

生产  
PRODUCING

汪民安 主编

“生产”的内在语义，就是生成，流变，活力，它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

第 6 辑



# 五月风暴 四十年反思

专题：“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

人物：当娜·哈拉维

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

艺术：我们在现实里都是盲人

文献：书的缺席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术馆

# P R O D U C I N G

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震惊了全世界。这场风暴过去了四十年，但是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事后影响。这是大学危机还是文化危机？是精神造反还是政治密谋？是诗意对抗还是阶级矛盾？是青年的本能宣泄还是革命的暴风骤雨？本辑的五月风暴专号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回顾和分析。五月风暴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退色，反而越来越突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表面。



ISBN 978-7-5633-7849-4



9 787563 378494 >

定价 36.00 元



汪民安 主编	第
生 产	6
PRODUCING	辑

# 五月风暴

## 四十年反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 第六辑, “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汪民安主编. 广东美术馆  
主办.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633-7849-4

I. 生… II. ①汪…②广… III. “五月风暴”(1968)(法国)—研究  
IV. D435.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97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 101113)

开本: 960mm×650mm 1/16

印张: 25 字数: 28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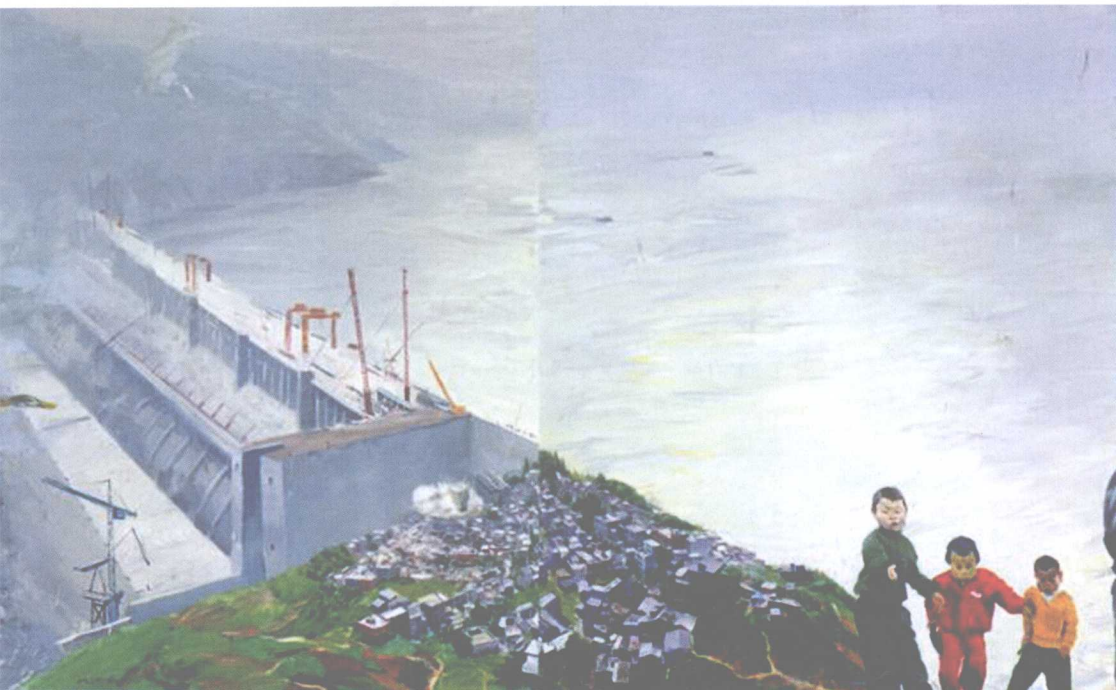
印数: 0 001~4 000 定价: 3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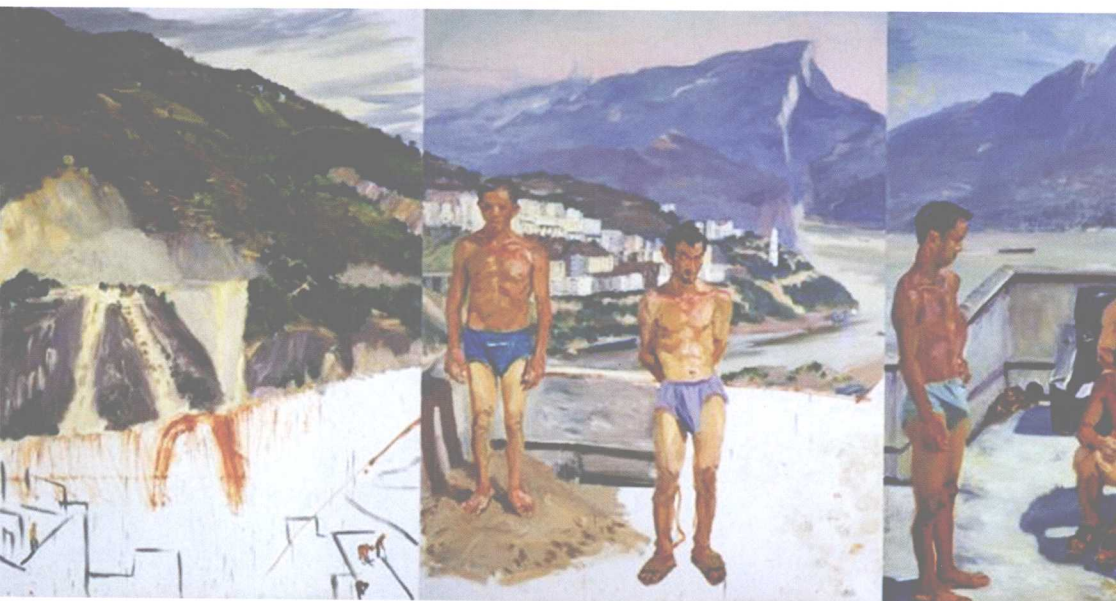


创作中的刘小东



刘小东 三峡新移民 300cmx1000cm 布面油画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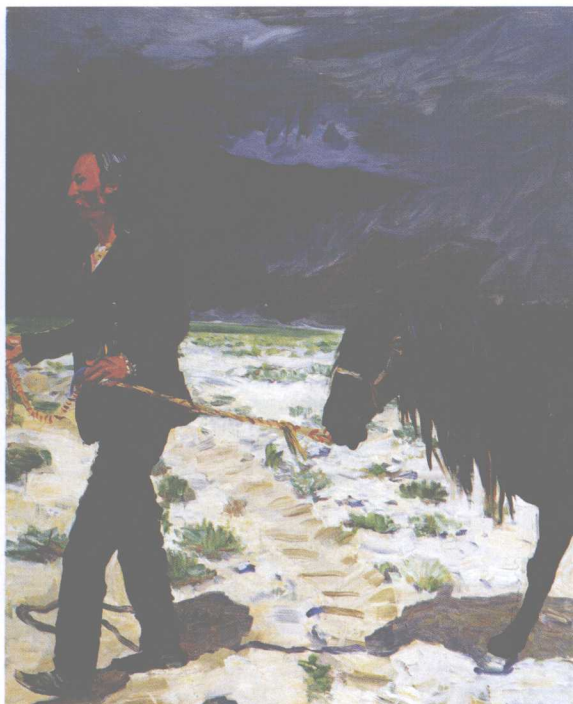


刘小东 温床 260cmx1000cm 布面油画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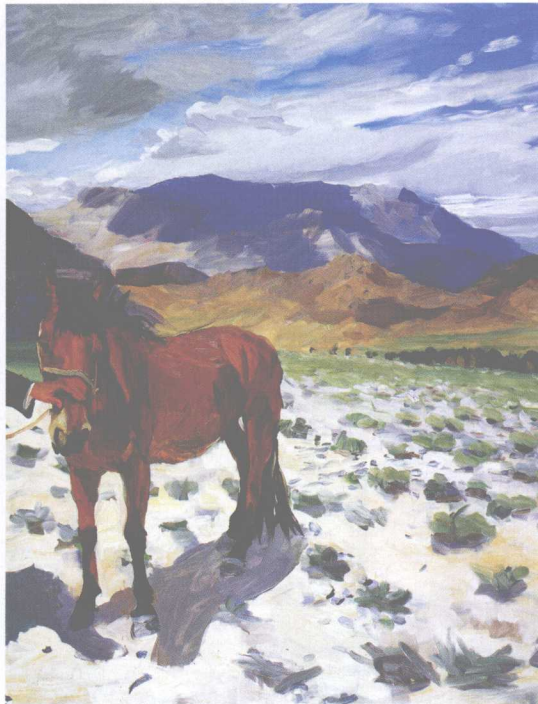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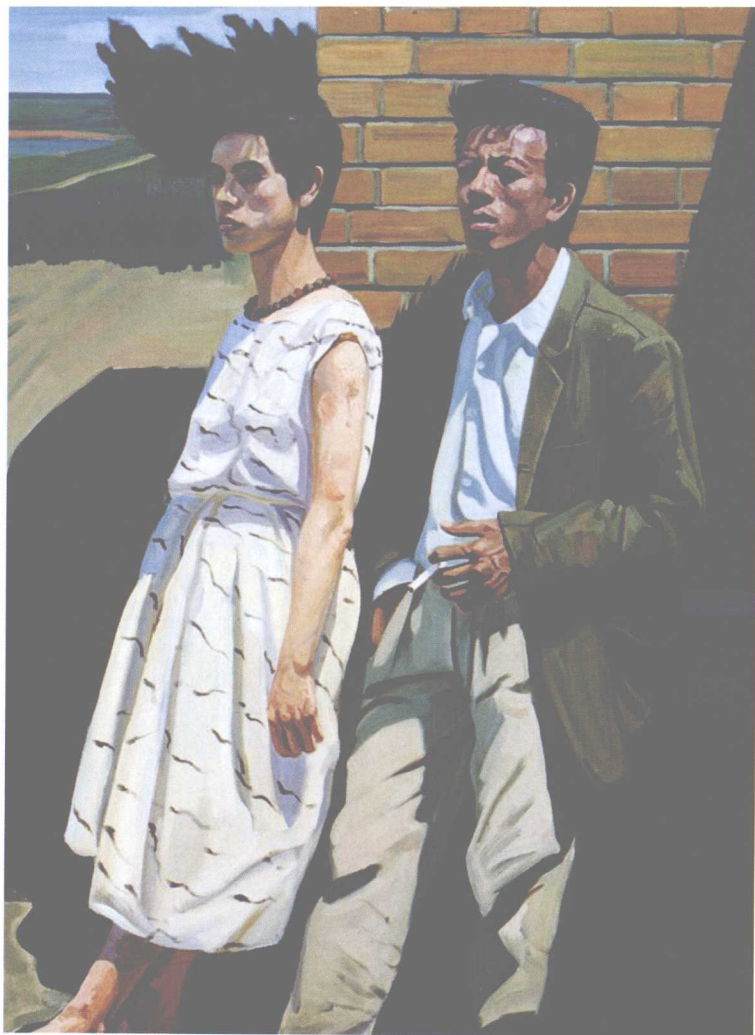






刘小东 青藏铁路（局部） 250cmx1000cm 布面油画 2007





刘小东 田园牧歌 170cmx120cm 布面油画 1989

# 目 录

## 专题：“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

- 003→共产主义设想 阿兰·巴丢
- 019→1968年5月发生了什么？ 基斯·A.里德尔
- 045→对1968年5月/6月危机的解释 菲利普·贝内东 让·图夏尔
- 082→法国1968年5月：一场新社会运动的兴衰  
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
- 111→1968年5月及其死后之生：导言 克里斯汀·罗斯
- 136→将反文化运动带入法国：《当今》杂志和1968年五月风暴的遗产  
克里丝·沃恩
- 157→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 阿仑·西尔维拉
- 172→巴黎红卫兵：1960年代法国学生的毛主义 朱利安·布金
- 194→社会抗议和政策改革：1968年5月和法国的教育指导法  
西德尼·塔罗

## 人物：当娜·哈拉维

- 223→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 当娜·哈拉维

## CONTENTS

290→赛博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当娜·哈拉维

### 评 论

32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抗战时期重庆“才子集团”的

“生活态度论” 黄晓武

### 艺 术

360→我们在现实里都是盲人:刘小东访谈 刘小东 孙善春

### 文 献

386→书的缺席 莫里斯·布朗肖

专 题

---

“五月风暴”  
四十年反思





## 共产主义设想<sup>[1]</sup>

阿兰·巴丢

赵文 译

萨科齐胜利之后的法国确乎弥漫着某种沮丧的气氛<sup>[2]</sup>。人常说最坏就是出其不意的一击,但意料之中的一击实际上也以不同的方式令人灰心丧气。就像好马良驹在比赛中获胜一样,在全国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的这位候选人赢得了选举,可就在此时,这个结果也莫名其妙地让人沮丧;凡是对博彩、冒险、意外和爆冷门有着最微妙感情的人,倒是都希望看到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局外人胜出。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5月之后身为总统,对法国左翼来说恰是使人丧失判断力的一击,但事情绝不仅止于此。仅仅只作为一个名字的“萨科齐”还蕴涵着更复杂的东西,这才是关键。那么,怎么理解这个关键呢?

最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选举结果借以使所有真正解放性规划凸显其无能特征的那种方式:选举偏好的表达被充分记录,但却是以地震仪式的消极方式被记录下来的,整个程序就其本性而言排除了所有使政治异见愿望得以实现的可能。2007年5月之后出现了历史怀旧的压倒性风潮,左派这一令人失望的判断力丧失的情形也构成了第二个关键。在自二战后形成的法国政治格局当中,“左派”和“右派”有着毫不含混的所指,而且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等政治派别也都对“占领”、“抵抗”和“解放”这一资产负债表

持有一致意见，而现如今这政治格局彻底分崩离析。这是萨科齐一场又一场豪华晚宴和一个又一个游轮假日的原因之一——左派再也唬不倒谁了，人们都说：富人万岁，穷人见鬼去吧。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情形使左派那些真诚的心灵充满了对于过去好日子的怀旧之情——密特朗、戴高乐，甚至希拉克，戴高乐主义的勃烈日涅夫，他们了解所要做的无非就是以最简便的方式让体制死去。

萨科齐如今让挨过了希拉克时期的日薄西山的戴高乐主义彻底断了气。2002年选举中若斯潘败北已经预示了社会主义者的溃败（第二轮选举作出投入希拉克怀抱的灾难性决定更是预示了这一溃败）。然而，目前社会党的分解并非由于其政治贫困，显然此前多年以来一直如此，而且也非由于实际得票率的问题——47%与其近年来的成绩相比并非太坏。萨科齐选举获胜看上去更像是法国政治生活象征结构整体的一记猛拳：这个定位体系本身早就失败了。造成令人沮丧局面的一个重要症状是，前社会党官员纷纷接受萨科齐内阁任命，中左派舆论制造者也为萨科齐唱起了赞歌；大船将沉，老鼠纷纷逃离，其数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背后的理由，当然是指这个唯一的政党的理由是：既然既有资本主义秩序逻辑已经包括了市场经济诸如此类的所有方面，为什么还要强撑着虚构那些反对党呢？

目前判断力之丧失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来自选举冲突本身。我将2007年的总统选举的特点——萨科齐与罗雅尔之间的竞争——界定为两类恐惧之间的冲突。第一类是特权者所感受到的恐惧，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攻击。在法国，这又表现为对外国人、工人、来自郊区的青年、穆斯林和非洲裔黑人的恐惧。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恐惧，并制造了一种对能起保护作用的主人的渴望，即便他剥夺并耗尽你的未来。这个形象当然现在具体化了，它就是具有超强刺激效果的警察首领：萨科齐。在选举过程中，与这第一类恐惧相对抗的并非是对自我决断的抑制性的

响亮肯定之声，而是对这一恐惧的恐惧：对这个警察形象的恐惧，过度恐惧，尽管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投票者对他极不了解也无好感。对“那种恐惧的恐惧”构成了第二种衍生性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内容——绝非多愁善感——几乎无人察觉；罗雅尔阵营对与被排除者和被压迫者的联合没有一点概念；这一阵营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怎样从恐惧之中尽可能多地得到可疑的好处。在以下问题上竞争双方是有着一致意见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法国军队正在那里作战），黎巴嫩问题（原因同上），非洲问题（非洲聚集着大量法国军事“管理者”）。然而，对这些问题转换思路的公共讨论在两个党派的议事日程上都付诸阙如。

第一类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之间的冲突以有利于前者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这里，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反射作用，这一反射在萨科齐获胜之后额手称庆的人们的脸上是显而易见的。而对那些被“对恐惧的恐惧”攫取的人们来说，所有的则是一种相应否定的反射作用，他们因选举结果而畏缩不前，这种否定性反射作用就是2007年令人绝望的判断力丧失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应低估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益密集地通过媒体和报纸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现在较之电视广播而言，报纸扮演着更为成熟老练的角色——在构成和动员这类集体情感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选举过程当中，现实似乎被削弱；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推进第一个恐惧不如说是推进了“对恐惧的恐惧”，推进了反应性的恐惧。我们虽然对现实境况作出了反应，但“对恐惧的恐惧”却只是在应对第一恐惧的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恐惧，于是也还离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这个位置的真空在塞戈莱内·罗雅尔空虚的高调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 选举主义与国家

如果我们给政治下一个这样的定义，“由某些原则组织起来的

集体行动,其目标是使目前由占统治地位的秩序所压制的新的可能性之后果得以释放”,那么我们则不得不作出结论说,选举机器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非政治的手段。这一点表现在这样一个鸿沟当中:一方面是大众的投票义务,另一方面是政治或意识形态信念所固有的即便不是非存在特性也是无具体对象特性。投票,这很好,为我的恐惧赋予了形式;但很难确信我为之投票的那个对象本身是好是坏。这并不是说选举—民主体制本身就是压制性的;毋宁说,这种选举程序被整合入一种国家形式当中,这种国家形式即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形式,配合既有秩序的维持,并且相应地履行某种保守功能。这就制造了一种更为深切的无能感:即便无法干预国家决策的普通市民不予投票,也很难看到某种解放政治出现的前途。

如果说选举机器不是政治程序而是国家程序,那么它获得了什么效果呢?拿2007年的教训来说,一个效果就是将那种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整合到国家之中——将这些大众主观因素投入到国家之中,最好是使国家成为恐惧对象本身,用恐怖和高压统治将它武装起来。民主的世界性视阈愈益频繁地由战争界定。西方投入数量激增的战斗前沿;要保持伴随着大量不平等的既有秩序,军事行动不可或缺;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只能靠暴力。这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战争和恐惧的辩证法。我们的政府解释说,他们投入海外战争是为了拒战争于国门之外从而保护我们。西方军队即便不在阿富汗和切克尼亚搜寻恐怖主义分子,他们也会不远万里去那里把充满怨恨的弃民组织起来。

## 策略性的新贝当主义

在法国,恐惧与战争的联盟以“贝当主义”这一经典名称为人们所熟悉。贝当主义的大众意识形态要为贝当主义在1940年到

1944年大行其道负责,这种大众意识形态部分地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惧为基础:贝当元帅或许让法国免于二战的灾难性重创,但采用的方式却是让法国绕过这场战争。用元帅自己的话来说,必须惧怕战争甚于惧怕失败。大多数法国人接受了整体溃败带来的相对宁静,较之俄国人甚至英国人,多数法国人在这场战争期间相当轻易地置身事外。今日与此类似的规划则建立在如下信念的基础之上,法国人只需要接受以美国人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法则,一切都会好起来:法国将会免于战争和全球多样性的灾难性影响。显而易见,今天法国的这两个阵营党派都在提供着这种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的贝当主义。接下来我要指出,这恰恰构成了对理解“萨科齐”这个名字所暗含的判断力之丧失而言至关重要的分析性要素;要把握这后一种规划的全部范围,其历史事实性和明晰性,我们就必须回过头看一看我要指出的该规划的贝当主义“超验”方面。<sup>[3]</sup>

当然,我不是说今天的形势和1940年溃败的形势类似,或萨科齐就像贝当。相似点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萨科齐之名所蕴涵事物的民族—历史的无意识之根也可以在贝当主义配置之中找到,在那种配置之中,判断力之丧失本身由国家这个巅峰自上而下地被庄严地发动起来,并呈现为历史的某种转捩点。这种模型式配置在法国历史上一再出现。它可以追溯到1815年复辟,当时获得侨民和机会主义者衷心支持的后革命政府又被拉回到外国人的行李搬运车上,并在身心疲惫的民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将使公共的道德和秩序得到恢复。1940年,军事溃败再一次创造了条件,国家行为的真实内容在那种语境之下以丧失判断力的方式彻底被翻转过来:维希政府不断地谈论“国家”,但这个政府却是因德国占领而被扶植起来的;最堕落的寡头政治却将引领国家走出道德危机;贝当本人,这位守护产业的上了年纪的将军,将成为国家重生的化身。

今天,新贝当主义传统的许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非常典型的是,投降协定和逆来顺受被说成是创新和复兴。萨科齐选战的中心主题如下:讷伊市这位市长将改革法国经济,让这个国家重新运作起来。当然,其真正的内容则是对国家复兴幌子之下高级金融命令持续服从的政治。第二个典型主题是衰退和“道德危机”,这使在复兴名义之下的高压手段得以合理化。凡是在大众动员的背景之下,政治的位置上总是会祭起道德,这太常见了。相反,他的呼吁诉诸勤劳工作,纪律和家庭:“美德终有回报”。20世纪70年代“新哲学家们”出现以来,道德对政治的这种典型移置就已经由致力于使历史判断“道德化”的所有那些人准备好了。目标则处在政治现实性之中:主张国家衰退与首都那些高级官员无关,而是民众中心怀不轨的某些分子的过错——他们当然就是外国劳工和来自郊区的青年人。

新贝当主义的第三个典型主题是外国经验的范式性功能。修正的样板总是来自国外,来自那些早已克服了道德危机的国家。对贝当而言,光辉的典范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国和弗朗哥的西班牙:这些领袖让他们的国家重新站稳了脚跟。政治美学是想象的美学:国家就像柏拉图的创世神一样必须紧盯着外国模式才能创生社会。当然,现今的样板是布什的美国和布莱尔的英国。

如下观念构成了第四个典型:目前的危机源头存在于过去某个灾难性事件之中。对1815年复辟这个“原型贝当主义”来说,这个过去事件当然就是大革命和处决国王。在1940年的贝当本人看来,这个过去事件就是人民阵线、布鲁姆政府,以及最主要的1936年大罢工和工厂占领行动。有产阶级更愿选择德国占领而不是让这些混乱重演。那对萨科齐来说,1968年5月——40年前的那场运动——的种种罪恶,常被当作目前“价值危机”的原因而一再提起。新贝当主义提供了一种有效地简化的历史解读方式,这

种历史通常将消极事件与工人阶级或群众结构联系在一起，而把积极事件与军事或国家结构——作为对消极事件的解决——联系在一起。1968年和2007年之间的时间之弧因而可以被当作萨科齐政府的合法性之源，继开端的有害事件之后必需的修正最终将由这个历史行动者着手进行。最后，这里还有着种族主义因素。在贝当统治时期，种族主义是赤裸裸的：根除犹太人。今天的种族主义则通过某种更具暗示性的方式得到表达：“我们不是低等种族”——言外之意是“不像别人那样”；“真正的法国人不需要怀疑他们国家的行为的合法性”——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行为合法性”。通过这些标准来看，我们可以指出：萨科齐之名所蕴涵的判断力之丧失可以作为贝当主义超验方面的最新表现而得到分析。

## 幽 灵

这位新总统坚决主张，对国家道德危机的解决——这是他的“复兴”进程的目标——就是“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初看上去这似乎有些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即1968年5月早就过去了。1968年5月的名字中有什么可使政权心神不宁的呢？我们只能认为，那就是“共产主义幽灵”，最近一波真正显现的“共产主义幽灵”之一。他会这么说（让我们模拟萨科齐的口吻来这么说吧）：“我们绝不受任何东西困扰。经验的共产主义已经消失，但这还不够。我们务必杜绝它的一切可能形式。即便是共产主义的设想——这是我们失败的代名词——连提都不能再提。”

什么是共产主义设想？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也就是在经典的《共产党宣言》当中给出的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自古以来便天经地义的那种安排——作为基础的劳动从属阶级隶属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阶级逻辑——绝非必然；这种阶



级逻辑是可以被克服的。共产主义设想还认为,有一种可行的完全不同的集体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将消除财富的不平等甚至劳动分工。大量财富的私人占有及其继承的转移方式将被取消。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高压国家的存在将不再必要;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为基础的漫长重组过程将注定使这样的国家逐渐消亡。

这样的“共产主义”仅意味着这样一套普遍的智性表征。它就是康德所说的理念,具有某种调节性功能,而不是一种规划。将这类共产主义称为乌托邦是愚蠢的;就我在此处对它们的定义而言,它们乃是智性模式,并总是通过某种不同的方式现实化。作为一种关于平等的纯粹理念,共产主义设想自国家起源之时便确凿无疑地存在了。只要有在平等正义名下对抗国家高压的群众行动,共产主义设想的萌芽和碎片就开始出现。斯巴达领导的奴隶,闵采尔领导的农民,他们所进行的群众反抗也许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不变式”的实践典范。就法国大革命而言,共产主义设想那时开创了政治现代性的新纪元。

接下来就要确定一下,在共产主义设想史上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现在处在什么位置。现代的壁画展现了其发展进程的两个伟大场景序列,当然,它们之间隔着四十年的鸿沟。第一个场景序列就是为共产主义设想划定位置的场景序列;第二个场景序列则是使之付诸现实的最初努力的场景序列。第一场景序列始自法国大革命,终于巴黎公社;让我们这么说吧,其时间跨度从1792年到1871年。这一场景通过起义打翻既有秩序而使夺取权力的群众运动连成一片;这场革命就是要废黜旧有的社会形式并创制“自由人的共同体”。在近一个世纪的进程中,由城市居民、艺术家和大学生构成的无组织的群众运动逐渐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型壮大。这一场景序列的高潮就是令人吃惊的首创性的——也是骤然失败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既展示了将群众运动、工人阶级领导和武装起义合而为一的非凡能量,同时也展示了它的局限:公社社

员们既没能使这场革命立足国内取得胜利，也没能击退外国背景的反革命武装力量而保卫这场革命。

共产主义设想的第二个场景序列时间跨度为1917年到1976年：始自布尔什维克革命，终于文化革命以及1966—1975年全世界范围内的武装造反的终结。这个场景被一个问题支配着：怎样获得胜利？不像巴黎公社那样，怎样抵抗有产阶级的武装反动，怎样组织新的政权以保卫公社使之免于敌人的冲击？问题不再是表述和验证共产主义设想，而是实现它：19世纪所梦想的，20世纪则要使之成真。对胜利的执著，其中心就是组织问题，而这种执著在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当中找到了它的基本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设想第二个场景序列的典型结构。党有效地解决了第一个场景序列遗留下来的问题：革命胜利了，既通过起义的方式也借助延长了的内战的形势，在俄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越南、古巴、新的秩序相继确立。

但是第二个场景序列接着又造成了新的问题，以它应对第一个场景的难题所使用的那种解决方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党推翻虚弱的反动统治是有着恰如其分的工具的，但在建构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一种暂时性国家，向非国家过渡的组织形式，国家的辩证“消亡”的组织形式——方面，党却证明是不得力的。党—国家结果发展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权威主义。这些制度的其中一些的确在教育、公共卫生和劳动力价格稳定措施方面实现了飞跃发展；它们也在国际范围内限制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然而，国家主义原则本身却证明是错误的，而且最终也是无效的。警察的高压统治并不能挽救“社会主义”国家，使之免于内部的官僚主义惰性；五十年里，它从未在资本主义敌人强加于它的巨大竞争当中获得胜利。第二个场景序列里那场最大的动荡——在其最宽泛意义上来说的文化革命和1968年“五月风暴”——可以被理解为疗救党的心力不足的某种尝试。

## 间隔期

第一个场景序列结束和第二个场景序列开始之间有四十年的间隔,在此期间,据称共产主义设想已经难以为继:1871年到1914年的那几十年中,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20世纪70年代第二个场景序列终结以来,我们便已经身处另一个类似的间隔期之中了,对手再一次占了上风。在此环境之中至关重要,共产主义设想的一个新的场景序列终于开始了。但显而易见,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二个场景序列的延续。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群众民主、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党,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的所有这些创新确实不再敷用。它们当然值得在理论层面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但是就实践政治层面而言,它们已经变得无效。第二个场景序列已然终结,试图使之重新来过则毫无意义。

在由敌人支配的间隔期内的这个时间点上——此时新的实验被死死压制——要确凿地说第三个场景序列的特征是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大致方向似乎尚可辨别:它约略是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层面之间的新关系——此种关系在“文化革命”的表达之中,或在“内心革命”这一1968年5月的观念之中初具雏形。我们仍须牢记来自第一个场景序列的理论和历史教训,仍须继续来自第二个场景序列的对胜利的追求。但新的途径既不能是奈格里和其他全球化替代论者所信奉的那种由群众智慧激发起来的无组织无形式或多形式的群众运动,也不能是某些托派和毛主义者所希望的对群众的共产主义党的复兴和民主化。(19世纪的)运动和(20世纪的)党曾经是共产主义设想的特殊模式,但现在不可能再返回它们了。相反,经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否定性经验之后,经历了文化革命和1968年5月的那些充满歧义的教训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另一种模式让共产主义设想成为现实,帮助它在新形式的政治

经验中得以实现。因此，我们的工作是如此复杂，如此具有实验性。我们必须专注于它的存在条件，而不只是去改进它的途径方法。我们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之中重新建构共产主义设想——重新表述劳动隶属于统治阶级并非必然的这一命题。

这个任务涉及哪些方面呢？从实验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试着找到一个支点，它应处于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和拉康曾说的“财富仪式”的暂时性之外。此支点在形式上与那种仪式相对立，并且能够支撑起普遍真理。可以下论断说“只有一个世界”。此话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当代资本主义可能自吹自擂说，它创造出了全球秩序；而它在当代的反对者也在谈论“替代性的全球化”了。就本质而言，这些反对者主张把政治定义为使现实所是的世界变为我们希望所是的世界的实践手段。可是，目前存在由人类主体构成的唯一世界吗？全球化的“这一个世界”只不过是物——待售物——和货币符号构成的世界，只不过是马克思所预见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程度地保持着不可入性。人们被闭锁在这个世界之外，诚如“闭锁”字面所示，他们常常被摒于这个世界之外。

柏林墙的倒掉据说象征了自由和民主的单一世界的形成。二十年后，显而易见的却是世界之墙的形式转换：它不再分割东西，现在它让富有的资本主义北半球和贫穷而濒于毁灭的南半球泾渭分明。一道道新墙在全世界范围内构筑起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非洲和西班牙飞地之间，富人的享乐和穷人的欲望之间——无论这些穷人是村庄里的农民，还是居住在贫民窟、郊区街区、私人房产、公寓、非法定居点和棚户区的城镇居民。资本主义所谓的统一的世界，其代价就是野蛮地对人类进行区隔，那些区域被警犬、官僚管理、海军巡逻艇、带倒刺的铁丝网和各种隔离措施分离开来。“移民问题”，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工所面临的境遇，恰恰生动地证明了——从人道角度来看——全球化的“统一世界”是一个假货赝品。

## 一个述行的唯一整体

必须扭转这一政治难题。我们不可能从对世界存在的分析性一致意见出发进而根据其特征采取某种标准化的行动。分歧无关乎属性,而关乎其存在。面对将世界一分为二的这种人为的和灾难性的状况——这就是在“西方”名下所完成的分裂——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将唯一世界的存在确定为公理和原则。但“只有一个世界”这个短句子并不是客观总结。毋宁说它是一句述行语:这唯一世界对我们来说以何种方式存在正由我们决定。一旦对此坚信不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这句简短的断言所造成的后果加以详述。

第一个后果是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无论是在餐馆厨房所见的非洲工人,我在街上所见正在挖土掘洞的摩洛哥人,还是在某公园里照料小孩的带着面纱的妇女,所有人都和我自己一样属于同一个世界。就在此刻我们便能扭转由物和符号构成的世界的观念,并由在此时此地着眼于生活的、行动着的人重构一个整体。这些人尽管在语言、衣着、宗教、饮食、教育方面与我相异,但却和我自己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由于他们像我一样存在,我就能与他们讨论——并且我们一起(就像和其他人一起那样)可以就事情达成协议或保持异见。前提是:他们和我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之中。

这时有人可能起来反对文化差异:“我们的”世界是由那些接受了民主、尊重妇女和人权等“我们的”价值的人构成的。其文化与此相反的那些人都不是这同一个世界的真正成员;如果他们想参加进来就得秉持与我们相同的价值,就得“归化”。正如萨科齐所说:“如果外国人想要待在法国,他就得爱法国;否则就必须离开。”要确定身份就得随时放弃“只有一个由生活着的男男女女组成的世界”这个原则。有人说了,我们必须把每个世纪的法律拿来作一番考量。是该

如此；但是法律并不对人的世界归属确定前提。它只提供在唯一世界的某个特殊区域当中有效的暂时规则。没人被要求热爱法律，而只需遵守。生活着的男男女女构成的唯一世界当然可以有法律；但这种法律绝不可能主观地要求你们必须和他人相同，也绝不可能对它治下的存在作出“文化”前提的规定。唯一的世界显然是无限博大的差异体系存在之处。从哲学角度来说——这绝非要对世界的统一性提出怀疑——这些差异正是存在的原则。

接下来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无限差异是否受什么东西支配呢？确乎只有一个世界，但是否这就意味着作为法国人，或生活在法国的摩洛哥人，或生活在基督教传统国家的穆斯林就微不足道呢？我们该不该把对这类身份同一性的坚持看作是一种障碍呢？“身份同一性”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一系列特征和属性，个人和群体可以借助这些特征和属性在自身当中辨认“自我”。但是这个“自我”又是什么？是由所有这些特征性属性所构成的多少可称之为常性的东西。因而我们可以说，身份同一性是支撑起这种常性的属性的集合。比方说，艺术家的身份同一性就是他或她的风格常性可以借以被辨认出来的同一性；同性恋的身份同一性由与可能的欲望对象之常性相联系的所有因素构成；某国家中外国人共同体的身份同一性则由借以能辨认出此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那些要素——语言、姿势、着装、饮食习惯等——构成。

由常性概念而如此被定义的身份同一性在两方面与差异相关：一方面，身份同一性总是与其他身份同一性相区别的；另一方面，它作为常性又不会变得不同。对身份同一性的确认有着另外两个方面。第一种形式是否定性的，即竭力主张我不是他人。比如在面对权威主义提出的归化要求时，就必然出现这种形式的身份确认。摩洛哥工人将会断然宣称他的传统和习惯绝不是欧洲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和习惯。第二种形式是指新形势中身份同一性的内在发展形式——就像尼采那句著名格言所说，“成为你自己”。

那位摩洛哥工人不会放弃构成他个体身份同一性的要素，无论是在社会当中还是在他自己的家庭里；但是他也将逐渐以某种创造性的方式适应这一切，以他寻获自我为限。所以他对自己所是——巴黎的摩洛哥工人——的发明并非通过内心断裂，而是通过身份同一性的扩展来完成的。

“只有一个世界”这句话的政治后果所起的作用，就是将诸身份同一性中最普遍的东西联合起来。最近在巴黎举行的一次集会作为一种地方性实验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未登记注册的工人和法国公民会集一处要求废除迫害性法律，警察的袭击和驱逐；要求外籍工人的存在现状得到承认；所有要求都不是不合法的；这些要求出自人的本性，这些人在根本上而言都处在同一种存在境遇之中——他们是同一个世界中的人。

## 时间与勇敢

“在如此巨大的不幸当中，你还剩下些什么呢？”高乃依的版本里，美狄亚的闺中密友这样问她。答复是：“我自己！我说，就是我自己，这就够了。”美狄亚所保有的就是决定她自己命运的勇敢；而我要说，面对我们时代判断力之丧失的时候，勇敢是最根本的美德。在讨论对压抑性痴呆的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拉康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讨论最终不就是导向了有关勇敢和正义的辩证式讨论了吗，就像是柏拉图那篇对话的讨论一样？在著名的“有关勇敢的对话”中，在受到苏格拉底询问之后，拉凯斯将军回答说：“勇敢就是当我看到敌人之时立即扑向他，与他作战。”对这样一个回答，苏格拉底并不特别满意，当然他接着温和地指责拉凯斯将军说：“这是有关勇敢的好例子，但例子还不是定义。”我要冒着与拉凯斯将军一样的风险给出我的定义。

首先，我坚持认为勇敢属于美德的一种——也就是说，它不是



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是在实践之中培养起来，由人建构起来的某种东西。进而勇敢是通过在难以忍受的境遇下的坚持而自行展现的美德。这不是与难以忍受的境遇偶然相遇的事情；那是英雄主义而不是勇敢。英雄主义与其说表现得像是一种美德，不如说像是一种姿态，我转而直面难以忍受的境遇的瞬间所表现出的一种姿态。勇敢的美德通过难以忍受的境遇之中的坚持而自行建构；时间是它的原料。长期作战是需要勇气的，其期限与世界法则所强加的那种期限完全不同。我们一直在寻求的那个点必须是能够和另类时间秩序相联系的点。占统治地位的[时间]秩序给我们派定了暂时性，但也只有那些被这暂时性所囚禁的人才总是动不动就惊呼——就像社会党的许多追随者所做的那样：“希拉克的十二年，现在又要再等下一轮选举。这就是十七年，也许是二十二年，也可能是整整一生！”他们最好也将成为沮丧者和判断力丧失者；而就最坏的情况来说，他们会变成“老鼠”。

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今天更贴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众多而丰富的19世纪现象正在重新搬演：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财富仪式”，青年人群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虚无主义，众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屈从，探索表达共产主义设想的众多小团体的实验精神，也是受群起之攻、被围追堵截的实验精神……无疑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和19世纪一样，今天最关键的不是共产主义假设的胜利，而是它的存在条件。处在目前压倒性的反动间隔期之中，我们的任务如下：将思想进程——就其特质而言总是全球化的，或普遍的——和政治经验——总是地方性的和独一无二的，但毕竟是可传播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共产主义设想得以复生，既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也在这片大地之上。

## 注 释

[1]1968年5月的幽灵何以在法国话语当中挥之不去? 阿兰·巴丢在这里探讨了个国家复辟和反抗的长时段场景,以及萨科奇总统职位的获得在这些场景中的特殊位置。他从柏拉图和高乃依那里汲取政治勇气的教益,并且发出了重申《共产党宣言》的奠基性担保的呼告。——《新左派评论》编者按, *New Left Review* 49, January—February 2008。

[2] 本文是 *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 Circonstances*, 4, (Nouvelles Editions Lignes, Paris 2007) 的缩写摘要,原书的英文本以“我们说‘萨科齐’时意味着什么?”为题由新左派书局(Verso)于2008年出版。

[3] 参看我的《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 Paris 2006),在那里可以看到对“超验”概念及其功能的展开论述,那些“超验”事物之功能就是对世界里多样性表象进行统治和秩序化。

## 1968年5月发生了什么？

基斯·A. 里德尔

赵文 译

描述事件就意味着事件被书写。一个事件如何可能被书写呢？“书写事件”的意思能是什么呢？

对1968年5月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加以描述的表述多种多样，这表明确切地说明那是些什么“事件”——在其最普通意义上所说的“事件”——何其困难。“危机”、“罢工”、“反抗”、“革命”、“(大学生)公社”和“内战”、“乌七八糟”(chienlit, 当时英文转译的委婉语意义上的“混乱”)，或者简单的记录时间的“五月”(无论前面是否加有“1968年”)，所有这些表述都是常见的词汇。表述一个历史运动的种种说法的这种异质性值得注意；如果说它们唤起的情感是强烈和矛盾的，那么巴黎公社、俄国革命和慕尼黑起义则通常以单一的名称为人们所认识。“五月”为什么如此不同？

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其持续之时，这些事件所造成的裹挟一切的强力与事后政治现状压倒一切的恢复原状之间存在着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贝内东(Bénéton)和图夏尔(Touchard)说到过“1968年5月和6月的危机”，尽管占领、路障和游行一直持续到6月十几号，但却是以日益孤立和绝望的方式坚持的。戴高乐在5月30号就发表了重要广播讲话，当天晚上就有人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了

支持戴高乐的大规模游行，而一直支撑着运动的那股力量就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消退。戴高乐将军发表讲话的一个月内，戴高乐派就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几乎并不让人吃惊。

可是此前的一个月，法国实际上在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和占领活动的影响之下已经陷于停滞，学生的行动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共有 900 万工人参与罢工，损失了 1500 万个工作日。正是大学生和工人的联合抗议标示出了法国 1968 年的不同之处，较之于当年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其他学生运动而言，法国的 1968 年影响要深远得多。戴高乐以其一贯风格带着沙文主义和含讥带讽的暧昧态度谈及“五月”：“永远如此，法国勇往直前。”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运动却使政治现状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大复辟，这也是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基本观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就是 1968 年 5 月的无限性，同时还有其无意义性。但是，要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必须复活那些事件所具有的斯芬克斯般的性质。

“斯芬克斯”这个词具有两层言外之意，一方面暗示了弗洛伊德“女性”之谜的著名提法(“你们当中的女人……你们自身就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暗示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所具有的谜样品质。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莫兰的这段话有没有这些言外之意，它都说明了“五月”最引人注目的那些方面之一，即其文化上的多样性和语义上的丰富性，而这更多地体现在运动造成的影响广度而不是运动本身的语汇规模之上。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巨大冲击，密特朗 1981 年当选总统及其随后对法国的统治，所有这些都从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五月”所产生的重大——但又暧昧——的后果，正因如此，“斯芬克斯”这个词的使用并不像有教养的法国读者所理解的那样看上去是清白的。这种蕴涵丰富的多义性表明“五

月”像棱镜一般，20世纪法国重大的文化变迁在其中得到了多重的折射。

## 怎样谈论“五月”？

人们以不同的名称了解那些事件，名称多样性本身就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用“危机”这个词儿谈论那些事件，是从制度层面来强调的；运动最活跃的时候，法国却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第五共和国，当时成立还不到十年，几乎到了解体的边缘，而且看不到任何切实的可能选择。相反，“反抗”和“革命”则强调了那些事件的引起欣快感的和改造的品质，加缪《反抗的人》(*L'Homme Révolté*)曾经在生存反抗(好的)和政治革命(坏的)之间所作的区分在这里没有了伦理控诉的意味，而只是反映了观察者多么深切地感受到了法国社会根本变革是可能的。因而，让·朱斯兰(Jean Jousselein)的《青年的反抗》(*Les Révoltes des jeunes*)把“五月”(1968年全球语境下的“五月”)视为20世纪重大的青年反抗活动，而在写作了《对父亲的反抗》(*La Révolte contre le père*)的吉拉尔·曼德尔(Gérard Mendel)看来，俄狄浦斯情结的成分才是至关重要的。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事件的后果使得很多著作用“革命”来称呼它们，有人说这运动是追随被背叛的托洛茨基的革命(安德烈·巴雍内[André Barjonet]的《1968年被背叛的革命》[*La Révolution trahie de 1968*])，对毛主义者来说，它是准备当中的革命(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的《法国的策略与革命》[*Stratégie et révolution en France*])，对心怀敌意的右派来说，它是一场幻想(雷蒙·阿隆的《无法发现的革命》[*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莫兰在1986年说过，“‘革命’现在对我来说是个被污染了的词”，这句话表明革命这个词——至少是在1968年该词广泛使用时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意义上说的那种“革命”——在多大

程度上受到了冷遇。我们可以说“撒切尔革命”或是东欧“悄无声息的革命”，这里不存在公然的暴力，但即便如此，“革命”一词也显而易见意味着不同的情况。现在板起面孔把“五月”当作一场“革命”来谈论已是相当困难，丹尼·科恩-邦迪(Dany Cohn-Bendit)二十周年回忆录的标题“Nous l'avons tant aimée, la révolution (革命,我们曾如此热爱它)”——英文版标题是“被重新经历的革命”，遗憾的是原来标题中悲伤的反讽意味丧失殆尽——就表明了这一点。

“内战”，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阿兰·盖斯马尔(Alain Geismar)和艾伦纳·莫朗(Erlyne Morane)所著《通向内战》(*Vers La guerre civile*)，以及埃德加·莫兰的“学生公社”(La Commune étudiante)都这样描述。这种说法可以被看作“革命”之对反形式的变体，它既强调流血——尽管在“五月”流血被避免了，但在毛主义者看来运动之后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又强调所有参加者共同表现出来的节日欢庆的性质。莫兰把“五月”比作一个“juekermesse”(游乐场)——既是一场游戏又全民平等，而且他也使用了“公社”这个词，显然他把那些事件与1871年的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当然，后者的结局恰恰就是“内战”这个词所标明的“流血”……

“乌七八糟”(chienlit)和“(总)罢工”具有最显而易见的政治内涵。“Chienlit”这个词从语源学上讲意为“把屎拉在自己床上的人”，而英文报章杂志在报道“五月”的运动时往往喜欢把这个词翻译成“乌七八糟”<sup>[1]</sup>，所以在语气上要缓和得多。(这个词在18世纪就被使用，用来指参加狂欢节的戴面具的名流要人，所以这个脏话带有明显的戏谑语气。)在1968年，最初使用这个词的是新法西斯主义刊物《分钟》(*Minute*) (5月2日)，继而戴高乐在运动高潮时期也使用了这个词，这次使用是臭名昭著的(“Les réform, oui! La chienlit, non!”[改革,是的!乌七八糟,不!])，而我手头的《拉鲁斯词典》以1968年为例解释这个词的第一个用法，其意思是指“无

序和混乱的状态”，可见作为“五月”的一个结果，这个词已经渐渐进入了当代法语语汇。可以想见，该词会被用作标题。《乌七八糟》(*La Chienlit*)是极右翼杂志《小白炮》(*Le Crapouillot*)的一期专号(多米尼克·维纳[Dominique Venner]编辑)，这期专号本身就是一部充满敌意的“词典”，在“五月”及此后三四年间广泛流传起来的那些有关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主张——挑战和质疑——以及这类主张所涉及的个人和概念，都遭到这个杂志的嘲讽；这个词通过当时的文本留在了法语的语汇之中，而这个词与其语境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因而几乎是不可转译的。有幅美术招贴画以典型“五月”风格的尖锐词锋进行了漂亮的还击，这幅画是戴高乐的漫画，上面还有一条文字：“La chienlit, c'est lui!”(乌七八糟，就是他!)

如果说“乌七八糟”带有戴高乐派的色彩，那么“(总)罢工”则更明显地具有共产党的色彩。法国共产党曾强烈谴责学生早期的抗议示威游行，特别因为这些游行是所谓“超左派”(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者、毛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策划推动的。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后来成为法共总书记)在5月3日的《人道报》上发表了恶毒的社论，他在社论中宣称，“必须积极地戳穿这些虚假的革命活动，因为从客观上来看它们服务于戴高乐派和大资本家垄断势力的利益”，并保留他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最克制的愤怒。直到5月10日晚警察施暴后工人也卷入运动时，法共才改变论调支持开始罢工甚至占领工厂的工人。此后路线明朗化了：警察的镇压不可饶恕，工人对改善条件和增加工资的要求完全合理并且要为之进行斗争直到(如他们希望的那样)选出一个左翼政府。“罢工”这个词在共产党人的著作中，在当时的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那里，以及在法共一流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那里，其含义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它还是暗示了“五月”的意义只能存在于工厂和车间

而不是被占领的索邦那样的教堂或奥德翁剧院。正如莫兰的“公社”唤起了人们对于 1871 年巴黎的记忆，法共的“(总)罢工”的说法则强烈地唤起了有关 1936 年和“人民阵线”的记忆，当时全法国的工人占领了工厂以支持新当选的左翼政府并保卫得到改善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把那些事件称为“罢工”就明确地意味着不能把它理解为“革命”。

如果说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表述的内涵多样性，那么不会令人奇怪的是，“中性”的表达是必要的，同样，两个候选词（“事件”和“五月”）显得如此平和且不透露任何信息。即便不带有意识形态侧重，“革命”一词也是一个明显的词语误用，因为没有任何制度被推翻；“危机”贬义太过明显，而“反抗”和“罢工”未能表现运动中的重要因素，我们提到的其他表述则太过感情化。一个简简单单的时间标签（在其他语境中可以和别的具体时间标签——“1066”，“十月”——共存）显然是个选择，而“事件”（根据我的《柯林斯英语词典》，其意思是，“出现或发生了的任何事情，尤指重大的事”）可以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无可争议地被使用以解决这个问题。

稍后我将说明——正如我从罗兰·巴特那里选择的题记所表明的那样——“事件”这个词甚至也具有概念上的言外之意，在当代法国知识生活中它还有诸多重要的含蓄意涵。但是我们还是暂时先来看看 5 月和 6 月的时间表。这篇冗长的介绍是必要的，它特别强调了我们的研究对象之困难，此一困难不可能奇迹般地消失，亦不可能被听之任之地接受，毋宁说它作为“书写(诸)事件”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一直存在。本文的标题也许现在应该重新表述：与其说“1968 年 5 月法国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什么既分散又联系着的事在 5 月共同构成了‘那些事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一看 1968 年之前那些年里事态的发展。



## 1968年之前的那些年

学生和工人中各种形式的不满情绪在五月风暴之前的几年中已经非常明显了。二战以后的那段时期(后来被让·弗拉斯蒂[Jean Fourastié]描述为“辉煌的三十年”)是飞速发展的时期,其间物质财富迅速积累,法国大部分的农业社会也转型为现代工业消费社会。1958年,仅有10%的法国家庭拥有电冰箱,到了戴高乐离职的1969年,拥有冰箱的家庭达到了75%。戴高乐的家长制和极权主义支配着这个经济和财富史无前例地增长(尽管分配并不平均)的时期,这个悖论已经透露出五月风暴的基本矛盾了,这个矛盾就是富足的物质与陈旧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某种乐观主义情绪在弗拉斯蒂的一部早期作品的标题中得到了反映,此书标题为“20世纪的大希望”(Le grand espoir du XX<sup>e</sup> siècle),副标题为“技术进步、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还题有让·莫内(Jean Monnet)的布道词“更好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然而,这种乐观主义的局限在十年之中就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用阿兰·德拉勒(Alain Delale)和吉尔·拉加什(Gellis Ragache)的话就能很好地说明当时的情况:“整个法国围绕着十几个‘增长中心’,而其他地区都成为荒漠或走向了衰落。”十年之后,人们毫不吃惊地看到,曾经那种对物质进步梦幻式的信念看上去十分荒谬可笑。

回顾起来,大学生世界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58年到1968年之间,大学生数量增长了224%,但是学校资源却没有任何扩增。南泰尔大学,地处巴黎——最富裕的——西部,1964年开始招收学生,当时这所大学的图书馆甚至还没有完工,处于城市的文化沙漠之中,而且与巴黎交通极为不便;难怪“事件”会从这里爆发……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学生的社会背景也改变了。UEC(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是共产党的学生团,长期以来一直是左派学

生当中的主导力量,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该组织却被内部的不一致所困扰。主要的异见者是那些所谓的“意大利人”,他们倾向于意大利共产党的道路(当时意大利共产党已经使自身彻底民主化并且批判了法国共产党斯大林式的中心主义);“中国人”,他们向往毛泽东的中国而不是苏联;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并把所有自主独立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批评为官僚主义偏向。1966年,亲中国的成员分裂出来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联,UJcml),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分裂出来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共青,JCR)——这些团体当时看似无足轻重,但在“五月”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更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于1966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自称为“造势主义者”(situationist)的学生团体通过选举接管了学生会。他们印发了一个小册子,题为“学生在经济、政治、心理、性和精神方方面面的惨况,以及对之加以改善的建议”(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iant considérée sous ses aspects économique, politique, psychologique, sexuel et notamment intellectuel, et de quelques moyens pour y remédier)。这个小册子认为大学生“和戈达尔与可口可乐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并且对直接民主形式和狂欢节式的革命进行鼓吹,这些内容可以说就是“五月”的先声。虽然他们对学生会的接管最终被宣布无效并予取缔(在大学背景里民主概念不过就是如此),但造势主义者们及其思想——我们后面还要探讨这些思想——显然在南泰尔和南特产生了影响。

当然,这并不是说1968年之前的普通法国大学生都被像露天市场上的叫卖者一样的左翼团体鼓动着,心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愤怒。但这些普通法国大学生普遍对戴高乐派政府感到不满,更不满于政府指派的大学当局,后者态度专横而且无法解决教室拥挤和课程设置乏味无聊的问题。大学生们日益看到富裕的法国却

存在明显的收入不平等,并且对刚刚于1962年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普遍感到不满,而这些都使他们对左派人士抱有模模糊糊的同情。大学生,如果是巴黎人而且不那么特别幸运,就得面对令人讨厌的选择,他或她延长了的青春期的要么是在家里度过,要么是在学校的宿舍里度过——后者的环境差不多一样逼仄,而且还可能更不舒适。无论如何,独立生活——特别是指性生活——似乎是不可企及的梦想。

青年工人可能更具经济独立性,也更容易接受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青年文化”(法国的摇滚歌星强尼·哈利代[Johnny Hallyday]和里夏尔·安东尼[Richard Anthony]就是那时蹿红的),但是较之于大学,工厂更明显地照搬了戴高乐派法国的独裁专横风格。工人的住房问题与学生的住宿问题一样迫切。当然,与大学生不同的是年轻工人们更喜欢给自己在旅馆(通常是教会旅馆)里租一间房。青年人在寻求自治的过程中潜伏着不满的情绪,而年轻工人们在工业普遍重建的那个时代对自己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感到不满也不足为奇。这两个方面的同时存在使五月风暴更加引人注目,但是二者却没有融合到一起,其他状况影响了它们的政治效果。

1968年1月在卡昂(Caen)的SAVIEM卡车厂爆发了一次罢工,工厂里工人不仅对低工资不满,而且也受够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高强度的生产,他们的行动已经超出了工会主张的温和的象征行动,演变成了真正的罢工,并在市中心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这次行动导致了一场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的激战,暂时占领地方行政区政府(威严的政府大楼)构成了这场激战的高潮。交战中有200人受伤,其中包括36名警察。5名青年工人后来被判监禁。这种踢开号召克制的工会的行动将会在“五月”一再重演,不过那时规模和强度要更大。

同一个月,南泰尔大学也爆发了一次冲突(在这所学校前一年

的11月已经爆发过一次为期10天的学生罢课活动),这次冲突发生在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和一个名叫科恩-邦迪的社会学系学生之间。米索夫应邀前来给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学生科恩-邦迪趁机问他为什么在他新近出版的论法国青年的著作中只字不提性问题,而米索夫回答说,最好让科恩-邦迪到水里凉快凉快败败火,而科恩-邦迪针锋相对地还击说:“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之下才可能有这样的回答。”后来科恩-邦迪通过道歉信的方式才平息了这次事件,但是科恩-邦迪和他的那种直面对峙的风格却不会那么快地消失无踪。

当时没人将科恩-邦迪的小插曲和卡昂骚乱联系起来,但现在放在一起看,它们看上去确乎是“五月”的预演。这让我们今天再看记者皮埃尔·维安松-蓬泰(Pierre Viansson-Ponté)那篇刊登在3月15日《世界报》上的标题为“法国厌倦了”(La France s'ennuie)的文章会感到特别可笑。物质繁荣和政体僵化的结合使得任何形式的社会巨变都看上去是不可能的。正如卡普狄维埃(Capdevielle)和莫里奥(Mouriaux)所说:“1968年5月和6月的事件的确难于把握,因为它们根本未曾被预见,也不可预知。”

大学生的不满情绪不仅只针对校园的生活条件,还集中在越南战争之上,1968年国际左翼力量的号召力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法国——实际上是整个欧洲——政治和政治生活明显停滞不前,这也意味着毛主义的左派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左派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第三世界。实际上只从其表面价值被理解的中国文化革命、被视作反抗美国这个歌利雅的孪生大卫的古巴和越南、中美洲人们的解放斗争,所有这些事件被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胡志明以及厄内斯特·切·格瓦拉等人格形象象征化了。因此而形成的“鸡尾酒”式的意识形态和肖像拼贴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维度,而这恰恰是戴高乐的法国和法国现有左派极度缺乏的。

3月21日,一个左派突击队袭击了在巴黎的美国运通大楼以

表达对越南战争的抗议。在被捕的六人中，札维尔·朗格拉德(Xavier Langlade)是南泰尔大学的学生，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南泰尔大学召集了会议决定以何种方式应对这个事件。科恩-邦迪提出了占领教务处的建议，教务处在塔钟大楼上面，俯瞰校园，而且晚上门也开着，没有保安守卫。学生们于是接管了 salle de conseil(评议大厅)，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类似“评议团”的领导机构，此次占领行动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半，最终达成决议要让“3月29日”成为“反帝国主义的辩论和斗争日”。

与将要发生的事情相比，三二二占领行动似乎微不足道，但当时它的重要性则不容忽视。因为，大学生，传统上被视为即使信奉快乐主义也还算温顺的群体，现在却占据了大学机构象征权力的主要场所，这在法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次行动还是 JCR(革共青)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集结在科恩-邦迪周围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联手行动，这次行动对 UEC(共学联)的左派进行了决定性的侧翼包围。无政府主义者讽刺性地把这个异端的联合称为“三二二运动”(Mouvement du 22 mars)，以影射 JCR(革共青)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六二六运动”的尊敬。

五月事件戏剧性地对既有政治肖像和政治话语提出了挑战，实在地讲，这些事件是在还未及造出它们自己的肖像和话语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它们的辞藻来源既有法语语汇(比如“乌七八糟，就是他!”这样的招贴画文字指向的就是已经存在的话语，或者就从 PCF[法共]的常用语那里借来词汇)，亦来自其他地方(难以计数的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招贴画)，但同时也为这套辞藻赋予了制造神话效果的动力，这一点就是运动能使得激情幻想延续下去的原因。甚至认为自己厌倦了“五月”的那些人——比如在《解放报》(Libération)五月风暴十周年专号上表达了这一情绪的塞尔日·朱利，以及在1986年翻来覆去地说“68陈旧了，86更好(68 c'est vieux, 86 c'est mieux)”这句话的当年的示威者——表达的恰

恰是对那套名词、口号,尤其是那些影像而非对其政纲的厌倦。20世纪60年代晚期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的“媒介即信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梅勒(Normal Mailer)想办法让BBC的电影摄影队在1967年10月21日他进行反战游行被捕时出现在现场,在这个时代电视可以转播越南战场上的爆炸,从而把战争以及对它的厌恶情绪带到中美洲的起居室里。我们将会看到媒体覆盖的即时性在“五月”的神话制造当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南泰尔的事例却表明电视广播还未涉入之时事情就开始进行了。科恩-邦迪和“三二二运动”之所以迅速闻名于世,恰恰在于他们与保守学生(或其他类型的学生)中的政治人物以及运动完全不同。科恩-邦迪从来不属于UEC(共学联)或其他任何有组织的团体;“三二二运动”实现了这样一种联合,它把本应该属于高度组织化的革命先锋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把行动的风格和形式看得至少与行动的明确要求一样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团结在了一起。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团体能够联合,完全是由于它们对戴高乐和法共的独裁专横共同的强烈蔑视。

对既有政治风格和政治组织的抗拒因UNEF(全法学联)实际上的解散而得到加强,UNEF那时基本上蜕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左翼团体的一个战场。1968年4月,PSU(统一社会党)的学生组织与托洛茨基派的FER(革命学生联合会)组成了联合班子共同领导UNEF。主席职位应在1968年4月13日的会议上转交给PSU(统一社会党)党员雅克·索瓦热奥(Jacques Souvageot),但会上一直对索瓦热奥横加指责,再加上新法西斯主义者前来滋扰闹事,最终他的主席任命就因会议的中断而不了了之。UNEF中各个派别——都由训练中的职业革命家组成——没有一个重视过科恩-邦迪,他被视为不负责任的业余革命者;但就在三周之后,索瓦热奥和科恩-邦迪并肩联手结成了同盟,显然,这完全是因“事件”的强力所致——若弗兰(Joffrin)就曾指出:“南泰尔的麻烦制造者和

富有经验的学生政治家之间的力量平衡使“五月”的大幕拉开了。”法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皮埃尔·鞠官(Pierre Juquin)在4月26日来到南泰尔大学谴责了那些鼓动者,把他们称为“有富爸爸的煽动家”(le agitateurs-fils à papa),但他本人却被赶出了校园。差不多在二十年后的同一天,这同一位皮埃尔·鞠官先生在总统大选中站在密特朗和法共候选人(安德烈·拉儒瓦尼[André Lajoinie])的对立面,高举“新左派”政纲,呼吁托洛茨基派团体以及仍旧抱着“五月”理想和观念的那些前共产主义者们的支持。

## 五月事件

5月1日,路线为从共和广场到巴士底狱遗址的传统工会游行照常进行,在政府看来,这种游行十四年如一日,毫无变化。但就在第二天,南泰尔文学院宣布关闭,“三二二运动”的八名参与者——当然包括科恩-邦迪在内——被勒令于5月6日前往学校的纪律委员会。学生们马上组织抗议集会,集会次日在索邦大学举行,但出席的人数不多,到了下午警察冲进集会场所,逮捕了500名学生。教育部长阿兰·佩列菲特(Alain Peyrefitte)和索邦大学校长让·罗什(Jean Roche)本来就特别害怕导致南泰尔文学院关闭的那些骚乱在索邦——法国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巴黎大学生生活的中心——产生连锁反应。尽管按照传统,警察是从不涉足大学领地的,但他们还是向警察求助,并确信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选择。

警察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把被捕学生装上警车并驱散围观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自发行动浪潮,这股浪潮也标志着“五月风暴”的开始。人群开始呼喊口号:“释放我们的同志!”,“停止镇压!”以及很快就流传开来的侮辱性称呼“CRS-SS(保安队-褐衫党)!”这令被捕的斗士们吃惊不已。这时警察的回应

则是野蛮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投掷催泪瓦斯和挥舞警棒，学生（不断有路过的青年加入其中）并没有退却，相反立即用卵石加以还击，并在卢森堡宫建起了五月风暴的第一个街垒。

通过词语暴力和肢体暴力宣泄了出来的被压抑着的能量，对野蛮的独裁所施威吓的拒绝，在甚至互不相识的青年人中一下子形成的团结——“五月风暴”所有这些关键特征都已经形成了，而政府处于劣势，措手不及，特别是前几日总理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UNEF（全法学联）——突然进入了行动的中心——和 SNE-Sup（全法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发出了举行全体罢课的号召，SNE-Sup 当时的总书记是阿兰·盖斯马尔，他、科恩-邦迪和索瓦热奥成了“五月风暴”当中最为人熟知的三个人物。

5月6日到10日的这一周里，学生运动拒绝与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除非释放被捕学生，重开索邦大学，警察从拉丁区全部撤离。集会、游行、传单、小册子一下子激增；五月风暴把印刷机奉为神明。拉丁区成了最野蛮的巷战的场所，巷战在5月10日的“街垒之夜”达于高潮。多亏了电影和电视工作者的在场，人们的注意力在此时已全部集中于巴黎，但法国其他大学城也成了游行和占领活动的爆发地点，其中南特和斯特拉斯堡最为活跃。

但是除了巴黎之外再没有地方有这么一个“街垒之夜”，如果说“五月风暴”当中有这么一个时刻，“风暴”所有释放可能性的被神圣化了的神话都围绕它聚集起来，那么可以说就是这个“街垒之夜”了。由于当局拒绝释放被捕学生，谈判已告终止；左岸进行大规模游行时，人们发现警察已经封锁了塞纳河上所有的桥梁。运动发出了“占领（拉丁）区”的呼吁——这是针对警察占领索邦大学而进行的争夺领土的还击，大约晚上9点，第一道街垒被构筑了起来。运动像野火一样被点燃，运动中人们用树枝、铁丝网、铺路石和汽车（按照巴黎风俗，汽车的主人非常乐意提供自己的汽车），把



它们堆积起来,但是从准军事的角度来看,这种街垒毫无价值。悖论的是,正是在其表面的无实际价值的特性当中,却蕴涵着某种象征价值,若弗兰就曾指出:

为了反抗他们(指警察)而建起的街垒是造反和兄弟情谊的象征。它们没有军事价值。开火放枪的武装军警无须借助坦克大炮就能在三十秒内将它们悉数拆除。盖吕萨克路以及附近地区的抵抗者在毫无事先计划或策划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他们的街垒,况且这些街垒紧密相连,很容易把建造它们的抵抗者包围其中而无路可退。有一个街垒甚至建在 cul-de-sac (死胡同)的入口!在1830或1848年,巴黎人民英勇抵抗军队,迎着他们的枪炮,从骑兵包围之中突围而出。那时的街垒是很讲技巧的;但在1968年5月,街垒只是符号,这样的街垒既返回了19世纪,同时又绝对地现代。没人希望内战,但所有人又都希望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街垒唤起了人们对巴黎公社那已经淡化了的记忆,进而把戴高乐派变成了凡尔赛分子。街垒召唤着浪漫主义者,刺激着激动的人们,轻轻拨动着共和主义者的无意识……在这场争取舆论的战斗中,街垒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它把历史拉向了大学生的一边。

这儿指出了街垒的动员效果;警察的暴力甚至在那些政治上不同情左派的人当中也激起了愤怒,让游行示威者激奋地团结起来,让迄今为止一直保持沉默的工会也参加进来。盖斯马尔和沙兰(Chalin,罗什的副手)的谈判在进行时被广播实况转播,但沙兰在谈判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实况转播。科恩一邦迪已经由于纪律原因而被正式禁止进入索邦大学,他还是加入了学生代表团去面见罗什,而罗什并未意识到科恩一邦迪的存在,直到佩列菲特打来一通狂怒的电话告诉他要驱逐科恩一邦迪为止。在“街垒之夜”,

五月风暴的狂欢节特征和自身的野性混为一体。

总工会(CGT)和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这两个主要联盟第二天早上磋商并决定在大团结基础上于下周一(5月13日)举行罢工,而那时几乎所有大学和许多中学都已停课。已于周六晚间从阿富汗返回的蓬皮杜总理已经在电视上担保满足学生的所有要求,但这个举措毫无助益,而且太晚了。5月13日这天,运动已经成为公开的政治运动,正如德拉勒和拉加什所说,“索邦大学重新开放并未结束大学危机,戴高乐派政府本身受到了质疑”。20万人(根据警方的数字)或80万人(根据联盟的数字)参加了由联盟和学生领导组织的巴黎大游行,左派职业政治家——密特朗、罗卡尔、孟戴斯-弗朗斯和瓦尔德克·罗歇——走在队伍的后面。科恩-邦迪则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激怒了总工会,当天晚上科恩-邦迪说:“对我来说,引领着游行队伍而把斯大林主义的垃圾们甩在后面可真痛快!”与此同时,索邦大学刚刚重新开放就被占领了,罗什所担心的“南泰尔效应”终于成为现实。占领成了接下来几周的主题,在工厂、百货大楼、中学和大学进行的占领是争取政治权力和个人自治的战争,但其表现却是夺取(物理的和象征的)空间的战争。5月14日靠近南特大学的法国南航工厂的工人占领了厂房,在办公室扣押了行政总监和助理们;第二天,克里昂(诺曼底)的雷诺汽车厂的工人如法炮制开展行动。突然爆发的暴力和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的紧张一下子扩大了,对年长的工人来说,是因为对1936年的记忆,对青年工人来说,则是因为与大学生的同仇敌忾。

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和行动的组织的两相结合恰恰是大学占领活动的典型特征:一方面是在阶梯教室和报告厅进行的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开讨论,表达各式各样政治风格和见解的传单、海报以及涂鸦;另一方面则是,每日选举原则基础上民主选出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围绕一些论题进行讨论和发

表报告,这些论题各种各样,比如拉丁美洲的反帝斗争、大学学科  
的重新界定以及膳食、婴幼儿托管、住宿(大部分妇女职责)等一系  
列物质基础问题。工厂的占领活动对抗性更强(毕竟那里有经理  
总监需要对付),而在意识形态上也不那么模糊(工资和条件的问题  
题被提了出来),但工厂里更多的是牌戏、投木球和跳舞,而不是毛  
主义的涂鸦和公开叙述梦想——尽管如此,工厂占领的节日气氛  
还是更少一些。

正是在这种质疑的喧闹声中,戴高乐在5月14日离开了法国去罗马尼亚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他的  
权威——无论是道德权威,还是宪法赋予的权威——都受到了质  
疑,但他很难直接面对这一困境,却宣称5月24日之前他不会  
对全国人民作任何解释,这样就加强了人们的这样一种印象:戴高  
乐对全国人民都关注的大事漠不关心。5月13日游行队伍喊出  
的“十年够长了!”的口号将响彻一个月。接下来,奥德翁这所国  
家大剧院在5月15日被占领,而剧院经理让-路易·巴霍(Jean-  
Louis Barrault)则表达了对学生的同情。知识界和文学界表现为  
压倒性的对学生的支持;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尽管他因  
一贯支持法共而受到游行者的讥笑,但还是表达了自己是站在他们  
一边的;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率领一队作家占领了作家  
协会(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法国最大的作家工会)的办公  
室;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则和其他一些人冲击了  
戛纳电影节,使其草草闭幕;让-保罗·萨特前往索邦大学明确  
表达对学生们的支持。巴黎附近布洛涅比杨古尔的雷诺汽车厂  
罢工比任何罢工都更具符号价值上的重要性,这场罢工从5月  
16日开始。“比杨古尔”无疑是权力基地,法国人中素有“雷诺厂  
打个喷嚏,法国就感冒”的说法。按照“五月风暴”那种“爱丽丝镜  
中世界”的逻辑,这里是法国先患上了感冒,雷诺厂才决定打这个  
喷嚏——没有人不曾受到这个喷嚏的冲击力的影响。CGT(总工

会)对学工的亲善一直怀有敌意,学生从拉丁区到比杨古尔的游行被挡了回去,而且“工人从学生瘦弱的手中接过火炬”这样的口号在比杨古尔也是被禁止的。但不管怎么说,青年工人无视工会领导的禁令而在全法国开展罢工和占领活动,那些工会领导们只得慢半拍的方式支持运动并试图保住自己对运动施加控制的权威。

科恩-邦迪(持有德国护照)于21日被驱逐出境,这道驱逐令是尽办砸锅事的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次日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而科恩-邦迪在本月底又潜回法国(有一种说法是,科恩-邦迪是藏在雅克·拉康的美洲虎汽车行李箱里潜回的!),他出现在索邦大学时戴着假发墨镜,当他把这些伪装摘掉时引发了一阵欢呼。戴高乐在5月24日向全国发表讲话,此时法国已经陷入瘫痪,罢工工人达80万人,公共交通全部中断,几无汽油供应。他的讲话构思得糟糕极了,以某种哲学风格大谈“参与”的必要,再辅之以全民表决的建议,好像他能在全民表决中获得信任票似的。不切实际的概念化的幻想和对自己个人权威的重申,这样构思的讲话恰恰是罢工者和学生们所不愿意听到的。历史学家阿德里安·丹赛特(Adrien Dansette)描述说:整个巴黎的人都在说“他等待了三个星期,讲了五分钟;他又准备在一个月内完成他十年都没完成的事情。”当天晚上,人们不停地喊着“再见,戴高乐!”,全国上下到处开始示威,这晚的示威也是最暴力的一次,导致了两名示威者的死亡(巴黎一名,里昂一名),人们之间流传着“巴黎股票交易所被烧了”诸如此类的说法,但实际上那仅仅是很小的局部火灾而已。“学生公社”和早些时候占领工厂行动的兴奋快乐现在给政治斗争的严酷感让位了。

5月25日开启的谈判就说明了这一点,谈判地点是位于格勒内尔街的劳动部,谈判者一方是工会,另一方是由蓬皮杜和其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就业国务秘书雅克·希拉克——他后来(两次)当选

总理——率领的代表团。谈判从周末开始一直进行到5月27日周一的上午7时15分，谈判结果形成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建议，其中包括每小时最低工资增加为3法郎，在对比考察国家补贴企业的工资情况的基础上分阶段把私人企业工人的工资提升10%，逐步恢复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作制度（这一制度曾因经济迅速发展和调整重构而被取消），以及罢工者在罢工期间可以得到平时工资的50%，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工会在私有企业中的代表权利。达成的这一揽子协定被提交给工厂群众会议，但是却遭到了普遍的拒绝，CGT的乔治·塞古伊(Georges Séguy)在1万名工人参加的集会上受到嘲笑，台下的群众高呼“人民政府”，显而易见，这句口号唤起了人们对1936年的回忆。看上去现政权已经打出了它的最后一张牌，可是谁以及哪个新的政权可以取代它呢？在接下来的四天，法国陷入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像南特这样的城市在5月的最后一周内与其说是在地方市政府当局的控制之下，不如说是由罢工委员会控制着。法国人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完全生活在一种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的氛围之中，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有这么一种印象：“现在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让人想起了左翼作家社会主义者马索·皮维(Marceau Pivert)那篇著名文章的标题——此文就是在1936年罢工和占领活动达到高潮时期发表的，同样也更其让人想起拉丁区“使你的欲望成为现实”或“让想象力夺权”之类更为著名的新超现实主义涂鸦。这对许多人来说是特别让人烦恼的景象，甚至是恐怖的景象，尤其因为此时既有的左派政治家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 政治家们的介入

在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庇护之下，这些政治家开始第一次走上舞台的中心，当然，比起

学生来,PCF对这两个人的指责要更多一些。孟戴斯—弗朗斯在道德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他一贯表示站在反对戴高乐政权的立场之上,并反对戴高乐那种把第五共和国的所有大权都揽在个人手中的做法。至于密特朗,他是从1965年开始反对戴高乐的。孟戴斯—弗朗斯出席了由UNEF(全法学联)和CFDT(法国民主总工会)组织的一次集会,集会以5月27日在(拉丁区南边的)体育场举行,作为第一次由非共产党员和非CGT成员参加的大集会,这次集会非常重要。尽管孟戴斯—弗朗斯没有发言,但他的到场本身意义重大,正如科恩—邦迪所说:“把所有寻求政治进步道路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而孟戴斯—弗朗斯就代表了这个选择。”

他还以更明确的方式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为弗朗索瓦·密特朗做工作。”就好像两人当中一个代表了(离现实较远的)某种选择而另一个则代表了政治现实性似的。密特朗在5月28日发表了声明,强调说5月3日以来法兰西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了,并且呼吁组成另一个临时政府筹备总统选举。他要求自己成为这个临时政府的领导,同时相信孟戴斯—弗朗斯可能会与他竞争,但也表明了他会全力投入到总统的竞选之中。这个声明招致了一片指责声,因为它听上去给人的印象是密特朗——这个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十年够长了”的“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强迫国家首脑下台趁机夺权,因而更彻底地危及了第五共和国脆弱的合法性。PCF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当天稍晚时候呼吁共产党应该参加临时政府,他无疑希望这足以满足那些反对格勒内尔经济(而不是唯经济论的)协定的工人。

人们对现政权的维持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大学之外——开始的时候正是大学使学生和(独立于或通过工会的)工人联合了起来,现在所有的左翼政党都要求戴高乐立刻离职——这些政党实际上早已就这一点达成了共识。第二天

(5月29日),戴高乐适时地离开了,尽管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说这是政治统治和个人威信崩溃的表现,又可以说是继拿破仑从艾尔巴返回这个事件之后法国历史上最重大的“逆转”,或者说两者皆是。上午11点45分,戴高乐离开爱丽舍宫偕夫人登上直升机,人们都认为将军是去他在科隆比的乡间别墅暂时休息几个小时。凌晨两点,有消息称他并不在那里。他在两个小时内行踪全无;高级部长们碰头时猜测说很可能他已经自杀了,让·蒂波多(Jean Thibaut)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法国》(*Mai 68 en France*)当中透露出当时新闻界的猜测是“他也许独自去散步了,去思考思考,就在森林里”。对事件的这两则神话性的猜测,就像人们愿意相信的那样,把他说得更像个古希腊执政官而不是现代政治家。后一种猜测无疑传到了蓬皮杜的耳朵里,但他保持着令人钦佩的沉着冷静,他立即表示明天就在电视上发表声明,但确实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有一个谣言在全法国范围内散布开来:他去了科隆比,在那里准备他的离职声明。

其实那时他正在距法国只有几公里的巴登-巴登与马絮将军(Jacques Massu)共进午餐(一个煎蛋两杯咖啡),后者是法国驻德国部队总司令。马絮后来说,戴高乐来到巴登-巴登之时彻底绝望了,斥责共产党逼着他离职;马絮则给予戴高乐支持,并使他重新振作起来,这让戴高乐在一个小时之内改变了主意。会谈中似乎并未提到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也许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吧。戴高乐“神秘之旅”的真正目的——正如那天下午早些时候人们所了解到的那样——无非是给在狂欢和恐惧两极之间摇摆的这个社会一个警告。

蓬皮杜的解释确证了马絮的说法(指戴高乐打算辞职),尽管我们怀疑他的解释多少带有一些个人的先入之见——在最危急的时刻,只剩下蓬皮杜还在支撑着宪法和政治都已经岌岌可危的大局,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本人就曾决定在戴高乐撤他职之前宣布辞

去总理之职。“神秘之旅”事件后的几天中蓬皮杜曾两次坚持辞去总理职位，但戴高乐对他说：“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非常虚弱，我对自己不再自信了。”戴高乐一向把自己等同于法兰西民族，这种神话性的“自居”使得这话听上去非常可信，他的确体验到了难以承受的背叛的感觉，真正的事实是他已经78岁了——这一点足以支撑“马絮/蓬皮杜假说”。戴高乐自从罗马尼亚返回法国之后几乎没有合过眼，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他所经受的持续的公众嘲讽就足以表明他与那些无论如何都算是更年轻的法国人相距有多么遥远。

然而，对包括米歇尔·若贝尔(Michel Jobert, 当时是蓬皮杜的高级顾问)和戴高乐的女婿阿兰·德·布瓦修(Alain de Boissieu)在内的其他许多人来说，戴高乐的消失和返回乃是了不起的成功策略之一。5月24日他发表那篇糟糕之极的讲话之后，尽管空气中弥漫着危机——他本是应对危机的老手——的气息，但形势反倒变得对他有利了。其传记作家让·拉库图尔(Jean Lacouture)机敏地评论说：“如果说在格勒内尔实现了从田园诗到经济学的转移，那么在夏雷蒂(Charlety)则实现了从神话到政治的转变。”难以指明但无处不在的可怕的难以捉摸的事态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地狱是中世纪为罪人准备的去处，被大混乱困扰的现代神学家也构造了地狱的景象——对父的剥夺”，用让·拉库图尔所说的这种景象去恐吓他堕落的人民，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策略吗？

这样看来，巴登之行似乎是扭转乾坤的一招妙棋，戴高乐实现了“从神话到政治”的转变，但又通过他的总理让下面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法兰西至少在政治上一贯充满了神话气质，现在更是如此，通过这种方式戴高乐坚持了自己的主张。次日他在讲话中说他考虑了“每一种可能性，无一遗漏”，拉库图尔补充说“每一种可能性，也许还有所有的机会”。在甚至包括“使你的欲望成为现实”在内



的“一切皆有可能”的这个时刻——在以语言矛盾纷呈为其典型特点的这个时刻，互不相容的矛盾共存于这个摇摆不定的权力核心，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 戴高乐的反击

5月30日4点30分，戴高乐向全法国人民发表了一周内的第二次讲话，这次讲话通过广播进行，只有声音没有电视转播。ORTF(法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大部分成员在举行罢工(最开始罢工的原因是抗议政府阻挠他们转播报导学生们的游行活动)，而广播讲话也巧妙地避免了切断信号所可能造成的侮辱。但这一举措同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醒，唤醒了人们对戴高乐许多年前另一次广播讲话的记忆，那是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暂时的流亡地伦敦通过广播发出号召，呼吁抵抗德国侵略者。菲利普·阿尔丰希(Philippe Alfonsi)在莫里斯·杜高松(Maurice Dugowson)1985年策划的“巴黎，一天中的故事”这个电视节目上介绍这次讲话时这样说，“四分半钟扭转一个国家，就是这篇讲话”；若弗兰则称之为“一篇政治杰作”，而且难以辩驳。讲话的声音充满自信，与5月24日那次是那么不同，自我表白(“我考虑了每一种可能性，无一遗漏”)，自我主张(“我不会退让；我受命于民，我要履行我的职责”)，不可思议的偏执(“有组织群体的胁迫、放毒和暴虐”)，以政府更强硬的干预相威胁(“如果这种事态继续下去，那么我不得不……采取全国直接选举之外的其他手段”)，以“红色威胁”相恐吓(“利用国民绝望情绪而夺取的权力……将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强权”)，以及最终对法兰西民族充沛而鼓舞人心的信心(“共和国不会拱手交出权力，人民必将团结一致，进步、和平和独立将与自由一道取得胜利”)，所有这些方面在讲话之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他宣布立即解散国民议会，于下月底举行大选，从而牢牢地

抓住了短期政治发动的先机。民主德国暴力镇压了1953年暴乱之后，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讽刺地反问：“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他们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另选一群呢？”戴高乐的讲话就是号召这么做的。

这篇讲话的回响——声音的回响和神话式的回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可能的武装介入的暗示也起了作用。迄今为止暴力活动虽然波澜壮阔但大部分只限于象征行为，而且汽油的匮乏也使得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死亡人数很少。5月24日接受采访的一名示威者说：“他们在越南战斗，他们在玻利维亚战斗，而我们在这里战斗。”但是阿蒙(Hamon)和洛特曼(Rotman)在谈到5月10日的“街垒之夜”时表现得更为理智，他们说：“他们整夜假装打仗。尽管战斗双方不交一词，但每个人都明白有一个边界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不能故意杀戮。”戴高乐语气沉重地多次强调宪法所起的作用就是提醒人们，作为总统，他也是军队的统帅，而他对“公民行动”的责问以及颇有深意地谈论“采取全国直接选举之外的其他手段”则暗示他不惮于动用他的权力。工人们已经得到了照通常标准看能想象到的最有利的回报，而学生在此前的战斗中已经筋疲力尽，在如何甚至是否采用某种政治策略问题上难于达成一致，这些都让他们吃尽苦头，而且随着紧急状态的气氛的形成和国家生活的瘫痪，工人学生之中日益增长着厌倦感。由于汽油的匮乏，多数巴黎人都感觉注定要郁闷地待在瘫痪的城市中度过圣灵降临节的周末假日，可就在这之前戴高乐发表了他的讲话。

人们所担心的并没有发生。5月30日夜里爆发了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不过这次示威是为了支持戴高乐。右翼日报《民族报》说走上香榭丽舍大街的游行人数以百万计，并平实得多地报道说有30万名警察出动执勤。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声明文学家并不完全跟着

学生和罢工活动走；作为文化部长的马尔罗和米歇尔·德布雷(Michel Debré)，还有皮埃尔·梅斯梅尔(Pierre Messmer)等其他官员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蓬皮杜拒绝参加此次游行，他认为他的参加看上去将非常具有挑衅性)。就像初次参加学生游行的大学生一样，这次游行的参加者中有许多人都并非出于政治目的，但就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也有许多令人作呕的渣滓，他们在政府特赦尚在监狱中的“秘密军”(OAS)恐怖组织成员的许诺下集结起来支持现政权。所以此次游行中“起来，戴高乐！”的呼声混杂着“科恩-邦迪去达豪！”的口号，恶意对抗学生们“CRS-SS”(保安队-褐衫党)！的口号。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其他省份也出现了大规模游行。“运动”不再有自己的地盘了。就在圣灵降临节人们大多外出度假之前，汽油加到了发动机里。

UNEF(全法学联)喊出了“选举=背叛”的口号，呼吁在6月1日进行示威，但是没有赢得多少人的支持。自此以后游行和占领活动的调子变了，变得更加尖锐但也更加困窘；“五月风暴”的节日性质，就像新异教徒按照历月行事一样，也是和“历月”联系在一起的。6月10日，也是选战开始的当天，发生了最著名的死亡事件——吉尔·托丹(Gilles Tautin)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跳进了(巴黎附近的)弗兰河溺水身亡。接下来的几天爆发了最后一波群众示威活动和第三次“街垒之夜”，在法国东部的索肖(Sochaux)造成了两人死亡。ORTF(法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于6月3日被占领，另一方面占领者分别于6月14日和16日撤离奥德翁剧院和索邦大学。6月17日雷诺厂工人在接受格勒内尔协定基础上复工，其他工厂的工人也纷纷效仿停止罢工。6月30日，第二轮议会选举结束，戴高乐派获得决定性胜利。在“受到惊吓者组成的议会”(戴高乐这么称呼它)当中，右派(在超过485席的总席位中)从左派那里夺取了一百多个席位。左派示威者中开始流传一句口号：“这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继续战斗！”这句口号在此后的几年中都能

听到。“什么”开始了,以及他们曾为什么或将为为什么而“战斗”,则一直是一个疑问。

### 注 释

[1] 英文翻译的字面为“dog’s breakfast”,从法文的“chien”(狗)而来,意思为“乌七八糟”。——中译者注

## 对 1968 年 5 月/6 月危机的解释

菲利普·贝内东 让·图夏尔

赵文 译

颠覆活动？文明的危机？围绕 1968 年 5 月/6 月危机形成了许多解释，众说纷纭。那些解释者与事件之间距离太近，因此他们的解释与其说是科学的解释，不如说是富有诗情的起诉，还有不少人，甚至是多数人，表现出的态度与其说像是分析者不如说像是辩护律师。大多数解释以富于激情的方式被书写出来，但它们毕竟揭示了——或有助于解释——一个复杂的、原因众多的危机，评论家们各自在这个危机中看到了最好的或最坏的事物，寻找着谴责/定罪之合理性和理由的材料。这些事件发生了，表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因素，它们难于理解或难于用一种原因加以解释，因而这些事件要求不同的解释：野蛮侵袭或精神的复兴，诗性反抗或阶级斗争，青年革命或精神危机。

从意外事件到精神反抗的所有这些解释涵盖了方方面面，要么是对整个事件的解释，要么则是对局部的解释，而且调动了不同的专业学科知识：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精神分析，等等。对这些解释加以分类是一项精密细致的工作，因为它们的解释目的绝非相同。尽管一些分析者提出了方方面面的整体解释，但还有一些分析者只对危机的某一方面感兴趣，而不考虑将大学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纳入一个整体的时间表。我们认为可以区分出八

类解释,它们针对不同的层面,而且意义也不尽相同:

- 颠覆活动;
- 大学危机;
- 头脑发热的青年造反;
- 精神反抗,文明危机;
- 阶级冲突,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形式;
- 传统性质的社会冲突;
- 政治危机;
- 各种因素的偶然遇合。

我们的目的是,对这八种解释类型进行一个综合性考察,让提出这些解释的解释者各自表述自己的理由,从而点明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难题。尽管我们也意识到了这种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但它自有其优长(特别是对法国之外的读者)——我们并不在既有的解释上再作我们自己的、“正确”的解释,而是尽可能细致地记录已经说过的、已经写下的那些解释。

## 颠覆活动

不可避免,最早的也是最能迷惑人的解释就是将其说成一次密谋。戴高乐将军在事件发生后就给出了视野宏阔的解释——我们千万不要“用狭隘眼光看大事件”,一开始他在1968年5月30日就说:“法兰西……受到了独裁的威胁。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妄图利用国民绝望情绪而夺取权力,显而易见,胜利者夺取的权力将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强权。”

几个月后,1969年3月,总统又对这同一种解释进行了强调:

两个月的时间内，所有地方的正常工作整个都被打断了。这可怕的混乱使人民濒临绝望的边缘，而我们也看到那些主要的策动者起来与共和国对抗，他们在一群空想家、一群野心家和一心报复的人簇拥下暂时夺取了权力，继而使整个国家陷入致命的极权主义之中。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次颠覆活动和大破坏是怎么被挫败的，多亏了政权的凝聚力，多亏了在我迫切需要时人民所给予的极大信任，先是那次游行和示威，然后是大选。

乔治·蓬皮杜总理直到1970年2月才把那次事件理解为青年危机，而此前他并没有时间作这样的思考，所以在1968年6月他持这样一种观点：

首先你们要记住，职业颠覆集团——狂怒者(enragés)、头脑发热的人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团结一致口号下把青年人和学生引入歧途。某个极权主义政党发动机器介入进来，试图控制大街上的局势，使经济活动陷于停滞，进而最终公开地提出权力要求。

如果说总理出于选战的种种目的而集中精力盯住了共产党，那么内务部长则特别热衷于揭露这些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它们的“真正目的是暴力推翻政府，彻底破坏共和制度和民主”：

近几年来，托派团体和卡斯特罗主义团体这些革命集团在我国组织起来。其革命活动表现为高度宗派化的、激进的、阴谋的暴力活动，其每次运动都能纠集1000至3000名好战分子，这些团体和运动的目的就是夺取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动用如下手段：捣乱性质的罢工、占领公共设施，

走上大街进行抗议游行，骚乱。

这些新兴的革命集团在此次五月骚乱和示威当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部长与部长之间想法也不尽相同。如果说马塞兰(Marcellin)部长猛烈谴责利用了青年的煽动者，那么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部长则可信地驳斥了阴谋理论：“学生的行为和一时冲动的原由不是一小撮领头人的煽动作用，也不是虚无主义，更不是对暴力的兴趣。就这次愤怒爆发的起源而言，其中有某种深层病灶。”这些表述之间的不一致很难形成对阴谋理论的支持。

阴谋——什么阴谋？把法国1968年事件说成是“极权主义阴谋”，借以唤起共产主义幽灵，这无疑是一种政治手腕，对6月大选非常有利，但几乎不用长篇大论的分析就可以证明法共和任何激进左派的阴谋无关，何况法共曾拒绝称那种形势是“革命”形势，在危机的最初阶段它明显保持着温和的态度。国民议会解散之后，法共全面地参与到选战之中，尽管最后落得一个惨败的结果。我们不必对此加以讨论，因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可以得出一个更合理的结论，即1968年法共“在客观上”有助于保卫第五共和国的政权，而不应把颠覆阴谋的责任加之于法国共产党。

即便说阴谋的责任落不到法共的头上，也能推给北京、哈瓦那，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就像弗朗索瓦·杜普拉[François Duprat]所认为的那样)民主德国。这些不同的说法很有意思，但是它们仅仅是一些假说，而且都有一个主要的漏洞，即为众多“宗派”——无政府主义者、蓝伯尔派托洛茨基主义者、弗朗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毛主义者、法共的异见人士——赋予了某种一致性，而实际上在1968年5月他们根本没有(即使表面上)这种一致性，就算有，这种一致性在“五月风暴”结束之际也已经非常脆弱了。可



以肯定,“三二二运动”的参加者、JCR(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FER(革命学生联合会)成员和 UJCml(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与 UNEF(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各派别的战斗者们一道通过他们简单但却有效的战术——招致“镇压”的“挑衅”、团结一致示威游行、占领大学建筑物、建立行动委员会、大集会,等等——在危机的爆发和传播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诡雷”的根源仍然处于晦暗之中,前述种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说明造反在学生大环境当中的影响,也无法说明更大的危机效果。重要的是考量别种类型的解释。

## 大学危机

1968年5月24日,戴高乐将军谈到大学时提到了“这个大机构在适应国家现代需要和青年人角色及就业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能”。在受到总统的指责之后,大学就已经成为了众多分析的对象,这些分析中绝大部分绝非是宽容的。价值判断和专断的判词大量涌现,即便如此,却很少有人能平心静气作冷静的解释,或拿出一篇像“Epistémon”一样准确的有关南泰尔文学院的目击证词。

在所有这类分析中,我们作了区分,一种分析着重点放在大学体制的僵化上,另一种分析则强调大学生的社会边缘化。

### 僵化的大学

1968春夏之交以来,对“拿破仑风格的大学”的指责就已经非常普遍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各种方式批评“在集中化奴役之中令人窒息、毫无活力的大学机构组织”。集中化指整齐划一、导致瘫痪的管理以及缺乏自治。它也意味着纵向刚性——科系之间铁幕重重——和横向刚性——文学院里有博士学位的和没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之间,法学或医学系里通过高等教师资格会考

(agrégation)的和没有通过的教师之间彻底隔绝分离。

1968年五月危机的前两年,在卡昂的一次会议上对大学机构组织的评议就已经开始了。参加此次会议的大多数是来自科学科系的教师。这些教师花了很长时间探讨“自治”、“多学科”和“废除教授制”等问题,他们还提倡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这种大学不再是以招收尽可能多的学生为目的并全部顺应同一种模式的科系集合。会议结束形成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招致了文科和法学科系的极大敌意——会议论文中有几篇旨在调整大学组织结构使之更具灵活性的论文还是由教育部委托准备的。据信这些论文“将于1967年春发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仍然有人猜测它们将于1968年4月“发表”。

那么大学拒绝任何改变吗?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认为是的,他一直以来把“官僚科层现象”的分析运用于大学:

这样一种系统本质上密不透风,从无变化。它既不了解也不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修改课程大纲不仅威胁职业前景,而且也是对教学团体权威的质疑。改变工作方法和工作关系将会打破组织的平衡,在组织方面所进行的任何改革都将受到教师反对以及相互分权牵制的不同团体之间的斗争的抵抗。

这些说法过于概括,因而不能不加质疑地予以接受。诚然,大学饱受组织结构僵化之苦,行政管理集中化、一刀切的制度化,以及人数过多的教职员集体表现出的保守主义,这些都是改革的阻碍,但是我们也应该在权力关系和科研组织之间,在不同的科系组织之间作出区分。

实际上15年前甚至更早些时候就已经启动了许多改革措施。国家在1954年和1959年调整了法学学位,1958年和1961年调整

了医学学位,1966年调整了理学学位和文学学位,1963年调整了药剂学学位,等等。这些改革从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范围极广,但是并未涉及大学的全部。它们基本上只涉及学科课程设置的和科研组织,而并未触动大学的组织结构和每个院系当中的权力关系。

显而易见,这种灵活性促成了竞争的形成——可以看出,与其说这是纵向灵活性(这从未太多地困扰过起来造反的学生们),不如说是横向的灵活性,正是这种灵活性使大量的青年教师站到了学生一边。这些青年教师的支持无疑推进了在被占领院系里的抗议运动,但是最终下结论说“五月风暴”的根源是对有缺陷的大学组织结构的反抗则过于草率了。

“五月风暴”既在最传统的机构中也在南泰尔文学院这样的大学中毫无差别地发生,后者是创新开放、管理自由的学校,并且还是“风暴”发动和最猛烈的地方。认为“五月风暴”与大学组织机构过时和竞争规模扩大之间具有某种因果关系的观点是最具误导性的了。“五月风暴”似乎与多年来学生人口数量上的重大变化和 student 处境的激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 学生的“社会边缘化”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过去15年当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学生人数增长特别迅速:1900年到1901年3万人,1950年到1951年13.5万人,1965年到1966年39.5万人,1967年到1968年50.8万人,1968年到1969年58.7万人。大学生人数在15年中翻了两番。

壮观的增长速度形成了一个难题,即资源分配不平衡大大加剧了。全法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大学生(约20万人)是文学院学生,其中大部分人的未来职业是教师——这个职业对学生来说不是那么特具吸引力也不会提供大量的职位空缺。在文科院系中,学生

更多的是被人文科学的声誉吸引而来,而不是为在未来谋求一份教师职业,很多学生都在社会学系和心理学系注册,而这些专业的就业前景更难于预测。

此外,正如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明确表示,学生人口的社会结构在过去的15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战后到1950年之间的那段时间还难以察觉,此后又变得异常突出的是,我们的大学已经从“布尔乔亚”大学转变成了由中产阶级支配的大学。

转变带来了重要的后果:

今天,特别是1950年以来,家庭和社会与大学之间的共谋关系或者说合作关系似乎越来越不可靠了。职员和工人进入大学学习的儿子通常不可能指望从他的家庭或社会背景那里得到该选择何种学业课程的建议,而且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也大大增加了职业活动的范围,其中有些职业是十年前人们想象不到的(信息技术,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因而现时代的大学较之于以前大学不得不作出更为艰难的选择,而且他的同辈群体很少能在这个选择上对他有所帮助。

所以学生踏上的往往是一条所知甚少的道路,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并且学生放弃和失败的比率是非常高的。一个粗略的计算表明:

开始大学生生活的学生在“平均”学时的学习之后拿毕业证离开学校的几率差不多只有一半……结合所有这些因素来看,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成为混乱的牺牲品。他们不仅

对毕业时的自我期待模糊不清,而且他们对自己学习的时间期限和方向也不甚了了。

因此,尽管他们加入了“文化”继承人的队伍,但1968年的学生并不满意这样的担保。难于作出选择,失败的风险常随,社会性退化或失业,这些因素使得学生对未来职业充满焦虑:

失败的高风险,停滞不前,或有的学生表现出的社会性退化,而有的学生所感到的四年或五年后找工作的困难——所有这些都摆在大学生面前,这在文科和理科学生那里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不受限制的社会力量的作用造成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足社会里学生处境的恶化,而知识分子们分析工业社会带来的富有所造成的不幸时却带着一种早熟的乐观态度。

学生们因而普遍对职业前景、考试和职业活动感到焦虑和疑虑,这种情绪又被对资产阶级大学和资产阶级文化——在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所谓资产阶级文化当中,教师是资本主义的“看门狗”,而另一方则是“大学生世界的受苦人”——的大谴责,被对“学生权力”或“学生否决权”的要求大大加强了。

这些观点中有一些后来得到了官方认可。埃德加·富尔部长紧紧追随布尔迪厄和帕斯隆的观点并作出了积极回应,也批评说课程大纲和评估方式“无意识地偏向某些类型某些群体的学生”,对“普遍存在的特权”加以谴责,“撇开表面现象不谈,竞争性考试这种传统体系使这些特权永世长存”。此类观点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传播,并且得到了部长的认可,即便经验研究可能得出质疑其真实性的结论——注意到这一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信件调查,在对6919封大学生回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诺埃勒·比塞雷

作出结论说：

客观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对同等条件的学生来说，成功率基本相近，无论他们属于何种社会类型。同样，初入大学时（尽管在最后一年的情况并非如此），家境好的学生并不因为他们得自家庭的文化优势而受到偏爱，他们的成功率并不比同处于一个层面的其他学生高。

另一项在图卢兹进行的“对一代大学生为期十年的调查”表明，社会底层出身并不是考试成功的樊篱。实际上，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在更大比例上通过了中学教师职业能力考试(CAPES)或高等教师资格会考(agrégation)。

克里斯蒂安·德拉热(Christian Delage)在奥尔良对一级学科(文学、科学和法学)所作的研究也应该放在这类调查之列，其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些调查的范围可能是有限的，但它们可以说明，在文科科系(这是社会学家特别偏爱的研究对象，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重要样本)之中，并且也是在大学整体环境下，可以察觉到的是(正如德拉热所指出的那样)，并不存在通过大学考试方式进行的社会排斥。这些调查大多认为：考试与其说是偏向“文化继承人”而排斥“文化孤儿”的甄选(有统计数据证明不存在这种情况)，不如说是把不享有特权的继承人留在了高等教育之中。所以，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家境好的学生群体里反映出的高失败率，埃德加·富尔部长那个说法就显得不可信了——尽管仍然确凿无疑的是，这类学生的物质优势的确使他们当中一些人即便一再失败也能继续待在大学里，普遍而言，这些学生所承袭的文化遗产的确是个重要的优势，在小学、中学，也就是他们上大学之前对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抗议的大学生都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的“客观作用

就是通过考试的方式对有教养阶级的阶级身份加以认可”，这种观念也是谴责阶级教育和布尔乔亚文化的各类宣言与小册子的主题思想。

如果考试未曾引发学生们的深切焦虑，对由考试支撑的大学主流文化的谴责也不会拥有范围如此之广的市场。但是，这类观点并不足以解释危机。虽然5月和6月整个事件过程中考试焦虑表现得非常明显，考试将近的时候事件爆发的确也非巧合。在危机的那些日子里，“选拔制度”一直受到猛烈的抨击，从大学校园被占领的第一天起，考试问题一直都是学生之间重要的——甚至是最核心的——讨论话题。这样我们就能用对失败的恐惧和社会竞争的风险解释大学的危机了吗？在局部意义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一解释必须在考虑大学内部竞争的前提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大学内部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有些是必须的，另一些则是学生选择的），但也较为短暂（仅持续几年时间），有时候让学生对未来前景灰心丧气（可能最后只得到一个平庸的社会位置，面临着求职的种种难题）。由于缺乏最基本的指导或选择，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要花好几年才能最终决定自己的未来职业，而仅有少数学生能像他们一入校门时希望的那样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因此“考试结果日益成了某种不能上诉的判决书，直接决定着是否能够获得人人热衷的社会地位”。

此类竞争当然造成了某种困境，也引发了对抗，大学生们日益形成了一种无组织的群体，构成了里斯曼（Riesman）所说的“孤独的人群”，这个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的群体充满了需要和焦虑，这群年轻的成年人纯粹被化约为了消费者（课本、印刷品、知识的消费者），从而成为20世纪社会里的边缘人。

然而这种情况并非为法国所独有，因而我们就此很难说比左翼宗派的意识形态和行动范围要大得多的这种大学危机与此时在其他各地爆发的大学危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法国的大学危机真

正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社会上扩散传播开来。要解释这种出人意料的独一无二的“传染性”，我们就必须看一看更为全面的解释。

## 头脑发热：青年造反

不少解释强调了危机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层面。被绥靖的“病态平静”的社会突然从平庸变成了狂热，在乌托邦风暴爆发的时刻，原有的社会组织的刚性、社会空间的等级性和其制度的匿名性都得到了补偿。孤独的人群被兄弟情谊的共同体所取代，上下级从属关系被神话般的平等所取代，习得的行为习惯被创造性的自发行为所取代：这是一场游戏，一个节日，一次欢乐的释放。

这是此类解释所采用的第一种形式——被绥靖的社会一下子热血沸腾。第二种形式的解释则更为强调青年人的造反这个方面，它引出了求助于“弑父”情结的精神分析解释。

### “头脑发热”

“头脑发热”，“心理剧”，“悲喜剧”，“大释放”，这些都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用来界定危机的术语，他对这次危机的解释还作了这样的评论：“对近来危机最为合适的解释方法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方法：G. 勒庞(G. Le Bon)的群众心理学或帕累托的解释方法。”

着眼于最普遍的层面——美国、德国和法国发生了突发性的造反，发达国家中暴力活动甚嚣尘上，雷蒙·阿隆特别补充了两个方面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准生理学或心理学的，另一种则是社会学的。我们集体生活的平静特质往往造成对我们侵袭冲动的某种压



抑。而且即便性解放也未必就意味着欲望的满足。正如马尔库塞(Marcuse)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从来都是压制性的,或者用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的话说,人这种侵略性动物必定要表现其侵袭性。社会学的解释强调另一个方面:一旦突发事件来临,人们显然都还原成了最基本的私人个体,既不属于某个宗教信仰,也不属于某个政治团体,独自沉浸在舒适和财富的追慕之中,被激情所攫取。所以有明确目标的头脑发热就导致了政治和社会的剧变,而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的头脑发热就导致了眼下这种情况。没有一种模式满足我们的渴望,这些头脑发热的事件必然是否定的、虚无的或破坏性的。

在雷蒙·阿隆看来,这种“补偿”现象在法国社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法国人受过于严格的体制和过于极权化的等级制折磨而痛苦不堪。他们为什么对那狂喜的时刻记忆犹新,当时他们把一切都砸碎在地?在那些危机时刻,制度片刻倾覆,他们获得了兄弟情谊的幻觉——他们体验到这样一种情感,获得了平等的幻觉——他们认为平等是活生生的现实,直到他们再次屈服于等级制的枷锁。自1789年以来,法国人已经习惯于事后放大革命的意义,这些革命是伟大的节日,他们在其中享受着他们日常所缺乏的一切事物,感到仿佛满足了愿望,即便仅仅是在白日梦当中。

就大学层面而言,大规模的学生集团和个人的心理情境使得难题恶化了:

法国大学生，特别是巴黎的大学生，构成了孤独的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备受孤独和集体生活匮乏的折磨，既缺乏与高高在上的教师的联系（这千真万确），也缺乏与他们同伴的联系……通过几近违法的团体而获得的这种青年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乃是对法国大学生普遍经受的孤独的过度补偿。

阿隆对五月危机的观点类似于托克维尔对1848年革命的观点。在阿隆看来，1968年法国人假装革命，正如其1848年的先辈假装1789年革命一样。美国学者罗伯特·马斯特斯（Robert Masters）走得更远，非常严肃地把青年革命行为比作猴子幼仔的造反行为，他强调了其中的“生物学造反根性”。

不必以动物学比较的方式追根溯源，但我们能说它是一种补偿现象或集体释放吗？有不少观点和目击证词都能全面地支持心理剧的这种说法。谁不曾为这造反的气氛所震惊呢？——游戏，节日，大街的影响力，口头话语的解放，口号和影像的洪流，乌托邦梦想的爆发。

**街道** 游行，歌唱，示威，占领大街，成为他人的同伴，逃离布尔乔亚的区域，发现团结，汇入人群；这是大多数学生共有的最基本也是最有力的体验，特别是在5月13日的大游行中，就像他们的父母在当年“人民阵线”时期所体验到的一样。

**节日** 勒内·帕斯卡尔（René Pascal）告诉我们：“那时所有事物一下子都变了。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无须鼓号，令人震惊的危机便已爆发，无疑法国人经历了迄今最令人惊慌失措的事……一连三十天法国社会都处在节日的狂欢之中。”

**游戏** “Epistémon”告诉我们：“真的——我们多少是在玩儿……所发生的一切就部分来看是不真实的。”

**口头话语的解放** 德赛都神父（de Certeau）说：“上个5月，我们解放了词语，就像1789年解放了巴士底狱。”阿隆的语气少了一

些热情,他说那就像是“马拉松式的清谈俱乐部”。

运动的口号则展现了乌托邦梦想的爆发,大辩论,虚无主义的诱惑,对自发性的崇拜,对一切组织的拒绝,对“一张白纸”的向往,以及挑衅的欲望。让-马利·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在《精神》杂志(*Esprit*)上撰文分析风暴的意识形态,他说:

运动具有游戏的方面,这一点可以从其理论一贯性的缺乏得到理解。如果你扮演不了你自己的“角色”,那大可以扮演好几个角色。当你对你希望建立的社会不甚了了的时候,这倒是个办法以保证不致过于迅速地被各种观念和团体搞得手足无措陷于瘫痪。这场运动是个万花筒:从圣鞠斯特到格瓦拉,求助于兰波、博诺(Bonnot)及其同伙、托洛茨基、安德烈·布勒东,它把这些革命的弃儿们都汇聚一处,也聚合起了向既有秩序发动进攻的一切政治和诗学传统……

但关键之点是:对社会的这场批判是以什么名义进行的?我们已经得出了答案,而这并非是个微不足道的答案:以生命欲望的名义,以表达自我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

这样看来,“五月风暴”似乎是一场梦想和造反运动,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表明与日常生活的决裂,在田园诗的幻想之中超越年龄、出身和能力的差异,在兄弟情谊的欢庆之中超越等级和隔离,总之,解放想象力,放逐理性。它是一段乌托邦插曲,是“生命和自由强力”的一场爆发。

“青年异军突起”——“弑父”

根据埃德加·莫兰的意见,5月/6月危机说明了“法国社会中青年异军突起”:

我们必须自问,在马克思主义正统之中,认为自身是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贯彻者的“知识分子”究竟是否做了别的什么事情,即是否促生了青年社会的“1789年”,是否促使了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异军突起。青年的这种新运动的出现,多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这类思想方法使进攻性成为合理,并为尚在寻找着自己形式和真正名称的这场喧嚣沸腾赋予了某种意识形态一致性,进而使之获得了建设性的方向。

确定的是,在那个时刻,学生先锋扮演了知识分子的角色,为参加到运动中的来自各行各业青年群众指引道路。

我们暂且不论埃德加·莫兰在这里谈论“马克思主义正统”是否正确。充其量我们能说的只是,他所说的“自发的团结”并非表现在所有年轻人身上,而仅仅只涉及年轻人中的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合作通常仅仅只停留在美好的愿望层面,而一个处在最佳观察位置的观察者肯定地说青年农业工人对整个运动差不多是漠不关心的。

1969年初进行的民意调查同样证伪了这样的观点:五月危机是团结一心的青年人的大规模反抗。民调机构 IFOP 一份调查呈现了“通情达理的青年人的一幅令人安慰的图景”。在受访者中,89%的人用非常快乐(35%)或还算快乐(54%)形容自己;71%的人认为“法国最好的事就是自由”。这次调查在“五月风暴”八个月后进行,并且包含了一些含混的问题,因此可以肯定,对该项调查的质疑也有许多。而说自己“还算快乐”意味着什么呢?

对强烈地体验过它的人来说,“五月风暴”有其无意识的根源,不是吗?是的,有两位精神分析学家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在其著作《抗争的世界》(*L'Univers contestationnaire*)中就把俄狄浦斯情结当作一种关键性的解释。

在这两位作者看来，这个世界的典型特征就是对所有形式的权威的敌意，对绝对平等的向往和为了创造进行的斗争——所有这些特征归根到底都是对父亲权威的拒绝（“这不仅意味着推翻父亲，而且意味着废除父亲秩序——父亲权威，后裔身份，家庭及其分支”）。

革命者使自己成为挑战父亲的对手，并试图实现某些成就，通过反对父亲而表现出来的“抗争，否定现实并且力图用某种自恋的理念取而代之，而这种自恋的理念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不可能的事物，因为使之得以实现的最小努力都要求从自恋王国进入现实王国，这必然导致冲突。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什么都不可能实现：‘现实一些，梦想不可能成真’”。

革命者是建设性的，而抗争者“首先想着的就是破坏（打碎各个环节）。他的否定性野心的合理化论证仅仅只得自一些模糊不清又常常相互矛盾的公式……如果说革命者使自己的俄狄浦斯动力服务于目的和手段在其中得到统一的社会‘事业’的话，那么抗争者则只将社会当作对自己家庭冲突作出反应的某种托词”。

即便有人对精神分析，的词汇感到有点反感，在面对精神分析必然要祭起的俄狄浦斯情节符咒感到有点尴尬，精神分析的这种思考，不可否认，还是可以说明某些个体的行为方式的。“五月风暴”所揭示的众生相各色各样，多得令人吃惊，其中一些行为与只从政治或意识形态角度所能预测到的完全不同。人们对运动表现出的狂热，保留，或者明显敌意并不与此前存在的左中右阵营划分完全吻合。

我们倾向于认为用集体精神分析的方式来解释“五月风暴”是有风险的，这种解释模式也必须与其他几种解释模式配合起来使用，但我们还是坚持个体精神分析毕竟可以说明这个危机中的某些方面。个体出于何种隐秘原因采取了这种或那种态度，对此加以揭示是可能的，而且并非是无关宏旨的。但这也将使我们的分

析“原子化”，进而忽视反抗的更深层原因，不是吗？

## 精神反抗——文明的危机

从假装革命到精神反抗，众说纷纭，但又非常相似。在同一些关键方面——梦想、拒绝、对生命活力的坚持，等等——基础之上，解释者们作出了“普遍价值危机”或“精神反抗”的推断。

这种解释常见于两个层面。“五月风暴”既被视为对不公和荒谬的社会的精神反抗，也被视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危机——文明的危机。

### 精神反抗

1968年5月28日，莫里斯·克拉维勒(Maurice Clavel)在《战斗》中写道：

我们必将永远一再强调这次革命首先是一次精神革命。精神正在进行报复，而且并非超前之举。我们与希望同在，它就在学生和青年人的手中。他们并不要求高工资；他们希望的是改变生活，就是使用这样一种语言，它的简明性既给人启迪也产生分裂。这是辉煌的，也是欢乐的凯旋。就像神圣事物令我们敬畏一样，我们在这场革命面前感到惊惧。

没有人死去，然而老旧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是否存在精神反抗？“精神”是什么？这种精神反抗的起源何在？

在《精神》主编让-马利·多梅纳克看来，这场运动的兴起是有其特定类型的社会背景的：

运动的失败造成了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的那些人的绝望。但无论新旧而反对一切组织形式，这场运动可能在政治上成功吗？它在政治上的失败却并未损害其根本灵魂——对压制性和荒谬的社会的攻击。它并不源自某个社会阶级或某类被压抑的人群。它的攻击目标并非政权，而是所谓的“文明”。

让-马利·多梅纳克在几个月前也曾撰文，在1968年“五月风暴”当中寻找到了精神根源，1930年代的精神回响和对“制度化混乱”的反抗，他说：

从政治上看这场运动失败了，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因为它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是反抗社会和反政党的，从来没有意愿也没有时间组织自身。但是政治幻想的破灭不会让我们忘记这场运动更深层的意义：它首先瞄准的是文明，其次才是使之具体化并放大其缺陷的政权……

政治嬗变永远平息不了这种反抗。生活方式的发明正在形成之中，尽管还需要几年时日才能完全呈现。欧洲终于开始犹犹豫豫地对充满美国精神的幻想作出回应，这个回应不是来自一些知识分子，而是来自群众。让我们再努力一下，把它推广到社会的其他层面，这样欧洲就会从蛰伏中醒来，重新发现那久被遗忘的激情：改变生活。

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几乎以相同的方式认为这场反抗反映了形而上学焦虑，并起源于价值的崩解：

这并非简单由于组织糟糕的教育，政治开放性缺乏，以及无灵魂的文明与人类生活基本需要之间的不相容一下子被青

年看到了并立刻引发了他们的怒火。某种形而上学焦虑——即便人们尚未习惯作这样的认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被感觉到了，而且让青年人以最痛切的体验感受到了，因为他们还没有习惯于自欺。我所说的就是绝对价值或建立在真理基础之上的法的缺席和绝对缺乏。而由于这种缺乏，青年人只能面对享有支配权的知识界和教育界，但就整体而言知识界和教育界早已欣然放弃了它们的职责（尽管其中不乏个别例外）。今日之青年已经系统地被剥夺了一切生活之理性。

在埃德加·富尔那里，我们也看到了他作为精神危机之说支持者的一面。1968年5月时任农业部长的他对农会发表讲话时说：

目前“事件”是危机的反映，这一危机不仅是教育方面、经济方面或社会方面的。它是精神危机，其根源在于我们时代的巨变……明显由于技术进步而引发的方方面面的巨变，为每一个人提出了生活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有怎样一种类型的社会的难题。归根到底，这是与[天主教]“现代化”(aggiornamento)相类似的难题。

长期以来，人类共同体成员资格都被视为一笔保险费。现在，它不得不需要一种积极的奠基性元素。

“五月风暴”表达了精神饥渴，表现了形而上学和道德崩溃的结果吗？无疑，那些事件充溢着众多梦想和崇高的希望。不少人就是起来直接反抗“消费社会”的，而许多天主教徒则认为这是把福音书价值运用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大好机会，众多知识分子则拾起了他们文化革命的旧梦，但学生运动的评论者比起学生自己来，使用“精神反抗”这个词要频繁得多。当然有些人感到“五月风暴”



是精神贫乏和探寻生存理由的一次证明,然而细读一下那些发表的册子和文本以及目击证词,就会发现关心这些问题的只是学生中的很少一部分,而这些问题对于工人阶级也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印象似乎得到了 IFOP 民调机构 1968 年 9 月在学生中所作调查的数据支持。以下是调查的问题和回答结果:

大学生和中学生被分为三类:(a) 不仅想变革大学,而且想激进地改造社会的学生;(b) 积极尝试改革大学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学生;(c) 一心想完成他们考试的学生。这些态度中哪一类型是最接近你的态度的?

(a) 12%; (b) 54%; (c) 没有回答。

针对 5 月、6 月事件中中学生最关心的事情有下面三种解释,你在重要性序列上会对之作怎样的排列?

对与学业挂钩的求职机会充满焦虑:

第一位 56%; 第二位 33%; 第三位 8%。

对消费社会加以反抗:

第一位 7%; 第二位 10%; 第三位 80%。

大学——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物质资源等方面——不适当今社会需要:

第一位 35%; 第二位 54%; 第三位 8%。

这个民意测验的确只覆盖了学生总人口而不是学生运动中的代表性样本。即便如此,将反抗消费社会看作“风暴”的主要理由的学生也仅占 7%,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对危机的这种解释的重

要性。

如果说“五月风暴”是一场精神反抗，那么它似乎一直停留在本能主张的层面。如果说它反映了精神上的某种矛盾状态，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种矛盾也只是无意识的或未被表达出来的。

#### 文明的危机

“五月风暴”是法国社会所特有的，还是更广泛的危机的一种症状？《精神》发表了一篇写于圣灵降临周星期日的文章，其中提到“西欧第一场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而且在同一期上，让-马利·多梅纳克作结论时说：“现在想象这样一种革命成为可能，这种革命不仅仅针对的是政权或所有权类型，而且是整个文明，正如艾玛努埃尔·墨尼埃(Emmanuel Mounier)在创立本刊物时所希望的那样。”

1968年6月安德烈·马尔罗也雄辩地提出了这样的解释：

“五月”开始于索邦大学的事件，对此已无须多说。学生们最合法的要求毫不隐瞒地向我们揭示了他们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这场运动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大学已经关闭，在日本学生们在战斗之中，在德国、意大利、荷兰，甚至在铁幕那边，学生们也开始了反抗。他们在美国大学——与古老的索邦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里造反。他们在墨西哥城市大学里造反，他们在这所大学成立了自己的纠察队，而联邦警察根本插不进脚去。学生总是不受拘束的，但这荒谬地透露出他们当前的无约束状态却像是中世纪的那种无约束状态，加利福尼亚的情况更是如此。可以确信，我们必须改革索邦、南泰尔，也许还有整个教育体制，特别是在视听技术已经开始敲击我们大门的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绝不应该是狭义的改良，更不应该是某种替换，即用有时混乱

但更多时候像是兄弟会的某种体制取而代之，难道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吗？真正的学生期待于我们的乃是希望；但与希望紧随的则是消极感受带来的最狂乱的幻想，是我们的老朋友——拿着黑旗的虚无主义，它唯一的希望就是毁灭。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改革的要求，还有迄今为止我们文明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在斯特拉斯堡的青年戴高乐派会议(1969年4月13日)上，马尔罗重申了他的论点：

你们有一个特殊的敌人，在他的威胁之下你们的命运将被彻底毁灭。这就是全世界——从墨西哥到日本——青年人的史无前例的自我放弃。这是巨大的绝望，这是破坏性的反抗，它根本分不清它所制造的一波一波的震荡和行动必不可少的连续性之间的区别，这绝望以及这反抗我称之为诗情的幻想，但也是自我放弃的一种悲剧形式。启示录的状态只能以他们的自我毁灭作结。面对这如星星之火在世界各地燃起的放弃行动，我们怎么办？你们必须牢记你们还没有忘记的那句话：“我不会退让。”

这急促的话语为思想打开了广阔的视阈，但是太多人说过这样的话，从20个世纪末“文明的危机”以来，“文明”这个词已经是被过度使用已告耗竭的词之一，而马尔罗的解释看上去令人目眩，但未必十分清晰。

马尔罗谈论“文明”的论调，与尼采的同时代人在发现“进步的幻象”之时宣称“文明衰落了”的论调是一样的，马尔罗所说的“文明”和虚无主义的诱惑以及神话的动员功能也是一样的，难道不是吗？他所说的“文明”与《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

的年轻作者在1926年所说的如出一辙,不是吗?如果说这是文明的普遍危机,那么这种“普遍文明”又是什么呢?在马尔罗看来,“文明”就是特定经济或社会—文化类型的典型表现吗?这毋宁说是无意义、非存在、毫无希望但又永恒轮回的文明,这种文明注定让生活着的人成为非存在,不是吗?年轻的斯特拉斯堡听众是拒绝这种文明的唯一群体吗?我们是否应该就这场危机的社会维度提出更为确切的问题呢?

## 阶级冲突——社会运动的一种新类型

南泰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在五月运动中察觉到某种新型冲突——“程序化”社会所特有的冲突——的萌芽:

“五月运动”是一种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与几十年前的任何行动都不同,它揭示并据此构成了我们社会中一种根本的冲突……

当前这种冲突不是直接经济冲突;这种冲突与盈利者一方与被剥削被压榨成按动物生活标准生活的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无关……法国的学生,就像柏林或伯克利的学生们一样,参与了对整合、宰制和欺凌的机器的斗争。正是这些语汇,而不是“剥削”,才能最恰当地界定这是怎样的冲突。斗争不针对资本主义,而是首先针对技术官僚统治。

这种反抗技术官僚统治权力的斗争“不是一种直接斗争,因为它从根本上对这种权力与经济理性及社会进步的统一性进行攻击”。

“五月”之前，在法国，知识分子或某些克制的**抗议**已经开始质疑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但是“五月运动”就其真正的本质而言从根本上暴露出权力和统治系统中社会、国家和国际等多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个运动采取了各种形式，而“反抗，向往革命的努力和工会斗争绝不可能完全被阶级冲突所涵盖界定”，但是，它仍旧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在某种历史视角之下又是最不易被察觉的一个因素”。

因而正是五月事件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种新型的冲突，其中最关键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作出决断、承续文化和保持个体性的权力，这种冲突的行动者不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是新的社会集团：

“五月风暴”的主要行动者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可以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的人群整体，无论他们是有具体职业的还是正在培训之中的。这一人群中最积极的那一部分实际上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在某些大型组织中工作但同时保持着最大的独立性，他们是学生、ORTF(法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记者、实验室技术员、(私人机构或公共机构的)研究员、教师，等等。这种新型阶级斗争是在技术官僚和自由职业者之间爆发的。

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经验分析不如说是预示和展望，所以它当时几乎没有招致批评。但是它的确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我们不能说阿兰·图海纳足够清晰地界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他的一连串说明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疑惑难解之处。因为：

1. 看上去似乎存在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五月风暴解释了……权力和支配构成的体系的统一性。”

2. 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似乎是技术官僚的权力：“技术官僚是一个统治阶级”，“为大规模的生产机器服务”。这些机器“既控制着经济的增长也宰制着整个社会”。

3. 政治权力所履行的功能显然是有限的：“政治权力显然不管理公共福利；它通过制度和管理组织对作为整体的社会进行一定的支配。”

4. 技术官僚权力并不自动地依赖于政治权力：“技术官僚阶级的存在并不当然意味着这个阶级本身享有政治权力，不意味着国家可以被直接还原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种图示化解释在今天已经不像 20 世纪那样真实了。”

除此之外，社会运动——“自由职业者”的这种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远未得到真正的分析说明。正如某些敏锐的观察者察觉到的那样，5 月/6 月的罢工无疑是以某种新现象为典型特征的，这种新现象就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高度的一致性。但在对这种极端重要的趋势（这对政治社会学来说是一种极端重要的趋势）缺乏细致分析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判断它究竟是一种普遍运动，还是仅限于公司和组织机构内部的独具特征的一种运动。此外，如果说这种趋势表现极其广泛（对此我们暂且存疑），那么我们就必须就其本质提出更多的问题。它是在新型社团的要求之下应运而生的，抑或是对新的团结形式的发现而促发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它是与工人阶级的（成问题的）团结，还是与造反学生形成的（更为不明确的）团结？总之，它是否提出了集中的要求，或在行动上表现出了一致呢？或者，它就是某个新阶级——“自由职业者阶级”——的诞生吗？

阿兰·图海纳并没有为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他那种激动人心

的概括让我们想起了几年后虽然成功流行开来但也尚未得到确证的“新工人阶级”的相关概念和思想。我们吃惊地发现，由一位社会学家写出的这种解释却对1968年的法国经济社会细节状况几乎没说什么。

## 某种传统类型的社会冲突

新形式的社会斗争——还是传统类型的冲突？如果说图海纳为工人罢工打上了某种新类型的标志，那么其他的解释则退而转向了传统的社会冲突的基本要素——物质要求，并且即便不是以之为唯一根据也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经济和社会形势去解释这场危机的迅速传播。

### 经济和社会形势

现在的历史学家在揭示政治运动的经济原因时往往卖弄一下自己的小聪明，但是那些讨论“五月风暴”的历史学家没有步他们的后尘。危机爆发之前的那些经济和社会分析文章对我们也是大有裨益的。

法国经济在二战后持续发展，这是令人满意的20年。这种经济形势的结果就是：在1968年22岁的年轻人们所生活的这个经济和物质世界已经与前代青年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了。1958年和1968年之间的差异是令人吃惊的，而1928年与1958年之间的差异却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也就是在1958年货币开始贬值，1963年启动了稳定计划，1965年经济开始缓慢恢复，1966年7月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到了1967年法国经济跌至此前几十年以来的最低谷。生产的衰退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相对而言影响较小，而就业形势则非常糟糕，撇开其他指标不谈，失业曲线持续攀升。

1968年初,根据所选择的不同的计算方法,失业人口总数的偏差达到了800%;2月份有11.2万名工人提出救济金申请(是1964年的四倍);4月份有24.5万人注册求职,如果我们算上未注册失业人口,那么求职人数就已经达到了37万人;如果我们再按照经济学家所说的就业参与率来计算,也就是说算上妇女、青年人和年龄稍大的既无工作也不求职(但情况稍好则会考虑求职)的人的人口总数,那么这个数字将高达80万人。

只要想一想法国的工作人口总数是2000万,那么这个数字也许不算大,但即便如此在一个长时段中它已算是我们能看到一个峰值了。更糟糕的是,失业人口中有一半的人年龄低于25岁,官方对于黄金和美圆储备增长的强调也使得这样一个推测更为可信,即失业率攀升乃是经济现代化、增长的生产率和边境开放的必然后果。容易理解的是,大多数受到这些后果影响的人不完全相信这些说法。

显然,法国的经济形势还没有严重到能被看作是“五月风暴”的一个起因的地步。然而,失业率稳定而看上去非常无情的持续增长不仅首先使年轻人备受其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焦虑和前途渺茫的普遍情绪,一旦危机在大学中爆发,便给这种情绪火上浇油,形成了蓬皮杜政府无法预见的冲力。

#### 垄断政治

法共(PCF)似乎和政府一样没有预见到5月/6月危机的到来,但这并不妨碍法共(带着某种后见之明并从中捞取好处地)宣称事件不可避免。当时的法共总书记给出了一个如此简单以至于不证自明的解释:

在这前所未有的巨大的1968年5月/6月罢工背后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过去十年来政府政策的后果。统治阶



级一直以来带着冷笑对工人最迫切的需要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科技进步的成果一直以来被一小撮寡头独占。工人阶级面对发生在拉丁区的那些表达不满的事件采取坐等观望的态度。我们还需要回忆1936年矿工的35天罢工吗?还有必要回想1967年那些伟大的日子——2月1日、5月17日、12月13日——或是1968年5月1日总工会(CGT)示威游行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象征性力量吗?

5月和6月的罢工和示威是加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集中化所造成的第一波大冲突,是有着手和脑的工人群众与陷于它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之中的垄断权力之间的第一次大冲撞。

所以,在法共看来,5月和6月罢工只是在规模上和以前的罢工有所区别,因而同样可以被解释为“工人”当面向“资本主义剥削”和“垄断权力”提出合法要求的行动。这是一个植根于经济和社会形势,植根于传统社会冲突模式之中的解释(也是在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内部的解释)。

## 一次政治危机

### 制度责任

戴高乐的支持度在稍稍下降之后又回升到了1964—1967年的水平,而他的总理蓬皮杜的支持度也一直是稳步上升,但就在这时危机爆发了。1968年4月,61%的受访者(与1月的53%形成对比)表示对总统很满意,这个比例与1964—1967年那段时期的比例相当。1968年4月,总理的支持度从1967年12月的43%上升为48%。

戴高乐声誉扫地和不被信任而第五共和国也因此岌岌可危,这就是“五月风暴”的起因——这个观点(不满于戴高乐对外政策

的国家大多接受这个观点)看起来不可能是一个应该被当真的论点。然而,我们必须问一下自己法国政治体制的某些特殊方面即便实际上并不是危机的起因,但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这场危机并在短短几天内使之获得了某种戏剧性的特征。

在《费加罗报》(1968年6月5日)上,雷蒙·阿隆以一种托克维尔式的视角强调第五共和国的制度所负有的责任——过度中心化、议会回避问题、中间机构形同虚设,等等。他写道:“政权已经堵死了所有的安全阀。”几周之后阿隆又继续申述这个观点,他说:“戴高乐主义沿着一条道路一直走下去,显得荒谬可笑,因为在这条路上最微小的一点闪失便会动摇整个政权。”

皮埃尔·阿维耶(Pierre Avril)曾对第五共和国的体制作出过重要和经常性的批判工作。他曾提及总统和总理之间权力的两极分化——5月2日至11日总理不在法国其间以及5月14日至5月18日总统外出其间,权力的这种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

这种两极化体制助长了五月危机的事态扩大。它也许还促成了危机之基础的形成,因为两极化体制内的权力分配使这种体制对危机缺乏敏感,也使这种体制无法对舆论作出响应。

弗朗索瓦·戈盖尔(François Goguel)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在探讨了第五共和国为什么克服了危机的难关之后,他总结说:

对这段时期用一句话进行概括:正是第五共和国的体制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因为若是在第三共和国或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府无疑会在一周之内分崩离析。这些体制使得掌权者能弥补早先的过失,使他们能经受住危机,而在早先的制度下

若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只得立即被迫辞职。

我们无法确定如果法国在另外一种不同政权治下1968年5月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很难接受戈盖尔的观点。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最初是挺过了最严重的危机的(1934年,1947年),如果南泰尔事件爆发在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也许会引发内阁地震。危机很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并且甚至因为内阁地震而恶化,但绝不可能直接转变成宪法危机。但是在第五共和国——既无安全阀亦无善于应对的政治家——治下,这场危机直接向总统发起攻击,这位总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现在却称学生的造反及其后果“不可能掌控”。第五共和国的各种制度无论在1960年代的阿尔及尔问题上,还是在1961年“将军暴动”事件——多亏了总统以独裁的方式使之得到了平息——当中都被证明是成问题的,1968年这些制度又一次起了作用,使最初规模很小的一场危机获得了如此深广的历史维度。

#### 左翼道路付诸阙如

如果说这场危机发展得如此严重,其中一个原因则是:宪法程序不曾给出一条政治出路,左翼权力政府的构想对大多数人来说缺乏可信性。

1965年到1966年期间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曾对通过普选方式进行的总统选举引起的两极分化现象作出过分析。在这里有必要简短看一看这些分析。1965年莫里斯·杜弗杰(Maurice Duverger)说:“显然存在着一种两极分化的运动,制度化的机制起到了推动作用。普选方式的总统选举就是这些机制中的一种。”

弗雷德里克·莫罗(Frédéric Mauro)1966年初说过这样的话:“总统选举对法国政治生活的变革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将迫使法兰西在事实上接受两党制,就像不列颠、美国,甚至德国那样。”自从

1965年11月大选之后,其他观察者就开始对“总统选举的动力机制”,“十一月精神”以及法国左派的复兴产生了怀疑。这些怀疑在1968年5月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政权的组织者共有的态度是彻底拒绝可能将政府职权交付给弗朗索瓦·密特朗、盖伊·摩勒(Guy Mollet)和瓦尔德克·罗歇的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可以说“五月”是“反十一月精神”的。

更为一般地讲,无论是在政治上的多数派还是在反对派看来,“五月”的基本特征就是彻底的政治真空——此前称得上是政治势力的所有力量都告蒸发,失去联系或保持沉默。1968年法国“政治力量”的集体虚弱——当然,除了对“激进左派的冒险主义”大加批判的法共之外——有助于对这场危机的程度和特殊性提供说明。

### 各种因素的连锁反应

在检视了这么多一般性解释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偶然在危机之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偶然的存在的的话),看一看似乎既非必然也非理性的那些事件所起的作用。

在南泰尔一片狭窄的区域建立一所与外部世界隔绝而且与外部交通极其不便的大学,看上去既无必要,而且也是不合理的。

“富歇改革”显然有其积极的方面(比如建立一系列科技大学),但同时也有其成问题的方面(比如强迫学生在入学第一年就一次性选择专业),为大学提供更有利的资金支持以展开这项改革,并使那些在旧体制下开始他们研究学习的学生们对改革调整有所了解毕竟是有意义的。到了佩列菲特担任教育部长之时,本来成功机会很大的改革已经失去了全部历史必要性。

5月3日有无必要让警察进入索邦校园呢?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可以确知的是,即便他们当时没有介入,“挑衅—镇压—团结”的运作机制迟早会开动起来。但是当警察当天离开索邦的时候逮捕

示威者则显得既无必要又缺乏理性。

5月2日到11日总理必须离开法国吗？他若在法国能对事件发生哪怕最微小的影响吗？也许对政府来说有必要在10日到11日的夜间作出突袭拉丁区的决定，但把这个决定提前到充满了不确定且一切都在犹豫之中的前一周则是毫无必要的。

如果说5月3日到10日之间的政府政策明显地是由形势必然性所激发的，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在总理返回国内的那个时刻，他为什么却认为宣布完全不同的政策是恰当的做法，而正是他所宣布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学生对大学建筑物的占领。

戴高乐必须前往罗马尼亚并且直到5月24日才向全国发布声明吗？但即便他早早地或以不同方式发布声明，事情能发生什么变化，这谁又能知道呢？

最后，还能提出很多问题，比如，如果大众传媒——特别是广播——没有以几千名学生的调子向全法国说话，“五月运动”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广播和电视没有给最初只是小规模示威活动推波助澜，并制造谈判在进行之中而特赦令即将颁布的幻觉，5月10日到11日夜间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所有这些问题与其他一些问题一道早已被讨论过，并且还将一再地得到讨论。没有人能作出断语说，如果这种或那种情况没有发生，五月危机就不可能出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发生的所有事件以及各个因素的连锁反应都有助于形成对“五月风暴”的解释。

与那些宏阔综合的和通过无法证明的定义而进行论证的解释相比，通过个别事件进行考察的解释显得有些琐碎，但完全忽略这种解释方法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将事件所不可能具备的要素强加于它们则更加错误。我们不必援引帕斯卡对克利奥佩特拉的鼻子的论述就能说明各个因素的偶然汇合是历史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如果在尝试理解一个历史事件过程中把大量时间花在探讨

如果发生的是 X 而不是 Y 或如果这种那种情况没有发生情形将会如何的问题上则是毫无意义的。在最宽泛意义上所说的偶然因素在事件中起作用,而且它们在 1968 年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尽管与 1936 年相比也许要小一些。然而,即便它们有助于说明事情结果如何,也无法解释 1968 年“五月风暴”的规模和重要性。在这么长篇幅的综述的结尾,只存在一条自明的结论,那就是,要解释像 1968 年“五月风暴”这样错综复杂的事件,单靠一种解释方式是无法完满的。为了不陷入解释上的折中主义,看起来我们就得将各种不同类型的解释予以综合。但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要解释什么:

——要解释教育危机:所有教学建制的突然瘫痪?

——要解释社会危机:体力工人和办公室上班族以及经理层的罢工?

——要解释社会其他方面的骚乱不安:职业危机、天主教教会的危机、艺术家和作家的骚动,等等?

——要解释政治危机:政权危机、政治首脑人物和关键性管理者的行为方式?

区别考察危机的不同发展阶段也许是一个好主意。我们试图解释危机的早期情况时,究竟是以少数“先锋派”——在大多数分析者看来,在 20 世纪中期这个工业化社会当中他们根本无法有效行动——所起的作用为重点呢,还是以危机在法国传播开来的为法国所独有的异乎寻常的传染性为重点呢?

区分层次,区分阶段——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通常是安全的基础之上……但是这种零敲碎打的分析不也有将最重要的因素摒弃于考虑之外的风险吗?“五月风暴”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危机,而是层次分明的系列危机,我们必须这么思考吗?其意义何在,而这里的“意义”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两年以来一直在对这些基础问题进行探寻(而且并不总

是能够给出相同的答案),而且我们今天仍然不能给出真正的答案。我们认为,任何答案都只可能是一种信仰行为的结果,或者是或多或少值得怀疑的假设,因为我们对这场危机的认识还不完善,就目前而言,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谜一样的缝隙。

有关大学危机和政治宗派行动的材料和说明从来都不缺乏。但是这些评论——几乎都限于对法国情况的评论——却无法使我们对如下根本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法国的大学危机与同时发生于众多国外大学的危机事件是否截然不同?它是法国大学特有的,还是大学普遍危机的一个样本?发生于大学的危机事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分析,可中学里发生的危机则相对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对这些事件信息的了解少得可怜。

除了“亲历史和秘史风格”的著作之外,也有大量专著探讨政治危机。这些著作值得高度重视,但是它们也自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就是在分析社会危机方面,我们则很难掌握确切的数据。当时能获得的只有一些责任声明,对格勒诺布尔或南特及圣纳泽尔此类地区“热点”的一些急就章式的报道,一些专论,还有就是出自积极参与运动的天主教斗士笔下的有趣的个人化解释。在本期杂志刊登出那篇文章之前,根本不可能确知多少人参加了罢工,以及都是哪里发生了罢工。但我们还是缺乏对罢工的起源和强度,其地域特征,或它们对各类工业与公共事业产生的影响的全面研究。“1968年5月/6月罢工是传统类型的罢工还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针对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给出的答案仅仅只是一些印象派式的答案,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分析者的个人立场。

当这些都得到了说明和解释之后,我们很可能发现提出了错误的问题。罢工整体上可能是传统罢工,也可能这里或那里的局部罢工是属于新类型的。即便这样我们也必须确切地解释所说的“整体上”,“这里或那里”,“传统”以及“新类型”究竟指的是什么意

思。除非对此进行了充分细致而广泛的研究,否则我们只能肯定地说对“五月风暴”的“解释”只能是高度近似的解释。

另外一个缝隙是,大多数危机的解释者的注意力仅仅放在那些冲在运动最前方的人身上,而对追随者所言甚少或根本没有提及。所以评论者提到“五月精神”的时候,最好先搞清楚他指的是达尼埃尔·科恩-邦迪及其朋友还是暂时参加运动的学生群众,他指的是法国南航公司的罢工工人还是尚贝里的和平罢工者。

占领大学的学生所怀动机也各不相同。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想使大学陷于瘫痪从而实现打碎资本主义的目的;人数更多的改良派学生团体赞成合作,乐意花大量时间草拟宪法内容并持续地加以讨论;考试体制当其运行不良时学生考试就像买六合彩,当其运转良好时学生们则不堪重负,很多学生的动机就是摆脱这个负担;有些学生则向往交谈,希望和老师坐在一张板凳上对话;而最后一部分但并非人数最少的学生则是希望表现与示威者的团结。再没有比“五月风暴”中第一个口号更能有效地动员起群众的了:“释放我们的朋友!”与其他动机一样,这些动机应该得到研究,并且是在区分学科和体制的前提之下得到研究,只有这样解释的眼光才不会只停留在巴黎文科院系上。

同样,还应该考察教师,以更贴近真实的方法而非许多记者惯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非黑即白的截然划分方法进行考察,并得出教师态度的类型学,这并非是一件坏事。对罢工者、政府雇员以及巴黎和外省的舆论形势的发展也应以这种方式得到考察。

最后,还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法国整体民众是怎样感受这场危机的。所有行诸文字的解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只是在说巴黎人的感受,将外省全然忽略不计——只有一部著作例外,那就是乔治·夏福(Georges Chafford)的作品,他在书中记录了枫多姆这个安静小镇里的“五月风暴”,揭示了全然不同于巴黎的另一个



世界。

援引儒勒·勒梅特 1890 年所说的话“你不可能只靠巴黎而进行统治”并稍作改动之后,阿尔伯·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写道:“你只要背靠巴黎就能统治。”如果《教师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的作者 1968 年还健在的话,他肯定不得不认为巴黎的确不等于法兰西。

填补空白,作出区分,寻找新的解释,这些都是未竟的工作:1968 之春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五月文献”富于才气的直觉和令人炫目的概括,可以说丰富,太丰富了,但毕竟还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审慎的研究。

# 法国 1968 年 5 月： 一场新社会运动的兴衰

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

赵文 译

1968 年在法国、美国和联邦德国都发生了战后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在这些国家抗议运动虽然展示出各自特殊的自我理解和构成特征，然而却在价值、运动方式、动员策略和成就方面表现出了一致性。这些相似性超越了民族特征并且表明了所有社会运动所共有的一些特征。运动发生之处，抗议者向西欧的既有的民主制度发起了挑战。他们对既有政党和中间集团的排他性代表权利提出质疑，用反对派力量和公众见证对抗这些政党，前者构成了对传统制度权威结构的否定，也形成了对战后政治格局设想的批判。<sup>[1]</sup>如果我们历史地评判这些现象，在高度组织化和高度富裕的民主社会中出现的这场抗议运动之自发动员现象仍然需要解释。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比如 1968 年 5 月的法国事件，以及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呢？各不相同的许多分析已经对五月运动作出过解释，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社会冲突”（图海纳），有的认为它是“代际反抗”（莫兰），一场“制度危机”（克罗齐埃），有的则认为它是

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场“危机运动”(布尔迪厄)。而对这些事件的定性评估又与那些社会学解释一样互不相同。它们被认为是“反抗”(图海纳)、准革命(莫兰)、“文化崩溃”(克罗齐埃),或者是已经普及的生产方式所无法控制的危机(布尔迪厄)。<sup>[2]</sup>这些解释各有所长。它们都指向了长时段的社会冲突和难题,但就此而论,这些难题与突然的运动动员之间的联系仍然没有得到探讨,并且从这些解释中也无从推断。本研究分析基础与前述这些方法皆有不同。<sup>[3]</sup>我将五月事件看作一场新社会运动。<sup>[4]</sup>从分析的角度加以界定,可以说,这场运动是“相互关联的个人、集团和组织整体采用公共抗议的行动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构成的有组织的、持续的努力”。<sup>[5]</sup>

在本文中,我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运动行动程序和行动过程都是围绕动员而展开的,它们的行动模式和目标都集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将使用社会运动的研究定理考察五月运动。<sup>[7]</sup>我还将讨论动员策略和行动形式,并分析它们在组织当中以及运动和权威制度之间所产生的动力学效果。<sup>[8]</sup>此外,我还要对在某些特定关系当中发生的自生行动过程进行描述,<sup>[9]</sup>并对“危机事件”和“危机时刻”<sup>[10]</sup>的概念加以解释。在第二部分,我将对新左派知识分子就运动所作的认知性解释加以说明。在第三部分,我提出七个论点以解释法国五月运动所独有的动员动力机制。最后,在第四部分,我将尝试着指明运动对政治体系,对新左派,对工商业结构和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

## 二

社会运动可以按照其目的进行归类。无论旨在改善妇女问题、和平还是环境问题,社会运动都将按照其目标和对社会问题的特定观点而获得某种同一性和区别特征。这些社会问题得到理解

的方式以及进而形成的策略性的解决办法则是观念和洞见、说明性假设和阐释、假定和态度的产物。运动从其观念得到解释,或者用一个新术语来说,它们“从认知的角度”得到解释。

就1968年的个案来说,运动的认知性解释无法仅仅从这场运动的“名称”推演出来。实际上,这场运动并没有一个能予普遍认定的名称,它也没有一个具体政策领域的定位,毋宁说这场运动所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用一个特殊年份给其命名,这一惯例式的命名方式缺乏实质但却透露出它在动员和政治效果方面获得了特别的成功。就此而言,1968年可以和1848年相提并论。尽管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核心集团及其拥护者,但它也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在法国,蓝领和白领工人也卷入其中。对它的认知性解释不能通过大学改革或教育体制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去确定。大学有着动员方面的最大潜能,但是高等教育绝非这场运动的目标和中心主题。

描述“1968”的视角多种多样。它是反极权主义的也是个人主义的,它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样也是民主的、反制度化的和反官僚主义的。由于核心集团内部存在多样性,加之组织统一性的缺乏,不同的领导人所主张的观点也不同,而且这些观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问题是:是否在各种思想、道德观、解释模式和对现实的理解当中存在一个内核,借以能使这场运动在认知上得到解释。对当前的认识和未来预期的目标是否能为这场运动赋予其同一性身份并使之与其他运动区别开来呢?

在我们对引发这场特殊社会运动的过程机制进行分析之前,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这场运动是社会行动而非社会思想的结果。然而,社会行动只有针对某种目标或参照点的时候,至少只有在运动的核心集团获得了认知的同一性的时候才能被动员起来。罗恩·艾耶尔曼和安德鲁·杰米森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强调指出过这一因果联系。他们在分析运动借以形成其同一性的过程时使

用了他们所说的“认知实践”<sup>[11]</sup>的概念。他们用这个概念表示对行动方向以及主体间行动意愿加以限定的互动交往结构或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象征体系之形成过程。这种“认知实践”还受到知识分子所规划的规则框架以及这些规则向相关目标的转化的决定。在运动全部过程之中,作为内部交流,对行动形势的持续适应,以及对众多事件的内部和外部解释等方面的结果,这个认知内核也会不断调整和修正。不同的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理论概要、概念和规划交汇穿插,以至于无法将这个理论融合的整体追溯到哪一个人。然而,对运动的认知性解释,对难题的表述,作为结果出现的对现实的把握方式,以及所确立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推动运动按照使它获得区别性的特殊动力机制发展下去。

将自身理解为新左派运动的1968年抗议运动之前,在法国、美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分别已经出现了“Nouvelle Gauche”、“New Left”和“Neue Linke”的提法。不满于传统的左派政党的知识分子们构成了新左派运动的创立者。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初期,这些新左派运动通过出版物、学术讨论圈、刊物和行动在国际范围内浮现出来。新左派之所以与老左派彻底划清界限,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1948年的布拉格政变、苏共二十大、对匈牙利反抗的镇压、冷战、禁止公开讨论东西方核武器问题,等等。当然这里面还存在总体性原因,这一原因自1920年代以来在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批判性讨论过程中已经展现了出来。新左派相信,民主社会主义将福利国家模式强加于己身,斯大林统治下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的背离,这两者都破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自由解放真义。放弃乌托邦视阈使传统左派政党无法为政治现状提供可替代的出路。它们看上去被现实政治牢牢禁锢,无法克服当前政治和社会形势,也不愿面对现有难题,更不愿规划未来的蓝图。从数字比例方面看,它们在物质上陷于停滞;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看,

它们也是裹足不前。

法国的情况最能典型地说明新左派新的认知定位或“认知实践”的系统演进。法国知识分子新左派是围绕《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 1949—1966),《争论》(*Arguments*, 1956—1962)和《国际情境主义者》(*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e*, 1958—1969)这些刊物而形成的。新左派新在何处呢?自由漂浮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借以与传统左派区分的新认知定位包括以下五个要素<sup>[12]</sup>:

1.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再阐释:新左派回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异化问题而不是剥削问题。它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打开理论阐释的空间,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摆脱僵化,使之不再等于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

2. 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模式:新左派相信,社会主义决不只限于政治和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和生产方式的国家化。毋宁说,社会主义必须消灭每个个体在日常生活、创造、家庭甚至性活动和社会关系当中体验到的异化。

3. 新的改造策略:个体应该从与集体的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前提是文化领域内的变革先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在设想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观念的创造,将之运用于亚文化群,在既有体制中把它们作为替代文化加以验证,进而形成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和共产主义模式。

4. 新的组织思想:座右铭是行动而非组织。新左派将自己理解为一种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作为一种运动,它运用从示威请愿到直接的强制行动的一切直接运动策略。它试图通过行动而创造意识,通过挑衅唤起公众,同时用行动改造参与运动的个体。

5. 社会变革领导者的新定义:无产者不再被视为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领导者。相反,新左派认为社会改造的推动力来自其他集团:新型(技术)工人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边缘群体。

新左派思想中固有的个体解放和集体解放之间、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之间、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在 1968 年运动当中造成了内在的紧张。这也说明了研究者对该运动进行定性的时候所表现的范畴过剩现象,他们有的说这是代际冲突,有的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反官僚运动,还有研究者认为是文化革命和性解放运动。运动中起到拱心石作用的社会乌托邦则将纷繁各异的思路聚合在一处,并将这场运动置入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马克思和巴枯宁等人所代表的那种乌托邦传统之中。然而,这场运动的社会乌托邦内容并不限于对劳动从外在控制中解放出来的集体解放的期待。它还表达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后物质主义的”那些主题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而且它也表现出“旧的”与“新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过渡形式。

使 1968 年社会运动独具特征的令人目眩的多样性也表现在各个国家的不同运动方向之上。切断争取解放的战斗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纽带之后,“青年知识分子”要求作为新型“革命主体”介入社会冲突。由于组织松散和对外部动员的强调,新左派把自己投入到从反核战和要求裁军到民权和反殖民等众多事业当中。比如,在美国,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在 1968 年同时爆发。<sup>[13]</sup>在德国,运动则包括了“复活节示威游行活动”(一场争取核裁军的斗争),反对紧急状态法案运动以及学生运动。<sup>[14]</sup>只有在法国,这一年出现了学生和工人之间的互动。大学抗议活动传播到了工业领域,演变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sup>[15]</sup>在短时间内,情况看上去似乎是新左派运动有可能变成广泛的社会运动,使得老左派政党“从上到下”革命化。也可以认为,学生运动通过学生与工人运动的平行行动有可能获得政治影响力。

### 三

在法国,1968 年运动的开始晚于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

美国和联邦德国分别从1964年和1965年就开始了持续的运动动员。相反,尽管法国各处有一些抗议(1964年巴黎和1966年斯特拉斯堡发生的对大学的批判活动,以及反对越南战争的一些抗议活动),但是这些较小规模的抗议与1968年抗议行动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直到抗议形势发展到顶峰之时,法国的运动才开始。然而,在几周之内法国的运动就已在动员规模方面赶上了世界形势,并在其政治爆炸性方面超过了德国和美国的抗议行动。<sup>[16]</sup>运动以巴黎近郊南泰尔大学里少数大学生的反抗活动为开端,很快就发展成为使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的总罢工。它还引发了使戴高乐政权体系面临颠覆危险的政治危机。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论点一:法国学生运动的动员作为本质上的行动自生过程之结果而自发地发生。

可以确定地讲,法国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大学体制的普遍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对学生的学习环境、就业前景和生活态度产生了影响。但是这场运动绝不仅仅是对这些不足的一种反应。<sup>[17]</sup>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全法学联(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 缩写 UNEF)不断地对大学以及未获多少学生支持的政府大学改革计划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提出批评。1967—1968学年开始时由全法学联在南泰尔大学协助组织的学生罢课行动只持续了几周就偃旗息鼓了。直到大学生中一个小核心集团在1968年春开始采取有限但不合惯例的行动,通过打破规则,侵越禁忌并作出其他一些挑衅行为的方式引人注目地“打碎”大学运作机制,引发了法国五月运动的动员过程才开始启动。

拉开抗议活动序幕的学生集团,“狂怒者”(Enragés)和“三二二运动”与新左派知识领袖之间有明显的参照关系,至少可以说,是受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著作和观点的影响。<sup>[18]</sup>具体说来,“国际情境主义者”的作品,也就是说,与《社会主义或野蛮》和《争论》有关的团体,在行动的学生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他们的行



动策略(直接性、挑衅性和随势而定的策略),还是其自我理解(反教条、反官僚、反组织化,并且反极权主义)都是与新左派哲学相符合的。这两个集团的焦点都是大学——“狂怒者”力图取消大学,而“三二二运动”则要将大学改造成“批判型大学”,都把大学作为实现社会彻底变革的行动途径和起点。它们自视为这种变革的核心运动。它们动员起大批学生的成功做法一开始仅限于南泰尔大学校园之中。如果没有传播到索邦大学,那么这场运动本来可以很快沉寂下去,就像全法学联协助组织的那次罢课和此前的其他许多学生抗议活动一样。当局采用了镇压措施扑灭索邦大学里学生行动者的小核心集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批警察进入了校园)。这些事件显然激怒了未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学生,促使他们起来表达与积极参与运动的少数学生的团结。在几天之内,好几轮学生行动和政府镇压之后,在索邦大学周围和拉丁区的街道上事态逐渐发展成为群众和军警之间的暴力冲突,在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过程中,运动动员得到加速发展。行动的动态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将中学生和年轻人(以及许多青年工人)推向大学生一边。

在一周(5月3日到10日)之内,法国已经赶上了其他西方国家运动发展的步伐。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中,法国学生运动就已超过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了。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表示出与学生的团结,是什么让法国工人与学生运动团结一致的呢?

论点二:学生抗议活动以某种“危机事件”(布尔迪厄)的方式传播到了工人当中。

在他的《学术人》一书中,布尔迪厄阐述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危机事件”在同时潜藏于不同社会领域的危机系列中具有创生作用和创生功能。进而,他给宏观社会学结构和结构性冲突的分析引入了“明确与偶然因素相关的”分析要素。然而,他也还坚持结构决定事件的理论,因为只有满足如下条件时事件才可能发展到“普遍危机”的“危机时刻”：“在感受到危机降临的当事人之

间,在因生存状况相似(条件相同)而有相似倾向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调谐的客观关系。”<sup>[18]</sup>在布尔迪厄看来,在更大的依赖性结构中的这种独立性就是“危机的”历史事件的本质所在。

在法国,使不同社会集团的感知同时化的危机事件就是“街垒之夜(5月10日到11日)”,在那夜学生和青年人进行了一场和平示威游行之后占领了拉丁区的一部分街区。他们接下来通过某种自发的和游戏的方式在占领区内开始构筑街垒。他们决定除非政府答应以下条件,否则他们决不撤离这片占领区:(1)释放在镇压示威游行过程中被逮捕的学生;(2)重新开放索邦大学,该校校长曾下令关闭大学,警察现进驻守卫在校园之中;(3)警察撤出拉丁区。5月10日到11日夜巴黎构筑起来的这些街垒是一种历史隐喻,隐喻着1871年巴黎公社的街垒和1944年从德国占领中解放的巴黎的街垒。街垒由中学生和大学生高高建起,它们不必模仿得一模一样就能唤起人们对历史上的街垒的回忆。它们的实质是表现而非工具。稍晚些时候,在这种挑衅行动和警察的应对部署的过程中,媒体报道、公众反应和政府与工会所采取的步骤使得学生抗议运动政治化了。

学生的行动主义吸引了大众传媒。由于在第一个街垒建起之后广播公司就立刻派出两台转播车深入到被占领街区进行实况报导,运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逐步加强。这种传播方式不仅使信息扩散到了拉丁区之外,而且也超越了首都范围。媒体报导制造了一个听众群,这些听众集中注意力紧跟事件发展,并且形成了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这样一来学生抗议运动的大火也就从巴黎烧到了外省。

政府在这个紧要关头必须作出反应。无论是作出宽宏大量的反应还是采取镇压的措施,它都面临着失去合法性的危险。政府发现自己作出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却缺乏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也缺乏作出决定的能力。此时总理不在国内,而内阁部长们也

难于协调一致地行动。在那日夜里斡旋调解的努力都告失败之后,总统本人采取何种措施以应付局势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部长们的认识,他们开始对局势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示威游行的学生是造反的暴徒,而示威提出的三项要求则是 émeute(造反)。内务部长几经犹豫之后终于下令警察和公安部队于5月11日清晨移除街垒。警察部队的暴行(《明镜》周刊[*Das Spiegel*]将之描述为“无情的战斗”)引发了骚乱和公众抗议。危机事件爆发了。

街垒之夜既不是由社会结构因素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集团或参与其中的个人规划的。毋宁说,这个危机事件是政府不协调的决策,运动中个别集团随势而变的决定和警察方面的镇压行动的结果,或确切地说,是这些因素的同时作用。换句话说,制造了全新形势的偶然境遇促成了这个危机事件。该事件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常轨,也打破了未被质疑的事物的正常秩序。它将不同社会集团的认识同步化,并且把某个时刻转化为了一个公共事件,这个时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能够通过同一个参照系对之进行把握。它让法国工会与学生运动及其要求保持团结一致——不仅在词语上,而且在行动上。为了抗议镇压和支持学生的要求,工会号召团结起来进行24小时总罢工。一切都要为这个目的服务——至少是在这个时刻。

然而在第二次政治介入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乔治·蓬皮杜总理于5月11日夜从阿富汗返回国内,也就是在野蛮清除拉丁区街垒十四小时之后,总理发表电视讲话接受学生的一切要求。总理的决定对危机事件转化为布尔迪厄所说的危机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sup>[19]</sup>

论点三:工人动员过程与学生运动的行动策略如出一辙。共同的价值将平行的运动合众为一。新左派的认知定位起到了使异质的社会运动统合起来的关键要素的作用。

同样，工人运动也始于少数积极分子的一次行动。5月14日，工会组织的24小时总罢工之后，南特附近飞机制造厂的青年工人拒绝恢复工作，相反，他们占领了工厂车间，封存飞机，并拘留了厂长。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受到了巴黎学生行动的指引，后者在索邦大学重新开放一天之后就占领了大学校园，而且受到了大西洋岸卢瓦尔地区有着无政府工团主义定位的“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联盟鼓动的影响。过去，这个联盟的代表就曾主张将直接行动当作实现工人要求的手段——但并未成功。只有在5月11日到13日之间那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形成之时，这个策略才可能成功。首都的行动者立即注意到了外省工厂被占领事件，接下来的几天里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雷诺汽车厂也开始了自发的罢工，罢工又从雷诺厂发展到其他工厂。仅仅几天时间，就有750万到900万工人投入到罢工之中——他们并非响应工会总部的号召，而是自发行动。<sup>[20]</sup>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五月事件前夕法国并未发生经济危机，因此自发的动员过程不能通过结构性经济因素解释。尽管存在分配冲突，失业率也在逐渐攀升，但是法国经济所遭受的衰退的影响较之于德国要轻得多，相比之下，法国更不易发生经济通胀和经济崩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1968年的法国是一个稳定的、无经济危机的国家。<sup>[21]</sup>

这种潜在的不满不可能仅仅只在社会经济原因中寻找其根源。它更是对工业系统中极权主义体制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后果。到了1968年5月，这种潜在的不满转变成了集体行动的意愿和甚至连工会领袖也无法控制的明确的抗议态度。学生已经成功地迫使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为工人运动提供了榜样。这一可能性预期也扩展到了其他集团当中。新的行动方式提高了工人们行动的意愿。有一份声明可以被看作对当时工人情绪的最好说明，这声明中记录了一个工人的话：“政府顺从了学生，它为什么就

不能顺从我们呢？”<sup>[22]</sup>现在形势已经变得一切皆有可能，或者说是看上去如此。

国有工业中的工人也发起了罢工。在他们当中青年工人是一股特别冲动的力量，他们把其他人都激发了起来。他们的目标是通过直接行动迫使“国家老板”(Etat patron)服从他们。直接行动使动员的动力机制启动了。这类罢工以劳工运动的传统为基础，但其释放出的却是没有特定目标的集体行动意愿。比如说，对工厂的占领可能是：(1)向政府和工业部门施加压力，为的是迫使它们坐到谈判桌前或作出决定；(2)展示地方队伍独立性以及使之与老左派支配的工会机器区别开来的方式；(3)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策略和新左派思想双重基础上对工商业和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改造的开始。这完全视行动者的意向而定。与学生运动的目标一样，工人罢工运动的目标的形成也是社会互动过程的动力机制的结果。

罢工委员会最初的要求与5月之前工会曾提出的要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社会运动绝不等于它所公开发表的文字。被占领工厂中的大集会表现出某种“创造性的沸腾状态”(effervescence créatrice)，不仅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还要求对工商业结构进行改革。“法国民主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et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非总工会，缩写CFDT)的定位一直以来都是最接近新左派的，该联盟发明了一个新词来表达工人们的内心期待：工人自治。<sup>[23]</sup>第一次自发罢工发生两天之后，“工人自治”的新口号就为罢工赋予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提出了“工人自治”之后，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就号召：(1)改革工商业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2)废除等级制和权力集中，并且(3)工人有权利通过自我决定和自我管理释放创造性潜能。尽管工人自治发展和贯彻方式的制度细节和合法性细节尚不清楚，但其中蕴涵的反等级制和反极权主义的成分却足以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在目标上团结一致。大学民主化

紧接着就是工业民主化：“A la monarchie industrielle et administrative, il faut substituer des structures démocratiques à base d’autogestion。”(工业和管理的君主制必须被建立在工人自治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所取代)正是这么一种“communauté d’aspiration”(愿望共同体,因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期待而形成的共同体)使得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团结了起来。<sup>[24]</sup>

论点四:老左派动用组织权力以对新左派的行动策略和目标定位进行彻底打压。冲突向作为集体谈判系统的制度化机制发展。

“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联盟,缩写CGT)不支持工人自治作为根本性社会变革的目标。它认为工人自治的概念只是一种 *formule creuse*(空洞的公式),相反,总工会的基本目标定位是财富分配而不是改变权力和决策制度。<sup>[25]</sup>它坚决反对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已经形成的联盟。一有可能,它就试图阻挠学生和工厂工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并愤怒地制止联盟成员和学生运动的“头子”达尼埃尔·科恩-邦迪发生关系。此外,它在自己组织权限之内尽可能地对这场已经使经济生活陷于瘫痪的社会运动进行否定。大约有750万到900万法国公民参加了罢工活动,而这场危机也获得了向革命形势发展的潜能;但是总工会却想尽一切办法把抗议活动纳入到调停解决的正常轨道中去。它也是推动工人与政府和工业界代表进行集体协商解决(5月27日格勒内尔协议),进而通过传统的冲突解决机制逐步消弭危机的重要力量。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总工会还没有能力有效地迫使草根阶层接受它的策略和目标。

工人在车间里举行了大集会以反对已经达成的工资协议解决方案。格勒内尔协议之后,没有复工,罢工仍在工会的控制之下——尽管工人拒绝同意工资解决方案——继续着。无论是在基层车间还是在整个工业单位,工会已经展开了改善劳资关系和提

高工资薪金的谈判,并且作出持续努力以压制自发的抗议活动,力图将之纳入到体制化的渠道当中。罢工运动转变成了劳资纠纷,而罢工的各种异质要求也分散到了各个委员会和其他团体之中,而且这些委员会和团体是乐意接受经济上的妥协解决方案的。商业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权力结构不再是讨论的主题。雇用方和工会之间有保障的谈判毕竟仍然是罢工运动的压力结果,正是这个压力迫使雇主坐到谈判桌前进行集体协商,也使他们有了妥协的意愿。格勒内尔协定第一次提出法国商业单位正式在工作场所组织工会的问题。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工会分部在所在工作场所有进行工会活动的自由,公会成员有集会的权利,有在工作场所的布告板上张贴工会声明的权利,有分发工会报纸的权利。<sup>[26]</sup>可以说,工会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由于自发的罢工运动而得到了改善。

但是,这也还没有使法国工人达到德国工人的水平,德国工人早已在工业劳资关系当中享受到了参与的权利。可以确定的是,德国工会传统中的“共同决定”从来都不是法国工会的目标,法国工会认为“共同决定”会限制它们行动的范围。工会也不接受通过一个双方在明确合同期限内共同遵守的协议而使劳资关系制度化的思想。工人自治的口号只表达了少数工人的情绪,而且也从未形成一个正式的模式。

仅仅有一小部分商业单位试图引入自我管理的机制。大多数罢工者支持对这场社会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自己的敌人不是雇主而是戴高乐政体本身。他们要求变革政治权力,认为这是社会结构改革的前提条件。而这个谈判则意味着运动目标定位的改变和冲突解决方式的改变。工会为危机的解决铺平了道路,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却无法使这解决方法得到贯彻。在格勒内尔谈判失败之后,工会谢幕,政党走向了前台。社会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也是在这个阶段,由于其自发性和反政党特性,运动并未获得满意的结构性坚实基础,而其核心集团在概念上对

这个基础也没有足够的准备。

论点五：蓬皮杜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相互冲突的策略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后果，这一系列后果导致了政治危机的恶化。蓬皮杜的策略旨在对这场社会冲突加以平息，去政治化和制度化，而戴高乐的策略定位是动员、政治化和通过全民投票维持权力。因此两种策略相互抵牾。

政治体制就此类社会运动作出反应的观点可以说分为两种可选择的策略：容忍和镇压。容忍的策略暗含了对运动旨趣的认可，也表示乐于进入对话或协商，至少是与运动中较温和的派别进行对话或协商。而镇压的策略则认为运动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法的，并因而彻底反对运动，通过动用警察力量取缔组织及其活动的方式来维持政治现状。这两种方式可以合在一起或交替使用——就像法国政府和总统在1968年五月所做的那样。这使运动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法国的1968年五月事件之所以变成那样一种戏剧性事件，其原因之一是：应付冲突的不同策略之间的内部斗争在最重要的两个政治职权者——戴高乐总统和蓬皮杜总理——之间引发了权力斗争。法国的两极化政治体制本来是建立在这两极协调运作的基础之上的，可是现在却因两极公开的策略之争和隐秘的个人争斗而彻底永久性地被毁坏了。

蓬皮杜从阿富汗的喀布尔返回之后立即采取了缓和与调解的政策，而这不仅和戴高乐“国家不会投降”的立场相抵牾，而且，正如雷蒙·阿隆指出的那样，<sup>[27]</sup>使得这一立场显得非常荒谬。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在罢工运动的背景之下愈演愈烈。蓬皮杜把所有赌注都押在集体协商这张牌上，而戴高乐希望证明公众对他的信任因而宣布全民投票，进一步使权力斗争戏剧化了。一旦宣布全民投票，就不可避免地使冲突政治化了，这一切都使通过集体协商消弭冲突的常规渠道达成社会经济的解决办法变得非常困难。抗



议运动转入了政治舞台,也为戴高乐政权危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政权有可能将“Dix ans ça suffit”(十年够长了)的声明转变为一种政治决策。格勒内尔协议的失败和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可以想见的失败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势,议会中的反对党在这个形势中仿佛看到了他们建立“过渡政府”计划的成功希望。

论点六:非共产主义的新左派未能成功地利用形势来界定自身的政治立场。

一方面新左派把自身理解为通过行动动员起来的并忠于草根阶层的自发性的运动,另一方面联合行动,把各异的旨趣组织起来,并将之导向特定的政治目标的压力日渐增加,但是新左派未能在这两方面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它没有形成行动的政治方案,因而分裂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派别主张建立起以民主模式为基础的全国协调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捍卫行动集体的基层动员。而另一派则支持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政党。只有少数人支持——但实际上也太晚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和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缩写 PSU)提出的观点,统一社会党是一个受新左派思想影响的小党。这个提议主张运动代表组成过渡政府并重新组织选举。20年后,达尼埃尔·科恩-邦迪说,他们当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孟戴斯-弗朗斯:“我们应该提议选举,提名孟戴斯-弗朗斯”。<sup>[28]</sup>

然而,1968年5月底,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缩写 PCF)采取了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这个选择的立场。就像总工会(CGT)动员全体成员反对工人自治的思想一样,法共现在使用它的组织力量防止由孟戴斯-弗朗斯担任首脑的过渡政府的出现。甚至在孟戴斯-弗朗斯领导下的联合左派——即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Fédération de la Gauche Démocratique Socialiste,缩写 FGDS)——对孟戴斯-弗朗斯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新左派和老左派之间的分歧阻碍了反对戴高乐政权的统一左派联合

的出现。5月底的戏剧性政治形势所提供的权力变革的良机就这样与左派失之交臂了。已经震动了法国社会也撼动了戴高乐政权的学生和工人的大规模平行运动现在开始解散了。新左派的联合思想过于薄弱；老左派的组织利益占了上风。

论点七：政府放弃了全民投票并决定重新举行内阁选举，进而重新确立了以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为基础的行动策略。

新选举将这场社会政治冲突纳入到了竞争的民主党派体系的传统渠道之中。政治和社会危机很快得到了平息。那些老政党和既有的利益集团支配着选战过程，而被动员起来的青年群众被剥夺了公民权，因为法定投票年龄是21岁。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政治党派经过这次危机之后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权利转移一度似乎是可能的，而且在危机高潮时期几乎成为现实，但毕竟没有发生。甚至在计票之前《人道报》就已经指出了谁应该为选举失败负责。第一轮投票结束的第二天勒内·安德里乌(René Andrieu)在社论中说：“Chaque barricade, chaque voiture incendiée apportai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voix au parti Gaulliste, voilà la vérité。”<sup>[29]</sup>（每一个街垒，每一辆燃烧的汽车都给戴高乐派政党带来了数以万计的选票：这千真万确）只有统一社会党发表的声明指出，1968年5月社会运动提出的所有难题仍然存在而且有待解决。

#### 四

法国五月运动的发展是自发性的和不可预见的。它异乎寻常成功地动员起众多群众，并且极大地动摇了政治体制。可是要清楚地说明它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考察可以被视为此次运动结果的四个方面。

### 对政治体系的影响

社会运动的研究者认为,为了使运动的中心思想成为唯物主义政治议程的一个部分,这些思想就必须由政治决策程序中的中间集团认可或接纳。但是在法国这样一种转换并没有发生,至少是在事件直接后果之中没有体现。

五月运动对政治党派的影响就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FGDS)和共产党之间攻守同盟的瓦解,还有就是民社左联(FGDS)自身的分裂,所以民社左联(FGDS)是1968年5月的大输家。民社左联(FGDS)不仅失去了它的选票和地盘,而且还丧失了保持内部统一性以及建立外部合作的能力。法国激进党离开了民社左联,因为它认为五月事件和匈牙利事变(1968年8月)<sup>[30]</sup>之后,密特朗所谋求的与共产党的战术联络已经不再可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缩写SFIO)这个社会主义党也与密特朗和他的计划拉开距离,尤其对密特朗1968年5月28日专横的决定不满。<sup>[31]</sup>民社左联(FGDS)的瓦解以及因之而发生的一系列后果在1969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与四年之前大为不同,左派不再以一名候选人参加选战,而是四名:代表民社左联(FGDS)的加斯东·德费尔(Gaston Defferre),代表法共(PC)的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代表统一社会党(PSU)的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和代表托洛茨基主义党的阿兰·克礼文(Alain Krivine)。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左派总共仅获得30.3%的选票,共产党候选人所得票数占其中的21.5%,统一社会党(PSU)候选人票数占3.7%。加斯东·德费尔仅获其中5%的选票,而阿兰·克礼文得票率仅是百分之一。因此他们在第二轮选举中没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总统选举的最终大战在戴高乐派候选人乔治·蓬皮杜和阿兰·波厄(Alain Poher)之间进行,后者则是由政治中间派提名而且受到了法国激进党(Parti radical)的支持——那时激进党已经从联合左

派中分裂出来了。结果蓬皮杜以 57.6% 的得票率当选,而且超过了 1965 年戴高乐本人胜选时的得票率(54.5%),进而即使在戴高乐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戴高乐的政治权力仍旧得到了巩固。

总统选举的溃败加速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内部改造的进程,1969 年 7 月该党和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缩写 PS)一样都在新的领导人领导之下进行和实现了重组。在随后的几年中,社会党(PS)将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整合起来。1971 年,由密特朗领导的“共和制度大会党”(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并入社会党(PS),就像罗卡尔倒戈之后统一社会党(PSU)中大部分左派组织在 1973 年到 1974 年之间所做的那样。工人自治的思想在这些党派内部充当了某种起统合作用的庇护伞,从外部看也使它们获得了区别性的特征。新的社会党早在 1969 年就已表露出支持与法共(PCF)联合起来的意愿,在 1972 年的时候终于与法共(PCF)共同起草了一份选举纲领。这份选举纲领撇开了意识形态分歧,包含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且为民社左联(FGDS)和法共(PCF)之间已有的选战联盟(1965—1968)附加了一个纲领性的政策范畴。<sup>[32]</sup>在五月事件和左翼阵营的分裂之后实现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正式和解在 1974 年总统选举中首次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密特朗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 49.2% 的选票,仅次于独立共和党戴高乐派候选人吉斯卡·德斯坦的得票率(50.6%)。而 1965 年密特朗与戴高乐竞选总统时得票是 43.7%,与那时相比,密特朗九年之后在得票率上提升了 5 个百分点,这看上去有些微不足道,但是这却透露出一种趋势,这个趋势将在 1981 年时使权力变革成为现实。在经历了 1968 年到 1969 年相对的和绝对的失败之后,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复苏了,这是由新一代投票者支撑起来的,他们在 1968 年时的年龄在 17 岁到 20 岁之间。法国民意调查研究协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nquête par sondage,缩写 SOFRES)1974 年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大部分青年投票者对五月事

件持积极态度。<sup>[33]</sup> 1981年密特朗大选获胜引发的公众欢庆被一种情感鼓动起来,这是展望到一个新法国即将出现的情感,也是对1968年5月的兴奋场面的追忆之情——是一种觉醒的感觉,也是新的政治期待的一种投射。然而,两年之后,社会主义政府不得不再次改弦更张。经济现实为新社会的期待限定了边界。

### 对新左派的影响

法国五月运动将新左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两难困境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它所起的独一无二的有力的动员作用让政府、政治党派和工会手足无措,但是作为运动的新左派最终没能胜过既有政治党派和组织。老左派的制度打败了新左派。新左派这次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所秉持的价值,而在于它拒绝为这些价值赋予一个持久的行动结构和制度基础。因而,“让想象力夺权”虽然作为最核心的规划使众多个体着迷并被发动起来,但在夺权方面仍然是不成功的,因为权力的基础不是想象力的动员,而是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决策前提。新左派内部的紧张和受到局限的影响力应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没有在打破权力之时掌握权力。

新左派以通过行动实现自我组织的策略动摇了权威结构,暂时使经济陷于瘫痪并使法国的政治系统陷入每个人都能察觉到的严重危机之中。它的策略在最初阶段很成功,推翻既有结构的那些行动也是毫不费力,但新左派毕竟没能将它的动员策略造成的冲力保持下去。以行动方式实现的动员总是一种短命的机制。不对动员手段和资源加以稳定化,持久的动员将是不可能的。运动的稳定性是以组织为前提的。新左派从未给其价值和实践中的反极权主义和反官僚方面赋予永久的组织结构。

它在运动中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和可控制的领导权,因为它相信组织结构必将导致寡头政治。因而,它所依靠的是草根阶层通过持续讨论和交往程序独立自主地决定运动目

标、方法和行动方式的那种自发性和创造性。运动的志愿精神和行动主义极大地释放了能量并解放了想象力。个体通过行动而得到改造,但是社会制度却未被触动。正如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分析1968年运动时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社会没有地址,只要你想对他提出要求,就必须向组织说话。”<sup>[34]</sup>

新左派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把焦点放在运动的自治和真诚性之上,因而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新左派拒绝与中间组织建立政治合作关系,进而未能与政治建制中的潜在伙伴建立联盟。联盟,应该被界定为自治但内敛的各政治权力的平等协调的合作关系,如果缺乏联盟,任何运动都无法成功地实现它的目标。由于未能成功地建立起政治联盟网络,新左派封死了所有调解的机会并牺牲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撇开它在动员方面的成功不谈,作为运动集体当事人的新左派错失先机。在运动过程中,反极权主义因素逐渐受到极权主义左翼团体的干部渗透。这些干部虽然在反对戴高乐和共产党的问题上与新左派观点一致,但是却没有放弃民主集中制模式。通过行动战役的方式发动的“愤怒行动的疾风”正是作为运动的新左派的结构弱点,这也为等级化组织的干部团体打开了大门。<sup>[35]</sup>这些团体的影响力的增长与新左派动员能力的衰退成正比。1968年5月之后,它们不仅抛弃了新左派运动的遗产而且彻底取代了它。它们甚至完成了军事化并采取恐怖主义手段,进而彻底摧毁了“观念的超凡魅力”。

新左派将自己摒弃于政治利益联盟机制之外,这就使新左派运动被孤立,并失去了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机会。尽管新左派也曾讨论过与孟戴斯-弗朗斯分享权力的可能性,但终究未曾付诸行动。与密特朗领导的左翼联盟进行合作,甚至是他们从未考虑过的。新左派核心集团的想象力和能量从未指向政治上可行的变革,相反指向的却是创立一个自治的左派运动的观念。只有削

弱老左派，打破它的组织权力，并且通过自发行动而使其成员参加进来才能实现新左派所构想的那种运动。

#### 对工商业结构的影响

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同时对经济增长抱有信心的新左派首先将社会问题看作是分配问题，也就是说首先看到以物质平等化纠正社会不公，废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和人类关系中的不平衡现象的重要性。它努力通过扩大参与权和经济合作机会的方式实现机会均等。新左派还非常关注通过工人委员会的途径而不是通过建立新型工业组织的方式控制经理权的问题。由于其定位的反制度化特性，新左派也提倡形成工商业既有制度的反制力量。即使它这样定位自己的权力，新左派也不会建立一种稳定的反体系。

在自发地占领工厂车间的行动爆发之始，运动对老左派组织扩张和成员招募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但是新左派最终没有通过其行动永久性地把握住工人。占领车间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工业结构或工厂车间的所有权和权威。从工人自治发展而来的对领导权和决策权进行重新分配的思想在1968年并不具备制度形式，最终这种思想被工会的物质要求和改善不公的平等化策略战胜。

即便不是在选战开始之前，也是在选战开始的时候，新左派便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被老左派的组织力量压服了。格勒内尔集体协商失败之后，老左派在因持续罢工而恶化的政治危机环境下已经获得了给出替代性行动策略的不容置疑的地位。老左派参加新议会选举的意愿对所有通过直接民主方式形成的政治立场的所有希望而言不啻是釜底抽薪，这种意愿只能加强工会作为中间协商伙伴的力量，只能有助于罢工的平息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中间协商机制持续运作（甚至是在总罢工所创造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下的运作）是1968年5月大危机得以解决的重要原因。

没有一个政党在选战期间接受工人自治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表达了“消除异化和剥削,普遍消除等级制和强权,废除工资劳动和劳动分工,总之,实现真正民主”<sup>[36]</sup>的愿望,但要真正贯彻和实现这一理想则是需要时日的。直到1970年,也就是在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内部得到论证和理论上的发展之后<sup>[37]</sup>,这个思想才深入人心。1972年社会党和共和制度大会党合并之后,新社会党将工人自治写进了政纲之中,这份政纲的标题是“Changer la vie”(改变生活)。激进派和民主派在社会党内都得到了发展,当然,这两派对工人自治有自己各自的理解。<sup>[38]</sup>最终,甚至连在1968年5月将这个思想当作 formule creuse(空洞的公式)予以拒斥的那个党派,也就是说共产党,在1977年到1978年的那段时间里也以含蓄方式采纳了这个思想。但这么做并没有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概念上发生改变。

####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制度体系的稳定性迫使新左派的推动力转向了新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的亚文化实验,迫使新左派通过从制度难题当中抽身的方式去解决制度难题。

兼具个人主义又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新左派对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异化进行反抗。他们在与异化斗争的过程之中打破了禁忌、规范和传统价值。他们抵抗规则,目的是挑衅权威制度并使之去合法化。大多数行动者在抵抗规则和蔑视组织和权力的既有结构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个体的解放。他们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通向个体自我决断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得到发展的亚文化使觉醒的氛围得以保留,并呈现其新左派起源,但是新左派的政治规划却日益让位于对个体不幸感的某种崇拜形式。所以,1968年的觉醒对许多人来说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另类生活方式的形成,生活选择和生活冒险的个体化,而且也是从政治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撤离。



以消除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异化为基础的个体解放乃是新左派的固有策略。但是新左派关于改造的思想并不止于个体的自我实现,此外还包括了以集体性的自我支配和自我管理方式实现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根本目标是摆脱“奴役的铁笼”,这铁笼一直以来将它的威权加在人类的头上,让人们受制于商品消费的需要,受制于对控制着现代社会中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的依赖,从而窒息了个人的行动。新左派的规划质疑的不仅是西方社会追求效率的世俗趋势,而且还质疑现代生活方式和使之成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它是充溢着法国 1968 年五月事件的那些梦想的源泉。

## 注 释

[1] 有关运动在政治和社会框架中造成的更激烈的变革请参看克劳斯·奥弗(Clause Offe),“挑战制度政治的疆界:19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1960s),载于查尔斯·S. 迈尔(Charles S. Maier)编:《变化的政治疆界:欧洲国家与社会,私人与公共的演进平衡论文集》(*Changing Boundaries of Political: Essays on evolving bal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ublic and Private in Europe*, New York, 1987),第 63—106 页。

[2]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学术人》(*Homo academicus*, Frankfurt am Main, 1988); 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封闭社会》(*La Société bloqués*, Paris, 1970);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克洛德·勒福(Claude Lefort)和柯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蒂(Corneelius Castoriadis):《裂隙:对事件的初步反思》(*La Brèche: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ènements*, Paris, 1988); 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后工业社会》(*Die post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72)。

[3] 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Igrid Gilcher-Holtey):《权力幻想:法国 1968 年 5 月》(“*Die Phantasie an die Macht*”, *Mai 68 in Frank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95)。

[4] 阿兰·图海纳此前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但他提出的结构分析方法和作为本章基础的互动论研究是存在差异的,有关这个差异请参看吉尔舍-霍尔泰《权力幻想》,

第24—40页。

[5] 弗里德海姆·奈德哈尔特(Friedhelm Neidhardt)和迪特·鲁赫特(Dieter Rucht),“社会运动分析:目前发展水平和深入研究的几个观点”(The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Some Perspectives of Further Research),载于迪特·鲁赫特编:《社会运动研究:西欧和美国的发展现状》(*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s of the Ar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Frankfurt am Main, 1991)。另见鲁赫特,“作为社会运动要素的公众动员”(Öffentlichkeit als Mobilisierungsfaktor für soziale Bewegungen),载于弗里德海姆·奈德哈尔特编:《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科隆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刊增刊》(*Öffentlichkeit, Öffentliche Meinung, soziale Bewegungen, supplement to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No. 34(1994):338—339。

[7] 奥托·拉姆施泰特(Otto Rammstedt):《社会运动》(*Soziale Beweg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78)。

[8] 于尔根·拉什克(Jürgen Raschke):《社会运动:历史系统大纲》(*Soziale Bewegungen: Ein historisch-systematischer Grundriss*, Frankfurt am Main, 1985)。帕特里斯·曼(Patrice Mann):《集体行动:行动的少数派的动员和组织》(*L'Action collective: Mobilisation et organisation des minorités actives*, Paris, 1991)。

[9] 克劳斯-彼得·雅普(Klaus-Peter Japp),“自我生产或第三方责任:论社会运动中的理性主义”(Selbsterzeugung oder Fremdverschulden: Thesen zum Rationalismus in den Theorien sozialer Bewegungen),见《社会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学刊》(*Soziale Welt: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und Praxis*)3(1984)。

[10] 《学术人》,第254页以下。

[11] 罗恩·艾耶尔曼(Ron Eyerman)和安德鲁·杰米森(Andrew Jamison):《社会运动:一种认知的理解》(*Social Movements: A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1991)。

[12] 《权力幻想》,第44—104页。

[13] 有关美国运动的发展情况,请参看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从休伦港到芝加哥围攻》(*From Port Huron to the Siege of Chicago*, New York, 1987);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六十年代:希望的年代,愤怒的时日》(*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New York, 1988);罗纳德·弗拉瑟尔(Ronald Fraser)等:《1968:造反的一代学生——一个国际口述史》(1968: *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 An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New York, 1988)。

[14] 有关德国运动的发展情况,请参看卡尔·A.奥托(Karl A. Otto):《从复活节游行运动到 APO:联邦德国议会外反对派的历史》(*Vom Ostermarsch zur APO: Geschichte der auss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77);卡尔·A.奥托:《APO:从原始资料和文献看议会外反对派[1960—1977]》(*APO: Die auss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in Quellen und Dokumenten* (1960—1977), Cologne, 1989);洛塔尔·罗尔克(Lothar Rolke):《联邦德国的抗议运动:对政治矛盾的社会历史分析》(*Protest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Eine analytische Sozial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Widerspruchs*, Cologne, 1987);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和马丁·克里(Martin Kohli)编:《激进化的启蒙:1965年到1970年柏林的学生运动和社会学》(*Radikalisierte Aufklärung: Studentenbewegung und Soziologie in Berlin 1965 bis 1970*, Weinheim, 1989)。

[15] 有关法国运动发展的情况,请参看图海纳:《乌托邦共产主义》(*Le Communisme Utopique*);埃德加·莫兰,克洛德·勒福和让-马克·古德雷(Jean-Marc Coudray):《乌托邦共产主义》(*Le Communisme Utopique*);劳伦·若弗兰(Laurent Joffrin):《1968年5月:事件的历史》(*Mai 68: Histoire des événements*, Paris, 1988);热内维埃弗·德雷弗斯-阿尔曼(Geneviève Deryfus-Armand)和劳伦·热尔弗劳(Laurent Gervereau)编:《1968年5月:法国和世界的学生运动》(*Mai 68: Les mouvements étudiants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 Nanterre, 1988);阿兰·德拉勒(Alain Delale)和吉尔·拉加什(Gellis Ragache):《1968年的法国》(*La France de 68*, Paris, 1978);阿德里安·丹赛特(Adrien Dansette):《1968年5月》(*Mai 1968*, Paris, 1971);对1968年不同解释的综述,可参看米什雷·赞卡里尼(Michelle Zancarini),“对1968年的解释(Les Interpretations de mai 1968)”,载于IHTP编:《68年:政治文化与生活方式》,《信息通讯》第10期(1996年2月)(*Les Années 68: Evénement, cultures politiques et modes de vie*, Lettre d'information no. 10 [Feb. 1996]),第4—23页。

[16] 有关动员的具体情况,请参看《权力幻想》,第105—269页。

[17] 有关学生运动的形成以及其认知定位和政治化,请参看让-皮埃尔·杜特伊(Jean-Pierre Duteuil):“南泰尔大学的激进左派团体”(*Les Groupes d'extrême-gauche à Nanterre*),载于热内维埃弗·德雷弗斯-阿尔曼和劳伦·若弗兰编:《1968年5月》;达尼埃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和加布里埃尔·科恩-邦迪(Gabriel Cohn-Bendit):《左派激进主义:用暴力方式疗救共产主义的老毛病》(*Linksradikalismus: Gewaltkur gegen die Alters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 Hamberg, 1968);有关核

心政治集团,请参看埃尔维·阿蒙(Hervé Hamon)和皮埃尔·洛特曼(Pierre Rotman)编:《那一代》,第一卷《梦想年代》,第二卷《权力年代》(*Génération*, vol. 1: *Les Années de rêve*, vol. 2: *Les Années de poudre*, Paris, 1987—1988);里夏尔·康班(Richard Combin):《革命的方案:5月/6月事件的社会学基础》(*Le Projet révolutionnaire: Éléments d'une sociologie des événements de mai-jun*, Paris, 1968)。

[18] 有关“狂怒者”,请参看勒内·维奈(René Viénet):《占领运动中的狂怒者和造势主义者》(*Wütende und Situationisten in der Bewegung der Besetzungen*, Hamburg, 1977)。

[18] 《学术人》,第276页。

[19] 有关危机时刻的模式,请参看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街垒之夜:社会抗议运动动力学的个案研究”(Die Nacht der Barrikaden: Eine Fallstudie zur Dynamik sozialen Protests),载于奈德哈尔特编:《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科隆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刊增刊》,第375—392页。

[20] 有关罢工的情况,请参看 PierreDubois 等编:《罢工要求或政治罢工:五月运动的行动,实践和方向》(*Grèves revendicatives ou grèves politiques: Acteurs, pratique, sens du mouvement de mai*, Paris 1971)。

[21] OECD,“罢工后的法国前景”,载于《经济瞭望》(*Oeconomic Outlook*)第3期(1968),第52—59页;I. N. S. E. E. (国家统计局与经济研究所),“1968年7月INSEE所做调查研究反映的工业形势与前景”(La Situation et les perspectives dans l'industrie d'après les enquêtes effectuées par l' I. N. S. E. E. en juillet 1968),载于《形势研究:INSEE每月评论》(*Etudes Conjoncture: Revue mensuelle de l' I. N. S. E. E.*)增刊,第8期(1968)。

[22] 菲利普·嘉维(Philippe Gavi),“工人言论”(Des ouvriers parlent),载于《现代》(*Les Temps Modernes*),265(1968):82—83。

[23] 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的全国机构在正式场合提出工人自治的术语,这尚属首次。有关这个口号的内部争论可以追溯至1963年。有关工人自治这个概念,请参看皮埃尔·库-萨里(Pierre Cours-Salies):《CFDT:一个在过去承担未来的角色——1946年以来的工团实践和策略争论》(*La CFDT: Un passé porteur d'avenir: Pratiques syndicales et débats stratégiques depuis 1946*, Paris, 1988);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工人自治的年代》(*L'Age de l'autogestion*, Paris, 1976);以及格赞·施万(Gesine Schuwan),“福利国家和自我管理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kratischer Sozi-

alismus zwischen Wohlfahrtsstaat und Selbstverwaltung), 载于汉纳洛尔·霍恩(Hannelore Horn)等编《理论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理查德·洛文塔尔纪念文集》(*Sozialismus in Theorie und Praxis: Festschrift für Richard Löwenthal*, Berlin, 1978)。

[24] 阿尔伯·德特拉兹(Albert Detraz)和其他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战斗者,“CFDT在1968年5月中的立场和行动”(Positions et action de la CFDT en mai 1968), 载于《工团主义》(*Syndicalisme*)增刊(1969)。

[25] 也可参看彼得·杨森(Peter Jansen)等人编:《法国工会:历史,组织和方案》(*Gewerkschaften in Frankreich: Geschichte, Organisation, Programma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6),第36页。

[26]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知识与责任:回忆录》(*Erkenntnis und Verantwortung: Lebenserinnerungen*, Munich, 1985),第335—336页。

[27] 转引自阿蒙和洛特曼编:《那一代》,第555页。

[28] 参看《人道报》(*L'Humanité*),6月24日,1968。

[29] 弗朗索瓦-乔治·德雷福斯(François-Georges Dreyfus):《1940年到1974年的法国左派史》(*Histoires des gauches en France, 1940—1974*, Paris, 1975),第308页。

[30] 有关5月28日事件,请参看《权力幻想》,第五章;有关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批判,参看菲利普·亚历山大(Philippe Alexandre):《戴高乐—蓬皮杜决战》(*Le Duel de Gaulle—Pompidou*, Paris, 1970),以及《快报》(*L'Express*),第888期,1968年6月15—21日,第8—9页。

[31] 参见沃尔夫冈·雅戈尔(Wolfgang Jäger):“法国的社会主义党与共产主义党”(Die sozialistische Partei und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Frankreichs),载于迪特·奥博恩霍费尔(Dieter Oberndörfer)编:《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党:第一卷南部国家》(*Sozialistische und kommunistische Parteien, vol. 1: Südländer*, Opladen, 1978),第65页以下。

[32] 热洛姆·雅弗里(Jerôme Jaffré),“法国政治世代初览”(A Preliminary note on French Political Generations),载于《欧洲政治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第5期第二卷(1977),第151页。

[33] 参看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作为环境的大学:一个短论》(*Universität als Milieu; Kleine Schriften*, Bielefeld, 1992),第152—153页。

[34] 雷纳·帕里斯(Reiner Paris),“愤怒行动的疾风”(Der kurze Atem der Provokation),载于《科隆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刊》,第41期(1989),第33—52页。

[35] 施万：“福利国家和自我管理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载于汉纳洛尔·霍恩（Hannelore Horn）等编：《理论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第584页。

[36] 参看罗桑瓦隆：《工人自治的年代》。

[37] 详见1975年巴黎联盟大会，见雅戈尔：“法国的社会主义党与共产主义党”，载于奥博恩霍弗尔编：《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党》，第93—100页。

[38] 参见沃尔夫冈·雅戈尔，“法国工会和左翼党派”（Gewerkschaften und Linksparteien in Frankreich），载于汉斯·吕勒（Hans Rühle）和汉斯-约阿钦姆·韦恩（Hans-Joachim Veen）编：《西欧民主工会，第一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Gewerkschaften in den Demokratien Westeuropas, Vol. 1: Frankreich, Italien, Spanien, Portugal, Griechenland*, Paderborn, 1983），第63—67页。

## 1968年5月及其死后之生：导言

克里斯汀·罗斯

赵文 译

我不知道法国历史上还有别的哪个时代能给我相同的感觉，让我感到正在发生某种非理性的事情。

——雷蒙·阿隆，1968年

重要的是出现了行动，就在所有人都断定行动是不可能的时候。如果说它发生了，那么它还能再次发生……

——让-保罗·萨特，1968年

这是一部有关五月事件死后之生的著作，有关法国1968年5月以何种方式被其后的各种表述淹没的著作。它也是关于如下主题的一本书：这场事件怎样持存，怎样抵抗被消灭，怎样强调或表明其事件性以对抗社会的健忘症，对抗总是试图加之于它的工具化，对抗解释它的各种社会学，并且对抗声称对它享有记忆垄断权的前学生领袖。

我使用“死后之生”这个词，并不是想对“五月风暴”的失误或成就加以罗列，也不想一一历数那些“教训”，尽管它们也许已经被五月运动向我们提了出来。我之所以使用这个词，毋宁说只是想表示为人所熟知的1968年“五月事件”如今不可能从围绕着它们

的社会记忆和社会遗忘等角度孤立地理解。那种记忆和那种遗忘早已获得了各种物质形式,构成了我将在本书中予以考索的事件历史。对五月事件记忆的处理——事件的政治维度已经由于这种处理方式而被各种评论和解释取消或打散了——现在成了1968年历史难题本身的中心。

提出这段不远的过去的记忆问题,就会与我们时代以分析为基础而形成的整体理解方式相遇,这种方式就曾经处理过另一件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记忆和社会遗忘过程。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和别的地方为当代学术“生产出”了记忆工业,而且破坏、灾难、有组织的屠杀、暴行、卖国通敌,种族灭绝的数据参数使某些精神分析病理学范畴——如“创伤”、“压抑”等——越来越容易地获得合法性,使这些范畴更加容易地成为理解集体记忆之过度和不足的概括方式。但在我看来,这些范畴只能使我们疏远于我们对“重大事件”的任何理解甚至感知,毕竟,“重大事件”于我们看来并不是被标上“灾难”或“大灭绝”的标签而发生的。换句话讲,“重大”已经开始经常性地暗示着死亡人口的“众多”,而不再是指团结协作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活的群众的“众多”了。

无论将病理学范畴运用于历史层面的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个案上是否合理——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和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近来发表的著作<sup>[1]</sup>就对这些范畴的使用,至少是在美国语境中的使用,提出过质疑,在我看来非常明确的是,“创伤”和“压抑”这类范畴,无论是集体意义上的还是个人意义上的,都不适用于1968年那段历史。尽管使用明确的标签,但这些范畴远不能唤起一系列让人回忆起1960年代的联想——愉快、权力、激动、快乐和失望。过去不久的那场政治事件,它的氛围和社会关系群是如何被记忆或遗忘的,尤其是左派政治文化是怎么逐渐被重塑,重新配置或遮蔽的,有关这一切的信息,



我认为,那些范畴透露给我们的很少,竟或没有。

当然,在社会史中,特别在以工人集体为对象的历史学家们当中,逐渐形成了提出这种质疑的模式。但就这些历史著作而言,记忆问题几乎总是被表述为确认身份同一性的问题:几乎总是将代际之中错综复杂的线索加以重新编织,目的是在这个或那个亚群体或亚文化之间建立牢固的连续性;强调被当作惯例的气质、习惯、生活方式、身体实践,正是这些支撑着某个特殊的社会身份同一性——比如,斗士的身份、某地区长住居民的身份、某宗教团体成员的身份、边远山区惯于隐忍的乡民的身份,等等。照这种观点来看,记忆可被理解为社会群体的某种财产,即可以被占有的某种东西,或即便这个记忆曾被取走,它还会被重新灌输到这个群体之中并使这个群体的身份同一性得到加强。记忆被用来服务于对身份同一性的占有和再占有,近来所谓身份同一性日益在更为狭隘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伦理的或地方区域的身份同一性。

1968年5月与其说与它的鼓动者——学生或“青年”——构成的社会群体有关,不如说与逃脱社会决定有关,与使人们离开他们的社会定位的移置有关,也就是说,与政治主体性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脱节有关。1968年5月被遗忘之时,被遗忘的与其说与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的习惯有关,不如说似乎与社会身份同一性——使某种政治得以形成的社会身份同一性——的消散有关。社会记忆和社会遗忘的流行理论——灾难或“创伤”学派和社会身份同一性学派——对于解释类似“五月风暴”这样的群众政治事件的记忆嬗变几乎是无用的。更糟糕的是,这些理论对知识领域的支配和它们无处不用的转喻——一方面是“古拉格”和“大屠杀”,另一方面则是习惯的稳定性——本身也许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症状,被视为不愿思考真正政治概念和当今集体政治力量的综合症状。

和所有令人迷惑的大运动——或者用希尔维安·拉扎卢斯(Sylvian Lazarus)的话说,“晦暗不明的事件”——一样,1968年5

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被埋葬了，一直经受着苛刻的指责，变得无足轻重，或者被表述为一个面目全非的怪物。就1968年而言，它成了卷帙浩繁的叙述工程，这个工程并非沉默的裹尸布，但也促发了对法国那场事件的积极遗忘。回忆、“自庆”、电视纪念、抽象的哲学论文、社会学分析——五月风暴经受着太多的注视。在1968年6月事件刚刚平复的那段日子里，有关事件的长篇累牍的文字就开始令人吃惊地泛滥起来，这类出版物的发表以某种可以察觉到的时长时消的节律延续至今。1968年的话语制造了出来，它最基本的作用就是用1968年的旧词汇对1968年历史加以清算，使之消除并蒙上迷雾。

现在，这种情况看上去并非完全真实。如果你读一读，比如说，加拿大小说家麦维斯·加兰(Mavis Gallant)在巴黎逐日写下的对5月和6月的记录，那么你就可以从她的杂记评论当中得到有关此事件本质的鲜活感受，其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现实：那两个月期间的巴黎，书籍销售量上升了40%。这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在那座城市里，学校都已关门，没人能够发出一封邮件，找到一份报纸，拍出一份电报或兑现一张支票；没人能搭乘一辆公交车，开动一辆摩托，发动一辆汽车；人们找不到香烟，买不到白糖，收看不到电视，收听不了广播新闻，甚至连垃圾也无人清理；没有人能乘上火车离开这个城市，收听到天气预报；在这个城市的所有地方人们夜间都无法安睡，因为到处都堆满了催泪瓦斯，甚至在五层高的公寓之中。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有阅读才能填满时间。从百货公司售货员到造船厂工程师，九百万人停止工作之后，日常生活的变化所造成的某种感受都潜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了。1968年五月风暴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群众运动，其间发生了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罢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普遍“暴动”。这次总罢工首次突破了传统工业生产的中心地区，扩展到了通信和文化工业领域，扩展到了社会再生产的全部领域之中。

没有一个行业,没有一个工种不在这次罢工之中受到影响;法国没有一个地区,没有一个城市或乡村没有受到触动。

总罢工持续着,随着罢工的爆发和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可能性一下子激增起来,有关五月风暴的文本和文献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提及或有选择性地提及这种经验的本质。

1968年5月中旬,继本月前些时候学生主导的暴力示威之后,爆发了一波又一波全国性的停工斗争。经过五到六周,法国陷于瘫痪。在1960年代全球范围内爆发——其中影响显著的有墨西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骚乱当中,只有在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还有意大利,知识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拒绝和工人骚动之间出现了某种同步性或“汇合”。既在地理意义上又在行业领域意义上所说的“总罢工”的迅速扩张已经使所有的分析框架力不能逮;在很短的时间内,法国工人就进行了三次罢工,就算是1936年人民阵线时期也未出现过这类情况。如此规模的事件的过剩,以及当其发生之时它产生过剩的那种方式——对即便是最机警的鼓动者的期待和控制,我认为,是本书探讨的对事件的两种征用方式——传记(个人化)版本和社会学版本——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两种歪曲策略并不新鲜。遗忘正如记忆一样,只有借助各种叙述配置的运作才能成为可能,就在行动主体创造了事件轮廓的同时,这些叙述也开始塑造他们的身份同一性。为了把一场群众运动化约为一小部分领袖、发言人、代表们的个人行动(特别是那些代表已经承认了他们过去的错误),是一个陈旧但屡试不爽的可靠的事件征用策略。通过这种策略的筛选,集体反抗被弱化了;运动最终无非变成了个体命运的生存苦恼;反抗被表述成为个别“人物”的职责,媒体就曾给他们无数次机会,让他们对最初的动机加以修正和重构。

社会学总是将自己装扮成大法官的模样,事后所有的现实——事件——都要被带到这个法官面前接受审判,被权衡归类

和存档。就1968年五月风暴而言,问题是复杂的。专治当代史的法国学院历史学家,他们尽管和其他人一样都处在1968年集体记忆的风景之中,但一直以来,甚至直到现在还保持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不认为这个事件是研究的对象,甚至指明这种冷漠态度的正是历史学家自己。1989年让-皮埃尔·里乌(Jean Pierre Rioux)说:“当代史学家——千真万确,不是别的学科的学者——何以如此甘心将这个领地拱手让给以技炫人的社会学呢?”同一时候,另一位历史学家安托万·普鲁斯特(Antoine Proust)在对史学领域进行盘点之时指出了1972年以来研究的“贫困”,他指责历史学家当中存在的“过度谨慎的态度”,批评他们未能审理或评价可以获得的文献,他指出,这是研究松懈的一种症状。作为一个群体,也许历史学家们发现在事件尚在暧昧不清的状态时要使之成为历史知识是非常困难的。<sup>[2]</sup>法国学院历史学家就此事件只有两卷文集(每一卷都是会议论文集)和少量的“回忆材料”发表。<sup>[3]</sup>是只着迷于维希政权的历史研究,是不情愿或难于克服近来在当今自由主义氛围中出现的好战文化所造成的种种困难,还是不愿意审理他们已经遗忘的记忆——无论是何原因,历史学家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较之于其他学科学者而言,使这个事件向着更高层次的工具化敞开了。这种放弃催生了一种解释真空,有待于其他人——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和已经发生变化了的左派——去填补。这两个群体日益被媒体赋予“权威”,日益成为记忆的保管者。他们支配着1968年五月事件的话语,一前一后联手合作,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创造出来一部官方历史,创造出一套可以辨识的套语。相对系统化的一套词汇,表述、形象、叙事方式已经为怎样构想“五月风暴”划定了边界,这些系统正是这部官方历史和套语的产物。在我画的编年表中,这些产物在1978年到1988年间,也就是在“五月风暴”十周年到二十周年之间被大批量制造出来。

官方版本的历史已经被编码,在众多大众媒体的蔚为壮观的

纪念仪式上被公开颂扬，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历史是一部家庭史或代际戏剧故事，它剥去了所有暴力的内容，也剥去了所有那些残酷的或明显属于政治范畴的东西，这个故事讲的是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温和改造，这一改造必然伴随着法国从极权主义资本家国家向新的、自由的、现代金融资本家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官方的历史宣称“五月风暴”中有一些更为激进的思想与实践实际上是沉渣泛起为资本效劳。官方历史还不只限于这一类表述。它还宣称，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代表的不是五月运动精神的失败和破产，相反，代表的恰恰是五月运动最深层的愿望的实现。通过把现在作为过去的目的而建立起一套目的论，官方历史把并非因循守旧而是探索或设想新的蓝图的记忆全部擦除，把探索替代方案的记忆尽数抹除。

在这种目的论之中，五月事件注定只能被理解为对政治现状的巩固，被理解为有助于达成一致意见的一场混乱，意识的改造，被理解为青年一代不满于窒息了法国文化现代化必然动力的文化结构而进行的一场反抗。官方对五月事件的“死后之生”的解释版本特别适合那些社会学家的旨趣，他们总是乐于将一切断裂重新纳入一成不变的逻辑之中，强调使社会结构再生产成为可能的群体和系统的同一性；同样也适合那些忏悔了的战斗者的旨趣，他们一心想把他们过去战斗的历史像重担一样从肩上卸下——尽管这两类群体所宣称的对那段历史所享有的权威性是那么的不同的。运动的前领袖断言有权在保留驳杂繁多的个人经验的基础上说话，依赖于经验而拒绝承认事件的关键特征性方面，或让这些方面脱离它们的一般意义。相反，社会学家偏爱抽象的结构和常规，偏爱均一化和量化，喜好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苦心营构一些原型——所有这一切都深深植根于对经验的不信任之中。无论他们的表述多么对立矛盾，这两个群体毕竟联手打造了一套非历史化的和非政治化的符码，而1968年“五月风暴”在今天就是通过这套符码被理

解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官方历史”的修正主义说法,无论是把“五月”说成是愤怒青年对他们的父亲的严厉管束的大反抗的说法及其各种推论,还是把五月说成是“青年”这个所谓的新社会范畴的崛起的说法,都不是我所感兴趣的。我感兴趣的是,这个特殊的历史版本是怎么流行开来的,那两个相矛盾的方式或趋向,即经验和结构,是以何种方式会聚在一些范畴的表述之中的,这些范畴,比如“一代人”这个范畴,最终的效果就是去政治化。“五月”记忆的悖论可以直截了当地被确定下来。这场群众运动的初衷首先是,在我看来,反抗专家统治,打破自然化了的职权领域(特别是分化了的专门化政治领域),可是在后来的几年中这场运动经过转译之后,差不多就等于有关1968年的“知识”,自称专家和权威的整整一代人都宣称他们具有对1968年的专门知识,而这个转译是怎么完成的呢?这场运动冲决一切理论领地和社会定义,并且在那些相互协作集体管理他们事务的不同人群之间建立起了不可预见的联盟和同步性。这样一场运动在“学生环境”、“一代人”诸如此类被规划的“社会学”范畴之中是如何被重新部署的呢?

在这本书里,我把大量精力用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上,即重构一个历史以展现官方叙述是以何种方式宣称对事件的权威性的。当然,下面就是我概念化研究的最初思路:1968年5月在发生10年、20年、30年之后,它在法国是怎样被记忆和讨论的?但我在研究的过程之中,第二个目标,和第一个一样吸引着的目标,逐渐地呈现出来:考索并找回事件的政治氛围和政治记忆的吉光片羽,也就是说考索“五月”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死后之生”,那不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氛围和记忆,也不是事后言之凿凿地认为运动的官方真理已经实现的那些人所给出的证词。如果说我想要解释官方叙事是怎么流行开来的话,那么我就得把多年前的“五月”的历史从一些“前演员”——他们已经在1980年代成为“一代”明

星——手里解放出来，从诸如“青年造反”这样一类假说性社会学范畴系列当中解放出来。1968年事件首先是千千万万人甚至是百万人参加的群众性拒绝，他们拒绝在社会事务中领会我们通常所领会的东西，那些东西无非就是最狭隘的社会学范畴所规定的东西。要书写这拒绝的历史，以及这拒绝的记忆和遗忘，在我看来是必须寻找到一种艰巨的书写形式的，这种书写就像运动本身那样不在社会学域限之内，既高于它，又低于它。高于社会学，也就是说，这种书写接近哲学批判的层面，那些著作家和行动者表明了哲学批判的立场，他们以政治方式对1968年的介入也已经开启了拷问究竟什么才使政治成为可能以及如何思考历史性行动的持续探寻。所以，我的研究转而求诸这些著作家和行动者，对他们来说，1968年“五月风暴”在他们的理智和政治轨迹当中即便不是一个奠基性时刻，也构成了一个关键点，这些哲学家包括，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阿兰·巴丢(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ranchot)和达尼埃尔·本萨伊(Bensaïd)、行动者兼出版人弗朗索瓦·马斯佩罗(François Maspero)、或作家兼行动者马坦内·斯托尔蒂(Martine Storti)和居伊·奥康盖姆(Guy Hoquenghem)。低于社会学，我所追索的乃是大街上人数庞大的无名者的历史性特定语言，主体性和实践，这些人建立起了街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他们是工人、学生、农民和发现自己有义务提出问题的其他人群——提问题并不局限在自己个人利益的层面，而是在社会本身的层面，在它的整体性层面。

我本人对五月运动的政治语言的研究延伸到了阿兰·施纳普(Alain Schnapp)和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 1969年最早的也是无比珍贵的文献编纂范围之外。我搜集到文献纪录片的胶片、小册子、各种运动团体的油印宣传册、发行时间很短的各类刊物、在运动白热化时期写下的各种说明——较之于所

有阐释性评论,它们要有意思有价值得多。那些阐释性评论出自埃德加·莫兰,克洛德·勒福和米歇尔·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之手,它们在运动之后已经被神圣化了。你只需要看看收于阿兰·施纳普和皮埃尔·维达尔-纳盖汇编的小册子和宣传册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五月运动的意识形态靶子了。有三个靶子: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和戴高乐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在运动发生20多年后——与那种把1968年看作是平和的、同情性理解的和诗性的“青年反抗”以及生活风格改造的观点达成一致呢?答案就在占统治地位的叙事配置当中,这种配置方式就是:通过官方的叙述而进行修改,大规模的化简并限定范围。这类叙事配置的最初形式是时间上的缩减,这种形式的改编制定出了一个缩了水的时间表,它告诉我们“五月风暴”就是按其字面而言的1968年5月中所发生的事情。更明确地讲,“五月风暴”开始于5月3日,既有秩序的警察部队当日奉命进驻索邦,开始拘捕学生,随后引发了持续几周的群众暴力示威活动,以至于扩大到拉丁区的各个大街之上。“五月风暴”终止于5月30日,当日戴高乐发表了讲话,声明他决不会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并威胁说要使军队介入,宣布解散国民议会。这么一来,“五月”就是5月,甚至不包括6月,尽管6月当中全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的群众近900万人进行了罢工活动。这么一来,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总罢工,连同“五月”反抗的史前史(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早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期)一道,都变成了隐而不彰的背景。这么一来,迫使5月/6月事件终结的国家暴力镇压也就不提了,当然也不用再提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早期的左派暴力活动了。实际上,十五年到二十年间的激进政治文化都被剔除到了视线之外,这种政治文化的轨迹呈现在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反抗活动当中,呈现在反殖民革命风起云涌并在各处取得胜利时许多法国人对全球政治南北划分的“第三世界”分析方



式的拥护当中。这种政治文化也体现在1960年代中期法国工厂内一再爆发的工人反抗当中,体现在反斯大林主义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兴起当中,这些观点出现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勃然兴起的数不清的刊物上面。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构成了间接的法国政治语境: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多数分支当中取得了胜利,以阿尔都塞主义的形式在大学当中取得了胜利,在毛派,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战斗者的小团体中取得了胜利,也在二战以后指导哲学和人文科学工作的主流参照框架当中取得了胜利。而所有这些进展都在那种叙事配置之中退居为背景,剩下的只是“自发的”五月运动“不知从何处一下子爆发”。对阿尔及利亚事务和五月事件的工人运动史前史的排除,还有对五月事件之后左派发展的排除,是将“五月”当作由解放了的“自由表达”构成的愉快的一月加以“抢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将“五月”限定为5月的做法成效显著。活动范围也在地理上被限定在巴黎,特别是拉丁区,时间上的缩短更利于这种地理上的缩减(同时也以地理缩减为基础)。同样,巴黎周边以及遍布全国的罢工工人都从影像上消失了;外省和其他地区工人,学生和农民之间成功的团结起来的实验也被抹除。根据一些资料来看,5月和6月期间,较之于巴黎人,外省的法国人看上去似乎更为暴力,更支持示威,而这一点在官方的叙述中是看不到的。在工厂里,在南特和卡昂以及巴黎之外的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彻底从视线中消失了,而那些事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事关平等的实践和观念丛——这里的平等,是绝不能纳入运动的前积极分子今日全心拥护的当代自由主义/自由意志论范式之中的。这样一来——我们看一个生动的事例吧——拉尔扎克地区1970年代早期出现的反进步主义的农业运动就通过“五月”叙事配置而丧失了自身的重要性,这个运动本就是“五月”“死后之生”的一种形式,在“农事协会”(Confédération Paysanne)的领导下抵抗麦当劳食品

和转基因食品,是一场平等主义的农村激进运动。

伊丽莎白·萨尔瓦雷西(Elisabeth Salvaresi)等人就曾表示,源于1968年的抵抗将遍地开花,这些抵抗也将在法国的农村,在远离巴黎的地方,在远离巴黎新企业家、新哲学家和新记者以及他们冷冰冰地兜售新东西的市场的地方持续下去。当今围绕农业而出现的政治乱象似乎实现了萨尔瓦雷西等人的说法。实际上,萨尔瓦雷西还说,1968年在今天最为深刻的回响更多见于法国的外省而不是巴黎。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研究 的范围,本研究所必需的是调查而不是推测——那么就会为1968年打开一种新的视界,从而使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或达尼埃尔·科恩-邦迪这类传奇人物退居次要地位,而可能让另一些人物在五月或之后所扮演的理论和政治角色更加清晰可辨。比如,从全球粮食政治这个当今焦点来看,博纳尔·蓝伯尔(Bernard Lambert)——1968年天主教背景的农业运动的被遗忘的斗士,1970年还就农业商业对现代化了的农民进行的剥削进行过前瞻性研究,是“工人、农民和战斗”的作者——就会呈现新的意义。<sup>[4]</sup>

为了掩盖把五月运动封闭在拉丁区这一自恋式的和创伤性的化约方式,官方叙事还对某种国际主义的叙事版本作出了慷慨的姿态。然而,在这么做的同时,却牺牲了国际主义的一个维度,可以说这个维度在法国反抗运动之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并使得这些反抗活动和发生在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抗议声浪联成一体——这个维度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美国越战的抗议。显而易见,越南在法国五月风暴的主流表述之中丧失其重要性(竟或彻底消失,比如,1980年代的一个电视纪念节目就大谈性革命的主题,而只字未提越南),作为对这种抹除的补偿,官方叙事还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维度:尚未定型而早熟的青年反抗,或青年追求个人自治的反抗这一所谓全球化“一代人”的广阔维度,也就是塞尔日·朱利所说的“伟大的自由主义—自由

意志论的文化革命”的维度。二十周年的时候，“五月风暴”已经被化简成了被权威化了的发言人所宣称的一场争取个人和精神自治的运动，此时，这些前学生领袖谋划着让整整“一代人”变成全球范围内一支整齐划一的大军，对这支队伍来说，1980年代的口令“自由”确定无疑地（也是以时间倒错的方式）取代了我要在本书中论述的1960年代对“平等”的渴望。

在官方叙事之中，对五月的事件所作的的时间和地理上的化简现在又给出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叙事强化了学生和大学世界在构造“五月风暴”的特性方面被赋予的巨大的代表性特权。也许我们不该为此感到吃惊。街垒，对索邦大学和奥德翁剧院的占领，最重要的还有充满诗意的涂鸦——这些景象已成惯例一再复现，由那三四个上了年纪的前学生领袖所代表的这些影像在“五月风暴”之后每隔十年就会在1968年电视纪念节目上出现。

然而，法国中间阶级青年在1960年代就通过与两个身份之间建立起理论斗争协作关系和认同的方式而全面的政治化了，这一点现在却在官方叙事之中是个明显的空白。这两个身份就是工人和反殖民斗士的身份。这两种身份，在作为本项研究的组织线索的政治现代性之中，也在从“五月风暴”那个时代直到今天的这个长时段之中，都是被赋予了特权的“他者”——我所说的“五月风暴”的时代，就我在本书中所采取的分期方式而言，从195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中期。我说“身份”，是指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行动者、理论家和呐喊者；他们的身份形象乃是政治欲望的客体，是政治想象、理论表述和幻想的客体；他们是脆弱而短暂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那场对话的参与者和对话者。法国第三世界主义最开始无非是一种认识意义上的“主义”，它最早出现于1950年代晚期。第三世界主义认为，殖民地人民通过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已经脱颖而出，获得了政治意义上的新的人民形象（“全世界受苦人”），他

们的出现也使得欧洲工人阶级的抗议行动黯然失色，尽管欧洲工人阶级的抗议以使罪恶普遍化并对之大加挞伐的方式曾在西方世界动员起来了学生以及其他群体。第三世界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继续得到发展，由于美国越南战争而在60年代中期加速发展。在许多法国左翼人士看来，正是毛主义提供了某种过渡形式和依据，使他们得以将斗争重心从殖民地农民斗争转移为国内的工人斗争，他们进而和都灵汽车厂的罢工工人一样承认，“越南就在我们的工厂里”。因此，法国工人就成了1968年五月运动当中最合适的中心形象。但毛主义也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法国1960年代自始至终，反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都在自发地集合起来；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话语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毕竟它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某个星期三的夜间，竟能有三千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响应“Tous debout, camarades, pure la Bolivie socialiste”（起来，同志们，保卫社会主义的玻利维亚）的口号前往巴黎Mutualité大厦参加集会。

“五月风暴”的关键理念就是使知识界的抗议和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在“五月风暴”当中出现的政治主体性乃是一种关系性的主体性，它围绕保卫平等的战斗，围绕身份同一性，渴望，机遇和错失了的良机，相遇，欺骗和失望等所有这些日常经验而确立起来。对平等的体验——正如在运动过程中很多人亲身经历过的那样——并不是一个目标或一项未来规划，而是发生在现在，必须作即刻体验的某种经验，它也对事后的表述构成了巨大挑战。运动过程中行动形式的发明创造则彻底使表述或代表成为不可能，打破了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区分和实践的差别，这里的实践把所有个体的关怀而非某些专业行家的关怀表述为政治的最高利益。所有这些经验都造成了威胁，动摇了我们用以描述日常生活的贫乏词语库存，让我们能用得上的数量有限的所有表述方式都

不再可靠了。20年后这个问题在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更加尖锐了,在批判平均主义的幌子之下,反对平等的普遍敌意在整个80年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扩散开来。这类批判说平等就等于一刀切的平均化,就等于对自由的限制和异化,就等于对自由市场机制的破坏。当知识界的抗争和工人的斗争之联合的思想消散之后,当这个思想被遗忘之后,1968年所能做的也就只是预告一种“具有解放作用”的反文化的出现,提出有关欲望和自由意志的某种形而上学,展演一个由“欲望机器”开动的世界并且展示植根于不可化约的个人经验之中的“自治个体”。

到了1970年代中期,新的身份已经替代了工人和反殖民斗士身份的位置,这个新身份至今仍然是媒体关注的中心。“平民百姓”,这是个被神圣化但又是绝望沉默的身份形象,它也是今天处在人权话语中心位置的难民身份形象的先驱。“持不同政见者”身份形象使法国人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构成了1960年代特征的南北轴心叙事而是专注于冷战叙事方式。在人道主义危机受害者的新表征系统之中,“全世界受苦人”径直变成了“受苦人”,也就是说原先形象表征的所有政治主体性和普遍可能性都被提出抽空了,直接被化约成了纯粹它异性的身份形象,无论他是受害者还是野蛮人。至少在法国,就像我在第三章要论述的那样,以人权为中心形成了道德伦理新话语,大多数这类话语都是由迫不及待地与战斗的过去保持距离或躲躲闪闪安于忍受五月精神的幻灭的前左派生产出来的,而这类话语也已经成为了遗忘1968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说,真正的困难出现于1976年左右,否定五月的需要助长了从政治向伦理的撤退,而这撤退不仅扭曲了五月的意识形态,也让绝大多数有关五月的记忆面目全非。唯独宣称自己就是五月记忆保管人的前左派作好了准备,随时可以通过他们正在经历的“精神改造”方式重塑1968年的意义。1968年的事件和政治文化实际上从来都表现为对道德说教的激烈的——有的时候是

狂暴的——反对,那种说教话语倒是 1970 年代晚期的主流,但毕竟 1968 年事件和政治文化已经根据个人伦理而非政治被重构了。随着居伊·奥康盖姆称之为“武士道德”的新哲学家的道德的出现,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将探讨抹除 1968 年印记的需要是怎么由新话语和新表征系统刺激起来的——新的话语推广极权主义,而新的表征系统当中的两个修辞形象,即人权和古拉格/大屠杀,自 1970 年代晚期以来便开始联手吹奏善恶交响曲。

“没有人死于 1968 年事件”。被太多次重复的这句话实际上是错的。它的一再重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症状,实质是想给造反及其参与者(既包括战斗者又包括国家)赋予某种教养良好的“好孩子”似的迷惑人的品质。事件不能通过伤亡人数计算的方式去把握吗?不能,当然不能,如果事件已经被归类为文化事件的话——就像五月在 1980 年晚期的官方叙事版本中所呈现的那样。五月风暴期间,没有什么事情是以政治方式发生的;它的效果纯粹是文化效果——民意测验这样说,官方叙事也这样讲,并使这文化效果获得权威,对之加以利用,公开地进行庆祝,通过印刷品和电视节目进行纪念,就像我在本书第三章将要论述的那样。“文化效果”通常无非指 1970 年左右开始出现的生活方式的变迁、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举止的变化——比如妇女更喜欢穿裤子而不是裙子或口语话语中新的亲密形式的出现,等等。但是,五月风暴这些所谓文化效果在多大程度上与事件的特殊性相关呢?正如让-弗朗克兰·纳罗(Jean Franklin Narot)所说,并非那几个月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运动的组成部分,并非所有继五月风暴而起的事物都能归因于五月风暴本身。大多数归在“五月的文化效果”标题之下的生活方式的调节和日常生活的变化同时也在所有经历着加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发生了——无论这些国家是

否有自己的“1968年”运动。<sup>[5]</sup>

如果我们采用了像“文化效果”这样的流行语汇来指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反文化”相类似现象又会怎么样呢？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经历了繁荣勃兴而富于创新性的反文化发展，特别是音乐方面的反文化发展，然而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法国1968年之后的反文化形式大多数是舶来品。在英国和美国，就像彼得·迪尤(Peter Dew)指出的那样，你确乎可以通过反文化的后门偷偷地把某种政治文化放进来；相反，在法国或意大利，1970年代的“反文化”却基本上代表了比美国发生的运动要强烈得多、暴力得多的政治战斗性的衰退。<sup>[6]</sup>当然，1968年事件通过哲学和其他理智探寻的模式在那个生机勃勃的现实形势中起着影响深远的作用，正是那个生机勃勃的形势使得法国的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创新和创造的年代。1968年之后紧接着的几年中，出现了似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思想探索和全新的思想交流场所——新刊物，出版界的新实验，等等，所有这些新事物多少都力图通过将政治能量移植到别的方面，移植到相关的研究中的方式而让五月事件持续存在下去。在第二章，我就将把有着不同的政治表述模式的集体实验和在历史编纂学领域内出现的新刊物当作典型例证进行考察。我所讨论的这些刊物仅仅只是林林总总的新刊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刊物，弗朗索瓦丝·普鲁斯特(Françoise Proust)就曾开列出这些刊物的清单，足以让我们对刊物品类之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而我所引用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大量涌现的新出版社或已有出版社出版的数量激增的丛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10/18出版社(1968)、Lattès出版社(1968)、Champ Liber出版社(1968)、Seuil出版社的“Points丛书”(1970)、Galilée出版社(1971)、Gallimard出版社的“Folio丛书”、Editions des Femmes出版社(1974)、Actes Sud出版社(1978)。在期刊和文化类刊物中，我们能看到：《转变》(Change, 1968)，《另类场景》(L'

Autre Scène, 1969),《新精神分析评论》(*Nouvelle Revue de Psychanalyse*, 1970),《现在》(*Actuel*, 1970)《如是》(*Tel Quel*, 1970),《非洲—亚洲》(*Afrique-Asie*, 1972),《逻辑造反》(*Réoltes Logique*, 1975),《社会科学研究学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5),《希罗多德》(*Hérodote*, 1976)。还有报纸:《切腹画刊》(*Hara-Kiri Hebdo*, 1969),《愚人国际》(*L'Idiot International*, 1969),《一切》(*Tout*, 1970),《解放》(*Libération*, 1973),《快乐的步履》(*Le Gai Pied*, 1979)。这份清单所反映出来的此类富有冒险精神和积极气质的思想,正如普鲁斯特所说,必然会引起某种反动,如在她以及其他学者所勾勒的时间表所示,与1968年相关的丰富多彩的创造性热潮,在1976年到1978年间就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疲态,其终结的开端到来了,并且新哲学家们和新的知识媒体也开始登上舞台。<sup>[7]</sup>

就法国高级文化生产领域特别是文学界而言,五月风暴的影响甚微——无论是对主题的影响,还是对形式的影响。正如帕特里克·康贝(Patrik Combes)论证的那样,几乎没有人尝试小说的形式创造以表现五月的政治图景。小说对1968年的事后表述只具有伪全面性。这种伪全面性从来都是在媒体表述划定的领域内原地踏步,比如,选择性地将某些事件戏剧化,其呈现视角总是来自某个个体有时被夸张地变形了的意识——这个人永远是在街垒背景下经历着可怕的生存危机的形象,这种表述方式全然不顾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我的研究一遍又一遍地揭示出的那样,个体对那段时间的记忆的内容几乎总是自己融入某个社会集体的分享与参与。1980年代初期,只有在一种比较流行的文类,也就是侦探小说之中,我才看到了尝试对当代社会各种重大事件进行叙述的切实努力,这里所说重大事件是指已经在刚刚过去的那段时间里被遗忘的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和1968年的断裂,以及那些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学和



特殊的政治交往方式。

我在本书中的大部分论点都与 1980 年代那些论调的理路完全相反,那些论调即便不把五月事件归因于“道德”或“精神”,也总是把它归因于纯粹的“文化”。实际上,我一直以来都在试图呈现几乎与之完全相反的某种东西。在 5 月间,所有事情都是以政治方式发生的——当然,只要我们将“政治”理解为与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政客政治”(专门化的政治,或选举政治)几乎无关或全然不同的另类政治。

“五月”本身并非一个艺术的时刻。它是一场没有多少影像的事件;毕竟法国电视业当时也在罢工之中。出自赛纳(Siné)、威廉(Willem)和卡布(Cabu)等人之手的素描和政治漫画一下子激增起来,并且还有摄影。似乎只有艺术手段中那些最“直接”的技术才能跟上事件发展的速度。但这么说的同时,也就已经表明了政治在多大程度上给文化施加了磁力,使之离开了它专门的或专业化的领地。艺术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就是紧跟事件的发展节奏,并且达到与当下事件及其周边事件的同步性——这么说意味着什么呢?

似乎对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起支配作用的不平衡性或不对称性,对法国 1968 年这段时期也是适用的。实际上,不平衡性正是这场事件所要呈现的基本特征:力图给难题提供答案的不成功的文化解决方式,在直接抵抗既有文化形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配置和政治发明,以及支配着文化实践的政治实践的紧迫性。再没有什么能比美术学校学生的经验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了。1968 年 5 月中旬,这些学生占领了他们的学校,把学校改为革命的“人民艺术工作室”(Atelier populaire des Beaux-Arts),开始以快得惊人的速度生产支持罢工的招贴画,这些画将在几个月中贴满巴黎的大街小巷。大多数这类招贴画所传达出的“信息”内容刻板而严厉,表达了认可,有时候甚至是命令:停工也好,罢工或者“开

动火车”的行动也好,无论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只要继续下去就好——“Continuons Le combat”(让战斗继续),“La grève continue”(继续罢工),“Contre offensive: La grève continue”(迎着进攻:继续罢工),“Chauffeurs de taxi: La lutte continue”(出租车司机:继续斗争),“Maine Montparnasse: La lutte continue”(蒙巴纳斯购物中心:继续斗争)。这也就是说招贴画表达的这些信息没有一条希望对发生了的事情进行“表述”;毋宁说,其目标就是与发生了的事情保持同一性、同时性和同步性。速度,某种高速的技术,极其重要;在充分地意识到这点之后,学生们放弃了早期使用的平版印刷术,因为,这种技术每小时只能印出 10 到 15 张成品,这太慢了,根本不能满足每小时印刷 250 张的需要。速度和灵活的媒介为艺术的绝对渗透——甚至是通过招贴画实现的这种渗透——提供了方便,但是,在使艺术获得捕捉事件的即刻性的能力方面,速度还不是最关键的要素。三十年后,“人民美术工作室”的积极战斗者之一热拉尔·弗罗芒热(Gérard Fromanger)在其简短的回忆文章中追忆了 1968 年招贴画的兴起。这篇回忆的标题是“艺术是使生活比艺术更有趣的事”(L'art c'est ce qui rend la vie plus intéressante que l'art)。这篇文章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介绍了那段时期令人目眩的开放性的形成,当时整个社会都不愿处在艺术“之外”或与艺术保持距离,当时艺术也实现了呈现而不是表述的功能:

1968 年 5 月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不再待在他们的工作室里,他们不再工作,他们也不可能再工作了,因为现实要比他们的构思强有力得多。自然,他们成为斗士,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成立了“人民美术工作室”并且创作招贴画。当时我们夜以继日地画招贴海报。整个国家都处在罢工之中,而我们却经历了有生以来工作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最终我们成了

不可或缺的人。<sup>[8]</sup>

佛罗芒热通过大量细节对5月期间艺术和艺术家拆伙分离的各个阶段的情形进行了介绍：在5月中旬群众示威的过程中，美术学生是怎样“放下架子而与他们的同伴集合起来”，就像毛主义者会说的那样，他们是怎样把艺术丢到身后而奔走于一个又一个示威者之间。“我们这些艺术家参加运动已有十天，我们在示威人群之中相互奔走。我们彻底离开了我们以前所有的一切。我们不再睡在画室——我们就住在大街上，住在被占领的建筑物里——我们不再绘画，我们不再思考它了。”第二个阶段则是向熟悉的空间的撤退：“我们这些画家告诉自己说，我们必须做点和美术有关的事情，我们不能让建筑物空着，不能让它们关门了事啊。”一台老旧的平版印刷机架了起来；第一张招贴“车间大学联合起来”（USINE-UNIVERSITE-UNION）马上被生产出来了。此时不少人想印出三十份拿到位于“龙路”的一个画廊里出售，用这资金资助运动。但是也正在这时，“现实”，以运动形式出现的“现实”介入了，这下子那种先让艺术成为资产阶级文化中的艺术然后再劫持它的步骤简化了。似乎没有时间让艺术品成为商品了，即便是已被改变方向而为运动服务的商品。在去画廊的路上，美术学生抱着的三十份副本被一抢而空，这些副本立即被贴到周围可以利用的第一堵墙上。招贴画成了真正的招贴画。

伴随着“人民美术工作室”的成立而发表的宣言称：“资产阶级文化通过赋予艺术家以某种特权身份而使之与工人分离和隔绝。特权画地为牢囚禁了艺术家。我们已经决定改造我们自身的社会存在。”<sup>[9]</sup>

我想，也就是在浏览一盘一盘电视纪录片录像带的时候我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在一本对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记忆和遗

忘的书中,在我的这项研究中,不进行任何访谈。我能把谁当作受访者呢?为了把这场群众运动当中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呈现出来,我不愿求诸因为总是注意力关注的对象而已经成为五月传说中的重要形象的那些人,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权力结构之中占据要津,尽管那些位子总是给他们一度公开谴责的那一类人预留的。我也不打算对工人、农民,特定的社会思潮等特殊部类作人类学的研究,这类研究现在也发表了一些,其中不乏好的作品,而我在本书中也有所参考。这场群众运动在全法国展开,触及法国的所有城镇,涉及一切行业和年龄群体,在选取有关这场群众运动证词的过程中,我所能使用的选择证词的标准是什么呢?和过去几十年已经发表的所有的研究著作一样,本书当中,尚健在的证人和参与者所写下的文字与已经被整理和筛选了的事件始末文献记录非常接近。但是,发表的证词至少是向一切愿意阅读它们的人开放的;与口头访谈不同,这些文字并不只面向特定的对话者。发表的证词,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说,总是随时进入争论的证词,它们将自己放置在其他证词的注视之下。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将自己只限制在这些公开发表的记录的范围之内,尽管把角度丰富而又各异的不同记录材料(公开的和私人的档案文件、论文、杂志和刊物文章、纪录片、回忆录、报纸)汇集一处是非常不科学的做法,但我也尽量不加质疑,而是希望通过这些材料了解围绕事件而形成的各种看法和经验及其对主流表述形成补充的叙述方式,并且了解事后回忆和讨论这些事件的方式。在本书下文中呈现的各种个体的——有时候也是短暂的——主观性将构成一个“拼贴”,它们绝不是某种“样板”或是“生活传记叙事”。如果不求诸这些主观性,那么我将不可能澄清那时政治社会交往——也就是说已经失落了的那种政治社会交往——的任何一种特殊形式的意义。我特意勾勒的不仅是官方叙事——它们随处可见,就像所有陈词滥调一样——而且还有与之不同的其他叙事,因此我也作出了特殊的努力,让这些回忆各就其位,既不服从对事件“现场

性”的偏好，也不会充当对当代权力配置进行合法化的工具。

近来在法国，对事件“现场性”的追求不断更新发展，伴随着这情形的则是，1968年事件的多种可资借鉴的审视角度也得以形成。1995年，也就是在西雅图事件发生前的几年，法国的冬季大罢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表征了某种新形势，勾勒出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地区政治创造性的新的意义。在我自己看来，在法国政治和知识界气候的变化方面，还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近些年来，对过去几十年的别具眼光的政治叙事大量涌现，这些作品由1968年那一时期的积极活动者写出，他们现在觉得有义务揭示一段过去，他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过去，在他们看来在吉斯卡和密特朗时代已经被扭曲甚至绑架了的那段过去。与此同时，青年一代的学者——多数是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严肃探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和1968年那段时间的历史，这在法国尚属第一次。这两个作者群体的劳动，就其本质而言，构成了1968年记忆当中一个全新的重要篇章。这也使我自己的工作不再那么孤独。

## 注 释

[1] 彼得·诺维克：《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和诺曼·芬克尔斯坦：《大屠杀工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 London: Verso, 2000）。

[2] 参看让-皮埃尔·里乌，“论法国五月的十年庆典”（*A propos de célébrations décennales du Mai français*），载于《20世纪》（*Vingtième Siècle*）23（1989年7月—9月）：第49—58页；安托万·普鲁斯特，“法国五月有什么新东西？”（*Quoi de neuf sur le Mai français*），载于《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143（1988年4月—6月），第91—97页。

[3] 这些著作中的一部，乃是当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为期四年的研讨班的成果，在我完成本书计划之后，才于今年问世。但是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有幸能够查阅最终收入这卷文集的许多论文。参看米什莱·赞卡

林尼-弗尔内尔(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等编:《1968年:反抗的年代》(*Le années 68. Le temps de la contestation*, Brussels: Editions Complexe, 2000)。又参看社会运动史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发起的讨论会论文集,雷内·莫里奥(René Mouriaux)等人编:《1968:法国五月探源》(1968:*Exploration du Mai français*, Paris: L'Harmattan, 1992)两卷。

[4] 参看伊丽莎白·萨尔瓦雷西:《五月遗产》(*Mai en héritage*, Paris: Syros, 1988);又见博纳尔·蓝伯尔:《阶级斗争中的农民》(*Les paysans dans la lutte de classe*, Paris: Le Seuil, 1970)。

[5]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和其他国家开始接受美国风格的消费习惯,我曾专门讨论过法国的这种文化转型,参看克里斯汀·罗斯:《快车,净体:法国文化的去殖民化和重塑》(*Fast Cars, Clean Bodies: Decolonization and Reordering of French Culture*, MIT Press, 1995)。在这个转型叙事模式中,1968年五月事件被表述为转型的中断,而非加速。

[6] 彼得·迪尤,“新哲学与福柯”(The Nouvelle Philosophie and Foucault),载于《经济学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8,第2期(1979年5月),第168页。

[7] 参看弗朗索瓦丝·普鲁斯特,“商谈还是抵抗”(Débattre ou résister)?,载于《线》(*Lignes*)35期(1998年10月),第106—120页。在她这位哲学家看来,这段充满了乌托邦知识能量的后1968年时代的确定终点是1980年,终结的标志是马塞尔·戈舍(Marcel Gauchet)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办刊物《争论》(*Le Débat*)。此刊物曾用好几期鼓吹宣传吕克·费里和阿尔·雷诺(Alain Renaut)的《1968年思想》(*La pensée 68*),这份刊物和费里等人的书(本书第四章将讨论这本书)一样,在建构1968年的“官方叙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普鲁斯特认为,《争论》提倡重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也就是专家)之间”的对话,知识分子进而才能通过这个过程进入民主的内部;知识分子应放弃改变世界的徒劳愿望,应将代表制民主及其体制和规则理解为所有政治团体的终极视阈;从此以后,知识分子的职能就是与他为之建言献策的决策者展开持续的争论,就是对现代民主所面临的难题和政治文化危机进行全面而理性的思考。令《争论》的主编诺拉欣喜的是,这份新刊物的创刊和萨特之死如此巧合,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他认为《争论》将成为“《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及其介入哲学的对手”。

[8] 参看热拉尔·弗罗芒热,“艺术是使生活比艺术更有趣的事”,《解放报》(*Libération*),1998年5月14日,又见阿德里安·里夫金(Adrian Rifkin)为《摄影性

绘画》(Photogenic Painting, London: Black Dog Press, 1999)所写的导言,第21—59页。

[9] “档案:人民美术工作室”(Document: L'atelier populaire),载《五月二日手册》(1968年7月1日—15日),第14—16页。

## 杂志《今天》: 国志人带心画外文又排 气激的暴风月正年 8001 味

恩天·德里克

著 蔡新韵

1978年5月,《今天》创刊。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复苏,也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化。《今天》的创刊,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发起的。他们希望通过这本杂志,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对文学的热爱。《今天》的创刊,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它不仅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股清流,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今天》的创刊,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天》的创刊,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今天》的创刊,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今天》的创刊,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复苏,也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化。《今天》的创刊,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发起的。他们希望通过这本杂志,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对文学的热爱。《今天》的创刊,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它不仅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股清流,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今天》的创刊,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天》的创刊,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将反文化运动带入法国：《当今》杂志 和 1968 年五月风暴的遗产

克里丝·沃恩

陆汉臻 译

1968 年五月风暴常被视为法国青年文化和/或青年政治的一场关键运动。对这一事件的常规叙述一般将重点放在拉丁区暴乱学生担当的角色——这场风暴的催化剂。回顾性和回忆式的文本迅速动用代际冲突这一主题来对这场运动的意义进行关键性的解释。当然，青年人在成长，1968 年之后的 68 这一代人 (soixante-huitards) 的政治轨线对理解这一事件渐渐起了重要作用，而个人的青年左倾主义信仰的明显退潮与 1968 后法国从革命转向改良主义政治这一更大的社会趋势有关。克里丝汀·罗斯 (2002) 最近的论著重新点燃了 1968 年遗产的大讨论。对于她来说，以上这种论述自 1980 年代以来渐成主流，并与认为五月风暴具有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的阐释并驾齐驱：这场运动的最基本的成就被认为是法国文化的自由化，这是自由改良主义左派能够不成问题地“拥有”的一个结果。在本文中，我想重新审视在这一被指称为去政治化的过程中 68 后反文化所扮演的角色。

出于此目的，本文将重点考察《当今》杂志，此杂志在 1970—1975 年间致力于推行一种基于反文化和别样的生活方式的概念的特别社会变革观，对法国青年的成长和法国反文化运动具有中心



意义,就是说,对这个过程的分析将使我们得到对更大过程的关键的认识,在这个更大的过程中,激进的全盘变革之梦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方案。<sup>[1]</sup>对这场运动所倡导的动因、它所认可的社会思潮和它所抗拒的思潮进行一番审查,将会发现,五月风暴的余波是如何部分地生产出一种特别的青年亚文化的。而且,还将看到,这种亚文化是如何受制于这样的模式的:特定的,哪怕是稍纵即逝的影响,文化偶像的迅速变换,被随后出现的种种亚文化所最终抛弃。这正是青年文化发展道路的特色。不过,在对《当今》杂志进行细枝末节的考察之前,有必要研究现存的对五月风暴余波的各种叙述,特别有必要研究这些叙述为认识1970年代法国青年与政治的关系所提供的视角。

## 五月风暴及其余波

罗斯的著作(2002)向对这个激进和革命时代进行“劫持”的行径——她这样归纳其特点——发起了十分严厉的攻击。她对评论家和社会批评家那不可思议的众口一词进行了思考,这些人几乎千篇一律地将1968年这场风暴描绘成一场文化革命。现在对五月风暴所作的回顾性解读并不基于其当时的言论和行动,它那鲜明的语言和主张很快被视为多少带有荒唐的色彩,令人感到些许尴尬。相反,却从它本该包含的种种隐含的要求,从它本该对法国社会产生的后果出发来对这个事件进行阐释。特别是,这个事件被这样解释,它使得法国社会的体制和社会现实变得缓和起来,使法国对国际文化——尤其是美国流行文化——的全球化浪潮更加开放,更加适应于冷战后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

这种众口一词的现象是如何出现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罗斯将重点放在了一部分观念制造者、社会评论者和思想者所担当的角色上。她对这部分人中缺少历史学家表示悲哀。这里任由

“哗众取宠的历史学家们”发表观点，任由他们确定这个事件的意义。她对原先激进的前巴黎学生领袖的批评尤其不留情面，这些人将五月风暴基本描述成一个家庭事件、一个急变中的代际危机、一个“反叛青年”的事件，这样做就最佳地切合了他们的利益。她指出，事实上，他们将自己对这个事件的一家之言代替了其他所有人的看法。现在他们身处媒体—政治体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以下这样表述是有既定利益的：他们在1968年以及之后所作的种种选择，回顾性地来说，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更长期的选择（即，偏爱自由胜于平等）的一部分，作出这样的选择是为了更好地改造法国社会。在罗斯看来，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从1968年五月风暴中剔除一切原始的、激进的政治意义，掩盖它所提出的革命挑战，抹杀其潜在的变革性的政治遗产。

在罗斯的叙述中，很多处言辞咄咄逼人，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更大趋势中令人信服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趋势是要复原五月风暴的政治维度，要更加符合逻辑地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法国历史趋势中找到其位置。罗斯同时也向五月风暴是一场特别的青年运动这样一种神话提出了一个令人欢迎的挑战，对随之而来趋向于用诸如 *soixante-huitard* 或“68 这一代”这样不合时宜的术语偷懒地解释1960年代以后法国社会每一个方面的变化这样的做法进行了健康的修正。不过，罗斯在解释五月风暴的文化主义阐释获胜的原因时存在解释手段上的缺陷，其中最核心的缺陷是一种缺失描述，尤其是对激进政治的信仰缺失：照罗斯分析，1968年之后将所有的宝都押在出现一个完全变革的社会上的著名斗士和活动分子面对自己的雄心壮志的落空，将这种苛求的、坚定的志向变成了在这个完全属于文化领域——特别是以巴黎人为中心的媒体和知识分子论辩场所——中产生影响和采取行动这样令人更为舒心的确定事物。罗斯将这一过程的起始期定为1970年代中期附近。深受1980年代的影响，这个过程的完成则以诸如《辩论》这样

的评论的出现、《新哲学》(格鲁克斯曼·列维等人创办)的圣化和主要基于保卫人类自由(由诸如“无国界医生”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代表)而创立的非政治视角的胜利为标志。所有这些取代了罗斯所说的先前与发展中世界的解放/民族主义运动更为激进的联系。

罗斯将法国反文化运动的出现置于这个去政治化过程的中心,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类似“文化效应”这样语焉不详的术语来意指与那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说的“反文化”相类似的东西,结果会是怎么样?与美国和英国不一样,这些国家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别出心裁,繁荣一时,在音乐界尤其如此,而法国在1968年之后出现的反文化运动则是舶来品。在英国或美国……一个人可以从反文化的后门悄悄溜进政治文化,这是可以想象的,但在法国或意大利,1970年的反文化运动则代表比美国的那种更朝气蓬勃、更强大有力的政治好斗性的衰退。(罗斯,第13页,2002)

这里,关于这些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一路来到欧洲大陆语境的外来流行文化,除了音乐亚文化是创造性和独特性明显的首要衡量尺度(对反文化所采取的一种奇异的还原主义立场)外,有几个启人心智的假设。不过,如果承认罗斯所强调的法国反文化运动是激进的政治运动缺失的一个标记这样一个观点,她随后却将重点放在对反文化引入法国的手段没有多少关系的领域,这似乎相当匪夷所思。她也不花任何篇幅来正经分析法国反文化的特定形式。看来似乎如此:她坚定地(令人欢迎地)拒绝将五月风暴看作神话般的“青年”运动,这样势必阻碍她对任何可能被视为复原五月风暴作为代际分裂的意象的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因为普遍

认为反文化首先是青年文化，或者是青年亚文化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因此，罗斯要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就成为一桩难事。在她的著作中，这标志着更大范围的解释性缺陷。她的著作敏锐地观察到言辞和话语的各种演变形态，为了将失败吹成胜利而使用的种种诡计，但她无力解释为什么某些话语变成了主导话语或被广泛接受。

## 反文化在法国

本文的观点是，清晰理解法国反文化的发展过程确实能提供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为止的那个关键时期的更历史化的叙述。到1970年代中期，受1968年五月风暴激发而产生的全盘变革社会的全球化梦想被悄然抛开，取而代之的是在更为有限的程度上得到实现的个人梦想。为了把握法国反文化的过程而作的这个假设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不幸的是，这场运动的叙述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全面的，结果，分析也就不充分。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以外，有关这个运动的叙述多为当代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往往侧重于反文化的某一个方面（公社、音乐节，或吸毒），往往着眼于其更多的异国情调和相应的更为昙花一现的特点来处理这个现象。<sup>[2]</sup>法国音乐界（1968—1975）的情形尤其不被外界所周知，但是要记住，罗斯却把音乐界的发展作为衡量反文化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

新闻报道当然发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记录作用，但是，因为罗斯所提出的问题的要点只有在事后才变得清晰，所以就可以对从当代叙述中找出与这些问题的关联之处寄予很大的期望。更稀缺的、更具分析性的叙述确实存在（比如，对公社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但这些叙述往往把更大范围的反文化运动的不同特征作为各不相关的现象来处理。这些叙述不见得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趋势相关联。<sup>[3]</sup>

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社会学家杰勒德·摩吉和克劳德·福塞一波里亚克的著作。他们在受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视角的启发而得到的一个框架中，特别是在通过强制的抹去等级(*declassement*)和重建等级(*reclassement*)过程来转变文化资本这样的观点下，进行广泛研究，对法国的反文化运动进行首次认真严肃的分析。研究在对运动参与者的访谈和第一手观察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结果发表于1977年，也许正值这个运动走向衰退之时。<sup>[4]</sup>他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如何确切解释罗斯所指认的这个过程，即年轻中产阶级反叛的世界是如何在一段时间那里基本被政治标记和框架结构(交战性、等级世界的视角、激进主义)所主导，随后又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被另外一个世界所代替，在这个世界里，中产阶级青年反叛被明确无误的文化术语(音乐、服饰、吸毒)所表达，简而言之，如何确切解释“从左派主义到反文化”这一转化。

为解释这一转化，摩吉和福塞一波里亚克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性步骤，这些步骤主要来自对左派星云(*nebuleuse gauchiste*)内部元素不断演变的位置的分析，这些元素主要是《当今》和《一切!》。根据这个观点，1968五月风暴基本上是青年学生反叛遭遇青年工人反叛。其最终的失败原因在于这两个群体无力结成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同盟。作为对这种失败的回应，左派主义出现了，因为反叛的青年学生试图抛弃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去变得与年轻工人一样，在革命真正正在发生的地方参加革命。左派主义不能生产一个革命运动，这一预想到的失败为反叛的青年学生作出进一步回应提供了时机。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定义简单化，将范围扩大，将所有自认为自己处在资产阶级体制错误一端的人都包括了进来，不论这些人在工厂、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因此，他们攻击的对象是一切形式的压迫：性、经济、种族和文化的。其出路不一定要等待伟大的革命时刻，而是要发起对体制的反抗，在其体制范围之外开创生活领域，这些生活领域最终将融合在一起，来挑战体

制的霸权。

这一切当中当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但正如摩吉和福塞一波里亚克所强调的,这对法国是全新的。的确,这种转变对法国的反文化运动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左派主义的主导态势对外国流行文化引入青年中产阶级反叛的世界形成了重要的抵抗,这种抵抗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这种文化只会起到潜在地远离真正的革命目标的作用,或者更糟,它是资本主义复辟策略的一部分(从马尔库塞的压抑的容忍理论来推断)。反文化这一反叛所提出的新无产阶级(不仅是工人阶级,所有那些认识到他们自身受压迫地位的人都可能成为新的革命阶级的一分子)视角因此伴随着反叛的特定文化表达。摩吉和福塞一波里亚克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去展现外表是无产阶级色彩的反文化——受制于其强调的普遍的受压迫——是如何实际上真正掩盖了阶级区分模式的一种新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的基础是个人和团体随身带入先锋运动的文化和社会资本。这样一来,反文化成了它一开始就反对的这个体制的不平等和偏见的一面镜子,再现了而不是废除了阶级等第。

摩吉和福塞一波里亚克对法国左派主义和反文化的视角——即认为它们两者基本上是青年亚文化而不是变革社会的基础——无疑是一种高见,但这在对盎格鲁—美利坚的那场运动的叙述中不无雷同之处。但在把握反文化运动的法国版本的特定维度的角度上具有更大意义的是《当今》杂志被赋予的起中心影响的角色。在摩吉和福塞一波里亚克看来,《当今》可以被视为法国反文化运动晴雨表,特别是,它代表了这场运动主导和先锋的元素,同时它不断与体制中的本地团体寻求交流和沟通,并在那种交流和沟通中不断演变。因此,分析其不断演变的观点就可以为剖析法国反文化运动的全部意义提供方便的途径。

具有同样意义的是摩吉和福塞一波里亚克所辨析的那些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新青年文化得以出现,并在该杂志所倡导的立场

周围立足。如上所述,《当今》在实现促使反文化在法国兴起的根本方略的变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变化始自对先前模式的一种本质上是代际的否定。当然,这就立刻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它本身可能成为青年文化内部未来代际分裂的牺牲品。如果对《当今》的命运的描述将对法国反文化的命运的描述投下阴影,那么,对杂志自身的政治信仰的缺失的探讨将为1970年中期法国青年的去政治化提供极其重要的深刻认识。

### 《当今》杂志的兴衰

《当今》杂志在反文化运动时期的首次出版是在1970年10月,紧随1968年底首次出版的更专业化的爵士乐和艺术杂志之后。《当今》的拥有者是音乐艺术和音乐会推广商吉恩·卡拉柯斯,他经营的其他项目收入丰厚,就使他能投资于一种没有收益的出版物,从中追求自己的个人的品位和梦想而无资金的后顾之忧。出于此目的,他开创了“BYG—当今”唱片品牌,致力于在法国推广和发行美国自由爵士艺术家的作品(阿奇·谢普,芝加哥艺术团)。该杂志与这个品牌联手经营,但发行量只有7000份,只面向一小部分早已具有专业素养的爵士乐听众重点推介先锋戏剧和诗歌,结果没有取得期望的成功。于是卡拉柯斯将杂志卖给了新近加入的合伙人吉恩—弗朗索·比扎特,比扎特梦想着将杂志引向新的方向。

比扎特是引领杂志新发展方向的中心人物。他大学学的是工程学,其家族拥有朗龙·普朗克制药公司,他在学生时代就是左派政治的高手,在《快车》度过一段时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在1965—1966年间生活在美国,亲眼目睹了美国嬉皮士运动的兴起。美国嬉皮士运动的活力、达观和普遍的自信精神使他大为震惊,这与他所经历的法国学生运动的各自为战、拉帮结派和过分理论化形成

极大反差。于是他决心将美国反文化运动引入法国。

加入他的事业与他并肩作战的有持有第三世界观点的医科毕业生伯纳德·柯其纳，他继而创建了医生无国界组织；帕特里克·拉姆伯德，一位对源自美国的艺术运动颇感兴趣并深受鼓舞的音乐家兼作家；迈克尔—安东尼·布恩尼尔，一个幻想破灭的前托派，比扎特在《快车》杂志遇到了他，他早已发表过分析萨特和法国左派主义的普及性文章，像其他人一样，他那时也正在别处寻找激进运动的未来。<sup>[5]</sup>其他作家也陆续来到《当今》，但时间都很短暂，其中最著名的是盖伊·霍昆海姆，他是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创始人兼活动家，还是男同性恋自由的理论家。不过，总体来说，正是这四位创始人在杂志发展的最初五年里为杂志提供核心内容。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坚持合作写稿，大多数文章署上各种各样的笔名，部分目的是为了给读者以生机勃勃、丰富多彩和活力四射的印象。

如果我们能相信比扎特本人的说法，那么，在1970年的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内，杂志所面对的第一个现实就是法国还没有出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文化：

我们创办《当今》杂志之初，谈到其他一些地方那些先锋派人士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我们这里闻所未闻。在六到七个月间，我们的专业水准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读者。（《当今》1973，第10页）

即使除去某种修辞上的自我标榜，《当今》杂志在初期所担当的角色似乎是很清楚的：这些作家的行动似乎表明法国先锋运动早就存在，他们相信，这种信心将最终迫使社会现实变得与他们预测的变革结果一致。的确，这种本质上来说是道德说教性的视角为杂志的头两年定下了基调。这是其演变过程中的三个鲜明时期



中的第一个时期。以下依次来分析各个时期。

### 1970—1972：“新的黎明”

这个时期的《当今》的鲜明特点是乐观主义，充满活力，雄心勃勃。注重创新，越来越多地使用迷幻性的色彩，在版式和图片设计上不断尝新，道德说教的目的十分明确：内容的重点是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美国——反文化运动的状况，发表的文章大多是译文，译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反文化运动出版物（IT，《伯克利讽刺》，Oz），这些出版物明显起到了激励和样板的作用。在这方面，《当今》加入国际先锋运动报业辛迪加是对其事业成功的一个关键性的肯定。<sup>[6]</sup> 罗伯特·克拉姆的卡通画受到了特别的青睐，经常出现在封面，克拉姆的绘画风格主导了《当今》的美术设计。他的作品经过翻译，由挪瓦出版社（该出版社由比扎特创办，来监管杂志的发展）出版，最终成为杂志营销策略的一个关键部分。

也许最缺乏创新点的是在写作方面。《当今》杂志的新闻写作风格和体系大量借鉴《快车》杂志，尽管今天也许不能这样看，但在当时《当今》的做法似乎更是一种对《快车》风格的背离。的确，一味强调必须写出符合现存的专业新闻写作标准的文章，势必会引发争议，于是杂志社资深的撰稿人寻求扩大投稿者队伍，扩大投稿范围。初期的编辑方针很明确：杂志属于读者，并强调这样一种雄心：杂志欢迎所有的来稿和建议，大家齐心协力，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分裂将最终消失。最终让读者控制杂志的生产资料的梦想甚至连部分都没有实现，杂志的生产核心依然掌握在极小数人手里，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对于是否坚持新闻写作的标准这一问题争执不休，比扎特认为需要维持最基本的保证清晰透明的需要，但那些投稿被拒的人认为那简直是一种社会压迫。<sup>[7]</sup> 这无疑证明，对于编辑人员来说，要跨越道德说教的立场是很困难的，而要使反文化运动在法国立足，这种道德说教在一开始似乎是必需的。

在《当今》的第一阶段，向法国读者进行反文化运动的道德说教目的主要是通过每期一个主题的方式来实现：生态学、妇女解放、音乐、家庭、毒品、路线，每期的一篇中心文章分析或描述存在于法国以外的一个样板，接着就是本地的目击者的描述，目的是为了恢复国内的运动态势。摩吉和福塞一波里亚克注意到的从左派主义到反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一个重要主题，它将杂志所关注的一些本来折中的问题、担忧和目标相互联系在了一起。早在1971年，一篇关于左派政治的文章这样写道：

一部分极左派革命者引发了政治斗争。这些人依赖于大众和当选的秘书总长……这场政治斗争是20年代陈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部分……在法国先锋派人士缓慢地渗透着……传统左翼分子开始开始了他们最后的挣扎。（《当今》1979年a，第2页）

1971年晚期，继续进行左派政治，还是与之决裂，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分明了。出路？一种新的文化实践，一场新的文化革命：

诗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军人：为政治而政治，为艺术而艺术，毒瘤开始形成。旧秩序被打乱，新文化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惊呼：秩序将向何处去？……巴黎公社、妇女解放、同性恋浪潮、公立中学里的爆炸事件、罢工：乌托邦影响了极左运动且摧毁了它。但这还只是狂热分子和警察的乌托邦、深受束缚失去活力的乌托邦：一切已经开始，一切已经发生。（《当今》1971年c，第2页）

第一阶段的顶峰是1972年2月的一期专刊，被宣传为“法国先锋运动指南”。《当今》杂志的工作人员在1970年制定了创立反文

化运动的目标,现在他们清楚地感到历史的分水岭已经来到:与左派主义已经彻底决裂,在局部欲望全部而且立刻得到实现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政治正在出现:

左派主义死了吗?……那些讲奥克语、保持布列塔尼传统的布列塔尼人,对现实不满的佃农,一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拒绝左派运动死板僵化的教义。一系列词汇:思想的解放,私生活和政治生活隔离的制度的废除。妇女解放运动,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革命生活传统和青年解放阵线,所有这一切都形成了新的秩序制度,打破了往日的旧秩序。这场尚在初级阶段的、还在摸索的,或者说没有前途的左派运动是一场社会中坚分子的运动,是展现新思想的一个方面。(《当今》1972a,第63页)

在《当今》杂志第一阶段的末期,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革命梦想无法实现之后渐渐消退的政治好斗性作过清晰的分析。不过,这远不是一次失败的经验。

在很多意义上说,从政治向文化的这种转移无疑预示着罗斯所分析的文化转型。不过,在她的叙述中,这种转型发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是更大范围的政治撤退的一部分。在1970年代初期,对《当今》来说,放弃传统的极左主义的策略、语言和组织是被看作是一种解放,是将变革的力量向法国社会进行更大范围的释放的一种标志。其基调是坚定的乐观主义。如果,像阿兰·西普纳和皮艾尔·维得尔-纳奎特(1971)在他们对五月风暴所作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参与五六月间的这场运动的青年其实参加的是一场自我认识不清的运动,因为这场运动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和参照点,那么,对于那些参与《当今》杂志编辑工作的人来说,很清楚有这样的迹象:这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正在顺利进行,

先锋运动就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反文化运动将找到其最充分的表达。<sup>[8]</sup>

### 1972—1973：“先锋运动的陈词滥调”

从编辑基调和主要内容可以清楚看出，《当今》杂志在1972年秋天进入到第二阶段。可以说，杂志已经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它已经成功将法国先锋运动刺激成现实。随着说教任务的完成，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有关反文化运动的宏大理念的主题宣讲了。于是，《当今》杂志集中精力将自己打造成发布信息、提供新闻、传播观点、分享经验、推广实践的一个中心，一系列主要文章完全依赖读者投稿（“次要指南”、“生态学”、“杂色”），关注于从先锋运动的视角来思考当前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阶段，小广告的版面引人注目地扩大了，这样，一方面如预期的那样宣传了一些行业和服务（书店、咖啡店、唱片店、工艺品和服装），另一方面也为个人和团体提供了联系空间，这些个人和团体认为自己就是本行业和本地域反文化运动的唯一代表。

这种对担当另一种联系机构的关注在关于法国公社的一份问卷调查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对这份问卷调查的回答按照以下类别来排列：社区的种类（“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对性关系的态度，或者这个公社是否以一种特定的政治、方案或宗教观为中心而建立的（《当今》1970b，第33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当今》与米歇尔·法里甘的新闻通讯《C：公社快报》联手开展了一场编辑运动，努力动员所有与在法国建立另一种富有情感的公社存在形式相关的人的力量。早就生活在公社的读者被邀写出他们的经历送到杂志社，并留下详细的联系方式，而那些决心参加这种实验的人士也被邀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将有意参加或者已经参加了法国公社的所有个人和团体的名字和地址整理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制成一份清楚的名单（“公社电话簿”），在指定的杂志订阅者手里秘密

流传。<sup>[9]</sup>这份名单包含约 5000 个名字和地址，有个人和业已存在的团体，有大量各种类型的公社。很清楚，社会变革的主要希望被寄予这些被视为“未来的实验室”的实验中。

不过，当实验失败的首批报告开始出现时，随之就出现了某种幻想破灭的最初迹象。最明显的是出现了批评美国反文化运动发展的首批文章：流行音乐的回归和商业化，某些政治领袖和曾被奉为指路明灯的人士（著名的有阿比·霍夫曼和杰里·鲁宾）的背叛行为，堕落成触目惊心的恐怖主义（黑豹，气象员）。在这个时期，对美国反文化的批评和幻想破灭的同时还抱有这种乐观主义：总体上说是欧洲，具体上是法国，正好来接过社会变革的指挥棒。这种乐观主义与罗斯的真实/非真实的两极化观点是个明显的反转。

《摇滚文化》，《青年革命》，一个时代的标志性话语在酒吧文化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成为流行音乐明星，一个时代盲目的偶像被卷入《奇观》中，最终也没有能穿越镜子……发生在欧洲大陆中心的这些运动，在那里力量还是充沛的……运动的渐弱，其失败是有明显的原因的。在欧洲其他类似运动发生之前值得好好理解和深思它。（《当今》，1972b，第 2 页）

纵观这个时期，《当今》杂志强烈排斥格兰姆摇滚，将它看作盎格鲁—美利坚反文化运动颓废、衰老和无用的标志；与此相对照的是，来自德国的新音乐（在英国，这新音乐的名字叫德国佬摇滚，代表乐队有罐头、橘子梦和牛皮纸）被称赞为新的能量和创新的源泉，1972 年和 1973 年《当今》杂志甚至组织了由德国乐队演出的巴黎音乐会。<sup>[10]</sup>

对离本国更近的人物的这种认同是对反文化典范持有坚定信仰的根本所在。理解在美国反文化运动中所见到的种种失败的“准确原因”是遏止失败感蔓延的一个手段，这种失败感尚未演变

成对变革可能性的信仰的更为全球化的抛弃。具有讽刺意义的，这种信仰的未经认可的基础是，正是左派主义的这份庄重的政治遗产将保护法国的反文化运动不受资本主义的奉承巴结。这是一根贯穿关于美国反文化运动失败的各种叙述的主线：这个运动失败的一个特定的本地原因是其政治的幼稚性和精深理论的缺失。曾经被嘲笑为阻止了当地反文化运动兴起的不合时宜的、限制性的力量（对左派理论传统的斗士的控制）现在看来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成为反文化抗拒回归的基础。

1974—1975年：“戏仿和幻灭”

欧洲是反文化运动的基地——这样的信仰不过是相对短命的，《当今》杂志的最后两年被一种强烈的幻灭感所笼罩，最终导致杂志在1975年10月自动解体。1970—1972年间的许多反文化特征慢慢退去，出现了更为直接的手段：戏仿、讽刺和幽默，这样一来，《当今》杂志与讽刺性的出版物，比如《查理·赫伯多》和基恩·埃登—哈利尔的《白痴国际》，更紧密地走在一起了。从这些出版物借来的一个关键的策略是，通过精妙的伪造，模仿美术风格和排版设计，戏仿编辑方针和内容，对其他杂志和报纸进行过度戏弄性展现：于是，自由化（Liberation）变成了冬眠（Lhivernation），她（Lui）变成了大母猪（Truie），如此，等等。这种策略的高明之处是不可否认的，但从超现实主义和情景画家的分神（détournement）策略中可以得到明显的类似点。

不过，从《当今》演变的这个幻灭阶段的背景来看，这个策略并不显示出带有挑战关于媒体奇观——作为提高革命意识行动的一个舞台——的标准思想的力量，相反，它更关注的是对主流文化进行复仇，这个主流文化看上去无畏地坚持对反文化思想和主题进行成功的吸收。杂志的整个调子越来越表现出某种讽刺性的痛苦，这种痛苦只会加强失败感，这点在两个鲜明的领域可以得到

证明。

首先,杂志早期所倡导的目标和思想如此轻易地被主流文化所吸收,对此它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怒。不过,这种愤怒被视为革命冲动耗尽的一种标志,而不是对更广泛社会范围的反文化的效应自由化的一种赞美(日后对1968五月风暴的余波所持的文化革命论就是这样的情形):

1974年秋,这场危机压迫折磨着人们的思想,左派运动变动变得一团糟……那些最黑暗的寓言被奇怪地取消,有时幸运地恢复了……先锋派人士的手段,摇滚音乐的涌现已有点力不从心了……

大部分《当今》杂志的主题已经成为公众讨论的普遍题材:在很小范围内,如在客厅,抽着大麻烟卷标榜着自由。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以及《自由党》逐渐倾向于《新观察》中的Emmanuelle的观点,不管怎么说,时代在进步,这是不错的,尽管我们也不那么确信,但是相信我们吧。(《当今》,1974b,第4页)

其次,即使对运动内部的人来说,这些思想所预期的变革效应似乎也并不能实现,这就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失落感。这在1975年7—9月间的黑暗虚无的“零”运动中体现得最充分。这是一场文化虚无和空虚的过度的庆祝,出于民主式的自我憎恨,这场运动甚至为与杂志自己的作者的无关性颁奖。这种对负面性的强调在1974年4月号的杂志里也表现得异常明显。这期杂志的主题是“他人的愚蠢”。中心文章的题目是《一个白痴读者的一天》。文中,一个刻板典型的读者利己和陈腐的观点被想象成愚蠢和保守主义的突然发作。对杂志平庸的读者进行这种无情攻击的做法与早期杂志的做法大相径庭:以前它常常邀请读者共同参与一种新型媒体

的建设。最终发表的一种类似社论性质的东西，对法国青年无力发动他们自己的社会革命流露出明显的愤怒之情：

啊，是的，他们有时很笨，那些少数社会边缘人，他们为所欲为，这真是太傻了，吸毒的傻瓜，抑郁的吸毒者，在恼恨中寻找快感、满口黑话、已成废物的吸毒者。

社会边缘人或吸毒者的丧失了判断力的意识流常常使他们变成负面的代名词：党同伐异、蒙昧无知、愚不可及。

针对法国中产阶级的偏见而发表的言论——黑话——的切口形成了。这种贫乏的语言为了丰富词汇而剽窃了美国英语，比如颓废、幻觉、大便、苦恼这些词汇穿越其内涵，改变其普遍意义，不受传统模式的束缚。

事实上，这些边缘人的所作所为不是特别的触目惊心，还没有这个制度更让人受不了。但是，我们触手可及的就是这些边缘人的这些事。

节日、道路、公社：那里产生的思想是精彩的，也同样具有讽刺性的：道路远离那一片蓝天下的边缘人，吸毒者空虚悲伤地待在旅馆卧室里，目光短浅，不再降低到民俗水平，旅游与地中海俱乐部一样乏味。人们知道：法国拦车搭乘的年轻人常常不同于缺乏想象力、玩世不恭的、几乎毫不坦率的种族主义者。

在公社的名义下隐藏着同样的压抑的不爽：人们哀叹自身的不幸，而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想解脱，舒缓紧张，只有沉迷于毒品，内心的冲突最后以吸毒告终。

《从你思想中驱逐警察》。1968年五月事件。被抵制了数周的警察又满街在跑了。（《当今》，1974a，第26页）

因此，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法国反文化运动远没有保存先锋



运动的纯洁性,它因为无力摆脱内心的压力而受害。的确,法国式的反复无常现在最有可能重造主流的模式和态度,最不可能引发一场革命。

这个立场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与社会的大趋势不合拍,越来越无法将先锋运动与体制区分开来,不信任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遗产,于是,杂志决定在1975年夏天自我放弃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杂志的发行量维持较好,盈利的基础也建立了,也没有重大的编辑方针分歧,但正是由于这种无奈,这种疲惫感,终于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当今》,1977,第234—257页)。与这种进入历史的感觉相伴而生的是不断增长的迹象:对全球青年文化运动的新的发展持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对初生的朋克运动更是持否定的态度。<sup>[1]</sup>这样,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反文化的青年维度不断重复自己的主张,随着其参与者的不断变老,不断前进,它却无法从内部更新自己。

### 反文化、青年文化和1968“五月风暴”的遗产

现在转过来谈谈摩吉和福塞—波里亚克的观点——法国反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青年文化——就很合适了。像其他青年文化一样,法国反文化在永恒(因为它似乎宣布了能标志深刻社会变化的新的社会态度和新的行为方式)和短命(因为它似乎很容易变得落伍,不合时宜或者被新的事物抛弃,因此对这种变革的现实投下疑云)之间摇摆。摩吉和福塞—波里亚克对反文化内部进行阶级的重新划分的分析再次强调了这一点。那些带着最厚实的文化和经济资本的人最能适应环境而顺利前行,他们将这些资本进行转化,重新融入主流。相形之下,非常清楚的是,摩吉和福塞—波里亚克对那些缺少文化资本的人深为同情,文化资本的缺乏使他们显得越来越依赖于过往的青年文化范式(由法国嬉皮士[baba cool]

或者工人阶级嬉皮士组成的一个团体)。与此同时,青年风尚和品位的世界在不断向前发展,<sup>[12]</sup>《当今》杂志作为法国反文化的晴雨表和急先锋,其演变、兴起和自我了断的衰落确切反映了永恒和短命之间的摇摆,而一个小圈子里的作者和投稿者适得其所,来逃离法国嬉皮士的命运,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将所得到的反文化资本重新转换成文化产业别处的职业。更重要的是,它的命运将青年文化的重要维度重新引入到对1968五月风暴的理解之中。

我们早先看到,罗斯已经揭示,五月风暴的主流叙述认为它基本上是一场文化革命。她提出这样的看法来作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这是对必定的政治失败的一种方便的事后解释。她将这个过程主要定期在1980年代,此时前好斗分子已经与体制和平共处了。这就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融合解释为社会更大范围的文化成功。虽然对那些从1968年反叛中出现的成功人士来说也许的确如此,但这很难解释,为什么这种叙述会被法国社会更广泛的团体所接受。对《当今》杂志的演变历史的分析可能是找到这种解释的开始。

首先,这种分析将把与左派主义的决裂,从而转向文化革命这一过程的发生时间定于某些周期中更早的时期。其次,要使这个过程更早地发生,发生这种决裂的原因就不是策略上赤裸裸的去政治化和革命雄心的缺失,而是在一个不同的行动领域重新安置这些雄心。因此,左派主义的失败与少数人的虚假而短暂的革命狂热没有多大关系,这些人一定失去了他们自己太多的责任。更为根本的是,这个分析很快显示,它无力全面解释五月风暴的能量和变革能量,或者无力全面分析日后的世界实际。这个时期尽管短暂,反文化运动的主题和观念似乎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因此,基本持文化革命论的叙述早在1970年的《当今》杂志就被断定为“超越左派主义”。不过,将假定的变革性政策置于这样的基础之上,是有其内在固有的危险的。与左派主义决裂,转向反文化——

不管这反文化是舶来品,还是别的什么——这样就将 1968 年五月风暴的遗产坚实地放回到青年亚文化的领域中,放回到青年文化内在的被迫衰败和年龄差异的框架中。

## 注 释

[1] 应该指出的是,《当今》虽然在 1975 年解散了,但比扎特在 1979 年以非常不同的编辑方针重新出版了这份杂志,外表与感觉上与英国的《面孔》相似。

[2] 新闻调查、指南和参与者的报告包括: Droit and Gallien (1972); Jaubert et al. (1974); Andrieu (1975); Bercoff (1975); Bizot (1976),《当今》创始编辑的一部小说,并不过分掩饰其自传性质; Actuel (1977); Barnley and Paillet (1978); Bernier and Buot (1994); Bouyxou and Delannoy (1995); Bizot (2001, 2006)。

[3] 比如,欲了解法国公社的发展,参见 Hervieu and Le'ger (1979) and Lacroix (1981) 的社会学分析。关于音乐,参见 Beaud and Willener (1973) and Beaud (1974)。

[4] 杰勒德·摩吉与克劳德·福塞一波里亚克合作,首次对法国的反文化运动进行社会学研究 (Fosse & Mauger, 1977)。这个分析在 Fosse-Poliak and Mauger (1983, 1983—1984) 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摩吉对反文化的最初兴趣来自他对 1972 年夏的毛主义红卫兵突然消失事件的亲身参与和观察,短短几个星期,好战分子好像不仅抛弃了他们对党和马克思政治的忠诚,而且非常高调地接受了反文化的风格,习惯和态度 (Mauger, 2002)。现在还不清楚的是, Mauger 与 Bourdieu 的关系能否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个哗众取宠的社会学家,但事实上他一直坚持他在早期著作中形成的观点,并继续严肃地坚持青年社会学观,发表了一系列短文,论述法国社会的青年亚文化和青年更广阔的天地,最著名的是 Mauger (1975, 1983, 1984, 1991)。也许因为他没有将分析法国反文化的文章结集出版成专著,他的著作在盎格鲁—萨克森世界似乎不为人所知。

[5] Burnier 著作众多,包括对知识分子和政治的论著 (Bon & Burnier 1966; Burnier 1966),对 1968 年五月风暴的后果的思考 (Bon & Burnier 1968),对法国在五月风暴之后变得明显的不可治理这一状况进行了概述 (Burnier & Kouchner 1970)。

[6] UPS 成员资格在《当今》杂志的社论中作了宣布,见《当今》第 7 期,1971 年 3 月。

[7] 关于读者与潜在的投稿者之间有时发生的冲突,见《当今》(1977, pp. 111—117)。

[8]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1971, p. 403):“学生运动继续掩盖自身的真实实现,甚至不让自己知道,手段是借用无产阶级运动的面相和术语。”

[9] 作为《当今》的秘密增刊而发行,第10—11期,7—8月,1971年。可以查阅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该杂志集。

[10] 带有鲜明的欧洲特点的摇滚音乐的概念在《当今》杂志第一次提出(1971d)。关于德国乐队举办音乐会的详情,参见《当今》(1977, pp. 183—187)。

[11] 反对崩客这个主题在比扎特的第二部小说得到最完全的实现(1979),这部小说与他的第一部小说一样并不过分掩饰其自传特征(1976)。

[12] Fosse-Poliak and Mauger 认为反文化被“aux poubelles de l’histoire” by the “héritiers” and “parvenus”所抛弃,从这一点上,反文化被无产阶级化的“法国嬉皮士”所拾起(1983—1984, p. 60)。

##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

阿伦·西尔维拉

聂玉莉 译

法国人仍隐晦地称之为“事件”，虽然其他人可能更喜欢称之为“偶发事情”。这种委婉的说法使人们又回想起1968年五六月份那场失败的革命，当时，广大学生和工人联合法国社会各界人民共同进行颠覆戴高乐共和国的斗争。惠灵顿公爵提及滑铁卢战役时说那是“一场几乎失败的胜利”，而在那个狂热的夏天，全世界的目光难以置信地注视着摇摇欲坠的法国政府被剥夺了权力和威严，老态龙钟，不堪一击，行将崩溃。

这个未曾预谋的事件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许没有人会想到，过去十年里一个政权稳固、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西方国家，一两天之内就被轻易地推到革命的悬崖边。这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普通政变，因为很多人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不只是又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的灭亡，像很多以往的革命一样沦为历史的尘埃，而是一个新型的革命剧变，预示着某种事物的到来。

时至今日，当人们发现法国政府这艘大船还是平稳地沿着波澜不惊的、索然无味的后戴高乐主义的航线航行时，整个激动人心

的“到处是街垒的日子”的怪诞的片段，如同昙花一现，像是一次不遵循所有游戏规则的越轨行为，似乎看不出任何意义。虽极具魅力、充满传奇情调，但在事件后来的过程中没什么主要成果。在经过了笨拙的摸索和彷徨之后，第五共和国在深受革命的重创和被嘲笑的屈辱中幸存，恢复到先前的状态，而革命势力也在那次转瞬即逝的行动后迅速瓦解。当议会中的反对派反思他们策略上的错误和丧失的机会的时候，他们自舔伤口，重整旗鼓，只不过比以前更不堪一击、更难凝聚人心。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正在探索一种可操作的理想——以取代不断扩张的消费社会的平庸——的新一代社会学家们没能在1968年五月风暴破灭的幻想中找到多少希望。的确，当我们陷入对这个谜团的沉思的时候，我们就难以对这次著名的冒险行为定论——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年轻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但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与1848年那场夭折的革命一样，1968年的这场风暴注定会被认定为一次令人沮丧的失败事件，而它的积极影响也如同19世纪的那次革命那样难以定论。

失败的战役缺乏决定性胜利的戏剧性场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68年革命的结果，与1848年的革命一样，比1789年、1917年或1776年革命的成功更难以评价。1848年一败涂地的革命家的那些宏图大略以不同的策略、不同旗号得到了完全的实施。但历史总是由成功者书写的，这些成功者歪曲了五月风暴的实质内容。其结果并不像革命者所预期的那样，像1848年2月一样，1968年五月风暴最终是一场右派革命，而并非左派革命。当学生们的对手逐步把实行地方自治的革命计划，诸如“参政议政”、“地区自治”及其他计划付诸实践时，五月风暴的整个的本质，已逐渐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最终结果是失败者得不到他们应得的赞扬，而他们的对手却因他们的大智慧及有预见性而广受褒奖。

这些人 这些缺乏革命经验的革命者是谁？他们的目的何在？众所周

知，这次无流血事件发生的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自始至终都由蓬勃乐观的青年来主宰，在1968年的春末夏初，一种新兴的并令人振奋的理想主义迅速传播开来，它的传播并不仅限于学生群体本身，而是掀起了法国社会所有阶层的革命高潮。南泰尔大学、索邦大学的学生，及不久之后跟随他们的来自南特和卡昂及其他省的同学，定下了行动的基调，他们活泼机智、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勾起了许多年长者对往事的回忆：

在这黎明活着就是福气，  
但能够年轻就是极乐之事！哦，多少次，  
用这种微薄、陈旧的，  
习俗、法律和法规所禁止的方法发起猛攻  
一个国家突然显得极具魅力、富有浪漫色彩！

被华兹华斯这几行诗唤起记忆的这种精神，回想起来就像是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传统，但不应被夸大其词。当然它们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差异。过去非常重要，所有法国激进分子都不能完全回避这个事实。科恩-邦迪和他的激进活动家也同样知晓借助历史，在3月22日运动胜利之后，他们很快抓住了机会，以“愤怒的人”为名，从而与法国大革命搭上了联系。当年雅克·洛克司以此为旗号，带领最顽固的右翼的激进派革命家度过了1793年那段极度恐怖事件的高潮阶段。从这里不难看出，这次革命中的大部分的词汇和大量的行动，似乎刻意借鉴他们国家的暴力的过去和“伟大的祖先”那令人激动的例子。

其他更类似的事情似乎更能引起人们熟悉的回忆。法国新闻界称索邦反叛的学生总部为“暴乱者公社”。车身残骸的火焰使很多人想起1871年燃烧的杜勒里宫。正如1936年的“人民阵线”，第一次静坐罢工再次在一家飞机工厂发起，这一次则在南特。

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传统的反抗行为：所有的公共楼房上都升起了黑红色旗帜；工人和学生苏维埃的即兴创作；自发的工地大罢工，尤其是声名显著的街垒，在难忘的5月10日夜晚设立在了整个拉丁区，所有这些有趣的形式可能会被解释为有着丰富多彩的革命传统的行为和言辞的自我意识的重新展示，过去那充满了神话和传奇色彩的日子慢慢地复活了。但在所有行为和言语的背后，在20世纪发生的学生、知识分子与普通的工人阶层联合起来的一种新型动乱中，许多人认识到了他们的革命使命，发觉了最明显无误的迹象。因为已开始了一个抗议运动，他们不顾所有权威和胁迫，运动转化为独特的危机，其强度前所未有的，法国社会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精英，作为该国一支独立的力量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

实际上，这些精英发觉，这次与共和国的议会反对党联手是权宜之计，通过削弱他们的地位，他们妥协了自己的理想，这偏离了他们原始的革命目的——伴随着这次危机把现有政权拉下马，现在这些精英只是成了由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脆弱和运转不灵的联盟的一部分。他们勉强被盟友拉进一个老式的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的革命已唤醒了朦胧的希望：有朝一日，在这拥有大规模的技术和平庸人的世界上，如果不受限制、完全自由，人们的思想和精神能够对邪恶的社会质疑，事实上还能够改变世界。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对欧洲其他的国家来说，它可以合理地被看作一个楷模和一个启示，五月风暴可能有深刻的意义，其意义在于：1960年代的欧洲，见证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力量出现。

这里有一段5月2日至6月30日之间一连串事件的简要叙



述,当戴高乐政党在选举中取得大胜后,政府首先关闭南泰尔校园,其次是索邦大学。

这一切始于一个无辜的美国人“抢短衬裤”事件的法文版。<sup>3</sup>3月末,南泰尔大学的学生及索邦大学位于郊区的新附属部的学生,发起对所在大学规章制度的抗议,虽然大学当局采取缓和的做法,但他们无法防止煽动行为蔓延到索邦大学的母校机构。当动乱扩展到巴黎郊区的其他学院的宿舍里时,学生的抗议行动突然呈现出一种更严肃、更具威胁的形式。他们抛弃了单纯可笑的小怨气——支持“卧室起义”与“性自由”。现在开始挑战这种观念,即大学是专家治理下的国家的一种工具。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扰乱了教学,被迫推迟期末考试,这成为挑战学院机构借口,学院未从教育的实际需要出发,因一些不相干的和不必要的分心而受到谴责。面对不断上升的失控的情绪,当各校长和学院院长不再能维护政权,而不断向政府求救时,无计可施的政府决定先关闭南泰尔大学,然后再关闭索邦大学,并下令驱散学生。

在一天前的5月2日,总理蓬皮杜在外交部长的陪同下离开Orly机场开始了赴伊朗和阿富汗为期十天的第一轮访问。(当时戴高乐自己也准备离开国家赴罗马尼亚访问。)蓬皮杜总理直到5月11日之夜——“街垒之夜”才回国。他在关键时刻在外访问,他是政府中唯一能够遏止暴乱的人。

以5月2日作为起点,这场危机对6月份戏剧性的选举有很大的影响,回顾过去,运动的升级可以分为三个显著的阶段:第一阶段,学生的鼓动促成;第二阶段,大规模的总罢工影响了大约10万工人;第三阶段,这反过来又挑起了一个尖锐的政治危机,使戴高乐将军与他的第五共和国濒临崩溃。

1. 这场自发的学生暴动,从托派、毛派核心分子、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到巴黎大学15万学生中的一半及学院青少年会员优秀分子,他们采取的形式是街头示威。警察以他们惯用的暴力

手段与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示威活动在5月11日“街垒之夜”达到高峰。在这个节骨眼上，蓬皮杜匆忙回国，向学生首脑作出让步，答应释放羁押学生，并从拉丁区撤回警察。

在这关键时刻，索邦大学被学生“占领”（很多外省大学也很快出现了类似情况）。墙壁上张贴着海报，高楼大厦上悬挂着黑红色的旗帜，在拥挤的讲座厅进行着无休止的辩论和讨论，学生们以“学生权力”为名来维护他们合理的行动，并为下一阶段的行动鼓气。这是一种双重战略构想，既是防御，又是进攻，学生们不让围攻者逼近，以加强他们对据点的控制，同时主动与工人阶级联合，恢复他们革命使命，共同发起对衰老和腐朽混乱的资产阶级的猛攻。整个社会对这次非同寻常的挑战有什么反应呢？甚至在接下来的5月24日的血腥战斗之后，整个5月份的民意调查一致显示，压倒多数的民意支持学生的运动，以消遣的态度看待他们的行为。

2. 受到学生暴动的鼓舞，工人们也随后加入行列当中。大约80万人于5月13日在Denfert-Rochereau宫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标志着总罢工的开始，使国民经济很快陷入瘫痪。工业和商业、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交通、通讯、邮电及学校……当整个法国被一种兴奋的快感所笼罩，并且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时，所有这一切却戛然而止了。经历过那些令人振奋的日子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在假日里那种席卷全国的狂热和兴奋。在5月13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正是戴高乐的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的游行示威，使他们对自身的力量有了足够的自信，加剧了社会的危机程度。为了防止不可避免灾难，总理不得不使用最后一着来力挽颓势，他同意对罢工工会提出对新的工资协议进行谈判。在由“罢工委员会”成功地组织罢工之后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工人和学生迅速抓住机会与雇主谈判。匆忙之间对蓬皮杜的提议作出答复。经过三天使人精疲力竭的集中谈判，

于5月27日形成了所谓的“戴高乐协定”，该协议给予了工人阶级自解放以来最慷慨的福利，而在此之前的1930年代，这些福利的给予都是依据人民阵线的马蒂尼翁协定。由于这些谈判，工人的最低周工资率增加了不少于35%，月薪增长至少12%，工作时数也大幅减少——这是工人获得的最大的收益。

但罢工远没有得到平息，普通成员反抗联盟纪律，拒绝与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他们推翻格勒内尔协议，指责总工会和外交部，甚至是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这在当时是最激进的三大工会同盟，指责他们与政府及雇主相互勾结，破坏这场革命。“罢工委员会”年轻气盛的工人，在持“左派观点”的学生的支持下，拒绝以无名投票方式进行复工表决的原则，延长停工斗争和继续在全国进行工人自发罢工。复工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勉强，汽车和冶金工人顶到了最后。到罢工结束时，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并且损失了7亿的工作时数。

3. 与此同时，社会的激进活动已经涉及了政治领域。戴高乐的支持者们勉强抵挡住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随后（戴高乐）将军于5月24日由罗马尼亚返回国内，其间他拒绝将此次行程缩短，这件事被认为是其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决定。他所作的短短七分钟的电视讲话，对于民众的热情期盼来讲，显得差强人意、虎头蛇尾。电视中的戴高乐苍老而憔悴，他对主要问题避而不谈，而是恳求人民通过6月16日举行的复决投票来授予他执行复兴计划的权力。仅仅一个将军的力量就想打动人民来进行这样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几乎是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涉及未来政权的投票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看起来也与工人们的实际利益相抵触。

这场危机一直持续到5月29日达到了顶点。这一天戴高乐将军仅仅由夫人和一名副官陪同突然地离开了首都不知去向。随后只在他的家乡科隆比贝双教堂镇露过一次面（这还是在他后来首次飞赴西德时人们才知道的）。整个国家被暴力的阴影所笼罩，迷

惑又充满恐惧的人们希望能通过他的辞职来平息这次事件，就连他的内阁也持这种意见。终于，由密特朗领导的反对党，得到了共产党和孟戴斯-弗朗斯的支持，他们的联盟企图夺取戴高乐手中看似已经丧失的政权。

在这个由三股势力结合成的罪恶的盟军里，孟戴斯-弗朗斯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是戴高乐政权的死对头，他在学生、知识分子和好战的工人中有大量的支持者；另一位，密特朗，来自原联邦的共和国主席候选人，得到了中产阶级和那些对共和国依然无比忠诚的自由分子的支持；至于法国的共产党，他们关于建立一个“人民政府”的言论给那些赞同五月革命精神的法国人带来了恐慌和不信任，而事实上他们才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押在一个要将法国变成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党上呢。密特朗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建议组成由孟戴斯-弗朗斯领导的包含共产党员在内的内阁政府（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违反宪法的）。他希望以此来让人们误以为戴高乐共和政府的最终出路只能是由共产党接收。此外，那些轻视共产党像轻视戴高乐主义者一样的学生和罢工者也反对这种被当作政治策略的体系。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要提出任何解决方案的意思。一边是不断增强的激进运动，一边是将军在避难所的沉默不语，整个社会陷入了僵局，叛乱的学生显然无法找到突破口。但是由于戴高乐的拖延策略，情况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

革命运动的转折点出现在了5月30日。这一天发生了两件极富戏剧性而又至关重要的大事。一是，戴高乐返回巴黎，并向全国宣布他不会因为压力而辞职。他严厉地谴责了那些合谋意图违反宪法的傲慢的政客，他还声明他将推迟公民复决投票，改组内阁（但仍由蓬皮杜领导），并且解散这场全国性的集会。那场演说充满激情、振奋人心，戴高乐恢复了往日的风采。他的演说使那些犹疑不定的听众坚信共和政权一定会坚持到选举，而且也许会执政

更久。

与此同时，首都的戴高乐的支持者们也从沉睡中觉醒，他们在协和广场组织了许多示威活动，估计人数近百万，比左翼分子5月13日组织的集会的人数还要多。就连这些组织者他们自己也惊讶于这样庞大的场面，他们找回了早已失去的信心。庞大的示威队伍高举着三色旗从协和广场游行到星形广场。这次示威活动是对戴高乐的演讲的最好呼应，它唤醒了大多数沉默的人们，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对动乱的厌倦和对共和政府的忠诚，也使人们作好准备来重振政府往日的声威。此时，戴高乐可以确信无疑：他不是孤军奋战。

### 三

这场“失败的”革命的后续是虎头蛇尾。革命远没有推翻主权，反而使第五共和国比以往更逍遥。局势趋于稳定，政府牢牢掌控形势，逐步恢复其受损的威望，在各省治安委员会的协助下，重申其权威。这些臭名昭著的民事诉讼委员会是由忠诚的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总罢工最终一片沉寂（虽然各地的工人们再次犹豫地拿起了他们的工具），全国的生活又恢复到正常。学生们的态度最后缓和下来。得到了彻底重整大学的机构的承诺，他们被说服撤离索邦大学及他们在拉丁区和其他各省的据点。

接着，人们的注意力又集中到议会选举上。左翼联邦完全放弃了颠覆政府的想法，他们与共产党结盟，却不能就共同纲领达成一致。于是他们就集中注意力搞传统的竞选活动，结果迅速演变为毫无意义的对往事的争吵。在联盟中联系最少的是共产党，它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革命的意图，极不情愿地加入到争吵的行列中。这些托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过去总害怕被左翼思想控制，这增加了他们对无责任心的“政治路线偏差分子”的敌意，作为

恼怒的革命观点的保护者，他们敢于挑战党的地位。只有 PUS，一个持不同政见，支持孟戴斯—弗朗斯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集团，似乎支持年轻的工人和学生的行为。但学生和工人们，遭受了背叛和对斗争失望，沿传统路线进行的一个老式的选举，逐渐失去信心并沮丧地退出这场斗争。

另一方面，在蓬皮杜总理的英明领导下，戴高乐政权度过了难关，并成功地发动了一场严格而又无耻的竞选运动，这是蓬皮杜总理最辉煌的时刻。戴高乐主义者充分利用国家对秩序安宁的渴望，机灵地采用 UDR 作为新党称号——保卫共和联盟。他们反对骗人的“共产主义颠覆”的阴谋诡计和不负责任的青年“虚无主义”，给人的印象是，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共和自由的捍卫者。他们平稳的策略，正如他们所标榜的那样有说服力，在选举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在 6 月 23 日第一轮选举中，保卫共和联盟，独立共和者及他们保守的盟友联合组成的“秩序党”，获得全国投票的 48%，比 1967 年选举了 8%。在野党的选票由 45% 下降至 41%。第一轮投票中，有 155 个代表成功赢得席位，其中 150 人是戴高乐分子，5 人是代表安全选区的共产党人。

第二轮投票是在两周后举行，标志着戴高乐分子大获全胜：在大会中，他们得到了 355 个席位，而总席位数是 478，增加的数量为 113。其他所有党派在选举中严重失利：共产党失去了 39 个席位，降至 33 个席位；左翼联邦失去了 61 个席位，降至 57 个席位；中心 (the Center) 失去了 10 个席位，降至 29 个席位；不幸的 PSU 也失去了它三个所有的代表。在法国所有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党派得到过这样一个压倒性的胜利。

#### 四

通过讨论得出的一些试探性的言论或许可以使“失败的”革命

散发出光芒,不用说,一个真正公平和客观的评价,必须等到目前為止有关五月风暴的更可靠的历史研究的出炉,为之补充大量的有趣的但主要是论辨性的著作。

把整个疯狂的片段归于法国人的变化无常的传统,这当然是诱人的想法。根据这个理论,五月风暴显示出一个国家公然反对任何合理的解释,向往富有浪漫色彩的动荡的倾向。正如在其历史上频繁发生的那样,法国再次狂怒,以与过去相同的方式和风格,宣称其高度个人自由主义。他们的革命传统,一样的强烈地爆发。就在5月初风暴到来之前,《世界报》(*Le Monde*)的一个最能干的编辑,曾警告他的读者说,法国人又感到厌烦了,这与1848年2月革命前夕拉马丁的庆祝辞似乎相呼应。总理维昂松一蓬特暗示,自1958年5月经国民投票建立共和国以来,法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人们都有一种疲乏感和自满感。高压政府,官僚主义的一贯作风,尤其重要的是,这种骄矜和自大的情绪在戴高乐统治十年之后渗入到国家政治制度,使全国都陷入萎靡不振当中。如果在19世纪的法国的政权平均统治时间大约是18年的话,是它过于幻想表明,建议与亨利·亚当斯标榜的“历史的加速度”相符,第五共和国注定要在建国十周年的1968年五月13重新改组?理性的观察者当然应该设法压制这种诱惑,不作异想天开的解释。然而,即使考虑到的可能发生的因素和意料之外的因素,也不能完全排斥民族性的因素,即困惑的历史学家引用的合适的托词,试图给当代不可预测、难以捉摸全国性事件强加一些条理性。

与这值得探讨的假设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的是民族情绪所显示的明显的矛盾。怎么可能使支持5月初早期革命的民意调查的意见与仅一个月后保守的投票在自由选举中的胜利相符?除了民意调查和普选的特征不同——尤其是处于事件过程中有着飞速变化的时间——这个转折点可以归因于大多数沉默和摇摆不定的人越来越渴望法律和秩序的整顿。这种现象绝不限于法国,但是,

正如法国戈盖尔和其他人所表明的那样，它仅需要在法国全民投票中一个小的转变，就足以导致议会中力量均衡的大转变，因为“运动”和“抵抗”这两股力量在选举中势均力敌。然而，即使承认歪曲法国选举习俗固有的因素，民族情感的大幅逆转，仍然有待解释。描述全国的情绪突然变得难以捉摸，但又以法国人性格中反复出现的浮躁形式发生——做这样的尝试很有意义。这样的解释由随后的事件过程证明是同样不可预知的，虽然无可否认，其影响不怎么令人震惊。因为，不到一年后，法国选民否决戴高乐4月的公民投票，赞成一个新的革命计划——“地区自治”和“参政议政”，就是本着同样的精神——他们有点惊讶地发现，这个时候他们已成功通过投票把他赶出了办公室。

把这场革命性质看作与青年和知识分子密不可分，观察家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事实上，尽管有以百万计的成年工人和公务员参加罢工，革命自始至终由善于思考的学生精英、年轻的工人和专业人士进行着。这些巫师的学徒们沉溺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当然是富有诗情画意，不切实际，认为他们有能力把候选人名单清洗干净并建立一个新的更有力的社会秩序，这将使法国免受守旧狭隘及过去遗留的官僚作风之害。新派和老派之间关系紧张——七十多岁的戴高乐与二十出头的科恩-邦迪之间——构成了五月风暴的本质。只有一些积极的少数激进青年能够把握它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事物的性质。学生们向往与工人联合起来，加强工人阶级革命使命感。值得赞扬的是学生，他们促成了总罢工，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危机，几乎把共和国推到崩溃的边缘。罢工者与他们的雇主达成一致以换取物质改善，而政客们也屈从于政府，回复到先前议会派别之争的游戏中。此后，又是这些年轻人坚持到底，继续体现真正的革命精神，直至被他们的盟友抛弃，在斗争中丧失勇气，使他们不再斗志昂扬，于是他们放弃了索邦大学的据点，把它留给了他们的对手。



在古老陈旧的索邦大学，挤满了青少年，他们不让中年围攻者逼近，也许这种印象作为1968年五月最真实的标志，将永远烙印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也表明，五月风暴的意义，应该不仅在这种分散人们注意力的诸如“代沟”这样的口号中寻求，更具体地说，应在法国的教育体系特殊性中去寻求。因为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教育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棱镜，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学校获得的价值观，青春期所承受的紧张和压力，与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法国，“大学”差不多就是它所属社会的翻版，因此情况尤其这样。19世纪初，拿破仑创建了法国大学，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被过度重新设计，它并不只是简单地类似于美国各大学及研究生院，而是通过各种途径，涉及整个国家赞助教育，从学前教育到小学，再到大学实行的高等教育和其他专业化的教育机构。有三个教育等级：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但在中学（公立中学）和大学之间，完全遵照国家教育部长的最高指示进行统一管理。国家教育部长仍然担负着古老和险恶的“大学主席”头衔，绝对控制整个教育阶段——从幼稚园所采用课程的形式到高等院校授予博士学位。在美国以“开放式入学”而闻名，这种做法在高中入学录取严格而大学入学不受限制的国家一直以来是很常见的。其结果是法国大学生数量多得不成比例（在法国有60万名大学生，而与之相反，联邦德国总人口约5000万，大学生人数为25万）。集中于首都的这次巨大的风暴，得到大批青少年的支持，人数迅速膨胀起来。公立中学的造反与拉丁区发生的事件相比，虽显得黯然失色，但是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在索邦大学被占之后，巴黎和各省的很多中学也被查封了，在这些朴素简陋的楼房里，大批很守纪律的青少年叛乱分子，受他们自己的革命行动委员会鼓动，使大学的战友们革命热情迅速高涨。

整个正在崛起的年青一代精英，不仅仅是大学生，拒绝接受当

时的政治体制和传统的道德观，因此它比起孤立的美国类似的情况，比如柏克莱或哥伦比亚大学所发生的事来说，是一种更广泛的现象。通过类推法来证明的方法是不可靠的，但如果麦迪逊大学、柏克莱分校、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建立联盟，在一大批强大的高中学生队伍支持下，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一旦释放，美国人可能会不寒而栗。学生们挑战当权派，当时国家因总罢工引起经济的瘫痪，处在混乱时期，总统抛下了白宫飞到夏威夷。此外，学生暴动将其进攻力量集中在仅仅一个城市例如芝加哥，这个设想如果成为可能，那么通过这个富有创意的类比，美国读者可能会体会到巴黎造反的一些真实意味。由于法国教育机构的权威性与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几乎完全符合，“学生的权力”运动是能够在该国不满分子中反叛分子找到支持者，他们渴望同学生在教育改革方面所提出的相同的自由。

学生的反叛目标，因此从当前的狭隘的怨气迅速地改变为对社会和政治的更大意义上的不满，从而也把他们微薄的力量转化为一个不可抵挡的革命狂潮，其目的在于抗议整个国家和社会机构。当“学生的权力”这个标语的意义扩展为全面攻击平庸的消费社会和权力集中的国家的暴政时，他们自然会在工人阶级中找到同盟军。虽然证实了这些有组织的工人，最终把他们的物质福利——更高的工资和缩短工时——凌驾于他们革命使命的诱惑之上。但学生所树立的榜样，在他们更为坚强的领导人身上并未完全丧失。工厂的无产阶级与享有特权的资产阶级分子联合起来的场面就显得不大协调。但两支力量联合的做法很有感染力，很快，这两支力量的结合对五月风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众多的先行者成为未来的领潮人。这虽是极短暂的联合，但达到了瞬间的效果。基于这个原因，毫无疑问，五月风暴其中一个主要经验是，它表明了知识分子同手工业者（极其傲慢的法国人区分方式：把脑力劳动者与手工劳动者区分开来）自古以来的一个鸿沟，被有效地

跨越了，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之中，因为他们怀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想，超越了过去的僵化的阶级划分。

虽然受到特定时刻的特定国家的限制，但当年轻人所引起的世界危机在西方世界的种种迹象显示出呈扩散的形势的时候，这一类现象不能完全忽视。风暴释放的巨大的能量正好为我们这个时代困惑的人们指引道路，也可以为受资本主义祸害的人寻求一条路线。我们能否大胆地猜测：五月风暴将来某一天会被准确地描述为一个失败的开端，而远非一场“失败的革命”？

文主手國中崗畫岩卷的

## 巴黎红卫兵：

# 1960年代法国学生的毛主义

朱利安·布金

朱琮 译

法国对毛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接纳证明了这一规律：夸大其词、误读和非故意的压制通常会伴随文化内容从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传到另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过程。从1920年代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但法国毛主义是一项活跃了不到15年的边缘政治运动，学生激进分子和知识分子先锋派是此运动的主要推动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本人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警告，他反对其他国家在没有考虑当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情况下，盲目接纳毛主义。毛主义是用来效法而不是用来模仿的。中国自身在接收西方马列主义的时候已经有过这方面深刻的教训。

### 向外传播的中国毛主义

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中国革命经历了几大阶段：从20年代内战和反土地封建主义，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到三十年代反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到战后非殖民化时期在第三世界中处于领导地位，尤其是1956年后与苏联开始对抗，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再到与西方——1964年与法国，1972年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上述历史经历体现了中国毛主义的一些核心宗旨：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与反帝国主义是一致的；战争不可避免，革命必然暴力；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中国社会主义之前，前者欢迎非无产阶级成分参与到革命中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必须走他们自己的既非西方也非苏联模式的道路。

在去殖民地化和苏联“去斯大林化”的特殊背景下，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革命传播呈现出一种新的迫切感。在不断强调走有中国特色道路的同时，毛泽东逐渐开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范例在全世界加以推广。而与此同时，外文版的毛泽东思想从北京向外迅速传播，这为世界了解毛主义创造了机会。1962至1968年期间，法国出现了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向外传播的毛主义哲学和策略的众多要素中——包括民主集中制、对儒家人道主义的批判、自我批评、富有创造性的人民群众、出色的意识形态斗争——需要强调的是革命暴力性和“调查研究”对法国学生的毛主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革命暴力性主张不仅来源于中国内战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经历，也是对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展作出的回答。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伴随着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随着赫鲁晓夫发起的去斯大林主义的计划升级，中国人民谴责苏联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开始与西方和平共处，开展自我批评的能力也有所削弱，苏联已经被反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义”维度所迷惑，而最严重的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劳动分配问题，资本主义重新出现在苏维埃内部。因为苏联向西方进一步靠拢，中国人民宣称自己是马列主义真正的继承者——这是多少有点虚伪的声明，因为中国同时也相继与法国和美国建立了友好关系。然而，毛主义声称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占领，而中国和第三世界则寄托着社会主义希望。这样就存在两

种矛盾：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革命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主要和次要矛盾。对敌人要暴力，对朋友要民主。

马列主义认为革命势必会造成严重伤害，这种观念需要进一步详细论述。但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能找到的毛泽东关于革命暴力的许多文章都是写于30至40年代，也就是中国内战和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期。一些著名的口号也是在这段期间提出的，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38），“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高形式”（1936），以上小标语都摘自《红宝书》的“战争与和平”部分。毛泽东关于战争主题的大部分文章写于30年代，有关和平主题的大部分文章——社会主义者热爱和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是必然的，帝国主义制造了战争——写于50年代。毛泽东在内战时期对具体的军事区分进行了详细阐述——比如游击战和革命区的区别，人民解放军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想法，而这正是其所要巩固的。军队的失败能巩固其战略的信念——这些都必须铭记于心并加以运用。战后对暴力性的再肯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高潮，而“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毛泽东“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下开始的。

如果暴力是用来对付革命敌人，那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另一套战略。在此范畴内，赋予知识分子角色对法国毛派来说尤其重要。毛主义在以下两方面保持了张力：一方面是典型的马列主义者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怀疑；另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可能成为有影响的革命力量的认识。尽管后来，“文化大革命”宣称热心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是声名狼藉的革命敌人，并对他们进行了镇压，但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对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进行双重关注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潜在的中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典范就是马克思本人，他在具体而特殊的经验和这种经验所提供的理论教训之间辩证地挪移。辩证唯物主义认知论在形

态上与苏联有所不同，它是革命的实用主义和解放的经验主义。知识分子战斗计划的一个基本范畴就是“调查”，而这点毛泽东在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进行了详细论述。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就直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调查是为了获得知识进而为革命斗争服务。毛泽东指示调查研究者召开“实情调查会议，并且通过讨论进行调查研究”，相关群众要包括在内，要准备调查表，直接参与到调查研究中并作好笔记，针对“具体地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为将来累积可供借鉴的教训。

1941年毛泽东再次肯定了调查研究原则，他告诉潜在的调查研究者，“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一些法国的学生毛派满怀激情追捧知识分子要虚心的号召，“人民群众”是“富有创造性的力量”；群众知道得更多。调查研究理论与“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甚至“民主集中制”的战略范畴轻松达成了一致。无论这些年，这股思潮在中国是否真正付诸民主实践，但至少在理论上，调查研究在群众代表中都是一个实践；从理论上来说，宣称代表人民的那些人可能是错误的。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员需要理解人民，为了理解人民，我们必须同人民交流，倾听他们的经验，而反馈回来的经验能使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然，这种

民主的推动力属于更广泛的覆盖定律，也就是马列主义政党指导革命的阶级方针。

毛主义传到法国后，结出了不同的果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68年以后，暴力修辞及其广泛的象征性实践对法国毛派来说非常重要。而“调查研究”这个范畴，完全是无意识地为70年代的法国文化政治从马克思主义到民主实践的转变作出了贡献。20世纪早中期，毛主义理论的很多宗旨对法国左派激进分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 法国毛主义：形成过程

1960年代末，新闻记者皮埃尔·何文提出了一个幼稚的问题：“法国共产党内有一天是否会出现中国的不同政见者？”两年以后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法国共产党在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产生冲突的同时和苏联结成了同盟，这为在法国开展毛主义运动打开了大门。在许多法国共产党员的眼中，这个同苏联的结盟是对法国共产党可信度的最新打击。1956年匈牙利事件给党带来了混乱，而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无所作为的立场严重破坏了它的感召力。二战期间同党有过斗争的一些好战的共产主义者，对通向社会主义的太平洋议会路线感到不满，法共对赫鲁晓夫的支持恰恰暗示了这一路线。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令人不满的因素的存在，1963年形成了第一个马列主义社团，他们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探讨，并寻找在法国维持马列主义原则的方法，来应对法共中的修正主义者向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一些中坚的好战的共产主义者眼中，毛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为武装斗争提供了支持。

1960年代，法国毛主义有两个主要分支：学生及来自法国共产党内的稍微年长的异见者。虽然学生在历史上更加引人注目——



1968年前后几年他们在文化政治和理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后者，“成人”分支也值得一提。1963—1964年，法国少数“亲华”的好战者消失了：1963年9月到1964年12月，刊物《革命》发行，1963年10月创立了短暂的“法国—中国平民协会”。

1963年11月在马赛发行了第一版《文献研究圈》，1964年1月在克利希发表了马列主义调查公报。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之后几个月里，亲华倾向的形势发生了改变。法国共产党和毛派开始在国内重启了中苏之间所经历的顽固的对抗立场，因为中国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开始接触，法共严厉地批评毛派。1965年的总统大选中出现了明显分歧。法国共产党及其学生联盟，UEC（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下文简称UEC），支持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反对查尔斯·戴高乐。克利希市1964年后期成为了“法国马列主义中心”，它支持戴高乐，因为坚信戴高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提供了最现实的防御。“法国马列主义中心”于1968年垮台。而马赛社团1964年7月带头组建了“马列主义者中心联盟”，并且于1965年2月开始发行报纸《人道主义新闻》，它反对双方候选人，意图在选举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对密特朗在维希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攻击。联盟的名称和机构还经历了两次改变，1966年6月变为“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67年12月又成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从1967年到1976年，这个政党是法国所有马列主义政党中最列宁主义的政党之一。他们支持贝乐登·菲尔兹所称的“等级制的毛主义”，换言之，他们承认了马列主义的一个观念，那就是高度纪律性的中央集权的政党，并试图按照这些思路来建立组织。1968年，他们转入地下，在随后几年里，他们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968年事件之后，UEC思潮得以继续生存，法国共产党在1956年组建了UEC，用来检验非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日益增长的力量。但是1963年之后，UEC和其创始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共产主义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派学生坚持法国共产党的路线，还有一

派学生是成分更加复杂的毛派、托洛茨基分子以及意大利同情者（后者走的是帕尔米罗蒂·陶里亚蒂所制定的路线，陶里亚蒂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于1964年去世）。同年3月，在第七届UEC大会上，“意大利派”成功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呼吁UEC从法国共产党里独立出来，号召支持最大的非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法国全国学生联盟。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试图阻止UEC月刊《光明》的印刷，并企图让UEC同另外两个默许法共指导的学生联盟结盟。1964年10月9日，在一次募集资金的公众辩论会上，学生进行了挑衅，并赢得了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支持。

《文学何为？》一书一售而空。然而，通过施加压力和驱逐一大批人，1965年初法国共产党收回了对UEC的控制权。“意大利”派系脱离了党并随之解散（尽管这股思潮的一些成员——比如罗兰·卡斯特罗，谢尔盖·朱里和马克·克拉夫兹——在1968年五月后成为毛主义阵营的重要人物）。1965年10月，托派分子接着开始罢工，最终于1967年3月在索邦组建了“青年共产主义革命”。在高等师范学校ULM中心的领导下，毛派与UEC共进退。在1965年3月召开的学生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派支持法共路线，反对意大利派系和托派分子，从而为其在UEC全国委员会和刊物《光明》的社论公会上赢得了很多要职。在一些新加入的前任UEC成员的眼中，这就意味着“斯大林主义者的操纵”。这或许是正确的，但它符合这样一个战略，既在党内保留职位，同时也努力推动党超越其当前的修正主义末路——这正是路易斯·阿尔都塞明里暗里所倡导的策略，阿尔都塞任教于ULM大街上的高等师范学校，他影响了众多的毛派。

## 阿尔都塞和毛泽东

路易斯·阿尔都塞生于1918年10月，1945年10月进入高等

师范学校学习,1948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从阿尔都塞1945年进入学校学习直到1980年11月16日——这天在一次精神崩溃中他悲剧性地掐死了自己的妻子,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阿尔都塞长期的精神压抑在他杀害妻子的时候达到了极点,这点虽然很重要,但它并不是我们要关心的内容。当然,有一点应该简单地进行说明,那就是1960年代他在法国发起了重读马克思的运动。虽然阿尔都塞精神上长期压抑,但是他仍然在法国最优秀的学校里教哲学,仍然是法国共产党成员。直到1990年阿尔都塞去世,他从来没有脱离党。

对他的很多学生来说,阿尔都塞60年代初提出的“问题论”是两个方面的:第20届代表大会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的破裂。换句话说,就是法共的反斯大林化或者“修正主义”。在阿尔都塞留下的关于孟德斯鸠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作品中,他对基本理论的贫困作出了回应,而这点他认为正是二战后法共的特点。

这种理论贫困的特点,一方面是斯大林的经济主义或者“背离”,这低估了持续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1956年后党的理论家的人道主义,代表人物有罗杰·加洛蒂和路易斯·阿拉贡(法国剧作家),而他们正是受莫斯科赫鲁晓夫的领导。尽管只是在70年代阿尔都塞才发展出了他的经济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但他在十多年前就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运动——比如它们引发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基督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虽然这种判断可能意味着向斯大林主义正统学说的回归,但就阿尔都塞而言,这并不确切,因为在他看来,斯大林主义相当复杂,而且在60年代早期和70年代中期这段期间,变化非常大。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过分依赖无意中为赫鲁晓夫的人道主义的修正主义铺设了道路。因此阿尔都塞号召回归马克思本身,重新校正党的理论

和政治机器。

众所周知，阿尔都塞提出了尖锐的“认识论断裂”——这个范畴引用自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早期的马克思深陷于人道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陷阱，后来的科学的马克思发现了阶级社会的科学。这二者充满了断裂。正是因为对理论的强调，阿尔都塞才发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同。就像他后来回忆起他反对马列主义神圣化时所言，“客观地说，在党的内部，除了纯粹的理论干预，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都是不可能的”。阿尔都塞将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经济的诉求作为一种“经验主义”加以拒绝，他区分了科学和概念的知识（即他所说的“理论”）和利益相关的具体知识（即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被人道主义所例示，而理论则被反人道主义所定义。阿尔都塞后来回想道，“在自我满足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名下的任何人或任何党派都意识不到，只有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才能为真正的实践性的人道主义辩护。”阿尔都塞反人道主义的特点虽然短暂却值得回味：“最终，这是我要回归的一个务实的共产主义定义，一个根除了所有市场关系的人类共同体。”

阿尔都塞与毛主义的关系，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有一点很明确，这个关系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跟结构主义方法或者雅克·拉康（法国精神分析医生）的精神分析理论一样，毛主义也只是阿尔都塞偶尔使用的手段（出现在恰当时间和恰当地点的手段）——它旨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人道主义和经济主义之外用马克思的文本进行思考。

对阿尔都塞来说，毛泽东为他提供了历史例证，证实了他的理论规划，同时也回应了别人对他哲学唯心论的批评。不仅如此，毛还给了他概念工具，使他竭力争使法共摆脱人道主义。毛泽东认为政治和经济革命不一定会伴随着意识形态革命，发展过程也并非均衡的——这点斯大林没有提到过——这对阿尔都塞很有吸

引力,因为它允许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长期阶级斗争。他最有名的文章《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69)清楚地表明了这点。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理论的实践在此达到了顶峰。早期的毛主义对儒家人道主义支持封建秩序进行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毛有时候还策略性地求助于儒家思想。这与阿尔都塞对西方人道主义的类似批判相呼应。

阿尔都塞早在1953年就开始引用毛泽东思想。1963年10月,在法共中央委员会大会上,正统哲学家吕西安·塞非对阿尔都塞所谓的毛主义进行了攻击。在阿尔都塞去世后发表的对塞非的回应中,阿尔都塞提到毛泽东的文章有伟大的理论价值。即使对中国的政治分析受到误导,毛泽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一点在1962年就得到了论证。在他1972年6月写给约翰·刘易斯的回复中,阿尔都塞总结道: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4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整个历史,历史上唯一现存的(留下来的)对已经发现的“斯大林式的背离”基本原则的批判,是中国革命的具体批判、在阵线上、实践上,原则上和形式上都进行了批判,这是无声的批判,来自远方的批判。来自幕后的批判。它需要更仔细地观察,需要解释,而且,仅仅因为行动和文本之间的不平衡,这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批判。无论怎样,这是一个能从中吸取教训的批判,它能检验我们的假设,即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历史。

196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对“理论的实践”的强调达到了高潮,但却轻视了毛泽东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性关系。1967年之后,部分地受到他的学生的影响,阿尔都塞对他的夸张的理论升华作了自我批评,而更正视行动和文本之间的失衡。尽管最后,因为阿尔都塞坚决拒绝脱离法共,他对毛主义的拥抱受到了限制。拒绝

脱离法共使得阿尔都塞的位置很尴尬，他想从内部来改变法共却毫无成效。虽然法共内部能够很不容易地接受炮声隆隆的异见，但对阿尔都塞的许多学生来说，他的党籍让人难以接受。

## 乌尔姆街上的学生

阿尔都塞 ULM 街上的学生对他的科学的理论化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他至少为学生在斯大林正统派学说之外的另外探索打开了绿灯。尽管，阿尔都塞的影响最终包括两种方式，并且还包括多种视野的交融，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去同意马克·波斯特 的观点，即阿尔都塞的学生在其教学过程中找到了毛主义的灵感。事实上，随着学生不断地探索毛主义，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发展。他和学生的思想彼此辩证地推动，直到彼此产生观念上的冲突，正如阿尔都塞回想起那时的情况，

我确切地记得这三个人，皮埃尔·马舍雷，巴里巴尔，弗朗梭斯-雷诺，1963年1月来办公室见我，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们解读马克思早期的作品。由此可见，并不是我主动在高等师范学校谈到马克思，而是应部分学生的要求。我们最初的合作开始于1964—1965年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创立于1964年6月。巴里巴尔、马舍雷、雷诺、杜豪、雅克-阿兰·米勒，以及雅克·朗西埃等人都出席了这个研讨会。1965年整个夏天我们都在研究《资本论》这本书。新学年一开始，我们最信任的朗西埃同意承担最困难的部分——我想说的是没有他我们会一无所成。

马舍雷1958年进入高等师范学校，紧接着罗杰·伊斯塔特

(1959)、巴里巴尔和朗西埃(1960)这几个人也进入了学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成了年长学生的核心。他们的追随者是一批既有共同之处又有着很大区别的同行,包括让-克洛德·米尔纳(1961)、雅克-阿兰·米勒(1962)、雅克-布罗埃(1964)、多米尼克·拉库赫(1965)和本·利维(1965)。

这是惊人的集中。大部分年长的学生——只年长几岁而已——专注于出版著作,而大部分比较年轻的追随者——很快有其他人加入其中,像让-保罗·多勒、克里斯地·里斯,雷吉斯·德布雷和奥利维叶·罗兰——以激进分子的身份更加热情地参与其中。1964年1月,ULM 社团投票决定接受北京的指示,而这给 UEC 增添了混乱,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1964—1965 学年,林赫担任了社团的带头人。1964 年夏天他在阿尔及利亚待了几个月,对一些读本已经非常熟悉,他本人对毛泽东的兴趣也得到了充实,而这些读本在当时的法国是无法看到的。

1965 年 2 月 1 日,ULM 社团第一次出版了《马列主义请愿书》,里面有米勒、米尔纳、朗西埃和林赫的稿子。后来的版本反映了理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性,对第三世界斗争的合理性也逐渐加以肯定,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越南的斗争。那年春天,UEC 开始感觉到 ULM 社团带来的影响(3 月份召开的第八届 UEC 代表大会有关的一些事件)就好像是如鲠在喉。“忠实于他们的主人:阿尔都塞”,布塞亚写道,“毛派绝对不想要分裂,却梦想着能掌控共产党内部,使其重新布尔什维克化,把它变成一个革命编队。”1965 年 10 月,UEC 的刊物《新光明》公开发行,这份刊物暂时由 ULM 控制。11 月,阿尔都塞发表了以“保卫马克思”为题的关于马克思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他写于 1960 年 12 月至 1965 年 3 月之间。也正是在这个月,在与法国 Maspero 书店合作的同一本选集里,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伊斯塔特、马舍雷,还有朗西埃一起——在 1964—1965 研讨会作品的基础上,发行了两卷本的《阅

读《资本论》》。党内的理论煽动提上了议事日程。

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1965年ULM社团在UEC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思想得以自由地传播发展。”这是阿尔都塞对这段时期的评论。因此,不受控制的事情常常按自己的规律发展。理论教育的方案开始盛行,在巴黎所有大学建立起来的理论学派中,出现了阿尔都塞和他学生的思想。阿尔都塞主义成了左派学生中一个名副其实的现象,这些学生正好出生在生育高峰期年代,因此人数众多。他们支持党。而党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作出的反应令人作呕,党似乎也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事业,这使得党在抵抗运动中的神话角色开始显得苍白无力。法共与第五共和国和解意味着其与资产阶级甚至是宗教文化开始和解。

回归马克思、理论优于实践、反人道主义的呼吁——这些都成了重建革命事业的普通语言,而此时革命事业已经偏离了方向,正如波斯特所描述的,“任何人都被欢迎登上马克思主义大船——用人道主义鲜亮色彩重新给大船上漆”。毛主义象征了法国马列主义刀刃,代表了回归(和迈向)阶级斗争的欲望。文化是争论的温床,不仅因为政治前行道路受阻(连阿尔都塞也承认这点),还因为法国以前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分明,而这正决定着政治倾向性,同时也明确暗示着知识分子的立场。学生对这个事实相当了解。举个例子,整个1960年代,法国大学学习的主要模式——古典主义——巩固了当时的政治现状,把乏味的教师教学分类延伸到相对封闭的等级制度的大学,再延伸到整个国家,而这种教学模式又主导着大学。古典主义和人道主义息息相关。对ULM的阿尔都塞学生来说,反人道主义是知识分子的另一种选择,意图在政治运动中将其推向高潮。1965年的理论学派中,阿尔都塞总结道:“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政治影响是存在的。”



1965年底，ULM社团拒绝参加总统大选，这种政治影响开始发挥它的作用。在UEC眼中，中立或许已经表示了其对密特朗的排斥。1966年1月，面临着新的压力，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从UEC的全国办公署和全国委员会辞去了相应职务。同年同月，米勒、米内尔、马舍雷与《马列主义请愿书》决裂，创办了《分析陈情书》（法国第三议会），选择把焦点集中于拉康思想而不是毛泽东思想。同月，阿尔都塞主义在choisy-le-roi由共产主义哲学家召开的大会上再一次遭到了谴责。尽管阿尔都塞本人当时没有出席大会，但是马舍雷受到加罗蒂的当庭攻击而备受煎熬；虽然，马舍雷此后也非常惊讶，他会受到如此公开的挑战，这次小冲突对3月在阿让特伊召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法共大会来说，仅仅是个序幕，伊利亚特评价这次会议“意味着理论自治的末日”。3月15日，法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决议，简而言之，既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基础进行了肯定，并且对理论的实践的观念进行了指责。阿让特伊和阿尔都塞一样处在官方批评的风口浪尖。“大会后的第二天，”阿尔都塞回忆道，“我非常惊讶地收到一封来自加罗蒂的电报，上面写着‘昨天你失败了，来见我，我是不会去见你的。’”三个月后，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告诉阿尔都塞，阿让特伊跟他一样，也是反对加罗蒂的批判者，他们对人道主义或许可以少些关注。

1966年，30个左右的ULM学生进行集会，他们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相当敏感，并且接受了名为“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进行修改吗？”的文本，这篇文章部分由贝宁·勒非执笔，并于4月发表。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人道主义，文章开篇写道，接着文章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这个观念带来的不利影响：文化和知识分子，科学和革命，道德和基督徒，以及意识形态和统一。这份带有嘲笑意味的文章，先引用了法共决议中的部分内容而后又加以评论，文章的特定目标正是阿拉贡。文章指控阿拉贡错误地划分了以下两

者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是“文化”，总的来说是从人类灵魂广阔的创造性运动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垄断。对阿拉贡来说，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必须参与到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战斗中。他的号召与马列主义论点恰恰相反，就像某些法共的忠实随从那样，即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阐述这种政治文化，马列主义也认为知识分子已经处于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对立面。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呼吁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背道而驰。争论者嘲笑阿拉贡，取笑他“揭开马克思的躯壳，你会发现黑格尔，再进一步，你会亲自来到18世纪——但是阿拉贡的指甲不够长挖不到那么深”。马克思躯壳之下，空空如也。马克思的科学正在于它同一切先前的东西决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次革命。试图恢复它的不幸的人道主义残余，只能是同它的具有科学本质的革命相违逆。这样的努力只能以意识形态和折中主义的结局而告终。什么是科学？“与意识形态决裂的理论”，这就是经典的阿尔都塞。

决议下一个攻击对象是法共，因为，法共愿意在某种“道德共识”的基础上与基督徒展开对话。ULM中心引用列宁的话，声称共产主义者唯一认同的“共识”只是阶级团结的共识。工人有共同的阶级斗争，无论他们是否信仰上帝，也无论有无产者和基督徒之间是否存在道德上的统一。工人和基督徒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因为“在经典的意义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后意识形态。法共对人道主义和宗教对话的支持，在ULM最后的批判中达到了高潮，即法共选择了卡尔·考茨基的社会民主，而不是列宁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为了在选举议会政治中巩固其地位，法共向社会主义者寻求一致；这正是修正主义的坟墓。UEC和其父辈组织一样也在犯罪。同样地，它也缺乏组织“纪律”和理论“纪律”，错误地强调年轻人的整体而不是阶级差异，在越战中错误地倡导谈判而不是武装斗争。法共/UEC为此已经作出了政治牺牲，因为他们已经作出了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牺牲，而这又源于理

论牺牲。与之相反的是，马列主义者维护一个基本的区别：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区别。

ULM 的学生 1966 年 4 月承认了这个文本，并于 7 月 14—16 号在昂德莱希重新会面。大约有 60 个人出席了会议。阿尔都塞本人没有参加会议，就是否要在大会上宣读他写的一份声明，大家产生了争执。围绕着是否要加入到 6 月末形成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展开了讨论。（这点前面有过论述。）回答是一致的：不！法国共产主义运动被认为是反知识分子、斯大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据派特瑞克·凯撒尔的说法，昂德莱希会议上的长期目标就是组建一个独立的党，同时把焦点集中在 UEC 内部的斗争和一些深层次的“理论构成”上。UEC 和 ULM 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决裂发生在 11 月末。12 月初《马列主义请愿书》发行了第 14 版（1966 年 11—12 月）。此版本谨献给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都塞为此特别写了一篇没署名的文章。在昂德莱希，人们只有从西方的新闻报道中才能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直到 8 月份，学生才知道一些零星消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消息坚定了他们的想法，通过回归到更“本真”的马列主义来拒绝过度的修正主义。此时，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更自觉的毛主义中，找到了令人惊奇的友善的同盟者。1966 年秋天，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和毛派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攻击，二者汇聚在一起，使 ULM 人脱离了 UEC。

从 1965 年 2 月到 1966 年 10 月，“高等师范学校共产主义学生团”开创了《马列主义请愿书》，从 1966 年 11—12 月的第 14 版，到 1968 年 5—6 月最后出的第 17 版，小标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下文简称 UJC [ml]）。新组织——UJC (ml)——1966 年 12 月 16 日由上百人组建而成。UJC(ml)的创刊文章强调了以直接的理论斗争来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白痴”；建立列宁主义形式机构强调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以及中国和法国马列

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基地是支点。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阵线是在各地亲自进行斗争和组织的马列主义者。一股革命力量，有着正确的领导和坚实的基础，因而是无敌的。

没有脱离法共的阿尔都塞继续发挥着其重要影响，而此时一批好战者仍然抱着回到法共的希望。阿尔都塞“隐蔽的”毛主义得以继续传播，举个例子，1967年7月在圣洛举行的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发行一百周年大会的学术讨论会，成了阿尔都塞主义者和雷蒙·阿隆追随者之间的一场对话。

然而，阿尔都塞拒绝脱离法共成了一条分界线，1967年这条分界线越来越持久。阿尔都塞本人对于UJC(ml)非常苦恼：“ULM群体和其朋友主动与党断绝关系，这让他们感到非常高兴。我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的行为像孩子，而不是政治行为。但是他们已经行动了。”他批评自己的学生，就像后来批评1968年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一样，犯了“左倾幼稚病”。然而，UJC(ml)成立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阿尔都塞开始批评自己对于理论的绝对强调：“我提出了那个赫赫有名的哲学定义：‘理论的实践’这一理论。但是在受到雷吉斯·德布雷，尤其是罗伯特·林赫的批评之后，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观点。他们真正了解什么是政治行动及其重要性。”阿尔都塞的一些学生与老师决裂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不知不觉也走上了教育掌舵人的位置。

## 进入1968年五月

从1966年12月成立到1968年五月风暴这段期间，UJC(ml)

面临着两个重要事件。其一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1966年第一个越南基础委员会形成,到了1967年3月,很多反战组织开始认同UJC(ml)(与之相反,相对应的越南全国委员会却与托派分子和统一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密切)。在第三世界主义者浪潮这一更广阔的大背景下,法国毛主义茁壮成长,对他们来说,毛泽东、胡志明、卡斯特罗,以及巴勒斯坦人都是象征。克里斯地·里斯把1960年代第三世界主义者同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左派力量联系起来。当然,美国对越南的占领,以一种来自远方的理论和技术,大大地刺激了激进分子。

UJC(ml)面临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努力把工厂里的工人组织起来。ULM必须同法共和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竞争以吸引工人的注意。对工人的关注这一转变,将UJC(ml)的领导中的阿尔都塞式的理论倾向同实践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推向了前台。在内部,组织通过频繁的自我批评来处理这种冲突,如果实践失败,就归咎于理论不够充分。然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保持警醒,这种趋势又自然而然地伴随着知识活动。或许有人认为在70年代法国理论无休止的自我反省中,这种毛主义的敏感性最终会得到体现。出于同样原因,1967年夏天,离开高等师范学校精英的庇护,到现场和真正的工人阶级互相合作,这一努力使UJC(ml)第一次对毛主义策略进行了实质性阐述:呼吁进行调查研究。

1967年7月1日UJC(ml)共青联(马列)——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发行了第一期报纸《为人民服务》,随后,UJC(ml)第二次全国大会(1967年7月14—16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大地重述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

与知识分子自发主义相反,马列主义者对法国社会现实各方面的分析,需要进行耐心而具体的调查研究分析。这是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政治阵线,

对现有状况进行局部分析，把计划的各个部分逐步落实到位。但是出于我们情况的特殊性，调查研究似乎要求有另一种基本的价值。通过它，我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如何把我们自身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光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还不够。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鼓励他们进行组织是一项长期的冒险事业，而我们也有遭到反对的危险。

关键在于去向工人学习。他们目前的状况和经历是什么？谁是先进分子？人民群众基础是什么？什么是合适的政治路线？20年代初在中国农民中形成的无产阶级民主策略，1967年八九月突然出现在法国，而此时 UJC 激进分子正深入到法国各省份和工厂，向工农群众学习。一些好战者也到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或许是因为绝大多数 UJC(ml) 成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愿意为其调查研究的对象——普通大众说话，很明显没有人谈论民主集中制，而是团结在毛泽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标语下。这些知识活动的特点是，人类学方法论，对阶级立场的忏悔，追寻民粹主义的法兰西，这就是 UJC(ml) 调研特征，并有助于 UJC“去中心化和流动”的组织形式。对法国的革命行动来说，这种调查研究是认知真正的历史可能性的方法。从历史上追溯法国革命行动发生的可能因素。贝乐登·菲尔兹作出以下评述：通过参照调查研究的方法——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UJC(ml) 不仅能够了解工人，也能了解“第二范畴”，即学生、资产阶级、小农场主和佃户。换言之，UJC 要不耻下问。

中国毛主义中的类似于自我抹杀和自我批评的另外一些方面——即“谦虚”——也隐含在这种立场中。人民群众应该有发言权的信念也是一次重要的民主推动。1968年后，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彻底垮台，毛主义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以上这些品质也都包含在内。1967年10—12月，调查研究小组回来参加学术年

会——让—吕克·戈达尔关于毛派的电影《中国姑娘》于9月份上映——UJC(ml)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校正运动。UJC(ml)的指示和那些深入到田间工厂的人产生了矛盾。ULM领导重点强调理论纯化，其残留的阿尔都塞主义，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愚昧，而备受攻击。针对这种严重妨碍了政治路线的不合时宜的顽固，必须严格遵循毛的文本。“UJC(ml)需要民主集中制”，它介于两者都声名狼藉的理论主义和自发主义之间。它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长期目标，也是调查研究过程的冒险。1967年12月的一个文本声明可以通过“群众宣传、人人参与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相结合”的办法达到UJC(ml)内的民主集中制。前UEC成员已经经历了法共组织严密的控制，被民粹主义根基剥夺了政治上的自主性，并且对毛泽东的著作保持忠诚。这被菲尔兹称为无等级制度的毛主义。1965年到1967年初的阿尔都塞的知性主义——理论先于实践——被通向实践的手段“调查”所破坏。理论一旦从ULM高墙中得到解放，它就必须考虑法国农村和工厂的现实，以及那些不可避免的麻烦。

1967年秋天，越南基础委员会运动日益激烈，随之而来的是UJC(ml)街头运动日益激进。1967年11月20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吸引了300多人前来庆祝越南“全国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1968年2月7日，UJC(ml)防卫队和右翼团体“西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2月12日，越南基础委员会的一批积极分子在南越南大使馆大闹一场，并把全国解放阵线的旗子挂上了大使馆的旗杆。1967年秋天和1968年春，UJC(ml)对越南问题过于关注，加上自身内部又发生内讧，以至于彻底错过了无政府主义学生在巴黎大学南泰尔校园中发动的第一次惊心动魄的反抗。

4月30日，越南基础委员会攻击了南越南的右翼大会，接下来，“西方”对南泰尔进行了反攻——这直接导致了5月2日校园被关闭。这就直接促使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个月UJC(ml)被彻底忽略。

## 结束语

1968年法国学生毛主义短暂而又如火如荼的历史是另一段历史。1968年10月,在宗教自我批评时期后,UJC垮台。其中的大量成员加入了“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这是1967年11月成立的秘密的边缘性的毛主义政党。留下来的UJC成员,包括ULM核心成员成立了“左派无产阶级”,它为五月风暴中反权威主义派别创造了空间,此外,它也和1968年学生组织中最受欢迎的团体“三二二运动”合并了,此后,它成为五月风暴之后激烈的政治文化骚乱中最主要的力量。1974年,它自动解散,这也象征着这样一个时期的结束:法国妇女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诞生;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中的“欲望机器”;恐怖主义的逢场作戏;以及极左派活动的其他表现方式等。

“左派无产阶级”是1970年代初政治暴力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其巨大的象征性和短暂的成就,表明了中国毛主义的某些方面在法国的不可移置性。法国极左派革命暴力的修辞在1968年后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法国从来没有经历过70年代像意大利、德国甚至美国那样的政治暴力。本文开篇,我把暴力革命视为毛主义对法国产生意义的两个重要因素之一。毛主义的修辞和法国暴力革命策略的重要性,恰恰是它们最终的不适用性。尽管法国毛主义暴力的末日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得以展示,但是只要提及这些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在中国种植的种子没能在1968年后的法国发芽就够了。再多的辩证技巧也不能废除现实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对毛主义有力的或许是决定性的接纳,也是局部的,有选择性的。

另一方面,法国毛派对调查研究策略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有效的,这无意中也鼓舞了公民—社会的实践。左派无产阶



级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单个的流动的工人阶级,而是无数社会团体: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解放者、高中生、军人、移民、早期的生态主义者,等等。简而言之,毛主义调查研究的方法,与一个不适时的事实相冲突:这就是新左派由不同利益团体构成,这些团体的解放目标有时候相呼应,有时候又相互冲突。毛主义者的调查研究,最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法国监狱信息小组,1971年2月由米歇尔·福柯创建成立。在“左派无产阶级”边缘上组织起来的监狱信息小组把调查研究指向了新的方向,他们在法国监狱里分发调查表,把狱内不堪忍受的状况向大众公布。法国监狱信息小组并没有把自身定位于革命的历史哲学中,相反,它的实践却遵循1968年后直接民主的特质。调查研究产生了信息,而信息本身是可以在斗争中运用于战术的武器。当然在没有历史哲学骨架的那个年代,如何定义和指导战斗是成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法国监狱信息小组为70年代法国文化政治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作出了贡献。

1989年后,起主导作用的新自由主义必胜信念认为,马克思主义衰退是因为其野蛮压倒了解放一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的衰退的另一个要素是它内部的矛盾。但是,像马克思曾经声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一样,法国学生的毛主义的矛盾不知不觉中也结出了另外的果实。调查研究的革命方法最终更新了直接民主实践,这种实践本身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活化。这就是说,将1960年代法国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超越的一个未公开承认的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辩证方式。

## 社会抗议和政策改革： 1968年5月和法国的教育指导法

西德尼·塔罗

李海滨 译

改革的政治经常被视为渐进过程——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这种分析模式的样板可以在阿伦·维达夫斯基(1974)关于预算过程的著作中找到。维达夫斯基认为,对于n年公共预算规模最好的预测是看前一年即n-1年的规模。鉴于大多数情况下阻止政策创新的种种阻遏和限制因素,约翰·基乐写道:“于是,人们就普遍地把那些克服了这样的障碍的出色的政府……仅仅作为普通决策模式有趣的例外。”

但是时不时地,政策创新一波波地出现在普通政治和风细雨的层面上。为着理解这些突破,渐进的决策模式几乎并不像以政局结构变化为基础的那些模式有帮助,诸如重大选举的重新组合;政治危机、战争或军事威胁的目的、领袖更迭,以及新的社会联合的出现,等等。这些非渐进的变化经常带来政治改革时期。瓦莱丽·邦斯(1981)所写的关于更替的话可以沿用到政治变化的多种类型:“如果重大的变化发生了”,她写道,“往往是伴随着新的行政领导的崛起。”但是来自政体挑战者们的对于普通政治的威胁又对政策创新产生什么影响呢?尽管邦斯(1981)的“新领导们有什么不同吗?”考察了领导更替的影响,罗斯(1980)分析了政党分歧对

政策的影响,基乐(1993)分析了政治危机和选举胜利的重要性,但我们对于社会抗议对政策变化的影响还是不甚了了。正如马尔克斯和伍德(1975)所写:

考虑到一个人可以看到的种种地方,多数情况下界定因果关系时的极端困难,以及可能需要的时间之久,大部分关于社会运动结果的话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或是分类学意义的。对于社会运动结果的系统研究远远比不上对于引发社会运动的条件研究。

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多数同特纳和基利安(1972)一样,假设一个社会运动的必要方面之一就是“一份社会改革计划”。但是运动种种又如何经常带来如“社会改革”这样总体性的东西?即使说得低调一点,关于运动对于改革的影响我们不甚了了,因为没有几个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系统的考察。

形成这个差距的原因之一是改革经常被看作是一个公民权自上而下的延伸(马歇尔,1964),或者是通过混合(罗干等,1970)或是通过精英政策扩散(赫克洛,1974)。第二个原因是社会运动经常和更常规类型的政治变化巧合发生,使得厘清前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某个特定的政策变化就变得困难(伯恩斯坦和弗洛伊登贝格,1978)。第三个原因是学者们通常都是关注运动的兴起,而不太注意政策设计、谈判,以及实施这些较为缓慢、枯燥的过程。很少看到一场运动目标集中、有力,能够激发一个直接的、看得见的政策反应——除了镇压这种反应。

## 1968年五月:改革之窗

不过我们确有一个近乎经典的案例可以来研究一场抗议运动

对于政策创新的影响——法国的1968年五月。正如那个时期两位最敏锐的历史学家的观察：

尽管这个运动偃旗息鼓，最后又在投票中被淘汰出局，但发生的一幕幕却承载着种种潜在性，即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手段，以一种人们不得不马上面对的方式，持久地拘押着法国的政治舞台。（卡普德维尔和莫里奥，1988，第219页）

这是一个困惑；并没有提出连贯的政策主张，在其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无组织的又几乎是崩溃的运动，导致占多数的保守派阵营得以扩大，反对派士气低迷又内部分裂，这种情况下五月危机又如何能够“持久地拘押着法国的政治舞台”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认为社会运动影响改革——是直接地、通过人民的力量，抑或间接地、通过它们引发的政治机会结构中的变化来实现。如果我们从纯粹的“抗议导致改革”模式出发，我们将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五月运动——一个被打败的运动之后竟还出现一些改革。但是如果我们把政策创新理解为政治机会结构中的变化带来的结果——对于精英抑或大众均如此——那么一场抗议之后紧接着是一场大的改革就不那么令人称奇了。

1968年6月全国大选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戴高乐党赢得一场重大的选举胜利，政府——并非心甘情愿——把在5月里爆发的对于教育变革的种种要求化解为一项教育改革的法律——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的指导法。五月运动的突发出人意料，崩溃得同样迅疾，但政策反应也很快并直指高等学府，事件的起始地。

应运而生的法律旨在围绕三大目标重组大学体制：自治、参与和多学科（夏朗达，1970，第二、三部分；福摩兰德，1974，第五章）。老的学院由教学与科研单位（UER）取代，把大规模的巴黎大学分成12个不同的“校区”，法律规定法国所有的大学都可以选出自己

的理事会并且制定自己的内部章程。很难想象没有借助于一场重大政治地震的冲力而将这么重大的一个变革引入法国僵硬的教育体制。

对于政策创新理论而言这个案例有何意义？在下文我将说明，诚如基乐在其文章里所提示的那样，一项例外的授权和一场咄咄逼人的政治危机为政策创新打开了一扇窗子。不过法国危机的短暂和五月运动的瓦解把改革议题留给了精英们，从而使之陷入议会政治的机制当中。当政治斗争从街头转到议会大厦和内阁部长会议上时，普通政治的游戏就决定了它的前途。正如我将要在结语中所论证的，这对超出本案例的改革具有深远意义。

## 政治机会和改革周期

在回顾这些事件和我的解读之前，说清楚我用“政治机会结构”这个词究竟什么意思以及如何以此来把那些五月狂人——他们中没几个对改革感兴趣——和十月的改革者联系起来。有关政治机会的社会运动文献通常用这个概念去理解运动何时出现以及他们使用的战略。<sup>[1]</sup>这个概念并不经常用来理解一场抗议运动为同盟者和反对者以及为政治精英所开启的政治机会。

研究运动兴起和战略的学者们主要强调政治机会结构的四个因素：选举重组（皮文和克劳沃德，1977），机构数据库的开放（艾辛格，1973），有影响力的同盟者的存在（盖姆森，1991；詹金斯和培罗，1977），和政治精英内部的分裂（塔罗，1989a）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为运动的形成和集体行动提供动力。<sup>[2]</sup>第五个因素——新的意义框架的 availability 和延伸——更少为人注意但是在激发一场运动时同样可以很重要（斯诺和本福德，1988，1992）。

但是新的运动本身有时产生政治机会的变化：为那些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可以看到什么成功，什么失败；为同盟者和反对者，他

们接受他们的集体行动模式并把他们的集体行动框架运用于新的目的；还为政治精英们，他们可以运用运动达到政治目的。重大的运动为其他人也创造机会，展示了新的或是集体行动创新的方式，在日程上推出新的解释框架，清楚表明对手的威胁或作出新的选区的承诺。

举例说，始发于美国民权运动的抗议周期表明在全国电视焦点下使用的非暴力抵抗策略是如何可以为一个少数人的运动取得多数人的支持。第二，它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可替换性的“权利框架”，其他少数民族很快可以使用——斯诺和本福德(1988)所称作的“主框架”。第三，它表明一个大的支持改革的非洲裔美国人选举力量的存在，而这一信号都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很快利用的(皮文和克劳沃德，1977)。

但是1960年代美国的各种运动也表明一个抗议周期内源性的发展又带来了自身的消亡。当南方的非暴力运动让位于北方较激烈的集体行动、不敌年轻的好战者们更为猛烈的言辞时，分裂便出现在温和的较老一些的组织 and 较新的组织之间，部分地是因为后者排他性的言辞，分裂也出现在整体的运动和那些白人“良心选民”(conscience constituents)。尽管只是运动中的少数，但好战的战术和激烈的言辞，使得民意转向，从带有改革主义色彩的约翰逊政府的支持性的政策向尼克松时期的惩罚性政策的转变便有了依据(布顿，1978)。

抗议—改革周期的抛物线模式还可以应用于五月事件后的法国。由于害怕街头骚动再起，同时又由于支持改革的选民的鼓励，1968年7月法国的改革派们拟订出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但是如同在美国一样——尽管快许多——这个周期从抗议、改革、合并、到最后的消退，有着一股内部动力。当竞争的威胁消失时，改革派们被迫收敛他们的雄心壮志以照顾保守的反对派们的反对意见(福摩兰德，1974)。到了1969年春天，随着戴高乐全民公决的失败及

其突然引退，改革派风头大减，结果获益更大的是那些保守的教授，而不是那些心存不满的学生。这个故事法国专家们耳熟能详；在政策突破方面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呢？

## 改革的机会

三个主要因素对改革派在 1968 年夏秋的任务起到助推作用：第一，早在五月事件之前的几年里人们就已经知道有一场关于高等教育的辩论；第二，五月六月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短暂性；第三，戴高乐派在选举方面得到的有力支持。三个因素合并起来便给了教育部长福勒广阔的政治空间，同时让改革有一个平稳的开始。

### 改革背景

在回想 1968 年五月事件时，很容易忘记 1960 年代是讨论、辩论以及教育改革尝试的十年——在法国是这样，其他地方亦如此。<sup>[3]</sup>从抵抗运动的改革计划——以 1947 年那份从未实施的郎之万—瓦隆教改计划书为顶点——到 1956 年和 1966 年卡恩两个重要的研讨会，加之 1965 年富歇改革方案的通过，“大学的‘现代化’成为在某些教育部门，某些实业界及某些政治团体和高级管理阶层的一个重大问题”（布里科，1982，第 37 页）。

改革派团体，包括法国学术界一些顶级人物，在不同时间都呼吁实行的改革，大部分后来都出现在指导法里——固然以不同形式。自布里科（1982）广泛研究的这些建议总结起来，显然包括：给研究更多支持，大学向社会开放，教学现代化，以类似美国大学的系取代学院，摒除大学之间的壁垒，在国家年度预算之外在资助研究单位时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取消某些主席职位，一种情况下甚至是限制学生在大学管理方面的参与（第 38—44 页）。

改革派们既没有被孤立也不是没有组织。他们有一个利益集

团——科学研究发展协会——和教育部的一个重要官员保持紧密联系,甚至成功“取得多位政客的支持”(布里科,1982,第37页)。尽管从第四共和国向第五共和国的变化使他们丢掉一些亲密盟友的帮助——比如,孟戴斯-弗朗斯——他们和教育部还保留信任的关系,尤其和先后两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加斯顿·贝尔杰和皮埃尔·阿格兰(布里科,1982,第40—41页,第44—45页)。将教育改革置于并保留在1960年代政策议事日程上,这个改革联盟是部分原因。

但是改革对体制上所有的缺陷并没有一概猛烈地挞伐。格里尼翁和帕斯隆(1970)对1954年和1967年间在四所主要学院实施的主要改革措施的总结表明重要改革主要还是和学位组织相关。至于学院或大学的结构问题,教学方法,教学和研究的关系等则被搁置一旁。尽管法学院和医学院在政府推动下实施了重要改革,可涉及文学院和科学学院的时候,“新的体制……并不一定代表与旧的教学组织的决裂,在传统态度方面更是如此”(格里尼翁和帕斯隆,1970,第32页)。

对于那个劳动节来说重要的是到了1968年,一支教育改革派干部队伍被富尔视为自己的幕僚和一个精英支持基地。这些人的关系遍布整个教育机构并且可以利用自卡昂研讨会以来流传坊间的意见建议。五月把一群新的不安分的演员推上舞台,但是它又在人们辩论高等教育未来的背景下爆发一场政治事件。<sup>[4]</sup>福勒只需把现有的建议——捡起并利用人们害怕五月事件持续不衰的心理,从而作出一种政治反应。他可以这么做,首先就是因为这场危机的非常性质。

#### 一场短暂的疾风骤雨般的危机

五月危机相当短暂,但让改革派在和那些以维护法律秩序为本能反应的人以及他们与之不共戴天的仇敌之间的较量中更有资



本。即使采用施奈普和维达尔—纳杰(1988)使用的那种宽泛的定义,相比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类似的事件,法国的五月过去得太快了。实际上,突然开始,闪电般地蔓延,迅疾崩溃,这些是五月/六月事件最明显的特点。

这个周期确切的开始仍然还有争论。有些人把针对 1964—1966 富歇教育改革方案的鼓动看作最重要的酝酿阶段(帕斯隆, 1986,第 376—377 页),康威和皮尔斯(1989)关于五月事件前人们对教育制度普遍不满的发现使这种观点得以强化。<sup>[5]</sup>有些人发现事件开始于 1966 年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还有些人更是早在 1967 年工人阶级反抗运动的早期征兆上就看到了(卡普德维尔和莫里奥,1988)。真实的情况是,和五月事件实际的主题相连的集体行动的兴起在 1967 年秋天就开始了并且零零星星地从冬天持续到 1968 年的春天。<sup>[6]</sup>

同样地,事件的结束也具有突然性。但是当多数人把六月选举后集体行动的突然衰减看作五月运动崩溃的迹象的时候,有些人却认为这个周期的结束要晚得多——在指导法通过后接踵而至的在改革问题上的冲突,结束于 1976 年最后一场大学罢课事件(帕斯隆,1986,第 394 页)。

确实地,5 月底当索邦和其他的学院被清理的时候运动被大大淡化了,并且随着戴高乐派六月选举的胜利,运动整体上遭受重大沦陷。到了复课时候,学生团体之间的团结,以及学生和支持他们的老师之间的团结,都已衰落到对当局构不成真正威胁的地步。正是这种衰败,加之人们对纷争再起的恐惧,给改革派提供一个停歇的机会以便把重心从街头转到政坛。

但是 1968 年夏天学生们的卸甲只是事情的一个部分——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法国的危机可以说 1968 年 6 月底就结束了,主要原因是随着格勒内尔劳资协议的签署,工人们又回到了工作岗位。<sup>[7]</sup>工厂里的斗争是否会持续激进,它和 1968 年 12

月工厂的工会权利问题相联系,还和1969年夏邦—代尔马斯政府倾向于集体谈判的立场相关(这些变化可参见布里奇福德,1989,第103—111页)。

五月事件也大大消耗了法国社会其他主要部门集体行动的能力。尽管各种不同的团体,如政府官吏(格鲁士,1988)、白领工人、政府雇员、农民、天主教徒(赫维欧—莱杰,1988)、家长协会(弗那斯,1988),甚至足球运动员(瓦勒,1988)都卷入这场五月运动,但他们对危机的态度大不相同。到6月时,巴黎的中产阶级——被警察在拉丁区的暴行所激怒——在选举中以压倒的比例投票支持右翼。

#### 危机和选举胜利

五月运动在法国的抗议周期历史上应该是最短的抗议运动之一。但是在它结束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学生们在开学时将要做什么,以及他们的行动将如何影响曾经在5月里加入到他们中去的工人和其他人。我们知道不确定性是抗议运动的主要资源之一(艾辛格,1973;塔罗,1989a)。这种不确定性,还有被动摇的戴高乐党试图安抚五月事件里出来的学生的愿望,为改革提供了重要机会。

算是事后聪明吧,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并没多少前景预示1968年秋天开学时五月运动会继续下去。但是7月份当富尔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时,没人真的知道五月运动是不是已寿终正寝。五月事件里大学体制和几乎法国社会的每一部分的快速瘫痪极大地震动了政治精英阶层,让改革主义者确信要避免造反复发就必须要做某件事情。暑假期间教育部门一片死寂这个事实可能意味着运动已然结束,或者也可以意味着运动的领袖们正在为新一轮抗议重新组合。<sup>[8]</sup>富尔的任命就是对这种担心的反应,他很快也利用了这种情势,对他的部长任期所作的主要研究也表明这一点(夏朗达,

1970;福摩兰德,1974,1975)。

改革机会的最直接的源头在于戴高乐派六月选举中的巨大胜利。迟至5月24日,戴高乐将军还在试图通过就参与一项举行公投的方式来应付危机,而这是一个他极可能输掉的公投。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的选举胜利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表一把六月选举中投票支持戴高乐派及其同盟的情况和之前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投票情况作一比较。从中可以判断他们的胜利是如何巨大。

并不只是戴高乐派的胜利解释了富尔获得的支持,5月份戴高乐遭受的羞辱也解释了富尔获得的支持。在发现他的政治空间被保守派的巨大胜利所挤压,支持者拒绝组织他想要的全民公投,这对戴高乐来说又何尝不是羞辱(夏洛特,1989)。让一个像富尔这样的改革派主管教育部并全权委托他实行改革,戴高乐这样做是希望强化自己在戴高乐党里的地位。

这一点在彼得·古勒维奇(1978)使用的联盟性的词语里可以得到最好理解,他用这样的词语去理解戴高乐在1969年公投之后的辞职。戴高乐联盟从来就没有局限于忠诚派和保守派;从一开始他们就向希望法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现代派”呼吁。就像他对待那个招致他在次年春天的失败的胎死腹中的全民公投一样,戴高乐可能把1968年的教育改革看作去重新获得现代派的支持,削弱保守派的力量,重新确立他和选民联系的一个途径。

对于这样一个联盟的彼此相争的事情,埃德加·富尔正符合要求。<sup>[9]</sup>他是一个从未处于戴高乐联盟中心的前激进派,对于戴高乐党内的许多人来说他都是充满嫌疑,因为他和第四共和国很多过分行为都能挂上钩。但他太合将军的心意了。戴高乐过去在教育改革上的努力无不为蓬皮杜和佩列菲特所破坏。<sup>[10]</sup>灵巧的政治手段和一定程度的左右逢迎(a degree of light-footedness)构成富尔的领导风格,这被一些人视作投机主义。他曾被

引述说“法国不是不能治理的。用技巧和掩饰就可以”(引自莱特,1987,第 527 页)。

表一 法国的选举变化,1958—1968

立法选举年份	第一次投票		
	左翼政党	政府	从左翼转向政府总数
1958			
百分比	41.9	17.6	__b
席位	90	212	—
1962			
百分比	42.1	36.4	18.6
席位	107	269	8.8
1967			
百分比	41.5	37.7	1.9
席位	194	242	—71.3
1968			
百分比	36.5	43.6	11.9
席位	83	354	103.5

资料来源:俄尔曼(1983,第 220 页)

a. 投票指数:上一次选举政府得票数变化的百分比减去上一次选举左翼得票数变化的百分比。席位指数:上一年选举政府所得席位变化的百分比减去上一次选举左翼所得席位变化的百分比。

b. 不包括从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的变化。

## 政治化和派系化

鉴于围绕五月高等教育的冲突,人们可能会认为一项如富尔 1968 年建议的改革计划将引发五月运动积极分子巨大的争议。但

是运动兴起得很快,很少专注于改革的细节。另外,这场运动很快就将教育问题抛在身后而关注国家政治,而且严重的内部分歧削弱了回到大学改革问题的力量。五月运动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富尔相对地可以放手出台一项重大改革计划了。

#### 国家政治的焦点

如果五月运动在大学里开始,一旦它从学生要求的层面演变到政治权力的层面,情势就不可逆转。如帕斯隆(1986)所言:“如果大学里激烈的冲突为引发抗议升级的紧张形势获得一个特权的地位的话,学生运动很快就不再具有——如果说曾经有过——那些严格来说和大学有关的目标。”

由于五月里教育部在清理索邦大学校园一事上的过度反应和警方的暴力行为引起游行示威,学生们很快就把精力集中于政治舞台。他们的口号刚开始很大程度上都是战术性的:学院应重新开放,赦免被捕的学生,以及撤走警察。但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五月中旬蓬皮杜辞职不久这些要求就得到充分满足——运动如果要进行下去的话就不能坐享其成。如帕斯隆(1986)写道的:“一旦被鄙弃的体制无法把它的攻击者聚拢在一起并掩饰他们之间的互相攻讦,反对传统大学的统一阵线顷刻间分崩离析。”(第382页)

把施奈普和维达尔·纳杰(1988,第二、三部分)搜集的文件资料浏览一遍,你无法不被大批学生团体将注意力转向政治之快感到震惊。主要的例外是在全国各地学院出现的临时机构,他们在夏天时致力于大学内部的问题。不过这些都是各自为政,很容易被教育部长和他的阁僚们吸收进他们的改革计划中。结果是,恰恰在力量加强的戴高乐派多数提出一个重大的大学改革计划时,这个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却没有一个应对的教育改革计划。

无论这场运动对国家政治的迅速关注是法国制度固有的集中化的结果(施奈普和维达尔·纳杰,1988,第50页),还是左翼本能的激进主义的结果,或者仅仅就是事件自身发展速度和方向的结果,这都很难说。法国五月风暴不寻常之处在于触及法国政治体制的口号迅速传向全国各地的运动组织,还在于呼唤教育改革的激进言论迅速烟消云散。这本是五月危机的部分重心,但当事情过去后,它却为那些精英留下一扇改革之窗。

### 派系纷争

在法国社会也没有任何支持大学改革的统一运动。如果埃德加·富尔和他的同僚希望在他们10月份向国会提出的法案里反映学生运动的意见,那么他们在林林总总的学生组织里,教师工会里,或者笼统说大学里,都找不到一个这些观点的连贯的代表。对学生和教师来说是这样,对于学生团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对于各级教育机构也是这样。

### 学生和教师之间

最明显的分歧出现在学生和教师之间。1968年的五月风暴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学生得到了教师的大力支持。部分的原因是几本大学教授著作的翻译的高调宣传的结果,还有部分原因是存在着一种迷惑不清的情况,相对于运动中那个“英勇的”、席卷全国的阶段——曾到了催生一个新的体制的地步,学生和教师们的担心则显得平庸乏味。在学生和教授方面,五月风暴中出现的激进的学生团体和大部分大学教授,甚至和那些左翼教授之间,也有着深深的裂痕。

这个裂痕已经在很多学院人数众多的自发的集会上人们的辩论中就出现了。一部分年轻教师,甚至一些教授,都参加了这些学生团体,他们为大学改革拟定雄心勃勃的计划(萨勒蒙,1982,第

67—68页)。6月,甚至正教授们都被教育部鼓励参加。但是这些临时机构,没有围绕五月运动的目标联合起一个改革联合力量,而是展现出横亘在学生与大多数教师之间的巨大鸿沟,并且在后者之间产生羞辱和怨恨情绪。萨勒蒙(1982)写道:“即使对于那些赞成改革的人来说,很多在集会上提出的后来为是不是得到同事们支持的观点看上去很幼稚而且必定会导致所有形式的高等教育的全面崩溃。”(第68页)

这些改革计划对保守派教授们的震荡由于教育部长富尔的改革策略而变本加厉。福勒准备接受学生们对于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的要求。当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技术和行政人员就大学变革的前景表现出不同立场的时候,分歧就远远超出了5、6两月的集会。<sup>[11]</sup>

#### 学生和学生之间

如果说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存在着尖锐分歧的话,那么学生团体之间的思想分歧甚至更为尖锐。5月之前,有些团体还是改革派;有些是内部有改革倾向;而另外一些则是一开始干脆就反对把大学作为运动领域。<sup>[12]</sup>尽管在5月份时这些分歧被运动统一的目标遮蔽,到了6月份这些分歧就开始显露变得更清晰了,无论是各种学院举行的非正式集会的辩论,还是各种团体对待参加选举的战术态度上,都可以看得出来。5月之前战略上的分歧,加之对于事件的截然相反的解释而导致的分歧,便产生了对待改革的不同态度。

法国全国学生联盟(UNEF)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五月运动爆发时,这个组织就深深分裂,一边是“大学派”倾向主张“重视学习”,另一边是“结构主义派”倾向“坚持针对政府的计划提出‘应对计划’”(蒙舍朗,1988,第17页)。不遗余力要赢得新近变得激进的学生的支持,导致法国学联在五月运动结束时采纳了一个更

激进的立场。其领导人“知道‘在很多地方(五月)斗争都发生在法国学联之外’”(第11页)。为得到他们的支持,需要保持一个超出大学改革范畴的激进势头。7月份在其全国会议上面对很多代表不服领导的局面,法国学联领导层提出一个新章程使之成为“一个大规模政治运动”,要铲除联合主义的痕迹(第11页)。

#### 教师和教师之间

法国教授中大部分人从未热衷于一个在他们有些人认为属于青少年的运动,然而有些人却对之感到惧怕,因为他们认为运动带有颠覆性质的危险性。类似硕士协会这样的有影响的保守派团体和类似大学教授自治联合会这样的专业协会都表态反对任何学生参与大学决策。诸如乔治·维代尔和查理·德巴什等著名学者强烈反对侵犯教授们自由选择的风险。<sup>[13]</sup>

参加五月运动的教师组织之间的分歧几乎和学生运动本身内部的纷争一样广泛。最好的例子是全国教育联合会,从其章程上说只是一个教师工会联合会,但是在五月运动期间其重要性大幅增加。即使在运动高涨之时,全国教育联合会内部的支持者也是四分五裂。尽管左派分子控制下的高等教育公会参加到学生在大学的运动中,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学联合会却反对抗议,还试图制止在公立中学进行的运动。<sup>[14]</sup>尽管全国教育联合会有些领导人出现在夏雷蒂体育场的集会上,其他人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路线,希望在危机结束后增加对政府的影响力。<sup>[15]</sup>

1968年当举行新建大学大会,全国教育联合会没有能力针对富尔改革计划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方案(FEN,1969)。部分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分歧的缘故。在这次会议上,成员工会主要是根据地区而分开。<sup>[16]</sup>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次全国大会却没有讨论行将到来的大学改革问题(FEN,1969)。仅仅是通过集中在“增加金融信贷的共同要求”,这些存在于全国教育联合会主要成



员之间的分歧被掩盖起来(FEN,1969,第207—208页)。

从这个简要回顾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五月运动中出现的思潮和组织被高度政治化,并没有一个推动大学改革的统一运动。即使福勒和他的同僚有心想在他们于10月向国会提出的法案里反应这个运动的观点,他们在那些学生组织中也找不到一个这些观点的有条有理的代表。<sup>[17]</sup>没有一个连贯一致的运动,使得富尔行动起来容易多了,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运动的崩溃以及开学后内部的分裂解除了原本是改革主要动力的威胁。

### 改革和政治进程

富尔的战略是要联合过去运动的一些成分,包括一些教育现代派和戴高乐派组成一个改革的联盟。他马上就开始联系,一方面和那些想建立一个符合现代世界节拍的大学的现代派,一方面是和那些想看到拿破仑体制解体的激进派。得不到保守派的信任,他就和天主教会的教育统治集团联系,晚上又偷偷摸摸地和学生领袖们见面。

富尔的第一个正式举动是成立一些研究委员会,和很多在那个春天喧闹中自发组织起来的临时机构进行接触,并且开始和相关团体的一系列会谈——有些是秘密的。<sup>[18]</sup>他把全国教育联合会吸收进他的计划中,和总工会领导人乔治·塞吉私下会面,说服他——并通过他说服他的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不要反对改革。<sup>[19]</sup>在他获得任命后的几个月里,富尔通过在他周围及阁僚中营造一个热闹的氛围(*bouillonnement au sommet*)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街头骚乱卷土重来的极其担心转移开去。

1968年秋天,富尔的发言听上去感觉他是一个革新派,但是他的真实战略是利用一个分散的但仍然具有潜在危险的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以及一个力量得到加强的戴高乐多数派。基于保守派保

持社会和平的愿望,现代派创立适应现代社会的大学的愿望,自由主义者对于大学自治的要求,还有进步主义者希望学生真正参与大学决策的要求,他建立起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从立法的角度看,建立联合力量的努力是一个成功;到了11月7日,即他任命四个月后,改革法案以压倒多数在议会两院通过(福摩兰德,1974)。

但是富尔的联合是临时的,取决于政府的支持者中存在的对五月运动会卷土重来的担心,反对派的解体,以及戴高乐个人的支持。另外它没有考虑教授们惯有的权力以将改革对其有利——一个改革实际增加的能力。秋去冬来,冬去春来,随着改革计划的实施及戴高乐的突然辞职,改革联盟里的龃龉变成了裂缝。

#### 改革的弱点

如此匆忙地提出这么多彻底变化或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施的情况还很少有。实际上,连用一年时间让体制过渡的想法都放弃了。到1968年12月31日,法律通过还不到两个月,便创建了约600多个临时的教学科研单位。4月份,新理事会选举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教师中举行。新大学几乎立刻就选出校长并向法国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的一个委员会呈递章程草案。到1970年开学时,甚至连把巴黎大学分成13个新大学这样棘手的问题都基本解决了。

#### 教学和科研单位:为对手创造资源

最大的问题在于新系科的创立——或者说教学科研单位——及其与新建大学的融入。因为富尔内阁不是依循从教育角度来说合理的路子,即先建立新大学然后让他们决定自己内部架构,他们是很快地拟定出一份“临时性”教育科研单位的名单——到1968

年——只有那时才迈向更大一步，把它们并入大学。

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临时的教育科研单位——他们中的一些仅仅只是老的学院或研究所的新名称——很快获得一个体制的基础，由此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制约新大学的格局。尽管管理层害怕的是激进学生将控制这些临时性的教育科研单位，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危险却是教授团可以利用这些教学科研单位来巩固其地位并阻挠真正的教育创新的开展。尽管，这里或那里，富有创造性的新学科单位的创立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但一个失望的改革者写道，“一部分协会的创立只是为了争得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多资源的控制权，而许多单位的创建是出于同属一个政治或哲学思潮的教员想围聚在一起的愿望”（夏朗达，1970，第177页）。

这个问题由于总理内阁不愿看到在5月之后狂乱的氛围中实施这项法律而更显突出。执政当局里并非所有人都和富尔一样对改革抱有热情。<sup>[20]</sup>在法国的宪法体制下，只有总理或总统才有权力通过创建大学所必需的政令。<sup>[21]</sup>如果总理——或者他的内阁成员们——不相信这项法律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其结果便是严重的拖延。

尽管富尔内阁几乎是马上就开始指定新大学的创建——1969年3月时已命名17所，到6月时已增至37所之多（夏朗达，1970，第177页）——总理办公室对要把这项法律应用于高等专业学院的计划很不悦（第189页）。“在不同的借口下，”他的阁僚为拖延找到种种理由，“法国总理府的签字一直被拖到富尔离开教育部长一职”（第193页）。巴黎的拖延就更长了，不过这和高层政治关联不大，更多的是因为需要找到办法解决旧索邦大学内部的派系纷争和政治分歧。但是在政府拖延的时候，那些对改革了无热情的学术高官们却有时间重组队伍了。

## 官员的报复

富尔和他的内阁期望那些新建的教育科研单位是临时性的有两个原因：“部长自己可以完成或修正（计划），新大学的理事会一旦选出，在创立章程时他们同样可以提出质疑”（夏朗达，1970，第175页）。但是他们在运筹过程中没有考虑两个因素：一，为使改革的精神持续下去要求致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二，他们对学术机构拖延或重塑改革的能量考虑不充分。<sup>[22]</sup>

学术界的力量和派系分歧在大城市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创建的往往不止一所大学。在较小的城市，如卡昂、克莱蒙特、弗戎、尼斯以及普瓦捷，都只建有一所大学，真正的“多学科”的机构就出现了（萨勒蒙，1982，第78页）。但在较大城市如艾克斯·马赛、里昂、里尔、波尔杜、斯特拉斯堡及图卢兹等，法律对学生人数有限制并且要创建不止一所大学。<sup>[23]</sup>

原则上，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在合理的基础上，这样做是可以解释的。但常常地，教授们总是基于个人的、政治的，或是学科的因素聚集在一起。<sup>[24]</sup>有些赞成改革的人选的是走向像文森或巴黎第七大学这样带有实验性质的大学；有些人选择的是像巴黎第一大学这样最便捷的方案；那些害怕变革的人可以继续待在巴黎那些原来的法学院和医学院里，它们几乎没有变化，或者加入到像里昂第一大学那样的保守的“新”大学的行列中去。改革派要在教育科研单位开始改革的急迫性，而政府在创立权威大学机构问题上的拖延，使得改革成为那些学术高官报复的人质。

## 一切照旧

毫无疑问，假如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部继续存在，又在一个有着捍卫改革的政治意愿的部长领导之下，那么基于匆忙决定和蹩脚的教育政策的临时安排本来是可以改进的。但是给予改革的时间，就像给予抗议的时间一样，非常短暂。上任不到一年，由于戴

高乐考虑不当的全民公决和辞职，富尔被新的蓬皮杜政府革职，他的内阁也随之解散。蓬皮杜是一个教育保守主义者，他的内弟是高等证书持有者协会(Societe des Agreges)的会长。他把富尔换掉而让奥利维埃·吉夏尔取而代之，而后者是一个忠诚的戴高乐派，他在负责实施这项法律时既没有个人的热情更无政治想象力。吉夏尔的任期正好赶上教育部一系列行政管理人员大换班，所以腾不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改革了。在他之后是约瑟夫·方达奈，蓬皮杜死后，又是让·皮埃尔·索桑，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第一任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及其阁僚走马灯似的更换对于新成立的大学没有多少好处。每一届政府都要重新对教育改革的问题抨击一番，不断推出新花样，无意间就在大学里引起混乱(帕斯隆, 1986, 第 390 页)。没有一个改革派舵手, 教育指导法“跟着地方的权力关系在走, 这里要照顾权力的连续性; 那里又要用作幌子以蛊惑人心”(帕斯隆, 1986, 第 386 页)。这些变化给了教育部一个机会重申其在许多教育生活方面的指导地位, 并且为爱丽丝·索尼埃-赛特这样一个教育保守主义者 1978 年成为大学事务部长时攻击这项法律的精神留下空间(第 394—395 页)。

#### 越关越窄的改革之窗

但是如果说改革在其最大胆的追求上失败的话, 主要的倒不是因为教育体制的力量, 或是因为富尔丢掉自己的地位。改革计划如此迅速得以通过是因为富尔及其同僚利用惧怕心理建立起一个联合阵营, 那种惧怕来自——阻挠改革——会有街头运动死灰复燃的危险。他们联合一致的基础虽宽却短。一些人是因为改革而赞成改革, 但是其他许多人支持改革只是他们害怕复课会延续学潮, 并使暴乱在法国社会卷土重来。当这种惧怕降低了, 改革的冲动也同时消退。

即使在戴高乐辞职、教育部长富尔被替换之前,富尔就失去了他在夏秋两季所享有的巨大权力。这个不仅是因为政治过程中的交换取舍使得改革倡议不断被消耗,而且更根本的是因为工人的复工和学校的复课提供证据显示除了小的孤立的鼓吹者团体外,上个春天的运动已经泯灭。

正是来自政体之外的挑战为改革者提供了政治机会,也正是那个威胁的衰减降低了他们对于一个谨慎的政府、一个保守的议会和一个被搅动起来的学术机构的影响力。这一点可以在笼统地说集体行动——具体说是对抗性的抗议——在复课时的急剧衰落上看得出来。从1968年7月至1969年6月学生示威、民众游行和暴力行动,主要是在改革计划通过之后,在学生理事会选举期间,抗争又重新开始。

实际上,改革有助于把学生抗议运动带回到它的起点。与德国和意大利——同时期在这两国也出现了学生激进运动从大学蔓延到街头的事件——形成对照的是,改革法框定的学生理事会选举运动把学生运动带回到大学校园,伴随选举运动的有暴力的,也有非暴力的集体行动。尽管报纸突出报道的是激进团体试图阻止学生投票时发生的最猛烈的暴力冲突,实际上,围绕这些选举的集体行动大部分都是和平的,60%的法定参加人数并不是总能达到的(福摩兰德,1974,第240页)。

运动卷土重来的威胁降低的最初迹象出现在议会里。立法进程每走一步都会导致原来的改革计划在自由度上的缩减。许多修订案都是由学术集团授意,通过总理办公室或是通过个别议员。结果是,在定稿以及这项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这项法案原来的每一条原则无不作了妥协。

其次,在选举团,比较8月份富尔慷慨的建议,讲师、助教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夏朗达,1970,第117页),学生的比重也作了限制,取决于他们参选的程度——这一限制从未对其他类别的选民规定

过(第 149 页)。至于大学向公众开放的目标,这项法律的终稿没有提及多少,但外部团体在大学理事会确占有法定的席位比例。

第三,富尔曾设想的协调教育政策的地区理事会从未创立,因为在戴高乐就地区事务的全民公决失败后,在他之后的政府里对分散权力一事已没有多少热情了。取而代之的是,原来以协会形式非正式活动的大学教授团体根据教育部的任命变成一个官方的理事会,逐渐开始行使实际权力。<sup>[25]</sup>取代富尔的改革派内阁的是盖查德内阁,其成员大部分都是在任的或未来的法国行政法院成员,主要来自保守的法学院,他们启动了一代改革。

教育指导法的缺陷在很多尝试进行系统的教育改革的国家都是很明显;然而,其他一些缺陷看上去可是传统的法国制度的结果,不能归咎于法律或其实施上;还有一些缺陷是和后来法国政治的特点有关。但是在评估这个非常决策案例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法国的制度多么深远地植根于拿破仑时代。即使说产生于富尔改革计划的大学在自治、多学科性和参与几方面比改革者所希望的程度还低,较之他们取代的旧体制也算一个进步,因为在旧体制里压根就没有任何哪怕类似其他先进国家的大学制度的结构。就其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来说,富尔可能失败了,但是考虑到反对改革的多重势力,他的成就也不可小觑(帕斯隆,1986,第 389 页)。

## 结 论

教育指导法对于非常决策比较理论的主要意义有三点。

首先,类似重要选举和严重危机,像 1968 年五月的抗议浪潮并不是简单地利用已有的政治机会结构,而是成为那个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通过它又打开了改革之窗。

其次,尽管改革浪潮可能帮助推动了改革进程,但其本身又不足以产生实际改革——这需要地位相当的改革主义者的存在和企

业家精神,能够将变革的动力转化成具体的建议并顺利通过政治进程。

第三,动员的浪潮可以产生一个临时的改革联盟,但是他们经常是太短暂、太分裂,而且声音太杂,当对无序的状况的恐惧烟消云散时为改革者提供不了持续的支持。

这些结论可以通过对比法国 1968 年的教育改革和其他最近的抗议浪潮。第一,就抗议和改革的共同发生来说,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改革一定源于抗议,但持续的集体行动经常驱使精英们沿着改革的方向行动。在美国,皮文和克劳沃德(1971)提出,“在大规模失业出现时偶尔爆发的社会无序期间,提出或扩大安抚安排”(xiii),同样的,肖特和蒂丽(1974)从他们对法国罢工史的分析后总结道“大规模的运动浪潮……总是以某种立法的成功得以补偿,这是政治行动价值最后的试金石”(第 145—146 页)。

法国人民阵线、美国的新政和伟大社会时期、1968—1972 的意大利都曾经历抗议和改革的共同发生。如蒂丽在他们对欧洲一个世纪的冲突的研究后总结道:

如果没有抗议团体中一部分人准备好克服政府和其他团体的反对,如果没有那些团体参与集体暴力活动,就不可能产生重要权利。(蒂丽,1975,第 184 页)

这个并不是通过直接把抗议转化为改革,而是因为抗议运动变成政治机会结构的一部分,为有改革意识的精英们提供机会,否则他们就没有机会。

第二,并不是五月运动本身造就了法国的教育改革,而是由运动引发的,又为老练的政治家们利用的执政联盟的重新组合。加以分析便可看到,能够解释结果中很多的变化并不是独立的变量,而是相互影响的变量。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美国 1960 年代的改革时期。按布朗宁、马歇尔和塔布 (1984) 的说法, 没有选举, 没有政治重组, 没有能够利用不断扩大的政治机会结构的领导人的多重影响, “抗议” “不足以” 为少数民族产生改革的结果。这就提示了社会运动的研究将是致命的不完整, 除非学者们对于抗议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得敏感起来。

第三, 法国指导法的实施显示, 尽管抗议对于改革进程的开始是必要的, 但它并非让改革持续下去的充分条件。一项成型于危机期间的改革当危机的威胁过去后便很快就失去它的热情。五月危机给法国的改革主义者们以政治机会去启动其实先于五月运动的改革计划; 他们抓住这个机会, 通过建立一个广泛的支持改革的联盟, 这个联盟包括学生运动的某些成分、主张教育现代化的人士, 以及戴高乐派。但是由五月运动打开的机会之窗还不够宽, 开启的时间也不够长, 不足以让改革以原样得以实施。

同样的, 约翰逊政府应对暴乱的分配政策让位于尼克松政府的“法律和秩序” 开销 (Button, 1978)。在意大利, 当局在最初面对 1960 年代晚期抗议浪潮时的迷茫无措和放任自流很快被镇压政策取代 (德拉·波塔, 1992)。像法国的五月运动及其改革主义的结果一样, 这些例子说明尽管抗议可以使改革列入议事日程, 但不足以保证其成功。这一点是否适用于特殊决策的其他来源, 只有在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之后方可知道。

最后补充一点: 一个抗议和改革周期的结果不能仅仅以其直接的结果来衡量。像其他国家主要运动的低潮一样——比如说, 在美国 (鲁普和泰勒, 1987) 和意大利 (兰格, 塔罗, 和 厄文, 1990), 紧接着像 1968 年五月学潮那样的大规模运动之后出现的沉闷可能掩盖一个缓慢而精细 (capillary) 的文化转型过程, 它为下一个抗议周期留下价值和实践的遗产。

## 注 释

[1] 关于和社会运动相连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参见塔罗的考察(1988)。最重要的标杆是艾辛格(1973)、麦克亚当(1982)、基雪特(1986)、卡赞斯坦和缪勒(1987)、塔罗(1989a,1989b)、克里西(1991)、鲁赫特(1990)。

[2] 基于政治进程模式的最系统的研究为道格·迈克亚当所作(1982),他认为在美国民权运动案例中,一个基于政治进程的模式就运动何时兴起提供的解释远远好于其他已有的模式。

[3] 参看布里科(1982);福摩兰德(1975,第二章);格里尼翁和帕斯隆(1970);帕斯隆(1986)。如格里尼翁和帕斯隆所写:“大学的一成不变及其组织和教学计划的僵化在过去15年里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直到最后各方的同声谴责加上招生规模扩大带来的影响,才成功地激发起人们的激情,连最保守的学者们也概莫能外。”

[4] 实际上,拟定在5月14日的议会辩论上对教育部长阿兰·佩列菲特的改革建议进行审议(欧贝,贝古尼乌,马丁和莫里奥,1985,第204页)。

[5] 康沃斯和皮尔斯(1989)从他们对1967年民意和1968年五月示威活动参与情况所作的分析得出结论:

[6] 施奈普和维达尔·纳杰(1988,第106页)认为和五月危机相关的第一起事件发生在1967年11月25日。他们对大学抗议运动精心所作的记录显示没有发生其他重大冲突直到3月22日在南泰尔发生了那些有名的事件为止。

[7] 法国劳工部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五月运动爆发之后的几年里由于失掉的天数1969年和1970年实际上低于1966年和1967年(卡普德维尔和莫里奥,1988,第107页)。尽管有迹象显示5月之后仍有工人斗争活动——比如工人们罢工期间占领工厂的意愿更强烈(第108页)——就劳工关系而言,1968年6月的格勒内尔协议有效地结束了危机。

[8] 在一个私下的访谈时,米歇尔·阿里奥回忆道,当来访者向戴高乐将军抱怨说富尔改革可能给高等教育带来破坏时,他总是提醒他们五月运动中体制的垮掉(访谈,1990年4月2日)。

[9] 1968年五月之前富尔对总理一职就怀有种种抱负。阿里奥回忆早在1964年就已经和他讨论过。尽管富尔直到7月份才被任命,6月份两人就第一次谈论富尔为教育部拟定的计划(访谈,阿里奥,1990年4月2日)。

[10] 感谢戴维·戈尔迪提醒我这一点,并且找到下文引用富尔的话。

[11] 如施奈普和维达·纳杰(1988)得出的结论:对于许多助教或讲师而言,废除大

学内部等级制比起跻身于教授行列更为重要。外省的教授们认为这是他们能扬名巴黎的唯一的机会,而其他40岁以下的人则宣称大学发展的方向还是要依靠40岁以下的教授。

[12] 比如说,五月事件之前,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分裂为“正统派”,“意大利人派”,和几个极端派别(施奈普和维达尔·纳杰,1988,第16页)。几个毛主义团体,五月运动之前之后从未对大学有过多少兴趣——除了把大学作为为工厂招募好斗分子的场所之外(第151页)。施奈普和维达尔·纳杰转录(第359—360页)的一份仅存的毛主义团体关于大学的文件要求运动要从属于“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即使3月22日的运动也丢弃了其领导人称作的“各阶级合作主义的精神”,以批评的目光看待变革大学的运动,提出“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实践是不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创造一个社会主义高潮”(第152页)。

[13] 分歧无法减至左翼的轴心上。尽管巴黎政治学院许多天主教的支持者赞成教育改革(大部分犹太人教授已是这样),世俗的左翼却是分裂的。因为改革会被认为是攻击法国教育的一致性(unity)(富尔努力要制造的正是这样的印象),所以它会被理解成破坏世俗教育的基础,而这个也被认为是共和国传统的根基。法案在通过政治进程的过程中,试图在保守的方向对法案作出修正的努力将来自自由派学者们,他们在6月的选举中坚定投票支持左翼的人士(热拉尔·科纳访谈,1990年3月21日)。

[14] 阿斯特,访谈,1990年4月5日。

[15] 尽管阿兰·吉斯马领导下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甚至在5月之前反对和当局妥协(欧贝等,1985,第204页),全国学院工会(SNI)很快投票支持在5月20日总罢工后复工,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决定罢工再继续更长一段时间。甚至在危机结束之前,全国教育联合会就出现来自造反的教员的争执:第一次在6月7日,大约200名激进的教员反对这个组织支持结束总罢工,他们占领了这个联合会在索尔菲利诺街的院子(巴贝特,1988,第12页)。尽管其领导人的本意是保护他的成员们的专业利益,但FEN在五月运动中执行的是政治调停的战略,所以当它的成员工会组织分裂时,这个联合会很难有所作为。

[16] 尽管SNI积极推动在有关学生毕业年龄、课程、教师专业流动性等问题上出台一个纲领,但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却“坚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家长和教员之间需要对话,重新组织学生利用时间”(欧贝等,1985,第207页),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整个就反对改革,认为它是“小打小闹”(第205页)。

[17] 在其主政教育部的开始阶段,富尔和他的合作者们想把先前运动的参加者纳

人参与的早期阶段。实际上,关于未来大学理事会——即起草大学章程的机构——的选举,富尔起初的计划是建立非正式的机构,让他们作为审议大学新章程的机构。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实际上还是原来5、6两月里出现的临时机构原班人马。政府这下就受不了了,他们担心这些五月临时机构对未来大学的影响,所以临时委员会的想法不得不放弃。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个失败在1968—1969学年创建新的大学机构过程中非同小可。

[18] 访谈,热拉尔·安东尼,1990年3月21日;访谈,夏朗达,1990年3月17日。从7月初获得任命到夏天结束期间,据报道,富尔和他的合作者们见了4000多个以不同方式对教育改革抱有兴趣的人。1990年4月2日米歇尔·阿里奥的一篇访谈录报道。

[19] 访谈,热拉尔·安东尼,1990年3月21日。

[20] 米歇尔·阿里奥报告说,法律通过后的那个上午,一个总理内阁成员对法案的全票通过向他祝贺。但还是这个官员又忙不迭地向他吐露心声说,现在又该决定如何避免其实施了(阿里奥,访谈,1990年4月2日)。

[21] 根据法国宪法程序,尽管部长可以促成为在大学里创建新单位所必需的决议,但只有总理或者总统才可以促成为创建公共机构所需要的法令,大学将要变成的也就是公共机构。

[22] 我是在沿用米歇尔·阿里奥对事件的设想(访谈,1990年4月2日)。

[23] 富尔知道这个危险。如夏朗达所说,那时他警告说“简单地把现有的单位改成教育科研单位会冒让改革很快有名无实的风险”(第175页)。

[24] 正如萨勒蒙审慎所写的,“有很多彼此无关的教育科研单位组成的反常的集合体”(第79页)。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巴黎,规模过大的大学不得不分成13个单位,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讨论和纷争一直持续到1970年开学。这些新起的“大学”中许多只是在名义上是多学科的,不同的教育科研单位被紧绑在一起,别扭地过着,给学生提供的跨学科训练,常常也不比老学院更多(夏朗达,1970,第177页)。有些情况下,不同大学还得共用一块地皮——比如在索邦大学——这会导致争校舍、争住房,甚至走廊。历史教学科研单位学生最后达到6000;英国文学甚至超过10000学生(萨勒蒙,1982,第177页)。尽管后来有所变化,但首都大学教育质量却一蹶不振。

[25] 访谈,热拉尔·科纳,1990年3月23日。

人 物

---

当娜·哈拉维



# 伴侣物种宣言： 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

当娜·哈拉维

林斌 译

## 新兴的自然文化

摘自《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的女儿之手记》：

凯恩·佩珀女士继续侵占我全身所有的细胞——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所谓共生起源现象的一个确凿案例。我敢说，你如果检验我们的DNA，就会发现发生在我们两者之间一些明显的转染成分。她的唾液中一定含有病毒菌体。当然，她吻我时舌头像飞镖一样准确有力，令人难以抗拒。尽管我们同属脊椎动物门下，我们不仅分属于不同的属与科，而且分属于截然不同的目。

我们何以将事物区分开来？犬科动物、原始人；宠物、教授；母狗、女人；动物、人类；运动员、驯兽员：我们两者当中有一方在她的颈部皮下植入了一块微型芯片作为身份标识；另一方则持有一份带照片的加利福尼亚州驾照作为身份证。我们一方拥有一份记载着二十代祖先的书面材料；一方却不知

道曾祖父母的名字。我们一方是大面积基因混杂的产物，被称作“纯种”；一方同样也是大规模混种的产物，被称作“白人”。这些名称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一种种族话语，我们两者在肉体上都传承了它们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一方正值激情燃烧、青春年少、体力充沛的盛年；另一方虽精力旺盛却已年过半百。在一片被政府征用来的印第安人领地上，我们进行了一场被称作灵敏赛的团体运动，就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凯恩的祖先曾经放牧过美利奴羊。这些羊是从当时已被殖民化的澳大利亚畜牧业进口而来，是为当年大量涌入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提供食物的。在历史学、生物学、自然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复杂性是我们这个游戏的名称。我们两者都是渴望自由的征服者后代、白人殖民地的产物，在运动场上，我们跳跃障碍、爬过隧道。

我敢肯定，我们的基因组比实际情况更为相近。尽管我们都是被剥夺了生育能力的女性，一方是由于年龄的缘故，另一方则是手术的结果，但是我们在生活方式上的相互关联必定在这个世上留下了某些可以追踪到的分子记录。澳洲美利奴羊牧羊犬特有的红色舌头敏捷而灵活，它已从我的扁桃体上汲取了细胞组织，那上面布满了敏感的免疫系统传感器。谁知道我的化学传感器中在什么地方带上了她的信息，或者她从我的细胞体系中提取了什么物质以将自身与他者区分开来并将外界与内部关联起来？

我们谈论过禁忌的话题；我们有过口唇接触；我们之间的关联在于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讲故事，故事的素材全部都是事实。我们各自以自身都几乎无法理解的交流方式训练着对方。从本质上讲，我们互为伴侣物种。我们在肉体上互为构成。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却互为意义重大的他者，肉体之间表达一种令人不悦的被称作爱的进化感染。这种爱是一个历



史反常现象，一份自然文化的遗产。

这份宣言探讨了从这个反常现象与这份遗产中派生的两个问题：1)我们如何可能通过认真看待人与狗之间的关系来学会一种以促进意义重大的他性为导向的伦理规范和政治策略；2)关于人狗世界的故事如何会最终说服大脑受损的美国人以及其他较少受到历史挑战的民族，让他们相信历史在自然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原则上说，《伴侣物种宣言》是一份私人文件，一次向太多的人类一知半解的知识领域发动的学术奇袭、一种在战事一触即发的全球态势中寻求希望的政治行动、一项永远处于发展进程中的事业。我会提供以一些狗啃过的道具以及尚未完全通过实践考验的论点，用来重新叙述一些故事，这些是我无论作为一名学者还是一个特定时代和环境下的个体都非常关注的故事。这里所指的故事主要与狗有关。我在叙述中投入了激情，希望能将我的读者一劳永逸地带入狗的世界里去。然而，我也期盼，即使是生性怕狗的人——或者那些仅仅把目光投向更为高雅的事物的人们——会从中发现与我们可能还要生存其中的世界息息相关的论点和故事。狗世界中的诸多习俗和活跃个体，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类，都应该是技术科学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更接近我的心愿的想法是，我想让我的读者理解我为何把有关狗的创作看作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

这不是我的第一个宣言；1985年，我发表了《赛博宣言》，试图在女性主义意义上解释当代生活对技术科学领域由外向内造成的冲击。赛博即“控制论有机体”，1960年得名于由空间竞争、冷战以及政策和研究项目中内在的技术人文主义的帝国主义幻象所构成的语境。我曾努力以批判的眼光进入赛博的角色；即，既非褒奖，亦非谴责，而是带着一种反讽精神挪用这个身份，以期达到空间战

士无法想象的某些目的。本宣言讲述了一个关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化和物种间社交实体化的故事，探讨的是两个人为并置的形象——赛博和伴侣物种——哪一个可能会为当今生命世界中的可行性政策和本体论带来更多的启示。这两个形象几乎不会构成两极对立关系。赛博和伴侣物种各自以一些始料未及的方式拉近了人类与非人类、有机物与科学技术、碳与硅、自由与秩序、历史与神话、穷人与富人、国家与臣民、多样性与枯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距离。而且，赛博与伴侣动物都无法取悦于追求物种纯粹性的人们，那些人渴望更好地保护物种之间的界限并且清除种群中的异类。然而，重要的是政治上最为正确的赛博与普通的狗之间的种种差异。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时代，我曾借用赛博来担任女性主义方面的工作。千年盛世之末，赛博无法再胜任一条称职的放牧犬的工作，即将批判性探究所需的线索集中起来。我于是便欣然转向狗，试图通过探索狗窝的诞生来为当下的科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构建方法，而在眼下，小布什政府一心想要取缔过去那种对地球上所有水生生物实施的碳预算政治中更适于生命存在的自然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一直佩戴着印有“有益于地球生存的赛博”的猩红色字样的标志，如今我在自己身上贴上了一张只有热衷于狗类运动、手牵德国防卫犬的妇女才有可能想得出来的标语口号，在那种情形之下就算被咬上一小口也会导致死刑宣判：“快快跑，狠狠咬！”

这是一个有关生命权力和生物社会性的故事，也同技术科学相关。如同任何一名忠实的达尔文主义者一样，我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进化的故事。按照（核）酸千年主义的模式，我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分子差异的故事，不过，它的根源不在于新殖民主义的《走出非洲》中的“线粒体夏娃”（译注：从理论假设的生活在约15万年前的现代人之母），而是那些最早的线粒体母狗，它们妨碍了男人再

次出现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译注：指1965年美国电影《万世流芳》，剧情讲述了基督耶稣自出生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生平事迹）。反之，那些母狗坚持构建伴侣物种的历史，一种平淡无奇而又绵绵不绝的故事，其中包含了误解、成就、罪行和不断更新的希望。我这段故事的讲述者是一名理科学生、一代走向字面意义上的狗群的女权主义者当中的一分子。其中，具有历史复杂性的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狗的在场并不意味着其他主题的缺席；狗在技术科学领域中是带有物质/符号学含义的血肉之躯。狗不是理论的替代品；它们在此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它们与人类共同生存。作为人类进化罪行中的共犯，它们从一开始就在伊甸园中，像草原狼一样狡猾。

## 摄 受

许多不同版本的过程哲学协助我将狗引入这篇宣言。例如，艾尔弗雷德·诺思·怀海特把“实在物”描述为“摄受之共生”（译注：英文“prehension”为哲学家怀海特的《过程与实在》中一个术语，意指实际存在物以自身的主体结构为依据对世界的领悟与接受，在其自身整体多样性的各种内在联系中感知外界）。对他而言，“实在物”意味着一个“实际的存在”。现实是一个活跃的动词，名词都好像动名词一样，其附加成分的数量多于章鱼的触角。生物通过相互渗透，通过它们之间的“摄受”或者相互牵绊，互为构成，塑造自身。生物不会先于相互联系而存在。“摄受”会产生一些后果。世界是运动中的一个活结。生物和文化决定论二者都是错置具体感（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实例——即，一来是把“自然”和“文化”这样的临时性、局部性的类别抽象概念错当作整个世界，二来是把显而易见的后果误视为先期存在的起因依据。世上没有先期生成的主体和客体，也没有单一的资源、统一的行动者或

者最终的结果。借用朱迪思·巴特勒的术语来讲,只有“偶然性基础”(contingent foundations);其结果就是重要的身体。一部充斥着多个施动者、各种关联和时间印记的动物寓言集甚至会超乎最异想天开的宇宙学家的想象。对我来说,这就是伴侣物种的意义所在。

我对怀海特的热爱根植于生物学,同时也更深地扎根在我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身体力行的实践中。这种女性主义理论否定了类型定势思维、二元对立论以及各种不同色彩的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为现象、过程、历史性、差异、特定性、共生、互构和偶然性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的认知手段。数十位女性主义作家已经拒绝了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主体、客体、类别、种族、物种、流派和性别是他们相互关联的产物。本书绝不是关于找寻不受权力的破坏力和生产力制约的甜蜜美好的——“女性化的”——世界和知识体系。与之相反,女性主义的研究对象是理解事物如何运转、谁在起作用、可能会发生什么,以及世上各种行为主体如何才能相互承担责任并以一种不那么暴力的方式向对方示爱。

例如,海伦·维兰在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对讲约鲁巴语和英语的小学数学课教学进行研究,还参与了有关数学教学和环境政策研究的澳大利亚土著项目,她在这个过程中界定了“新兴的本体论”(emergent ontologies)。维兰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不同知识实践范畴中的人们如何才能“和谐共处”,特别是在一种简单轻率的文化相对主义无论是从政治、认识论还是道德角度来看都不是一个恰当选择的情况下?在十分看重差异的后殖民世界中如何普及一般性常识?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在新兴的实践中拼凑出来;即,在易受攻击却脚踏实地的作品中一些不和谐的个体和生活方式被生拉硬拽到一处,而这种不和谐源于它们相互之间毫不相干的历史遗产和几乎不可能却完全必要的未来共同命运。对我来说,这就是意义重大的他性的意义所在。

查理斯·汤普森曾在圣地亚哥研究过辅助生殖实践,随后又在肯尼亚研究环境保护科学与政治,他提出了“本体舞蹈编排术”(ontological choreographies)的概念。生命之舞的脚本不仅仅是一个隐喻;人类和非人类的身体被肢解后再按照某些程序拼装起来,这些程序使得自我确定性和人文主义或器质论的意识形态成为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错误指南,更不必说对于个人经历而言了。

最后,玛里琳·斯特拉森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史和政治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也对英语中的亲属称谓习惯进行过调查研究,她引用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为何将“自然”与“文化”看作两极对立或者普遍类别的做法都是愚蠢之举。作为一名研究关系类群的人种学家,她说明了如何通过其他类型学来进行思考。我们不是搞两极分化,而是要把现代几何学家发热的头脑当作完整的画板来绘制关联性。斯特拉森从“部分关联”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即,参与者既非整体也非部分的模式。我将其称作意义重大的他性之间的关系。我把斯特拉森看成一位自然文化的人种学家;她不会介意我是否会邀她进入狗窝,进行一场物种间的对话。

对于女性主义理论家来说,谁人与何物存在于世的问题正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哲学命题,引导我们所有人进行理解伴侣物种的训练,既在传说中以化学方式蚀刻在每个细胞的DNA上的深度时间里,也在留下更多气味踪迹的近期活动中。按照老式的说法,《伴侣物种宣言》是一份认亲声明书,许多实际存在的种种摄受之共生使其成为可能。伴侣物种取决于偶然性基础。

而且,如同一名无法将自然与文化正确区分开来的颓废的园丁所制造的产品一样,我的亲缘网络形状看起来不像一棵树,而更像一座藤萝架或一个游乐场。你无法区分上与下,一切似乎都朝一旁倾斜着。这种侧向运动的蛇状行程是我的主题之一。我的花园里到处都是蛇,到处都是藤萝架,到处都曲径通幽。由于受过进

化人口生物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的指教,我知道基因的多向流动——身体和价值的多向流动——一直都是地球上的生命游戏的名称。它当然也是进入狗窝的途径。无论人与狗还能证明些什么,这些形体庞大、全球分布广、在生态学上具有机会性、喜好社交群居、哺乳类同行者已经在它们的基因组上留下了耦合与传染性交往的记录,这记录会让哪怕是最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感到不快。就连在对现代纯种狗抱有幻想的加拉帕哥斯群岛(译注:位于厄瓜多尔西部)——在那里,分离与阻隔繁殖种群并减少他们遗传的多样性的做法看起来好像模仿人口瓶颈和传染性疾病等自然灾害的标准示范试验一样——大量的不安分的基因流动也无法被阻止。受到这种交互性的启发,我冒着疏远那曾与我形影不离的旧日同伴赛博的危险,试图说服读者,让他们相信狗类可能是穿越当今第三个千年盛世的生物技术政治丛林的更好的向导。

## 伴 侣

在《赛博宣言》中,我试图书写一份替代性协议,推出一个象征物,树立一个生活在当代技术文化中的隐喻,在对技术和实践表示敬意的同时也与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后核世界的永久战争机器及其超越现实并且极具物质特性的谎言保持着关联。赛博可能会是生活在矛盾之中的人群,关注着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文化,反对可怕的自生神话,完全接受死亡的必然性为生命的条件,敏锐地察觉以各种偶然性的规模繁衍于世的新兴历史杂交物种。

然而,赛博的各种变体几乎无法穷尽技术科学中本体舞蹈编排术所要求的重点工作。我已经开始把赛博看作更大的奇异的伴侣物种家族里的小字辈,这些物种中的生殖生物技术政治通常会令人感到惊讶,有时候甚至给人带来惊喜。我很清楚,在哲学问题研究年鉴或者自然文化民族志中,养有一条参加灵敏赛的狗的一

位中年美国白人妇女比不上那些拥有自动化装备的战士、恐怖分子及其转基因亲属。而且,1)自我形象设计不是我的任务;2)转基因者不是敌人;3)在西方世界里,有很多将家养犬类想象成浑身长满绒毛的儿童案例,这是危险而违背道德伦理的,与此相反,狗不能代表人本身。的确,那就是狗的美好之处。他们不是一个象征物,不代表一个意图的实现,也不是任何事物的终结。他们就是狗;即,一个与人类之间有着强制性的、构成性的、历史性的多变关系的物种。这种关系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在快乐、新奇、辛劳、聪慧和娱乐之外也充满了浪费、残酷、冷漠、无知和损失。我很想知道如何来叙述这段共同的历史,如何在自然文化中传承共同进化的后果。

不可能只有一个伴侣物种;必须至少有两个才能成立。它存在于句中;它存在于肉体上。狗类的故事包含着无法逃避的矛盾关系——这是一些互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会先于关系而存在,关系的确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特定性与偶然变化性在自然与文化、在自然文化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没有基础而言;只有大象与大象之间一路上的相互扶持。

伴侣动物仅仅构成一种伴侣物种,两个范畴在美国英语里都不是很古老。在美国英语里,“伴侣动物”这个字眼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于兽医学校及相关场所的医疗和心理社会学工作的。这项研究告诉我们,除了为数很少的那些不爱狗的纽约人专门盯着街上未加清扫的狗屎以外,养狗能够降血压,还能帮助人们安然度过童年、手术和离婚等危机时期。

当然,欧洲语言早于美国生物医学、技术科学文献几个世纪就有将动物当作伴侣而不是工作或运动型狗类的记录。此外,在中国、墨西哥以及古代或当代的其他地方都存在大量文件、考古和口头等形式的证据充分表明狗在承担许多种其他工作以外还被当作宠物来饲养。在美洲早期,狗帮助不同种群的人们运送货物、打猎

和放牧。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狗是食物或羊毛的来源。养狗的人们都乐于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与亚历山大大帝那一次次堪称典范的御驾亲征相同，狗在欧洲征服美洲大陆的过程中都曾在人的指使下充当了致命的武器和恐怖的工具。日本犬的饲养者、专门的狗作家约翰·卡吉尔曾以美国海军军官的身份在越南参战，他提醒我们说，在电子战事诞生之前，训练有素的狗是武器系列当中最有灵性的一种。追踪猎犬不仅吓住了奴隶和囚犯，还救助了迷路儿童和地震灾民。

罗列这些功能不会触及全世界的象征和故事里出现的差异万千的狗类历史，罗列狗所从事的工作清单也不会告诉我们狗类受到的待遇如何以及它们又是如何看待人类伙伴的。在《美洲早期的狗类历史》(耶鲁,1997)一书中，马里恩·施瓦茨写道：有些美国印第安猎犬举行的一些预备仪式类似于它们的人类伙伴，其中包括南美洲阿述亚部落的吸食迷幻剂行为。在《与动物相伴》(剑桥,1986)中，詹姆斯·塞普尔提到，对于19世纪北美大平原上的卡曼奇部落来说，马有着极大的实用价值。但是，马被人以一种功利主义方式对待，而作为宠物的狗则获得宠爱，出现在许多温情故事中，武士们为它们的死亡而哀悼。有些狗过去是祸害，现在依然如此；有些狗一直被像人一样埋葬。当代的纳瓦霍牧羊犬以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方式与它们的自然景观、羊群、人类伴侣、草原狼以及陌生的人或狗发生关联。在全世界的城市、村庄和乡间，许多狗与人类并肩生活，或多或少得到宽容，有时受到利用，也有时遭到虐待。没有一个恰当的字眼能够足以公正地表达这段历史。

然而，“伴侣动物”这个词语通过后内战时期政府赠予地上建立的学术机构里的兽医学校进入了美国的技术文化。也就是说，“伴侣动物”的血统产生于技术科学的专业知识与工业时代后期宠物饲养的普及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它们中大量颇具民主性的个体爱上了它们的家庭伙伴，或者至少是非人类伙伴。伴侣动物可能



是马、狗、猫或其他愿意接受服务犬、家庭成员或跨物种运动队队员等巨大的生物—社会身份转换的各种动物。总体来说，一种动物不会吃掉自己的伴侣动物（也不会被对方吃掉）；对于那些发生这类情况（吃掉或被吃掉）的动物，人们很难改变那些殖民主义、本民族中心论、非历史性的态度。

## 物 种

“伴侣物种”是比伴侣动物更大、更为多样的概念范畴，而且不仅仅因为它必须包括像大米、蜜蜂、“郁金香”和肠道微生物这样的有机体，它们都对人类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亦然。我想在为“伴侣物种”写关键词词条的时候强调同时回响在喉头并使其发音在语言学和历史上产生意义的四种音调。其一，作为达尔文的忠实女儿，我坚持采纳进化生物学史的音调，其中包括了人口、基因流动速度、多样性、选择性和生物种类等范畴。过去 150 年来的争论一直围绕“物种”的概念范畴是表示一个真正的生物学实体还是仅仅代表了一个易于操作的分类体系这个问题展开，这些争论既包括了夸大其词的成分，也带有弦外之音。物种是关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类，专业的科学知识对于这种现实来说非常必要。继赛博之后，生物学种类都包括什么的问题打乱了先前的有机生物种属。以种种不可逆转的方式，机械的和文本的都被划归有机世界，反之亦然。

其二，受到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亚里士多德派学者的影响，我一直将物种看作哲学范畴的一般性种属。物种是关于差异界定的，根植于因果定律的多声部赋格之中。

其三，由于我的灵魂带有深刻的天主教世界观烙印，我在物种里听到了“真实存在”教义，它支配着两个物种，即作为肉体的超物质符号的面包和葡萄酒。物种是关于物质与符号语言在肉体上的

水乳交融,融合的方式对于美国学院派的世俗新教意识和多数版本的符号学人本科学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其四,因为信奉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并且迷恋于可疑的词源学,我便在物种里听到了肮脏的利润、铜钱、黄金、粪便、秽物和财富的声音。在《爱的躯体》一书中,诺曼·O. 布朗教我如何在粪便和黄金、在爵士乐无意义的原始叫喊和文明的重金属乐声、在硬通货中寻求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结合。在现代美国的狗文化之中,我再度遭遇这种结合,那里有丰富的商品文化;有充满活力的爱欲行为;有将国家、平民社会和自由个体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有纯粹主客体构建的杂交技术。当我在手上套了晨版《纽约时报》的外层塑料薄膜——为了表示对工业化学的研究帝国的尊重——然后捡起我的狗们每天制造的、被称作粪便的微观生态系统的时候,我发现狗粪清理器简直是个玩笑,它把我带回了象征实体、政治经济、技术科学和生物学的历史事件中去了。

总之,“伴侣物种”是一首四声部重奏,实质上就是互构性、限定性、非纯粹性、历史性和复杂性的综合体。

这样一来,《伴侣物种宣言》是关于自然与文化对以意义重大的他性为纽带、在人与狗之间形成的、具有严格的历史特定性的共同生活所造成的冲击。许多人都被召唤进那个故事中受到质询,对于那些为了卫生的缘故而极力与狗保持距离的人来说也同样具有启示作用。我想要让读者相信,技术文化的栖居者变成了自然文化的共生遗传组织中的我们,故事中如此,事实上亦然。

我从法国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那里借用了“召唤”(interpellation)一词来表达主体在现代状态下是如何由具体个体被意识形态“召唤”至他们的主体位置上而得以形成的。如今,动物通过我们对它们的生活充满意识形态的叙述来“召唤”我们解释他们与我们必须生存其中的体制。我们“召唤”它们参与我们对自然和文化的构建,承担生与死、健康与疾病、长

寿与灭绝的重大后果。我们的血肉之躯相伴生活，其方式的多样性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无法穷举的。故事远远大于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在这篇长长的哲学性导言中，我违反了《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的女儿之手记》中的一条主要规则，那是我为了纪念我那位当体育新闻记者的父亲而信手涂鸦之作，也正是它激发了我写这篇宣言的灵感。《手记》要求我在讲述中不要偏离动物故事本身。寓意必须是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现在与曾经的天主教徒及其同道者——那些相信符号与肉体合一的人来说，这是一类作品的真理规则。

我写了《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的女儿之手记》，记录下这些事实，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的任务是报道赛事，至少在过去是这样。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在童年时代就曾在三甲棒球俱乐部的丹佛熊体育场里坐到深夜，看着我父亲写赛事报道并且存档。一名体育新闻记者或许比其他任何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更为奇特——需要用一些铁定的事实来编织一个故事，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文笔越生动越好；的确，如果故事忠实于事实，那么措词越是生动激烈，故事就显得越真实。我父亲不想负责一个体育专栏，尽管这在报业中是个更有面子的工作。他想要写赛事报道，希望一直待在一线附近，如实讲述真实事件，而不是为专栏这个元故事去打探丑闻，寻找视角。我父亲信奉的只是赛事本身，那是事实与故事的共生之处。

我成长在两个主要社会制度的怀抱中，它们刚好同现代主义信念水火不相容，后者以不可更改的差异为基础主张将故事与事实彻底区分开来。这两个体制——教会与新闻界——在公众眼里都已腐败堕落，并且（在经常被利用的情况下）为科学所不齿，但是它们在培养一个民族对真理的渴求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符号与肉体；故事与事实。在我出生的那所房子里，这些有

生产力的伴侣密不可分。用低贱而粗俗的狗语来说，他们媾和在一起。难怪当我长大成人后文化与自然在我眼里爆发了冲突。这种内爆的力量最大莫过于亲自体验这种关系并且说出这个可以当作名词使用的动词：伴侣物种。约翰在说“词语被化作血肉”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吗？当时，第九局正临近结束，熊之队比分落后两分，三人在场上，两人出局，两个好球，而五分钟之后比赛就会结束并且成为档案中的历史。

我同时也成长在科学大厦里，大约在乳头突起的时节就知道了有多少地下通道连接不同宅地，有多少对配偶在实证知识、可伪证假设和整合理论的宫殿里维系着符号与肉体、故事与事实之间的纽带。由于我的科学领域是生物学，我早就知道，解释进化、发展、细胞功能、基因组复杂性、历史性成型、行为生态学、系统交流、认知——简言之，解释一切可以配得上生物学之名的事物——与记录下一场赛事或者接受耶稣化身之谜没有太大差别。生物学工作者要想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对待这门科学，就必须讲故事，必须获取事实，必须横下心来渴求真理，放弃某个虽为个人喜好却被证明毫不相干的故事或事实。同时，科学工作者也必须有勇气克服困难坚守一个故事，接受其不和谐因素，亲历其矛盾，只要那个故事中包含了一个关于生命的重要真理。不正是这种忠诚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使进化生物科学得以发展并且满足了我的同胞们对有关肉体的知识的渴求吗？

按照词源学的解释，事实指的是已经完成的表现、行动、作为——总之，即成就。一个事实是一个过去分词，一件完成的事情，结束了，固定了，展示过，实施过，已经实现了。事实已为进入下一期报纸划定了截止日期。从词源上看，虚构的文学作品与之极其相近，但是在词性和时态方面有所不同。如同事实，虚构指向行动，但是虚构作品涉及构建、成型、发明的行为，还有伪造或佯攻。虚构源于现在分词，处于进行中，仍旧悬而未决，尚未完成，往

往有可能与事实发生冲突，也有可能向我们展示某些尚不为人所知却即将揭晓的真理。与动物共处，彼此进入对方的故事，试图揭示关系的真相，共同占据一段鲜活的历史：这就是伴侣物种的任务，其中“关系”是在可能的限度内最小的分析单位。

因此，我近来以记录狗类故事为生。所有的故事都以比喻的方式流通，即，表达任何事物所必需的修辞格。比喻（希腊文：tropos）意指转向或跳跃。所有的语言都会转向和跳跃；从来没有直接表达的意义；只有那些教条主义者才会认为我们能够在交流中完全抛开比喻。我最喜欢将狗类故事比喻成“词形变异”。词形变异是指一个单词中的某种变化，比如，添加、省略、颠倒或变换字母、音节或音调的位置。这个词出自希腊文“metaplasmos”，意为重塑或改造。词形变异是一个通称，几乎涵盖单词中的任何一种变化，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用词形变异来表示伴侣物种关系史上人狗肉体的重塑和生命规则的再造。

比较和对比一下“原生质”、“细胞质”、“赘生物”和“种质”。“metaplasma”（后成质）一词有着生物学含义——这正是我欣赏元词语的地方。肉体与能指、身体与词语、故事与世界：这些在自然文化中合而为一。词形变异可以带来造成肉体差异的一个错误、一次失误、一种比喻。例如，一串核酸基之中的某个替代物可能是一种后成质，它会改变一个基因的意义并且更改一个生命的进程。或者说，养狗人经过改造的某种习惯做法，比如增加异型杂交和减少近亲繁殖，很可能源于像“人口”或“多样性”这样一个词语的意义改变。颠倒词义；交流实体互换位置；重塑、改造；昭示真理的转向：我讲述的是关于故事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如此。汪汪。

在隐含意义的层面上，本宣言不仅仅是关于人狗关系的。人与狗代表了一个宇宙。显然，赛博——它们将机械与有机物历史性地凝固在信息符码之中，其中的边界不是流于浅表的，而是关于由数据界定的符号与噪音密度——完全符合伴侣物种的分类群。

也就是说,赛博提出的所有关于历史、政治和伦理的问题也都与狗类息息相关。关爱、繁衍、权力差异、时间尺度——这些对赛博来说都很重要。例如,哪种时间尺度设定能够决定劳动体制、投资策略和消费模式,使得其中的信息机器的裂殖时间变得趋同于人类、动物和植物群落与生态系统的裂殖时间?对于一台电脑或一个个人数字助手来说,什么样的废物清理器刚好合适呢?至少,我们知道,并不是在墨西哥或印度的某个电子废料堆,处理信息系统所产生的污染生态环境的废弃物的人类清理工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报酬。

涉及伴侣物种,艺术与工程学是一对有着天然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因此,人类与自然景观的搭配十分贴切地隶属于伴侣物种的范畴,并且引发了关于将狗与其人类伙伴的灵魂紧密结合的历史和关联的所有问题。苏格兰雕塑家安德鲁·戈兹沃西很清楚这一点。戈兹沃西全身心地投入了穿过植物机体、土地、海洋、冰与石的时间尺度和时间流研究。对他来说,陆地有鲜活的历史;那段历史是由人类、动物、土壤、水和岩石之间的多形式关联构成的。他制作内嵌细枝的雕刻冰晶计量器,在涌动的海岸潮间带堆砌大约一人高的层状锥体岩石,在乡间的广阔土地上建造延亘的石墙。他对于重力、摩擦力等各种作用力有着工程师和艺术家的专业知识。他的雕塑有时维持数秒,有时保存几十年;但是,生命的终结和变数从未从他的意识里消失过。过程与消解——还有人类与非人类、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介质——是他的合作伙伴和素材,不仅仅是他的主题。

20世纪90年代,戈兹沃西完成了一件名为《拱廊》的作品。他与作家戴维·克雷格发现了一条从苏格兰牧场通向一座英国市集小镇的放羊古道。他们沿着古道一边寻踪一边拍照,在标志着动物、人类与土地的今昔历史的地点作了记号,由此汇聚并分解出一座自立的红色砂岩拱廊。消失了的树木和佃农、圈地与新兴羊毛

市场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苏格兰牧羊犬与雇佣牧羊人的可能境遇、吃草的羊群及其走向剪毛场和屠宰场的情形——这些都体现在那座将地理、历史和自然史联系在一起的移动的岩石拱廊上。

戈兹沃西的《拱廊》中隐含的柯利牧羊犬不是关于“少女回家”，而是“佃农出走”。这正是 20 世纪后期风靡一时的一部关于聪慧的牧羊犬、苏格兰边境柯利羊的英国电视剧中所表达的一种可能性。自 19 世纪末起，这个品种就在基因构成上受到羊群驯养赛的影响，它已经使这个运动项目在几大洲都享有一定的盛名。也正是这同一种狗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这种灵敏性竞技运动的主角。也正是这个品种被大量地抛弃，然后又被热心的志愿者救助或者在动物庇护所里被杀掉，因为人们在著名的电视节目里观看了那些多才多艺的狗之后都想在宠物市场上买上一只，于是便突然涌现出来许多宠物市场以迎合需求。冲动型购物者很快就发现这只勤勉的狗根本无法满足于边境柯利犬的工作。而且，故事中的雇佣牧羊人以及出产食物与纤维的绵羊的劳动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肉体以多少种方式继承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动荡历史呢？

如何在这些关于异类关联——而与“人”无关——的有始有终的有限流动中寻求伦常的生存呢，这是戈兹沃西的艺术中的一个隐含问题。他的艺术一丝不苟地表现了人类特定的栖居地，但它却既非人文主义也非自然主义艺术。它是自然文化的艺术。这种关联是最小的分析单位，关乎各种不同程度上的意义重大的他性。那就是伦理的或许更好一点的关注方式，我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探讨长期以来的人狗同居现象。

因此，在《伴侣物种宣言》中，我想要讲述关于意义重大的他者的关系的故事，通过这种关系，伴侣双方在肉体和符号上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下面关于进化、爱、训练和种类或品种的狗类故事尽

管杂乱无章，却帮助我来思考如何与诸多物种和谐共存，它们在各个不同的时间、身体和空间尺度上与人类一道出现在这个地球上。我的叙述充满了个性化陈述却并不系统，带有个人倾向性却并非智者之洞见，根植于偶然性基础而非明确清晰的前提。狗类是我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但它们在伴侣物种的宽广世界中只是其中一种。在本宣言里——或者在自然文化中的生活里，部分的累加不会构成全部。反之，我想要寻求玛里琳·斯特拉森所谓的“部分关联”(partial connections)，这个关系到共同相处所必需的反直觉几何图形和不协调位移，其中的自我确定性和永恒交流的万能技巧绝非可有可无。

## 进化故事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喜欢有关狗类起源的故事。对于热心的读者来说，这些故事充满了意义，它们是斑斓的浪漫史与朴素的科学之混合物。人类迁移与交流的历史、技术的本质、荒野的意义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充斥着这些故事。判断我的狗是否爱我、区分动物当中以及动物与人类之间的智力等级、决定人类到底是主人还是受骗者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可能取决于一次严肃的科学报告的结果。评判品种的衰败或进化、判断狗类行为是由先天基因还是后天培养决定的、在老派解剖学家和考古学家与新派分子学奇才的不同学说之间作出判断、确立新旧世界的起源、确定杂种狗的祖先到底是现代濒危物种中存活至今的贵族猎狼还是与卑微的乡下狗一样靠食腐肉为生的委琐乞丐、在它们的线粒体 DNA 里找寻一种或多种犬类母系祖先的遗迹或者通过公狗的 Y 染色体搜索一种父系祖先的遗迹——所有这些连同更多问题的解决都迫在眉睫。

在我写《伴侣物种宣言》这个部分的当天，从美国公共广播公



司(PBS)到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的各大新闻网点公布了一条新闻:《科学》杂志发表了三篇关于狗类进化和驯化史的论文。几分钟之内,狗世界网的众多电子邮件都充满了大量有关该项研究的意义的热烈讨论。网站地址迅速穿越各个大陆,把消息带到了电子世界,与此同时,不上网的文化人在纽约、东京、巴黎和约翰内斯堡的日报上追踪着这一事件的报道。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人们对科学起源故事如此激烈的反应,这些叙述又会如何帮助我理解伴侣物种这种关系呢?

如何解释灵长目动物特别是原始人的进化,这可能是当今生命科学中众所周知的争论最为激烈的领域;但是,狗类进化这个领域却几乎不乏人类科学家和流行作家之间惊心动魄的混战。世界上关于狗类外表的描述无不受到质疑,也无不被各自的支持者反复引用。在流行与专业的两个狗类世界里,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1)西方话语及其相关领域之中所谓自然与所谓文化二者间的关系;2)什么人与什么物可以算作行动者的相关问题。这些事情对于技术文化中的政治、伦理和情感行为都很重要。作为狗类进化故事世界的忠实成员,我在寻求共同进化和互为构成的途径,同时也不必从故事里去掉其畜性以及多种形式的美感。

狗类据说是第一种驯化动物,从而剥夺了原先猪被赋予的荣耀。人文主义的技术爱好者们将驯化描述成为男性化、单亲、自生的范式行为,正是通过这种行为人类在发明(创造)劳动工具的过程中不断地塑造自己。驯养动物是改变时代的工具,以肉体的形式实现了人类意图,相当于在狗类身上进行自慰。人将(自由的)狼变成了(奴隶的)狗,从而使得文明成为可能。狗窝里杂交的黑格尔和弗洛伊德?就让狗来代表根据品味不同被安排走向进化或毁灭结局的故事里那些屈从于人类意图的所有驯养植物和动物物种吧。资深的生态学家乐意相信这些故事,目的却是为了以堕落成为文化的荒野的名义憎恶它们,正如人文主义者相信它们的目

的是为了抵御生物对文化的侵袭一样。

近年来,这些传统叙述已被彻底改过,在流传中一切都打着游戏的旗号,包括狗窝里的一切也不例外。尽管我知道这是时尚,但我很喜欢这些发生词形变异的改进版本,它们赋予狗类(以及其他物种)驯化的初步进展,然后又设计出分散异质作用力的永无休止的舞蹈动作。除了时尚以外,我认为更新的故事有更大的真实的可能性,它们自然也就更可能教会我们注意到意义重大的他性不仅仅单纯反映出人自身的意图。

狗类的线粒体 DNA 作为分子钟的研究表明,狗类的出现早于先前所估计的时间。1997年,出自卡雷斯·维拉与罗伯特·韦恩实验室的研究报告提出的观点是:狗类早在15万年前就从狼群中分化出来——即,就在现代智人出现的同时。这个年代没有化石或考古证据支持,后来被 DNA 研究结果所界定的5万到1.5万年间取代,而科学家们更偏向近代,因为这更便于将各种已有证据加以综合处理。这样一来,狗类就像是首先在东亚某地短期内断断续续地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出现的,然后又伴随着人类的行踪迅速地分布到整个地球。

许多阐释者指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由狼进化而来的狗最先利用了人类废弃物堆所提供的卡路里富矿。通过适时的行动,这些新兴的狗在行为上并且最终在基因构成上适应了耐力距离的缩短、惊弓之鸟般的逃亡举动的减少、与更广泛的跨物种交际窗口期相一致的幼犬成长期,以及与危险的人类平等分享地盘的增长。从多代俄国长毛狐中选择出来的不同驯良程度个体的研究显示出许多与驯养有关的形态和行为特征。这些狐狸或许与一种原始“乡下狗”的诞生颇具类比性,这种狗如同所有狗类一样在基因构成上与狼相近,但是在行为上却有所不同,而且能够接受人类推进驯化过程的做法。通过人为控制狗类繁殖(比如,杀死多余的幼犬或是有选择地饲养一些母狗),通过无意却作用明显的一些后

果,人类原本可以对早先出现在故事中的多种狗类的形成有所帮助的。人类与狗类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两个物种来说,灵活性和机会主义就是游戏的名称,它们在绵延不绝的共同进化过程中彼此塑造。

学者们利用这个故事的多个版本来质疑自然与文化的鲜明分野,以便为技术文化制造一种更具生产性的话语。狗类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达西·莫里认为,人工与自然选择的区分毫无意义,因为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关于差异生殖的。莫里弱化了意图的重要性,而是将行为生态学推到了前台。环境史学家、技术史学家、科学研究学者埃德·拉塞尔提出,狗类品种的进化是生物技术史上的一个篇章。他强调人类中介的作用,并把有机物看作人为设计的技术,但是其方式使得狗类拥有主动权,同时也突出了人类文化与狗类之间不断发展的共同进化。科技作家斯蒂芬·巴蒂安斯基坚持认为,总体来说,包括狗类驯化在内的驯化行为是一个对人类及其相关物种双方都有益的成功进化策略。有大量的实例为证。

如果将这些叙述加以综合考虑,那么就要求对驯化和共同进化的意义作出重新评价。驯化产生于同居的过程,涉及多种媒介,这些故事都不会有助于形成新一版本的原罪堕落说,也不会为任何人带来某种确定的结局。同居不意味着卿卿我我的暧昧关系。伴侣物种不是那类供 20 世纪早期格林威治艺术村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谈资的友伴式配偶。关系形式多样化,悬而未决,尚未完成,相因而生。

共同进化的界定需要比生物学家通常的定义更为宽泛。当然,像花朵的生殖构造与传播花粉的昆虫的器官这种肉眼可见的形态之间的相互适应就是共同进化的结果。但是,将狗类身体和心智的变化看作生物学范畴,同时把人类身体和生命中的变化,比如畜牧或农业社会的兴起阶段的变化,看作文化范畴,从而与共同进化无关,这就是个错误了。至少,我怀疑,人类基因组包含了大

量关于其伴侣物种的病原体的分子记录,其中包括狗类在内。免疫系统不是自然文化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它们决定着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机体能够在哪里并且与什么一起生存。假如没有人类、猪、家禽和病毒的共同进化的概念,流感的历史就会变得难以想象。

不过,疾病不可能是生物社会故事的全部。一些评论家认为,就连像人类过度发达的语言机能这样的基本现象的出现都是因为相关的狗类承担了需要敏锐味觉、声觉的任务,从而把人类的面部、喉咙和大脑解放出来投入聊天活动的缘故。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是,我敢肯定,我们一旦减少了自身对新兴自然文化的非抵制即逃避的反应,不再把目光局限于生物简化论或文化单一论,人类和动物都会显得有所不同。

我受到生态发展生物学的最新观念鼓舞,或者,用发展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的话讲,就是“生态发展”(eco-devo)。新分子技术与许多学科的发散型资源使得这门年轻的科学成为可能,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发展动因与时机测定。有差异的、与特定语境相关的各种可塑性构成了规则,有时为基因构成所吸收,有时则不然。从微小到巨大的有机体在各个层面上实现环境和基因信息结合的方式决定了它们的最终形态。没有时间或地点标明遗传的终止和环境的开始,基因决定论充其量不过是狭义的生态发展可塑性的一种片面表达。

宽广的大千世界充满了自行其是的生命。例如,玛格丽特·麦克福尔一倪已经证明,夏威夷短尾乌贼只有在胚胎受到发光细菌的侵袭的情况下发光器官才能正常发育。与之类似,人类的内脏组织离开了菌类植物的入侵也便无法正常发育。地球上各种各样的动物形态都出现在海洋里充满细菌的咸水中。进化中的动物的生命历程的所有阶段都不得不与它们体内外寄生着的活跃细菌相适应。一旦科学家们找到寻求证据的途径,复杂的生命形式的

发展模式很可能会体现出这些适应性变化的历史。地球上的生命是可以掌控的,具有机会主义的偶然性,往往会将不般配的伴侣强行拉进某种新型的共生遗传关系。互为构成的伴侣物种和共同进化是一般规律,而非特例。这些论点构成了我的宣言中的主体隐喻,只是本体与喻体之间相距并不遥远。比喻促使我们想要看,需要听,寻求把我们从祖辈相传下来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的意外发现。

## 爱情故事

在美国,人们通常认为狗类具有“无条件的爱”的能力。按照这种想法,人们在与同类的关系中为误解、矛盾心理和复杂性所累,却从自己的狗身上获得无条件的爱,从而找到心灵慰藉。反过来说,人们也像爱孩子一样地爱他们养的狗。在我看来,这两种看法如果不是基于谎言,也是源自错误的认识,而且它们本身也构成一种侮辱——对狗类和人类都是如此。乍一看,狗与人之间一直存在着覆盖面很广的大量沟通渠道。然而,就连在当今消费文化的宠物一族之中,或许可以说特别是在这些人当中,信奉“无条件的爱”有着致命的危害。人类通过在工具中实现自己的意图,从而构建自我,这些工具包括驯养的动物(狗)和电脑(赛博),如果说这种观点是被我称作人文主义技术爱好者自恋情结的一种神经官能症症状的话,表面上与之相对的认为狗类通过无条件的爱来拯救人类灵魂的观点或许是狗类爱好者自恋情结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吧。由于我认识到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人狗之爱的珍贵性,对无条件的爱的话语表示异议尤为重要。

J. R. 阿克利的离奇杰作《我的狗“郁金香”》(1956年在英格兰首次私人印刷)内容是关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期间作家与他的“阿尔萨斯”母狗之间的关系,它为我的反对意见提供了一种思

路。从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的开篇，历史就在读者眼角的余光里隐约闪烁着。两次世界大战过后，英格兰的一条德国牧羊犬被命名为阿尔萨斯，这是那些充满否定和更迭的琐碎小事之一，而正是这些小事使我们得以重新开始忙于生活。“郁金香”（现实生活中叫做奎尼）是阿克利生命中的挚爱。作为一位重要的小说家、著名的同性恋者和出色的作家，阿克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那份爱的尊重，他认识到自身肩负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他首先要想办法了解这一条狗的需求和欲望，其次还要不遗余力地确保她能如愿以偿。

“郁金香”被人从第一个家里解救出来时，阿克利几乎没有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理想中的爱的对象。他也怀疑他自己也不是她心目中的爱人。随后发生的传奇故事与无条件的爱无关，而是关于如何进入一个主体间性世界的努力，即在一个凡间关系的所有肉体细节中遭遇对方。行为生物人类学家芭芭拉·斯马茨会赞同这种关系，她曾经大胆地写过人与动物、动物中间的主体间性和友谊。阿克利不是行为生物学家，却持有与他所处的文化相一致的性学观念，他在“郁金香”的阶段发情期里着手为她寻找一个合适的性伴侣，这种做法既滑稽又感人。荷兰环境女性主义者芭芭拉·诺斯克曾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肉类制造的“动物工业情结”丑闻，她提议将动物当作科幻小说意义上的“另类世界”。阿克利对他的狗所具有的意义重大的他性深信不疑，因此他肯定会理解。“郁金香”举足轻重，这改变了他们双方。在某些方面，他对她也很重要，而这些方面无论是否与语言学有关，只能在任何符号学实践允许的范围内阐释。这些错误认识与昙花一现的正确认识一样重要。阿克利的故事充满了面对面的世俗之爱所包含的那些意味深长的身体细节。从他人那里接受无条件的爱是一种几乎不可原谅的神经质幻觉；而努力满足恋爱所需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条件却是另外一回事。了解亲密他者的不断

求索以及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悲喜错误都会赢得我的敬意,无论对方是动物还是人类,抑或无生命体。阿克利与“郁金香”的关系可以赢得爱的名义。

我从几位终生养狗者的教导中受益匪浅。这些人很吝啬地使用爱这个字眼,因为他们厌恶有人将狗类视为喜欢爱抚、毛茸茸的、具有孩子般依赖性的附属品的做法。例如,琳达·韦塞饲养大比利牛斯牲畜护卫狗已三十年有余,在繁殖方面积极倡议健康方式,而且在这些狗的照料、行为、历史和健康等各个方面都堪为人师。她对狗和养狗人都有着异常强烈的责任感。韦塞强调对某一种狗、某一个品种的热爱,她讨论的问题是:若是将这些狗作为整体来关注而不是只关心自己养的狗,人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她毫不迟疑地建议杀死一只攻击人身的救援狗或任何咬伤过儿童的狗;这么做可能意味着挽救这个品种的声誉和其他狗的性命,更不用说儿童的生命了。所谓“完整狗”对她来说既是一个种类,也是一个个体。这份爱引导她和其他那些收入极其有限的中产阶级进行科学和医学的自我教育,从事公益行动,教化他人,并对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韦塞也谈过她那条特殊的“宝贝狗”——一条多年前与她同住、至今仍然令她心动的母狗。她以尖刻的抒情风格描述现在养的一条狗,那狗十八个月大时来到她家,咆哮了三天,可如今也能从她九岁的孙女手里接饼干,允许那孩子拿走食物和玩具,并且以宽容的方式统领着家里更年幼一些的母狗。

我对这条母狗的爱无以言表。她聪明、骄傲、一级棒,如果四处乱叫是我一生中需要付出的代价,那就随它去吧。(大比利牛斯讨论小组,2002年9月29日)

韦塞显然很看重这些情感和这些关系。她急于坚持表白自己

的爱归根结底关系到：

与一个不同的生物分享生活的深刻乐趣，乃至喜悦，这个不同的生物有着不同于我们的思想、情感、反应，或许生存需要。而且，为了让这个“类别”的所有物种都茁壮生长，我们必须学会去理解并尊重这些生物。（大比利牛斯讨论小组，2001年11月14日）

把狗看作身上长毛的儿童，哪怕是在比喻意义上，相等于贬低了狗和儿童——并把儿童树立为撕咬的靶子，把狗树立为杀戮的对象。2001年，韦塞家里养着11条狗和5只猫。在她全部的成人生活中，她曾经拥有、喂养并展出过多条狗；同时，她养育了三个孩子，身为一名略带激进倾向的女性主义者，过着充实的平民政治生活。与她的孩子、友人和同事分享人类语言是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尽管我的狗可以爱我（我这样认为），可我从未与其中任何一个进行过有趣的政治谈话。另一方面，尽管我的孩子可以与我谈话，可他们缺乏那种真正的“动物”性，它使我哪怕只是短暂地触摸到与我的同类如此不同的另一个物种的“生物”，这短暂地带给我的现实体验令我感到敬畏。（大比利牛斯讨论小组，2001年11月14日）

以韦塞所指的那种方式爱狗，与宠物关系并不相悖；的确，宠物关系能够并经常助长这种爱。在我看来，当宠物对狗来说是一项高要求的工作，需要具备与那些出色的工作犬相同的自控能力、情感与认知技巧。许多宠物和饲养宠物的人都值得尊敬。另外，人类与宠物之间的嬉戏，以及仅仅一起外出闲荡来共度安详时光，



会给参与者带来很大的乐趣。当然，那是伴侣物种的一个重要意义。然而，在类似我所所处的社会中，宠物的身份会将一条狗置于特别危险的境地——当人类对它的爱消退时，当方便问题成为人类首要的考虑因素时，或者当这条狗不能满足人们对无条件的爱的空想时，它就面临着被遗弃的危险。

我在调查中遇到的很多严肃的养狗人都强调工作对狗的重要性，这些工作会使它们不那么易于受到反复无常的人类消费观念的伤害。韦塞认识的很多饲养家畜的人的护卫犬都因为它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受到尊敬。一些狗从人那里得到爱，另一些则不然，但是它们的价值并不由好感的程度来决定。尤其是，这些狗的价值——连同生命——并不取决于人类是否感觉狗爱自己。相反，狗必须完成他或她的工作，剩下的就如同韦塞所讲，都是次要问题了。

精明老道的边境柯利狗作家、牧羊狗训练师唐纳德·麦凯格颇有同感。他的小说《诺普的希望》和《诺普的考验》对牧羊犬与主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精彩的介绍。麦凯格指出，牧羊犬作为一个类别界于“‘家畜’和‘同事’之间的某个位置”（犬类遗传学讨论小组，2000年11月30日）。这种身份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有时候狗在工作中的判断力可能会比人强。尊敬和信任，而非爱，是为了在这些狗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而提出的苛刻要求。狗的生活更多取决于技能——还有一个不会崩溃的农村经济——而较少受到一种很成问题的空想的影响。

麦凯格热衷于强调育种、培训和工作的必要，旨在维持他最熟悉并且关心的品种狗所具有的可贵的放牧能力，可我认为他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低估和错误描述了狗世界中宠物行为与竞技表演之间的关系。我也在怀疑他与狗的交往能否被称作爱，假设这个字眼没有如此严重地受到我们的文化对狗类的儿童化处理以及拒绝尊重差异的倾向的玷污。狗类的自然文化需要他对功能狗的坚定

信念,这唯有通过人为安排的与工作相关的实践才能得以维持,其中包括繁殖和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工作。我们需要韦塞和麦凯格对某种狗、整体狗、特定狗类所从事的工作的了解。否则,爱会无条件地杀死种群和个体。

## 训练故事

摘自《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的女儿之手记》:

我的教子马可是凯恩的教童;她是他的教狗。在训练中,我们是虚构的亲友团。我们的家族盾徽或许可以从伯克利狗类文学、政治与艺术杂志里获取它的座右铭,这份杂志模仿的是《巴布》风格;也就是《犬吠》,报头题字是“狗是我的副驾驶”。在凯恩12周大的时候,马可6岁了,我和丈夫拉斯顿送给他幼犬训练课程作为圣诞礼物。每逢周二,我把凯恩装在她的柳条筐里带在汽车上,从学校里接上马可,开到汉堡王吃一顿由汉堡包、可乐和炸薯条组成的高热量的健康营养套餐,然后再到圣克鲁斯的动物保护协会(SPCA)上课。像同一品种的许多狗一样,凯恩是一只聪敏、听话的年轻狗,天性习惯服从命令。像在高速视觉特技效果和自动控制的电子玩具时代长大的许多同代人一样,马可是个聪明伶俐、积极进取的教练员,天生习惯操纵游戏。

凯恩很快就掌握了要领,一听到“坐下”的命令就迅速从地上抬起后臀。另外,她还在家里与我一起练习。兴味盎然的马可起先把她当成了一辆内置微型芯片的卡车,遥控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按一下想象中的按钮;他的小狗就会奇迹般地完成他那进行遥控的万能意志下的心愿。上帝很可能要成为我们的副驾驶。我作为一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

公社里长大的成年人顽固地信奉万物具有主体间性和相关性的理念,其中自然包括狗与男孩的训练。抱有相互关注和交流的幻觉总要比什么都没有强,但是我其实想要的远不止这个。而且,在这里,我是两个物种之中唯一的成年人。主体间性不意味着“平等”,后者简直是狗世界里一个致命的游戏;而它是指关注面面相对的意义重大的他者的联合共舞。除此以外,尽管我不擅长控制,我不得不担任指挥,至少在每个周二晚上。

马可同时还在上空手道课,他深深地爱上了他的空手道师父。这个细心的男人深知,除了心智、精神、身体三个层面的训练以外,孩子们还热爱他的武术中的戏剧性、仪式和奇装异服。“尊重”,这是马可欣喜若狂地告诉我他从课程里学到的词语和行为。他将自己罩着袍子的小身体收拢成预先指定的姿态,在做一套动作之前向他的师父或同伴规规矩矩地鞠躬行礼,并为得到这样的机会而神魂颠倒。作为不听话的一年级生,他在准备做高难度的规定动作时尽力使忐忑不安的心镇定下来,并且直视他的老师或同伴的眼睛,这令他感到兴奋不已。嗨,我会白白放过这样的机会,不让它为我的伴侣物种事业的繁荣服务吗?

“马可,”我说,“凯恩不是一辆电动卡车;她是你在一项名叫服从的武术里的同伴。你在这里是年长的一方兼师父。你已经学会了如何用你的身体和眼睛来表达尊重。你的任务就是把这套动作教给凯恩。在你找到一个办法教给她如何控制自己飞奔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凝视你的眼睛之前,你无法让她执行‘坐下’的命令。”她只能看手势坐下,他只能“卡达卡,发奖赏”(译注:训练狗表演特技的一种小玩意。是由一片薄铁片制成,一端固定,一端没有固定。使用时,主人可握在手中,用拇指按没有固定的那一端,就会发出响声),这是不够的。

当然,那也是必要的,但是指令是错的。首先,这两个年轻的生命要学会注意对方。他们必须进入同一个游戏。我相信,马可在接下来的六周里开始变得像一名驯狗师了。我也相信,当他学会用肉体姿势向她表示跨物种的尊重时,她和他就互为意义重大的他者了。

两年以后,我透过厨房的窗子,瞥见马可在空无一人的后院里与凯恩玩十二根穿梳杆游戏。穿梳杆是最难教会和最难完成的灵敏度训练项目之一。我觉得,凯恩和马可的动作做得迅速而优美,完全对得起他的空手道师父的教导。

## 积极的束缚

2002年,资深的灵敏赛选手兼教练苏珊·加勒特写了一本受到广泛好评的训练小册子,题目是《王牌之爱》,由以狗类灵敏度题材为导向的克林-朗制造公司出版。这本小册子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与近二十年来狗世界里大量涌现的颇为流行的积极型训练方法为基础,对任何想要与她或他的狗建立更为密切、更为默契的训练关系的养狗人都会有所启示。当然也要考虑到狗不肯应声而来或有不恰当的进攻行为等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加勒特试图向人们灌输生物行为学研究所提倡的态度,并把行之有效的工具交到那些向她学习灵敏度的学生手里。她的目的在于说明如何缔造一种以积极关注为特征的关系,它能给狗和人类双方都带来好处。先前最懒散懈怠的狗会获得一种无须选择的、自发的、有针对性的热情。我强烈地感到,马可在他的进步教育小学里接触的是一种与之相近的教学法。这些规则在理论上很简单,却巧妙地隐藏着对实践的苛刻要求;也就是说,采用即时信号来表示一种想要对方实施的行为,然后在与特定物种相适合的时窗内发出奖赏。时下流行的积极型训练咒语“卡达卡,发奖赏”只是一座巨大的后“规训

与惩戒”冰山的一角。

需要强调的是，正像加勒特的小册子的封底上的卡通漫画宣称的那样，正面鼓励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事实上，我以前读过的狗类训练手册中还没有一本比它更推崇近乎全面的控制，目的是满足人类意图，这里的人类意图指的是在一种高要求、双物种的竞技运动中的巅峰表现。那种表现只能出自一支具有高度进取心的队伍，队员行动不是迫于压力，而是熟悉彼此的能量，信任指挥姿势和回应动作的可信度和连贯性。

加勒特的方法在理性和实践上都很苛刻。人类一方必须妥善安排，以至于狗把这个笨拙的两足动物视为一切美好事物的来源。整个训练期间，一般为几个月的时间，必须尽可能减少狗从其他途径获得奖赏的机会。浪漫的人可能会对一些要求感到怏头，比如，将狗一直关在柳条筐里面，或是用一条皮带松松垮垮地系在自己身上。禁止随意享用与同类自由嬉戏、追逐顽皮挑逗的小松鼠或爬上沙发等乐趣——除非并且直到狗能够表现出自我控制力，对人类指令的回应率接近百分百。人类必须详细记录下狗在每项任务里的实际正确回应率，而不是根据虚假判断编造自己的狗如何达到天才水准。在王牌之爱的世界里，不诚实的人会遇到很大麻烦。

对狗有大量的补偿方法。狗还能从另外什么地方得到每天几个小时的集中培训，每次课不仅在设计上都会确保它不犯错误，而且会接二连三地得到好吃的食物、玩具和自由？而这些都是专门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并维持这位个性已被熟知的特殊学生身上的进取心而精心安排的。狗世界里还能有另外什么地方的培训实践会使狗学会如何学习的技能，热衷于表演一些可能会变成运动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新奇“行为”，而不是郁闷地服从（或者不服从）不能领会其要旨的强迫性命令？加勒特指导人类仔细记录下狗真正喜爱的事物清单；她教给人们如何以狗类喜爱的方式与同

伴戏耍，而不是完全不顾狗的意见，一味机械地朝它们扔球或强迫它们进行激烈活动。除此以外，人类必须真正从适合狗类的嬉戏方式中得到乐趣，否则对方就会有所觉察。加勒特在书中列举的每个游戏或许要求实现按照人类目标所规定的成功，但是，游戏需要吸引狗参与其中，否则就毫无价值。

简言之，它对人类提出的主要要求恰恰是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不了解如何去做的事情——即，如何认识到这些狗的个性，倾听它们的心声，不是在无生命的抽象理念中，而是在一对一的关系中，在有关联的他性中。

加勒特的实践和教学法没有余地对自然狗的狂野心灵或者哺乳类动物社会平等的空想进行浪漫想象，但是其中有大量篇幅对注意力控制和诚实业绩展开讨论。这个富有戏剧色彩的训练中没有心理和肉体的暴力；行为管理技术扮演着显著的角色。我在按照加勒特的方法进行训练的过程中犯过不少善意的错误——其中一些给我的狗带来痛苦，一些给人类和其他狗带来危险，更不必说对灵敏度训练的成功毫无帮助。重要的是以科学知识为依据并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学习理论不是空谈，即便它仍然是一种有严重局限性的话语，是一种粗糙的工具。然而，作为一名文化批评者，我没有能力推翻处于巨大压力下、以成功为导向、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所大肆宣扬的暴力爱的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泰勒式科学管理原则和美国商界的人事管理科学为后现代灵敏赛训练领域找到了一个安全稳妥的理论框架。作为一名科学史学家，我也无法忽视积极型训练话语中那些有关方法和专业知识的浮夸的、脱离历史语境的、过度空泛的主张。

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我那本翻烂的《王牌之爱》借给朋友们，并把我的“卡达卡”装置和肝饼奖赏藏到了口袋里面。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加勒特迫使我不得不承认：像我这样的养狗人具有如此出色的自我欺骗能力，我们在反复无常的训练中和对实际情况自欺欺

人的评估中将自相矛盾的空想投射到我们的狗身上。她的积极束缚教学法为狗提供了一种严肃的、具有历史特定性的自由；即，安全地生活在多物种的城市和郊区环境中的自由，在进行一项高难度的运动时几乎没有身体束缚，完全没有肉体惩罚，带有明显的自我实现的进取心。在狗世界里，我正在领会我的大学老师们在关于自由和权威的讨论课上宣扬的观点。我想我的狗更喜欢强悍的王牌之爱。比起我来，马可心存更多疑惑。

## 艰苦之美

维基·赫恩——一位著名的伴侣动物训练师，斯塔福德小猎犬和艾尔谷硬毛犬这类名声已遭诋毁的狗类的爱好者，也是一名语言哲学家——乍一看刚好与苏珊·加勒特相反。赫恩已于2001年去世，却仍然是积极型训练方法的拥戴者的眼中钉肉中刺。赫恩生前没有从老路上回头，转而全盘接受新观念，这令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专业训练员和普通养狗人都感到愕然，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近乎宗教性的转变，先前军训式的科勒驯狗法当中猛拽皮带和硬拉耳朵等纠错方法给人留下了不太美好的记忆，可这已经转化成了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家的赞许眼光下快速发放肝饼的快乐。她对“卡达卡”训练方法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而她反对动物权利话语的态度更为激烈。我在她针对我新发现的这种训练方法展开的猛烈抨击面前不寒而栗，也为她针对动物权利观念提出的尖锐批评而欣喜。然而，赫恩对嗜好卡达卡方法和迷恋权利说的人提出的批判逻辑严密并且有力度，赢得了我的尊敬，使我认识到了一种亲属关系。赫恩和加勒特在本质上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姐妹。

这种近亲繁殖关系的答案在于她们都集中关注狗类向她们表达并要求实现的愿望。这两个有头脑的人以令人惊叹的恩典对狗类投入了关注，照顾到所有这些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并把这当作

对关系实践的无条件要求。无疑,行为主义训练员与赫恩在方法上有着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些可以通过经验研究得到解决,另一些则根植于个人才能和跨物种的超凡感知力中,或者各种不同的实践群体间不具可比性的默知识当中。分歧中的一部分也可能存在于人类的顽念和狗类的投机行为。但是,“方法”在伴侣物种中不是最要紧的问题;重要的是超越无法简化的差异而达到“沟通”。重要的是特定情境下的部分关联;结果,狗与人一同出现在那个“猫的摇篮”般的复杂游戏中。尊重便是游戏的名称。出色的驯狗师在意义重大的他性的旗帜下严格遵守伴侣物种关系的纪律。

赫恩最有名的书是关于伴侣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交流的,书名《亚当的任务》(兰登书屋,1982)起得并不恰当。这本书探讨的是双向对话,而不是命名问题。亚当轻松地完成了分工明确的任务。他不必担心如何回话;上帝,而不是一只狗,按照自身形象把他变成了他现在的样子,丝毫不差。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的是,当人类语言不是媒介的时候,赫恩不得不为交流而担心,不过,不是因为多数语言学家或语言哲学家可能会列举的种种理由。赫恩喜欢让训练员在工作中使用日常语言;事实证明那种用法对于理解狗可能想对她表达什么非常重要,这并不是因为狗讲的是带皮毛的人语。她坚决维护所谓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许多观点,没有人比她更加有说服力地要求马戏团驯兽员、马术师以及热衷于狗类驯化的人采取意图明确、意识先导的语言实践。这种在哲学上令人困惑的语言都很有必要,它时刻提醒人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对那些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动物相当了解。

到底何人是专家,这一定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究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不可能了解别人或者自己,一定要抱着尊重的态度不断地问什么人、什么物出现在关系里。这适用于所有真正的爱侣,无论什么物种。神学家描述了“反面认识”上帝的力量。因为神圣的人与物是无限的,一个有限的生物在没有偶像崇



拜的情况下只能说出它不是什么；也就是说，不是自身的投射。这种“反面”了解的另一个名称是爱。我认为那些神学思考在了解狗方面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有助于建立一种可以被称作爱的关系，比如训练。

我认为物种内或物种间的所有伦理关联都是由蚕丝般结实的线结成的，这条线索就是对关联中的他性的不断的敏锐洞察力。我们不是一体，存在取决于一起相处。其责任就是要询问有谁在场，有谁就要出现。我们从近期研究中得知，狗类，哪怕是狗窝里养大的幼犬，在觅食测试中对人类的视觉、指引（用手指）和敲击暗语作出反应时，远远优于智力普遍较高的狼或类人猩猩。狗在物种和个体时间中的生存一般取决于它们对人类的正确解读。我们有理由相信，多数人类能对狗类的愿望作出回应，这不仅仅是巧合使然。赫恩的辩驳卓有成效，在她看来，有经验的驯狗人使用的是表达意图的术语，这可以避免那种拘泥于字面意义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后者在动物身上看到的是长满绒毛的人类，衡量它们价值的标准类似于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中享有权利的人文主义主体。

对拘泥于字面意义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抵制和对意义重大的他性关联的坚持强化了赫恩反对动物权利话语的论点。换句话说，她爱上的是伴侣动物训练中的严格等级观念可能带来的跨物种进展。赫恩认为行动中的卓越应该是美丽的、艰苦的、特定的和个人的。她反对精神功能或意识的抽象比较尺度，它将有机物列入现代主义生物大链条中并相应的赋予其特权或监护权。她所追求的是特定性。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性大屠杀被荒诞地等同于因 J. M. 科茨的小说《动物的生命》里的人物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而扬名的动物工业屠宰情结，人类奴隶制的推行被等同于动物驯化，这些在赫恩的体系里都讲不通。残忍的暴行与可贵的成就一样应该有它们自己的有效语言和伦理回应，其中包括实践中的优

先权。更具活力的世界在特定场景下的出现取决于那种区分事物的敏锐洞察力。赫恩爱上的是人狗面对面有技巧的交流时本体论舞蹈设计的美感。她深信,这是“动物幸福”的舞蹈设计,这正是她另一本书的标题。

在1991年9月发表于《哈泼斯》杂志、题为“马、猎犬和杰斐逊式的幸福:动物权利有什么错?”(网络版位于 [www.dogtrainingarts.com](http://www.dogtrainingarts.com),并附有一篇新增序言)的著名批判性文章中,赫恩问道:“伴侣‘动物幸福’可能会是什么?”她的答案是:来自奋斗、工作和实现可能性的满足感。那种幸福源于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即,源于赫恩所说的被动物驯养员们称作“天分”的东西。伴侣动物的天分大部分只能在关系型的训练工作中得以实现。赫恩因循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提出这样的观点:这种幸福基本上是关于一种恪守“正确行事”和成就满足感的伦理道德观。一只狗及其驯养员在艰苦的训练中共同找到幸福。这是新兴的自然文化的一个实例。

这种幸福类似于向往卓越以及获得追求它的机会,这是在具体事物的认识层面上,而不是抽象范畴。不是所有的动物都相同;它们的特殊性——种类和个体——很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幸福的特殊性,那是需要外在实现的东西。赫恩对亚里士多德和杰斐逊式幸福的解释关系到人类与动物作为相关生物的繁荣。如果说传统的人道主义在后电子、后殖民世界中已然逝去,杰斐逊的狗道主义或许仍旧值得关注。

赫恩把托马斯·杰斐逊带入狗窝,她相信,权利的根源在于承诺的关系,而不是事先存在的彼此孤立的类属身份。因此,在训练中,狗类从特定的人那里获得了“权利”。在关系中,狗类与人类彼此在对方身上构建“权利”,比如,要求尊重、关注和回应的权利。赫恩将狗的服从训练项目看作增加狗向人类索取权利的能力的一个场合。学会诚实地听命于自己的狗是使主人感到泄气的任务。赫恩一直毫无含糊地坚持使用政治和哲学语言,她宣称自己在教

育狗时“将自治权赋予”一种关系。问题原来不是动物权利是什么，仿佛它们的存在需要行动来揭示，而是一个人如何与一个动物建立一种权利关系？这些权利根植于相互占有之中，其实很难消解掉；而且，它们所提出的要求会改变所有伴侣的生活。

赫恩有关伴侣动物幸福、相互占有和追求幸福的权力等论点迥异于把包括“宠物”在内的所有驯养动物的生存状态都归结为“奴隶制”的做法。反之，对她来说，伴侣物种的面对面的关系使得某种新型而高雅的东西成为可能；而那种新事物不是代替主从关系的人类监护权，甚至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财产关系。赫恩不仅把人类，而且也把狗类，当作一种具有物种特定性的道德理解和严肃进取能力的生物。占有——财产——关系到互惠关系和使用权。如果我有一条狗，那么我的狗就有一个人；其中的具体含义至关重要。赫恩改进了杰斐逊的财产和幸福观，甚至就在她将这些概念引入追踪、狩猎、顺从和家庭行为的范畴中的时候。

赫恩的动物幸福与权利理念也迥异于把减轻苦难当作人类对动物的核心义务的观点。人类对伴侣动物的义务远远超过这一点，与这个领域中一直存在的残酷与冷漠一样令人感到灰心丧气。环境女性主义者克里斯·库默所描述的生长伦理接近于赫恩的方法。关系型训练实践中派生出某些重要的东西；所有的参与者都得到改造。赫恩喜爱关于语言的语言；她要是活着的话就会在整个过程中辨别出词形变异来。

## 灵敏赛训练

摘自《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的女儿之手记》，1999年10月：

亲爱的维基·赫恩，  
上个星期，一边观察我的澳洲混种狗罗兰，一边脑子里想

着你，我于是想起这些事情都是多维度并且与情境相关的，描述一条狗的脾性需要更大的精确性，非我所能。我们几乎每天都去一片允许除掉锁链自由放狗的绝壁环绕的海滩。那里主要有两类狗：拾物猎狗（又译：衔回犬）和追逐拾物猎狗者。罗兰是后者。罗兰偶然也同我和拉斯顿玩球（或者在一两块肝饼的引诱下随时都可以和我们玩），可他的心思不在这里。这种活动其实不能给他带来成就感，这体现在他缺乏风度上。但是，追起拾物猎狗来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是谁要扔出一个球或一根棍子，那些拾物猎狗就盯住他，就好像自身的性命都取决于接下来那几秒钟。其追逐者则紧盯住拾物猎狗，带着对于方向线索的高度敏感，随时准备在千钧一发之际一跃而去。这些逐狗者不会盯着球或人；它们盯的是披着狗皮的反鸟动物。属于追逐拾物猎狗型的罗兰看上去像是为柏拉图主义课程作实物模型的澳中边境柯利犬。他前半身下伏，前腿略微分开，一条腿在另一条腿前面，保持着一触即发的平衡，后背抬起一半，双眼聚精会神地盯着一处，整个身体准备有力地跃向某个方向。当拾物猎狗轻快地奔向投掷物时，追逐者便躲开他们警觉的视线，带着欢愉蹑手蹑脚地尾随而去，以娴熟的技巧围追堵截对方。出色的追逐者一次甚至能够对付多条拾物猎狗。出色的拾物猎狗则能够躲避追逐者，仍旧以令人艳羡的步伐追到猎物——或者，如果发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时，就会一头扎进海浪之中。

由于我们在海滩上没有鸭子或者牛羊等替代物，拾物猎狗只得为追逐犬服务了。一些拾物猎狗的主人不允许他们的狗身兼数任（我不能责怪他们），所以，我们这些追逐犬的主人时不时地试图用游戏分散我们的狗的注意力，而游戏肯定不能让他们获得同样的满足。周四，在看罗兰玩的时候，我在头脑里勾勒了一幅拉森式漫画：一条年老的关节僵硬的旧式英

国牧羊犬、一只可爱的以红色为主的三色澳洲犬和一条边境柯利杂种犬剑拔弩张地围住一条拉布拉多牧羊犬,许多毛色驳杂的金毛犬和一条绕着一个人转来转去的向导猎犬,而这个人——至死信奉美国自由个人主义——正试图把棍子只扔给自己的狗。

与灵敏赛教练盖尔·弗雷泽的通信,2001年5月6日:

盖尔你好,

你的学生,即罗兰和我,在本周末举行的美国狗类灵敏度协会的新手标准选拔赛(USDAA)中得到两个达标分数!

我们在周六清晨的赌徒比赛中表现不佳。最后在傍晚六点半举行的跳跃比赛中,我们在灵敏赛跑上丢尽脸面。作为辩解,我们只睡了三个小时,就在清晨四点钟起床,赶往黑沃德参加选拔赛,到了那儿时我们还能站着就已经很幸运了,不要说跑和跳了。我和罗兰在跳跃比赛时跑的是完全分开的跑道,都不是裁判规定的那一条。但是,我们在周六和周日进行的标准跑中都发挥得很出色,其中一项还赢得了冠军绶带。罗兰的脚和我的肩膀似乎天生就是要一起跳舞的。

我和凯恩下周六要去迪克森的优等狗灵敏大赛参加她的第一场趣味比赛。祝我们好运吧。跑道上有许多相互冲突并激怒的方式,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一切都很有趣,或者至少是有教育意义的。我和一名男子分析了我们周六下午各自在黑沃德的表现,我们都为美国文化(就此事而言,是我们自身)目空一切的自大而开怀大笑,我们通常都认为错误都有原因,而且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原因。诸神都在开怀大笑。

## 比赛故事

狗类灵敏运动在部分程度上是受到马类跳跃比赛的启发，它作为娱乐项目首次出现在1978年2月伦敦克鲁夫兹犬展上服从命令冠军赛之后、公布小组裁决结果之前的间歇中。同时，在灵敏度的谱系中还有警犬训练，1946年始于伦敦，使用类似高架A型框架斜坡这样的障碍，此前陆军已在警犬部队采用。狗类工作选拔赛在英国是一项严格竞赛，包括三英尺跳竿、六英尺栏板跳和九英尺跳远，这成为灵敏赛系列的第三个分支。对于早期的灵敏赛而言，不允许跷跷板进入儿童赛场；煤矿的通风井被拿来当作隧道使用。男人们——用英国驯狗师、灵敏赛史学家约翰·罗杰森的话说，许多“在矿井下工作、需要从狗身上获得一点乐趣的家伙”——成为这些活动的最初爱好者。得到宝路宠物食品公司赞助的克鲁夫兹电视台很有把握地宣称，在这项运动中，人的性别和阶级与参赛宠物的谱系一样参差不齐。

灵敏赛在英国大受欢迎，其传播的速度甚至超过了驯化后的狗在全球蔓延的速度。1986年，美国狗类灵敏赛协会成立。到2000年为止，灵敏赛在全国的几百场赛事中吸引了成千上万名迷恋者。在典型的情况下，一场周末赛事引来的狗及其主人的数量超过三百，许多小队每月举行不止一次选拔赛，每周至少训练一次。灵敏赛风靡欧洲、加拿大、拉丁美洲、澳洲和日本。2002年，巴西赢得了国际犬业联盟世界杯。美国狗类灵敏赛协会的最高级别赛事被电视台转播，录像带受到灵敏赛爱好者的抢购，他们为了解顶尖驯狗队的新招数和狡猾的裁判想出来的新型跑道设计。好几个州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训练营，上千名学员前来向著名的驯狗师学习。

如该项运动的精美月刊《克力跑》所示，灵敏赛的技术含量越

来越高了。一条跑道由二十多个障碍组成，比如跳竿、六英尺高的A形架、一组接一组的十二根穿梳杆、跷跷板和隧道，这些都被裁判按顺序排列起来。不同的比赛——被称作斯诺克台球、赌徒、配对、编花跑、穿越隧道和标准等——涉及不同的障碍配置和规则，需要各种不同的应对策略。参赛者在赛事当天首次看到跑道，可以到里面走上十分钟左右，策划如何跑。狗到实际比赛那一刻才会看到跑道。人通过声音和身体发出信号；狗按照规定的顺序穿越障碍。分数取决于时间和精确度。跑一次通常要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赛事结果在以秒为单位的差异中决定。灵敏度取决于迅速反应的肌肉，与骨骼和神经有关！根据发起方组织的要求，一个人与一条狗组成的小组在一天里要参加两到八个项目。取胜的关键在于辨别出障碍模式、掌握动作要领和突破困难障碍的技巧，以及人狗之间完美协调和沟通。

参加灵敏赛可能会昂贵；旅行、宿营、入场和训练的费用很容易高达一年2500美元。要想得到好结果，小组需要每周训练几次，并且保持健康。在时间上的要求对人、对狗都不是小事情。在美国，参赛者当中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中年白人妇女；国际上最好的选手在性别、肤色和年龄上更具多样性，但是可能在阶层上仍比较单一。各种狗都会参加比赛并且获胜，但是特殊品种——边境柯利、喜乐蒂牧羊犬、杰克拉塞尔梗——在跳高课程中表现出色。这种比赛完全是业余的，工作人员和玩家都是志愿者和参赛者。安·莱福勒和达勒·吉莱斯皮是犹他州研究(和参加)该项运动的社会学家，他们从“激情充沛的业余爱好”的角度谈论灵敏赛，这些业余爱好给区分公共/私人、工作/娱乐的界限带来了问题。我努力使我的体育新闻记者父亲相信，灵敏赛应该取代足球，与世界级的网球赛一样在电视上获得一席之地。除了在与我的狗共度时光、共同训练中获得快乐这样一个简单的个人化事实以外，我为何如此用心呢？确实，在一个充满这么多急迫的生态和政治危机的

世界里，我又如何用心呢？

对另一个人的爱、责任与技巧追求不是博弈的零和对策（zero sum）。类似于维基·赫恩所指的意义上的训练的这种爱的行为会导致像关爱其他有关联的新兴世界那种爱的行为。这就是我的伴侣物种宣言的核心。我参加过灵敏赛并且体验到它本身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也是了解人情世故的一个途径；即，对各个层面上的意义重大的他者所提出的要求变得更为敏感，这些要求的提出会使世界变得更适于生活。如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不利因素隐藏在细节之中。关联在于细节之中。有朝一日，我会写一本有分量的书，即便不效仿福柯叫做《狗窝的诞生》，也会叫做《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的女儿之手记》，为了纪念我的另一位鼻祖，旨在证明将狗与我们需要使之繁荣发展的许多其他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诸多头绪。在书中，我只能委婉地提出我的主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会借用我的灵敏赛训练老师盖尔·弗雷泽在学生面前常用的三个词组：“你抛弃了你的狗”；“你的狗不信任你”；还有，“信任你的狗”。

这三个词组将我们带回到马可的故事、加勒特的积极束缚和赫恩的艰苦之美。就像我的教练一样，一位优秀的灵敏赛教练能够确切地告诉她的学生们，他们把狗留在了哪里，什么样的手势、行为和态度阻碍了信任的建立。这都是相当直观的。起先，这些动作似乎很不起眼；时间限定太过严格、苛刻；过于强调一致性，老师又太苛求。然后，人与狗都会意识到，哪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如何共同相处，如何带着纯粹的喜悦、运用技巧跑完一段艰难的跑道，如何交流，如何以诚相待。目标是遵守纪律的自发性，这个词语看似前后自相矛盾。人和狗双方都得要做到积极主动，顺从地回应对方。任务是在一个不和谐的社会里和谐相处，生物间联手共舞，在肉体上、运动中、跑道上获得相互尊重和回应。然后再记住如何与所有的伴侣在每个层面上都如此这般地生活。



## 繁衍故事

到目前为止,该宣言强调了人、动物与无生命介质共同构成的两种时空标尺:1)在地球及其自然文化物种层面上的进化时间;2)在有限生命体和个体寿命层面上的面对面相处时间。这些进化故事都试图消除我的政治人民对生物简化论的恐惧,而且,与我那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同事布鲁诺·拉图尔一道,使他们对更加充满活力的自然科学探险产生兴趣。爱与训练的故事试图以那些无法简化的个人化细节来向这个世界表示敬意。每重复一次,我的宣言就会再次铭刻那些由关注、倾听和尊重构成的相似图形。

该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发出声音的时候了,这就是以十年、百年、人口、地区和国家为尺度的历史时间。在这里,我借鉴了卡蒂·金有关女性主义与写作技术的著作,她在著作中提出了如何识别新兴的意识形式的问题,其中包括全球化进程牵涉到的分析方法。她写了有关分散的介质、“局部与全球层次”以及有待于实现的政治前景。养狗的人需要学会如何为了实现更有活力的多物种前景而传承艰难的历史往昔。对于分层而分散的复杂性的关注帮助我避免了悲观决定论和浪漫理想主义的影响。事实证明,狗世界是由局部和整体的各个层面构建的。

我需要借助于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安娜·琴来思考狗世界中的尺度建立。她质询在当代印度尼西亚不择手段的跨国金融交易中什么才能算作“全球的”。她看到的不是已预先存在于前沿、中心、局部或全球的各种形状和比例之中的实体,而是创新型的“尺度确立”,其中,重新开放看似已经关闭的途径一直是一种可能性。

最后,我将转向——直观上讲,转移到狗世界那边——内弗蒂·塔狄亚对作为活生生的历史劳动的经验的理解,通过这个途径主体可以从结构上被纳入权力体系,而不会被简化为诸如资本

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施动者的原材料。她会原谅我将狗类算入这些主体之列，她会至少暂且给我提供人/狗之间的二元对应。让我们看看讲述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狗的历史——牲畜护卫狗(LGD)与放牧狗——以及这些种类派生出来的、其身份已经体制化的狗类——大比利牛斯犬和澳洲牧羊犬——连同没有固定种属的狗——能否有助于形成一种潜在的世俗意识，来增援我的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与社会主义者同仁们；即，增援那个如同所有的终极理想一样，只能通过否定性命名才能昭然于世的假想群体。

我会以这种否定的方式流畅地那些讲述公布事实的故事。有无数有关各种各样的狗类的起源和行为的故事，但是所有这些叙述从诞生之日就不是平等的。我在狗世界里的导师们告诉我他们过去的养狗经历，我认为这些经历都体现了对业余与专业科学的文献、口头、实验和经验证据的尊重。下列故事召唤我进入它们的深层结构，它们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反映了某些关于生活在自然文化中的伴侣物种的重要信息。

#### 大比利牛斯犬

与放牧绵羊和山羊的民族有关联的护卫犬的历史可追溯到数千年前，遍及非洲、欧洲和亚洲的广阔地区。数百万牲畜、牧羊人和狗在地区范围内长途跋涉，往返于市场以及冬夏季牧场——从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出发，经过葡萄牙和西班牙，穿越比利牛斯山脉，途经南欧，跨越土耳其、东欧，再穿过欧亚大陆，从西藏进入中国的戈壁沙漠——可以说在土壤和岩石上刻下了深深的足迹。雷蒙德和洛纳·科平杰在他们那部内容丰富的著作《狗类》(斯克布里纳，2001)中将这些路径比作冰川雕刻。地方的牲畜护卫狗从外观和态度两个方面演变为特定的品种，但是性交流总是关系到邻近地区或流浪种群。在地势更高、更靠近北方、气候更寒冷的区域

里生长的狗类形体上大于地中海或沙漠生态区域里成型的狗。西班牙、英国以及其他欧洲人在那次被称作征服的大规模基因交换的过程中将他们的獒型大体型狗和牧羊犬类小体型狗引入了美国。这种远非任意混合种群的相互关联是生态和基因人口生物学家的梦想或梦魇,取决于那种叫做历史的无情事物。

19世纪中期以后由犬畜联盟培育、已拥有完整谱系的牲畜护卫纯种犬起源于由地方品种汇集而来的不同数目的个体,比如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比利牛斯獒、法国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大比利牛斯犬、意大利的沼泽犬、匈牙利的库瓦兹犬和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牧羊犬。有关这些封闭“岛屿”(译注:意为孤立,少有杂交可能)种群的基因健康和功能意义的争论在狗世界里引发了品种之论战。一个养狗俱乐部在部分程度上类似于一个濒危物种经营联盟,特定种群的数量瓶颈和过去基因的自然和人工选择系统的颠覆都对持续不断的有组织的行动提出了要求。

在传统上,牲畜护卫犬保护羊群不受熊、狼、贼和陌生狗的伤害。它们通常在同一个羊群中与牧羊犬一起工作,但是,两类狗有不同的分工,相互交流也很有限。带有明显地方特点的小种牧羊犬到处都是,其中包括大量的柯利犬,等我谈到澳洲牧羊犬时会作详细介绍。畜牧经济中跨越广阔时空的农民牧人对他们的狗实施了强有力的功能性标准管理,这直接影响到了生存、繁衍机会和类型形成。生态条件也会对狗和羊产生影响,而不受人类意图支配。与此同时,这些狗运用不同择偶标准,自然也会不失时机地按照它们的自身性倾向而与邻居交配。

护卫犬不放牧羊群;它们保护羊群不受食肉动物侵袭,主要手段是在边界巡逻,大声狂吠吓跑陌生来者。它们会袭击甚至杀害那些坚持不肯退却的侵略者,但是它们化攻击性为威胁恐吓的能力也颇具传奇色彩。它们也会完善一系列不同的叫声,以表示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警告。牲畜护卫犬往往有着较低的狩猎冲动;

幼犬在玩耍中很少涉及追逐、聚集、头顶、足踏和抓咬游戏。如果它们与牲畜或相互之间开始像那样玩耍，牧羊人就会阻止它们。那些不听劝阻的狗将不能继续留在护卫犬的基因储备库当中。工作护卫犬向青少年狗传授经验；假如没有这样的条件，一位懂行的牧羊人就得帮助一条孤独的幼犬或更为年长的狗学着做一条合格的护卫犬——否则就会由于无知而让新手一开始就遭受失败的挫折。

牲畜护卫犬往往都是糟糕的逐物猎犬，而且，它们的生物社会倾向和教养结合起来，共同压倒了更高级的服从比赛的迷魂曲般喧嚣声。但是，它们有能力在一个复杂的历史生态环境中独立作出惊人的决定。关于牲畜护卫犬协助母羊分娩以及舔净新生羊羔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这些狗与它们的看护对象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像大比利牛斯犬这样的一条牲畜护卫犬或许会一整天都懒洋洋地趴在羊群中间，夜里却兴冲冲地四处巡逻，随时警惕出乱子。

牲畜护卫犬和牧羊犬的学习能力通常在难易程度上有所差异。两种狗都不会真正被教会做它们的核心工作，更不要说对方的工作了。狗的功能行为和态度能够而且必须得到指点和鼓励——训练，从那个意义上说——但是，在追逐和聚拢过程中得不到乐趣并且没有多少兴趣与人类合作的一条狗无法被教会如何有技巧地放牧畜群。放牧犬自幼年时起就有着强烈的狩猎欲望。确切地说，放牧就是与人类放牧者及其饲养的食草动物协调行动，控制那种捕食模式的各个构成元素，除去杀戮和肢解的部分。同样的，很难从头教会一条对占领地盘、无端怀疑入侵者和微弱的社交乐趣没有多少热情的狗如何对这类事情产生好感，哪怕用世上最大的“卡达卡”响板也无济于事。

至少从罗马时代起，根据法语记录，白色大型护卫犬在欧洲护卫羊群的历史已有几个世纪了。1885至1986年间，比利牛斯山脉狗在伦敦的犬畜联盟登过记。1909年，首批比利牛斯犬被带到英

格兰进行繁殖。在 1897 年那部里程碑式的百科全书《狗的种类》中,亨利·德白兰特伯爵花费了好几页的篇幅描述比利牛斯护卫犬。1907 年,两派法国专业养狗者在卢尔德和阿杰勒市成立了互为竞争的俱乐部,他们购买了自认为有价值并且“血统纯正”的山狗。关于纯种血统和贵族血缘的话语阴魂不散地伴随着现代品种,这些话语带有对农民放牧人及其牲畜的浪漫理想化成分,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和阶级的形成使这种生活方式几乎成为现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些法国俱乐部和大多数狗。山里的工作护卫犬遭受战争和经济萧条的蹂躏,但是,到 19 世纪末为止,他们已经因为熊和狼的灭绝而失去了大部分工作。结果,比利牛斯犬变得更像乡下狗一样四处游荡,被出卖给游客和收集者,而不是用于护卫羊群。1927 年,身为外交官、展览评委、养狗者以及比利牛斯本地人的伯纳德·塞纳克—拉格朗日联合了残存的少数专业养狗者,成立了比利牛斯犬业余爱好者联盟,写下了那份至今仍是标准制定基础的描述性文献。

20 世纪 30 年代,两位抱着严肃态度的富有的女性收集者将许多狗带出了法国,一位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玛丽·克莱恩(巴斯克犬畜联盟),另一位是生于比利时、嫁到英格兰的让娜·阿尔普·特鲁瓦·方丹夫人(芳婷犬畜联盟)。1933 年,美国犬畜俱乐部认可了大比利牛斯犬。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减少了比利牛斯山余下的牲畜护卫犬数量,并且消灭了大部分在法国和北欧登记注册的家养犬。比利牛斯史学家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有多么密切以及哪些留有后代等问题,试图查明玛丽·克莱恩、阿尔普夫人以及其他几人从村民和专业养狗户那里买了多少条狗。只有三十条狗通过繁衍后代的方式对美国比利牛斯犬的基因库作出了贡献,其中多个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世界上仅有的比利牛斯犬大群体在英国和美国,尽管后来在法国和北欧也发现了这个品种,而且美国与欧洲的饲养者之间也有交流。这

些狗类的持续存在多半起因于热心的展览爱好者和对这种狗情有独钟的饲养者。自从玛丽·克莱恩开始收集活动的 1931 年起,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比利牛斯犬之中很少有担任牲畜护卫犬的工作。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随着应对食肉猛兽的方法在美国西部出现,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放养狗杀死了大量的羊。郊狼也杀死了家畜;它们被农场主们残忍地毒死、捕捉和枪杀。凯瑟琳·德拉克鲁兹——1967 年得到她的第一条比利牛斯犬展母狗贝拉,在饲养大比利牛斯犬方面得到了该品种的加州“教母”鲁思·罗兹的指点,此人也教导过琳达·韦塞——住在索诺玛县的一座奶牛饲养场。这个中产阶级式的、西海岸的比利牛斯犬饲养背景体现了该品种的文化和前景的重要差异。

1972 年,一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科学家打电话给德拉克鲁兹的母亲,谈论食肉动物数量减少的问题。专门研究农业关联产业的大学和美国农业部开始认真对待食肉动物控制的非毒性方法。环境和动物权利活动人士开始公开发出他们的声音,试图对公众意识和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限制使用毒药屠杀食肉兽类的联邦条令。德拉克鲁兹养的贝拉在参加狗展的间隙与奶牛待在一起游荡;那座牧场从未受过食肉动物的骚扰。德拉克鲁兹说,“她的头脑里亮起了一盏灯”。大比利牛斯犬标准条例描述了保护羊群免于熊狼伤害的那些狗,尽管那不是单纯描述犬展养狗专业户亲眼所见情景的文字,而是颇具象征性的叙述。无论这份体制化饲养的书面标准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它涉及理想类型和本源叙述。德拉克鲁兹在她自己写的起源故事中说,她开始考虑到自己所熟悉的比利牛斯犬可能有能力守卫牛羊,抵御其他狗和郊狼。

德拉克鲁兹把一些幼犬送给了她认识的北加州养羊人。从那里,她和其他几个饲养比利牛斯犬的人,其中包括韦塞,一起将狗

(也包括一些成年狗)放到牧场上,试图找到途径帮助这些狗变成更有效的“猛兽控制狗”,这是当时采取的称呼。这个奶牛农场被改造成牧羊场,德拉克鲁兹成为牧羊业者联盟的一分子。20世纪70年代后期,她遇见了玛格丽特·霍夫曼,牧羊业者联盟中一位积极呼吁启用狗来驱赶郊狼的妇女。霍夫曼从德拉克鲁兹那里得到了“雪熊”,繁殖了更多条狗,把它们全部交给了工作的家庭里。2002年11月,在我的采访中,德拉克鲁兹谈到“犯下每个可能犯的错误”、在社交和照料工作犬方面所作的尝试、与牧场主保持密切联系,以及在研究和安置方面同加州戴维斯分校和农业部之间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琳达·韦塞和伊夫琳·斯图尔特作为美国大比利牛斯犬俱乐部负责修订标准的委员会成员,确保了功能性工作犬受到特别的关注。到80年代末为止,德拉克鲁兹仍旧向人们展示着正在成型的狗,忙着将比利牛斯工作犬安置到全国各地。其中一些狗来自牧场,经过清洗沐浴后获得比赛冠军,然后又直接回去工作了。这种“两用狗”在比利牛斯犬的繁殖和饲养教育中成为一种道德和实践的理想。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教化涉及各种劳动——以及劳动密集型——实践,其中包括管理高质量的互联网讨论邮件清单,比如牲畜护卫犬讨论邮件清单和大比利牛斯犬讨论邮件清单的牲畜护卫话题部分。外行人的专业知识、志愿者的工作和协作中的实践群体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每条比利牛斯工作犬都来自四十多年的宠物和展览家史。放眼四望,到处都是伴侣物种以及新兴的自然文化。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起先是杰弗里·格林,然后是罗杰·伍德拉夫,二人先后成为这个故事里的主要角色,两个人是位于爱达荷州杜波依的美国农业部羊类试验站(USDA)的成员。他们的首条护卫犬是可蒙犬(匈牙利),然后又试过阿卡巴士犬(土耳其)和比利牛斯犬。为我提供比利牛斯犬信息的人们怀着巨大的

敬意谈论这两个人。这两个美国农业部工作人员力劝牧场主试用护卫犬，他们获得了养狗人的帮助并将其视作自己的同事。例如，1984年，伍德拉夫和格林在萨克拉曼多举办的美国大比利牛斯犬俱乐部国家特色展上召开了一次有关牲畜护卫犬的专题研讨会。另一个关于工作护卫犬在北美的复兴的故事是，哈尔·布莱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了给其他牧民采集经验而在纳瓦霍牧羊实践中对杂种狗的有效使用所作的研究。

牧民的再教育是美国农业部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利牛斯人积极地投入了这个过程。牧民们深谙以科学为基础、建立在政府赠予地上的大学和农工联合企业所代表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往往将狗看作老派过时的事物，而将商业毒药当作有利可图的进步元素。狗不容易随遇而安；它们要求改变劳动方式和时间、金钱投入。帮助牧民作出改变的努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成功。

1987年和1988年，美国农业部在这个项目中从全国各地购买了大约一百条护卫狗幼犬。农业部的科学家同意了育种俱乐部成员的提议，对那些通过这个项目安置的狗进行阉割，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让这些狗不介入俱乐部成员认为有损于狗类身体和基因健康的幼犬生产和其他繁殖行为。为了减少工作犬臀部发育不良的风险，这些幼犬的父母全部接受了臀部X光透视检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调查表明，80%以上的牧民发现他们的护卫犬——特别是他们的大比利牛斯犬——是一种经济资产。到了2002年，几千条牲畜护卫犬负责保护美国全国各地的绵羊、骆马、牛群、山羊和鸵鸟。

雷蒙德和洛纳·科平杰及其在汉普郡大学的新英格兰中心农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来自土耳其的安娜图牧羊犬入手，不仅着手开展研究工作，并且将数百条牲畜护卫犬安置在美国的农场和牧场中。雷蒙德·科平杰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是



尼科尔·廷博根的动物行为学遗产，而且科平杰夫妇还有过雪橇赛狗的严肃经历。比起我在故事中强调的那些外行养狗人来，科平杰夫妇一直受到公众瞩目，除了那些直接参与牲畜护卫犬工作的人以外，也为科学家们所熟悉。在许多方面，科平杰夫妇都不赞同我提到的那些比利牛斯犬爱好者对护卫犬的看法。汉普郡大学在项目中没有为他们所安置的狗实施绝育术。他们通常不看重品种差异，认为成熟过程中的社会环境是在有效护卫犬品种的形成中唯一的关键变量。汉普郡大学的项目安置更加年幼的狗，宣传一种对生物社会发展和基因行为倾向的不同观念，对人和狗的教化采用不同的方法。

多数养比利牛斯犬的人不肯与科平杰夫妇合作，从一开始就抱有敌对情绪。实际上，科平杰夫妇很少接触到大比利牛斯犬，因为品种俱乐部有着很强的道德规范。我在此无法评价这些差异，读者可以在《狗类》一书中找到科平杰夫妇的观点。然而，那本书没有提到比利牛斯犬的饲养人，也没有提到他们从一开始就做牲畜护卫犬的安置工作并与杰弗里·格林和罗杰·伍德拉夫合作。读者也不会从1990年美国农业部的出版物中了解到，1986年爱达荷大学针对400人、涉及763条狗所作的调查结果表明，大比利牛斯犬占了总体数量的57%。比利牛斯犬和可蒙犬占了参与研究的牲畜护卫工作犬总数的75%，后者是另一个未对汉普郡项目有所贡献的品种。这项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表明，比利牛斯犬在工作成就上往往会得到所有品种当中的最高分数。其中也包括，咬伤的人最少，伤害的牲畜最少。在针对59条比利牛斯犬和26条安娜图牧羊犬的幼犬所作的研究中，83%的比利牛斯犬得到“好”的分数，而只有26%的安娜图牧羊犬得到这样的分数。

在对纯种犬不切实际的迷恋中孕育的巴斯克比利牛斯山狗从遭到破坏的农牧经济中被引入美国西部的牧场，来到一度受到骑着西班牙马的平原印第安人猎杀的水牛的草场栖居地上（鲜有土

生土长的草类存活),保护英国牧民异类生物学牛羊群落,这次引进——与源于西班牙征服和传教的当代保留地纳瓦霍牧羊文化研究并驾齐驱——应该为任何伴侣物种宣言增添足够的历史讽刺意味。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重新引入灭绝食肉动物物种并将其地位由害兽转为自然野生动物和旅游热点的两次努力,将会引导我们更进一步陷入这个复杂局面。

在重新将灰狼引入部分其先前活动区域一事上,美国的濒危物种条令赋予内政部司法裁决权,比如,1995年14只加拿大狼被放进黄石国家公园,加入了国内最大的麋鹿和水牛群落。加拿大狼的迁徙始于它们在蒙大拿的自发行动。1995至1996年间,又有52条狼被放入爱达荷和怀俄明两个州。2002年,大约有700条狼住在洛基山脉北部。大体上讲,牧民一直不肯妥协,哪怕他们在金钱上为损失的牲畜获得全额赔偿,哪怕内政部的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部门除掉或杀死祸害牲畜的狼只。根据吉姆·罗宾斯2002年12月17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D3页),有20%受到严格管理的狼佩戴电子监控颈圈。郊狼的数量有所下降;狼把它们都杀掉了。麋鹿的数量有所减少。这令猎人们感到不快,而那些担心少了捕食者以后食草动物会带来危害的生态学家们却感到欣慰。旅游者——还有服务于他们的商家——也非常高兴。怀俄明州的拉马尔山谷记录了10万多人次在汽车狩猎旅程中曾亲眼看到了狼。没有旅客遇害,但是2002年的国家统计数字表明,200头牛、500只羊、7匹麋鹿、1匹马和43条狗丧生。这43条狗是什么狗呢?

其中一些是没有作好准备的大比利牛斯犬。内政部把狼放进黄石国家公园里,违背了牧民的意愿,也没有与在爱达荷州的农业部牲畜护卫犬研究人员进行协调;而且,我怀疑,甚至没有想到与知识丰富的比利牛斯犬饲养者谈话,这些人也是一些乐于展示她们的成长中的漂亮大狗的中老年白人女性。内政部和农业部在科

技文化中毫不搭界。不断有狼逃出公园围墙。狼、牲畜和狗都遭到杀害,这或许是无谓的损失。野生动物官员已经宰杀了125条以上的流浪狼只;牧民也非法枪杀了至少数十只或者更多。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游客、牧民、政府官员和社区被截然分成两派,也许没有必要这么做。需要从一开始就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全面形成更好的伴侣种群关系。

狗类喜好社交并划分地盘;狼也是如此。有经验的牲畜护卫犬已形成足够大的群体,也许有能力震慑住北方灰狼,阻止对方吞噬牲畜。但是,在狼占领地盘后再引入比利牛斯犬,或是启用数量太少又无经验的狗,这都一定会给这两种犬科动物双方带来灾难,也会不利于野生动物和放牧伦理规范的融合。野生动物保护小组已经为受过狼群袭击之苦的牧民购买了比利牛斯犬;狼群似乎被这些狗所吸引,跃跃欲试,把它们当作自己地盘的人侵者而宰杀。没有采取可能的行动来引导狼群尊重有组织的狗;派牲畜护卫犬前去积极促进狼类兴盛和牧民保护野生动物联盟的做法可能已经太晚了。或许,在比利牛斯犬夜里安全地躲在室内的时候,狼群就会对郊狼实行控制了。

与此同时,还原生态学也带有欧洲色彩。在比利牛斯山脉,法国政府从斯洛伐克引进了欧洲棕熊以填补先前熊类被屠杀后留下的空白,那里的后共产主义旅游业大力宣传观熊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了不错的利润。法国的比利牛斯犬爱好者们,比如韦斯科山犬畜协会的养山羊人伯努瓦·科肯波,正努力将狗重新放回山中,让斯洛伐克熊领教什么是正当的后现代秩序。法国比利牛斯爱好者们正从美国同行那里了解牲畜护卫工作犬的情况。法国政府为农场主们每人免费提供一条护卫犬。但是,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农民被猛兽吃掉的牲畜,这其实比承担日常照料狗的任务更有吸引力。在与保险机制竞争方面,护卫犬面临着比驱逐狗熊还要艰难的处境。

远离多物种保护和农场政治的干扰,比利牛斯犬一直在作为展览狗和宠物方面表现出众。然而,身兼工人和宠物二职的这个品种的狗在数量上激增,这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品种俱乐部的控制,更不必受到可行的农牧经济的控制了,从而出现了商业幼犬制造和后院繁殖缺乏管制的混乱局面。对健康状况漠不关心;在行为、社交和训练方面无知;环境残酷,这都是常有的事情。品种俱乐部内部也在什么是负责任的饲养行为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观点分歧,特别是在面对纯种犬的基因多样化和种群遗传学上的棘手问题的时候。受欢迎的公畜使用过度、对狗类问题的刻意隐瞒、不择手段地追求展览比赛冠军的行径时有发生,危及狗类生存。太多的人还在这么做。爱狗人士不允许这类事情发生,我在研究中遇到过许多这种有爱心的人们。这些人在他们的狗的各个生活空间里——农场、实验室、展览、家庭以及任何其他地方——不怕脏,不辞辛劳地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我希望他们的爱会繁衍流传;这是我创作此书的一个理由。

#### 澳洲牧羊犬

在美国被称作澳洲牧羊犬或澳犬的放牧品种犬带来的麻烦一点也不少于大比利牛斯犬;我在此仅举几例。我的观点很简单:熟悉这些狗并与之共同生活意味着继承一切可能的条件、实现与这些生物发生关联的一切、构成伴侣物种的全部关联。恋爱意味着了解人情世故,在许多层面上与意义重大的他性和示意的他者建立关联,在局部和全球层面上,在纵横交错的网络中。我很想知道如何才能认可我将要了解的那些史实。

关于澳洲牧羊犬的起源,如果说有什么肯定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名称的来源,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与这些天才放牧犬有着共同祖先的所有种类的狗。也许,最确定的事情是这些狗应该被称作美利坚合众国西部牧场犬。不是“美洲”,而是“美利坚合

众国”。我来解释一下这一点为何重要，特别是因为多数（而远非全部）祖先很可能都是自从殖民时期之初开始与主人一同由英伦三岛移居北美洲东海岸的柯利品种的变体。加州淘金热及内战后遗症是我的区域国家故事的关键。这些意义重大的事件使得美国西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我不想沿袭这些充满暴力的历史事件，因为我和凯恩、罗兰一起上我们的灵敏度课程，进行口头交流；这是我为何必须告诉他们这一切的原因。对于伴侣物种来说，进化、个人或历史健忘症都是不允许的。健忘症会破坏符码和肉体，让爱显得微不足道。要是讲述淘金热和内战的故事，那我可能会想起关于狗与主人的其他故事——这些故事涉及移民、出生地、工作、希望、爱、游戏，还有通过重新思考主权和生态发展自然文化而获得的同居可能性。

关于澳犬的浪漫起源故事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斯克牧羊人在澳洲短期停留放牧来自西班牙的美利奴羊之后来到加州和内华达的牧场上在一个超时间的西部田园场景里放羊，途中他们带着大理石色小狗乘坐客船统舱。“乘坐客船统舱”拆穿了谎言；乘坐客船统舱的劳动阶层根本无法带狗到澳洲或加州。而且，移民到澳洲的那些巴斯克人没有成为牧民，而是做了加工甘蔗的工人；直到20世纪，他们才到地球的另一端去。19世纪，巴斯克人与数百万垂涎黄金的人一起来到加州，有时取道南美洲和墨西哥，而在此以前他们不一定是牧羊人，结果却以牧羊为生，为其他失望的矿工提供食物。这些巴斯克人还在内华达开了大型餐馆，菜品主要以羊肉为原料，那里在二战以后变成了州际公路。他们从当地的工作牧羊犬中得到了自己的牧羊犬，这些狗少说也是品种驳杂。

西班牙传教士喜欢通过经营牧场来教化印第安人，但是，琳达·罗雷姆在网络版澳犬史中提到，直到19世纪40年代以前，远西的羊群（更不要说土著居民了）在数量上已大幅度减少。金矿的

发现从根本上永久地改变了该地区的食品经济、政治和生态状况。大群的羊被运送出去，在海上从东海岸合恩角附近出发，再从中西部和墨西哥穿越陆地，然后再从那个有着殖民田园经济的“附近”白人殖民区澳大利亚船运。其中许多羊都是美利奴羊，最初有西班牙血统，是作为西班牙国王的一件礼物送给萨克森的，羊类殖民出口贸易在那里得以兴旺发展。

从淘金热开始，一直到内战结束，大量英国人（和一些非裔美国人）殖民者涌入西部，美国土著受到军队摧残和遏制，从墨西哥人、加州人和印第安人那里征用的土地得以巩固。

所有这些羊群的迁移也就意味着它们的牧羊狗的迁移。这些不是旧时欧亚田园经济体系中的护卫犬了，那种经济体系有着现成的市场途径、时令更替的牧场、当地的熊和狼——尽管这一切都遭受了严重的损耗。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殖民地对自然界的食肉动物采取了一种更具挑衅性的姿态——在昆士兰的大部分地区周围都建起了栅栏抵御野狗，并且捕捉、毒死和射杀在美国西部地区活动的任何长着锋利犬齿的动物。直到环境保护运动起作用后这些手段被宣告非法，护卫犬才在美国西部的牧羊经济中出现。

陪伴来自东海岸和澳大利亚的羊群的牧羊犬多半都是老式工作柯利/牧羊犬类型。这都是身强力壮的多用途犬，工作姿态是“眼神散乱”，直立静止——而不像经过羊群测试选拔出的柯利犬那样目光炯炯，蜷身蹲伏——犬畜俱乐部的几个品种都来源于此。在从澳大利亚来到美国西部的狗之中包括那些通常为大理石色的“德国库利犬”，外观酷似现代澳洲牧羊犬。这是源于英国的多用途“库利犬”，冠以“德国”是因为有德国殖民者住在这种狗常见的澳大利亚某个地区。长相类似于当代澳犬的狗早期得名是由于它们与乘船来自河下游的羊群的关联，无论它们自身是否也是随着这些船到来的。或者，与后来的移民狗相关，这些类型可能也是到二战前后才被称作“澳大利亚牧羊犬”的。鲜有书面记录存在。而

且,很久都看不到一只“纯种”犬了。

然而,我们可以确认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在加州、华盛顿、俄勒冈、科罗拉多和亚利桑那各州进化的谱系,从 1956 年开始它们被登记注册为澳洲牧羊犬。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登记才成为惯例。类型的范围仍旧很宽泛,狗的类型与特定的家庭和牧场有关。奇怪的是,爱达荷一位名叫杰伊·西斯勒的马术表演者在把一种狗变成俱乐部和政治齐备的一个当代品种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作用。二十年间,西斯勒的“蓝狗”是一场很受欢迎的马术表演。他知道这些狗当中大多数的父母,但是最初的谱系也就仅此而已。西斯勒从各个不同的牧民那里得到这些狗,其中的几只澳犬成为该品种的基础畜群。在我的狗凯恩的十代谱系里有 2046 个祖先,有案可查有 1371 条狗,我在其中找到的西斯勒的狗有 7 条。(在一百万多个祖先当中,有 6170 只在她的二十代家谱中,许多取了像“发红的牧场狗”和“蓝狗”的名字;其间留下几个缺口。)

西斯勒是一名出色的驯狗师,维基·赫恩会喜欢的那种,他把 1945 年前后得到的吉诺看作他的第一条真正的好狗。吉诺为日后这个品种的诞生提供了后代;但是,西斯勒的狗当中对澳犬的数量具有最大影响(血统比率)的是约翰,父辈不详,某日游荡到西斯勒牧场,然后被写进了谱系中。类似的有关基础犬只的故事很多。它们都可能是思考伴侣物种和肉体及文本传统诞生的微缩景观。

澳犬亲本俱乐部,即美国澳大利亚牧羊犬俱乐部(ASCA),在图森由一小群热心爱好者成立于 1957 年,ASCA 于 1961 年起草了一份标准初稿,1977 年撰写了确定稿,1971 年开始了它自己的品种俱乐部登记制度。ASCA 种犬委员会成立于 1969 年,组织了牧羊比赛并授予头衔;而且,牧场上的工作狗开始为选拔赛投入相当大量的再教育。适应性竞赛及其他赛事流行起来了,相当多数量的澳大利亚人将 AKC 附属机构视为下一步措施。其他澳大利亚人将 AKC 认可看作任何工作犬的毁灭之路。亲 AKC 派分离出

去,成立了他们自己的俱乐部,美国澳大利亚牧羊犬协会(US-ASA),1993年获得了AKC的完全认可。

现代品种的所有生物社会机构出现了——包括有知识的业外健康和遗传学积极行动人士、研究品种常见病并且获许成立公司销售相应的兽医生物医学产品公司的科学家、以澳犬为主体的小型商业机构、热衷于狗类灵敏度和服从性训练的演员、郊区周末和乡村放牧种狗选拔者、搜救工作人员、治疗犬及其主人、一心要保留他们所继承的全能狗的育种员、其他迷恋于放牧才能不详的长毛演出犬的育种员,还有更多。C. A. 夏普在厨房的桌子上编写了《双螺旋网络新闻》并且协助建立了澳大利亚牧羊犬健康和遗传学研究所——更不消说,她反思了自己作为育种员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她培育的最后一条狗死去后收养一条很小的杂种澳洲救援犬的经历——在我看来,她以行动体现了对一个具有历史复杂性的品种的爱。

作为凯恩的育种员,加州中心谷的盖尔和香农·奥克斯福德夫妇,在USASA和ASCA都很活跃。奥克斯福德夫妇一心铺在培育和训练工作种狗以及服从性和灵敏度展示上,向我讲述了“全能澳犬”的情况,我觉得这类似于养比利牛斯犬的人们所使用的“双重目的”或“完整狗”这类话语。这些字眼可以防止品种分化成为更加鼓励的基因组合,每个都服务于专业人士的某个有限目标,不管是灵敏度运动、美丽,还是其他什么。但是,对澳洲牧羊犬的基础测试一直着眼于是否具备高超放牧技巧的能力。如果“全能”不始于此,那么工作犬这个品种就无法生存下去。

一个自成体系的类别

作过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通常会比有详细历史记载的能说明更多的问题。技术文化中人类与“未登记注册的”狗类之间的当代伴侣物种关系能向我们揭示哪些关于继



承——或者更好，主宰——历史和创造新的可能性的问题呢？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这些狗需要“一个自成体系的类别”。著名女性主义论著《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作者伍尔夫很清楚，当非纯净的东西漫步走过正式登记注册的草坪时会发生什么。她也清楚，当这些有了标记（和作为标记）的生物获得资格证书和一份收入时会发生什么。

宽泛的丑闻引起我的关注，特别是那些涉及所有物种的种族化性别和性别化种族的问题。即便我只待在美国，我该如何称呼这些类别不确定的狗呢？杂种、混交种、美国纯种、任意育种狗、亨氏五十七（译注：世界著名的食品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调味品和餐食两大类。其主人亨利·约翰·海因兹将当时公司生产的产品归为57类，提出了“57种变化”的口号）、混种狗，还是干脆就叫狗？而且，美国狗的分类为何要用英语表达呢？不仅只是“美国的多样化”，而且美国是一个存在多种语言的国家。最重要的是，集中讨论大比利牛斯犬和澳洲牧羊犬时，我不得不通过讲述两个长毛犬的故事提出现代品种继承当地和全球历史的困惑。同样的，我在此不能开始阐明对所有既非该功能类别也非该机构化品种的各种狗的历史。因此，我将讲述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每次重述都会分叉变成充满世俗复杂性的多个网络。我要讲述的是萨托们的故事。

“萨托”在波多黎各俚语中表示一条流浪狗。我在两处了解到这个事实：互联网上，还有时髦的狗文化杂志《犬吠》2002年秋季卷中特威格·莫厄特的感人散文。这两处直接将我带入自然文化，人们礼貌地称之为“现代化”。“萨托”是我在这两处学到的唯一一个西班牙单词；它在狗世界这个地带引领我转向符号学和物质的方向。我还发现，在从南方“发展中世界”到文明的北部的“永远的家園”的迁移过程中，萨托这个词都被大写了，在词法惯例和金钱投资上都是这样。

至少同等重要的是，我发现，我从心智两方面都被疑问带入了这个故事中。我不能通过否认这一点，而一味将注意力导向它那带有种族色彩、充满性意味、包含阶级色彩和殖民性质的语气和结构。在我的宣言中，我和我的同事们需要反反复复学着占有历史，而不是否认历史，最不该采取清教主义式批评的廉价伎俩。萨托的故事中有两种看似相互抵触的清教主义式批评的诱惑。第一种是沉浸在殖民主义的滥情，看到的只是从波多黎各的街道上救助受到虐待的狗，并将其送至美国的不杀动物避难所，然后从那里转移到适当的家庭的慈善(博爱?)之举。第二种是沉浸于历史结构分析，其做法否认了情感关联和物质复杂性，从而避免了可能超越多种差异而改善生命质量，却总是杂乱无章的参与行动。

1996年以来，大约有一万只波多黎各狗已完成了从街道流浪生活到郊区家庭生活的过渡，其时圣胡安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钱塔尔·罗布尔斯与从阿肯色州前来造访该岛的卡伦·费伦巴赫一起建立了拯救萨托基金会。导致他们采取行动的事实令人震惊。上百万具有生育能力、通常患有疾病并处于饥饿之中的狗到处觅食，寻找栖身处所，它们遍布波多黎各的赤贫居民区、建筑工地、垃圾堆、加油站、快餐厅停车场和药材销售地带。这些狗既有乡村的，也有城市的，有大有小，可以辨认出属于机构化品种的，明显不属于任何品种的。它们多半年幼——野生狗一般不会活到很大年纪；有大量幼犬被人类遗弃，而且为野狗所生。在波多黎各，官方的动物收容所主要宰杀那些交到他们手里或者扫荡中收集起来的猫狗。有时候，这些扫荡收来的动物找到主人并得到照料；但是，他们生活得很艰难，经常遭受埋怨及官方采取的行动之苦。城市收容所的条件是动物权利侵害展览上的素材。

当然，在波多黎各，各种类型的很多狗都得到很好的照料。穷人和富人一样珍惜动物。但是，如果人们抛弃一条狗，他们多半会放走它，而不是将他或她送到一家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并且肯定

会杀死收容对象的“收容所”里。而且，以阶级、国家和文化为基础的阉割猫狗的动物福利伦理在波多黎各（或者欧洲大部分地区 and 美国的许多地方）都不太普遍。强制性绝育和生殖控制在波多黎各有一段非常波折的历史，即便将历史记忆界定在非人类物种的政策方面。至少，只有绝育狗才可以真正算作狗的观念——负责的（在谁看来？）育种员照料下的那些狗除外——把我们抛入生物权利及其在大城市和殖民地中的技术文化手段的世界中。波多黎各既是大城市，又是殖民地。

这一切都否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有生育能力的野狗有性活动，生下许多它们无法抚养的幼崽，然后在极大的痛苦中大量死于可怕的疾病。这不仅仅是叙事。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是，波多黎各的情况不会比美国更好，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人格不甚健全的施虐者，他们故意并冷漠地对动物在精神和肉体上施加可怕的伤害。无家可归的动物就像无家可归的人们一样，在自由贸易——或许更好一些，在自由之火——地带，是显而易见的攻击对象。

对我来说，罗布尔斯、费伦巴赫及其支持者所采取的行动既令人不安，又给人启迪。他们在圣胡安建立并经营一家私人收容所，作为运送狗到多半是国际收养者的途中的一个中转站。（但是，波多黎各是美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不是这样呢？）波多黎各对这些狗的需求很小；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生物政治事实。任何想到过人类国际收养的人都了解这一点。拯救萨托基金会筹集资金，训练志愿者如何将狗（和一些猫）带到收容所而不给它们带来进一步的伤痛，组织波多黎各兽医免费为动物治疗和绝育，以适合北方的方式与未来的收养者进行社交活动，为他们准备文件，与航空公司联系每周安排用商务航班运送大约三十条狗到多数位于东北部几个州的不杀戮收容所网络。9.11 恐怖事件发生后，从圣胡安出发的游客被招募来认领装着待运送的狗的柳条筐，当作自己的私人行李携带，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反恐怖装备阻塞救援通道。

基金会开设了一个英语网站，给上网的潜在收养者提供信息，为救助团体联系到将狗接收进它们“永远的家庭”中去，这里借用这个网站的术语。该网站充斥着成功收养的实例、收养前的悲惨故事、收养前后的照片、行动与捐款的邀请、寻找可供收养的萨托的信息和狗世界电子文化的有用链接。

一个波多黎各人可以通过每月至少救助五条狗来成为拯救萨托基金会的一名成员。任何费用主要由志愿者来自行支付。他们找到、喂养并安抚狗，然后再劝它们进入柳条筐并带它们到中转站去。幼犬和青少年狗优先，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救助对象。病入膏肓的狗被实施安乐死，不过，有许多受伤或病情严重的狗都康复并得到安置。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成为志愿者。网站上讲述了一位靠社会救济金生活的老年妇女的故事，她自己几乎无家可归，却招募流浪者安抚并收集狗，她从自己微薄的资金里拿出钱来为每只狗支付五美元。即便知道这样的故事属于那种文类也不会削弱故事本身的力量——或者它的真实性。网站上的照片多半是波多黎各中产阶级妇女，但是所谓拯救萨托基金会的多样性不仅专指狗。

在一系列主体转换技术中，飞机是一种工具。从机舱里出来的狗受到另一种社会契约的挟制，不同于与生俱来的那种。然而，并不是任何一条波多黎各流浪狗都能从这个铝制子宫里获得它的第二次生命。在狗类收养市场上，体型小的狗就像人类场景中的女孩子一样是黄金准则。美国对他者入侵的恐惧波及面很宽，自然没有物种或性别界限。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机场到马萨诸塞州斯特林的那家出色的收容所去看看，那家收容所自从1999年加入这项计划以来已经安置了两千多条萨托（还有大约一百只猫）。再一次，我在狗世界欣欣向荣的电子文化中找到了我的位置([www.sterlingshelter.org](http://www.sterlingshelter.org))。

总体来说，在美国东北部的动物收容所里，10到35磅的狗太少，满足不了需求。一条中等尺码、阉割过、得到救助、行为端正的

狗在美国狗世界里多半都被高看一眼。这种地位部分来自不向纯种狗世界中猖獗的优生论调妥协的骄傲。但是,收养一条流浪狗或被遗弃的狗,无论杂种与否,几乎把一个人救出以阶级和文化为根基的“改良”意识形态、家庭生物政治和教学模式的泥潭。诚然,优生学以及“现代”生活中其他改良话语有着如此众多的共同祖先(和活着的同胞兄弟姐妹),以至于近亲繁殖率甚至超过了父女交配的比率。

从收容所里收养一条狗要付出许多劳动、一大笔钱(但是还赶不上前期准备工作的开销),以及自愿向某种控制机制妥协的态度,而这一机制足够激活任何一位福柯门徒或普通自由论者的过敏症。我本人支持这种机制——以及其他许多种制度化权力——为了保护各个主体群落,其中也包括狗类在内。我也积极支持收养获得救助和收容的动物。因此,在认识到这一切来自何处以后,我产生了只能忍受却无法缓解的消化不良症。

好的收容所会接受大量萨托狗的收养请求。人们得到这样一条狗,就不再会从宠物商店购买宠物,也不再会支持幼犬制造业。斯特林的那家收容所告诉我们,从美国带到这里的幼犬中有99%是中到大型狗,所有的狗都被收养了。许多大型幼犬和青少年狗是从家庭圈养猎犬项目中来到斯特林避难所的,这个项目将弃狗从美国南方的合作收容所迁移到东北地区——美国南方是世界上另一个少说也是没有安全保障的猫狗绝育伦理的地区。不过,寻找小型收容狗的人们多半会在国内市场上一无所获。这些人的家庭扩充手段需要局部和全球的不同层面。然而,正像儿童的国际收养一样,得到一条进口狗很不容易。正常的程序包括详细的面试和表格、家庭访问、朋友和兽医的推荐、好好教育狗的许诺、驯狗员的临场指导、房屋产权证明或房东允许养宠物的书面文件,然后还有长长的排队等候名单:所有这些,还有更多。目的是为狗找到一个永久家园。

这种方式是一个建立亲缘关系的机制,事实上,它以每种可能想象的方式介入“家庭”的历史并从中收获。伴侣物种确立家庭的机制的有效性可在一些叙事分析中得以证明。成功收养的故事通常指向同胞兄弟姐妹和其他多物种亲属关系,比如,父母、姐妹、兄弟、阿姨、叔伯、同辈表堂亲属、教父,等等。纯种收养故事亦然,而且,在取得养狗资格之前,这些收养/所有权获得的过程涉及多个这种文件和社会手段。几乎是不可能——而且通常不相干——从这些故事里得知所指个体属于什么物种。一只宠物鸟是一条新狗的姐妹,处于婴儿期的人类兄弟和年老的猫阿姨都被当作像妈妈或爸爸这样的人类家人的亲属。性别差异无关紧要;关键是物种差异。

我拒绝被称作我的狗的“妈妈”,因为我害怕成年犬的幼儿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的歪曲认识:我想要的是狗,而不是婴儿。我的多物种家庭不是关于代理权和替代物的;我们正在努力地体验其他的喻体,其他的词形变形体。我们需要其他名词和代词来表达伴侣物种的亲缘种属,如同我们曾经(而且仍然)对性别谱系所作的处理那样。除了在晚会邀请或哲学讨论中,“意义重大的他者”对人类性伴侣而言没有意义;这个词语也并不能承载狗世界中那些粗制滥造的亲属关系的日常意义。

但是,或许我过分担心词语了。我不得不承认,没有人清楚美国狗世界里传统上表达亲属关系的使用中词语是否指年龄、物种或者生物繁殖角色(除非要求多数非人类绝育)。基因不是问题的核心,这当然令人欣慰。关键在于伴侣物种的形成。一切都在于家庭,无论境遇好坏,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这是在传承的历史这个怪物的腹中形成的一个家庭,只有占有这些历史才能改变它们。我一直明白,如果我怀孕,我希望子宫里的那个生物是另一个物种的成员;也许这会变成普遍状态。不只是出入于国际收养过程中的杂种狗在意义重大的他性中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类别。

我盼望着狗世界上有更多思考,关于继承那份跨越伴侣物种

的进化、个人和历史时间标度的极其复杂的多物种遗产意味着什么。每个登记注册过的品种，每一条狗，都参与了能够并应该将养狗人卷入包括活生生的劳动、阶级构成、社会与生物性别的详尽阐述、种族类别以及局部与全球的其他层次在内的多重历史当中的实践和故事。地球上的许多狗都不是机构化品种的成员。农村狗和乡下、城市里的野狗对于它们生活在其间的人群来说带有它们自身的示意他性，不仅仅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如此。还有“发达世界”里的杂种狗或者所谓“任意交配而出生”的狗，比如出现在繁荣不再的经济和生态环境中的功能类犬只。被称作“萨托”的波多黎各流浪犬从极其复杂并产生惊人后果的历史走出来，成为马萨诸塞州“永久性家庭”的成员。在当下的自然文化中，品种可能是一个必要的（虽说也是具有深刻缺陷的）手段来延续那些作为它们的生命源头的有用犬类。目前的美国农场主们对旧金山或丹佛来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恐惧甚于对狼的恐惧，无论他们离公园或美国土著有多远，无论他们在法庭上多么能言善辩。

在我自身的个人—历史性自然文化中，我深知养比利牛斯犬和澳犬的人多半是中产阶级白人，他们有一种尚未言表的责任感，要重新构想被摧毁的牧场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而毁灭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源于需要这些狗发挥作用的牧场实际工作。通过他们的狗，像我这样的人与土著主权、牧场经济和生态生存、肉类工业的彻底改革、种族正义、战争与移民的各种后果和技术文化的机制发生了关联。用海伦·维兰的话说，这关系到“共同相处”问题。当我和“纯种”的凯恩接触时，我们以肉体之躯体现了那些使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的人与狗之间的关联。当我抚摸我的同乡苏珊·考迪尔那条漂亮的大比利牛斯犬威廉时，我等于也在抚摸那些重新安置的加拿大灰狼、斯洛伐克高级熊和国际复兴生态，还有狗展和多国田园经济。与整条狗相伴，我们需要整个遗产，正是这些遗产使整个伴侣物种成为可能。不足为奇，所有这些整体都是非欧

几里得几何学的部分关联之结。我们不必作出天真姿态而占有那份遗产,或许可以期盼游戏的创造性优雅。

摘自《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的女儿之手记》,2000年6月:

凯恩·佩珀女士终于以她的真实物种身份现身了。她是一条处于发情期的克林贡母狗。或许,你不经常看电视或者像我一样爱好星际旅行世界,但是我敢说联邦星球的每个人都知悉克林贡母犬具有令人生畏的性感,其品味到了凶悍的地步。我们这里的比利牛斯犬、未经阉割的二十月大的威廉,它在幼犬时期一直是凯恩的玩伴,一开始它大约有四个月那么小。凯恩在六个半月时就被割除了卵巢。她总是兴高采烈地碰撞威廉那柔软而充满诱惑的后背,从他的头开始,鼻子对着他的尾巴,而他则躺在地上,试图去咬她的腿或者舔迅速闪过眼前的阴部。但是,就在我们到赫兹布度过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期间,说得委婉一点吧,事情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威廉是一个性欲冲动的、温和的、毫无经验的青少年雄性个体。凯恩体内没有发情荷尔蒙(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尚存的大量涌出所谓雄性激素的肾上腺皮质组织,这些物质对激发雌雄哺乳动物的性欲起到很大作用)。然而,她是一条对威廉感到兴奋的小母犬,而他则兴趣盎然。她不会与其他任何狗做这个,无论“完整”与否。他们的性游戏与功能性异性交配行为毫不相干——威廉不会跨到对方身上,对方也不会展示出充满诱惑的后部,双方不会互嗅阴部,没有呜咽和徘徊,这些生殖行为一个也没有。不,我们这里只有纯粹的形式多样的变态行为,我们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读着诺曼·O. 布朗长大成人的人对此倍感亲切。

体重110磅的威廉躺在地上,眼睛炯炯发亮。凯恩体重有35磅,她的阴部跨在他的头顶上,鼻子朝向他的尾巴,看起



来很是疯狂，她压在他身上起劲地晃动后部。我的意思是说使劲压下去，迅速晃动身体。他伸出舌头拼命要舔她的阴部，反倒把她从他的头上掀了下去。看上去有点像骑术表演，她骑着一匹野马，尽量想在上面待得时间长些。他们在游戏中的目标略微有所不同，但是双方都全身心投入这个活动中。我自然看着这像性爱。绝对不是同类友情。他们持续了三分钟，其他什么也不顾。然后，他们又重新进行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我和苏珊放声大笑，不管笑声刺耳还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都不值得他们关注。其间，凯恩像一条克林贡母狗一样低声咆哮，牙齿毕露。还记得《星际旅行者》中的克林贡杂种狗比朗娜·托里斯曾经多少次将她所爱的人类飞机驾驶员情人汤姆·帕里斯送进医务室吗？哦，天呐，凯恩在玩一个怎样的游戏？威廉全神贯注，非常认真。他不是一条克林贡狗，而会被我这一代女性主义者称作体贴的情人。

他们的青春和活力对异性生殖霸权意识形态和提倡禁欲的性腺切除术构成了一个讽刺。现在，在所有的人当中，我，这个写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书讨论我们西方人类如何毫无顾忌地将我们的社会秩序和欲望投射到动物身上的人，不应该在我那只除去卵巢、活力旺盛的澳犬和苏珊那条长着天鹅绒般潮湿的大舌头的天才景观护卫犬身上看到诺曼·O. 布朗《爱的身体》一书的证实。不过，还有什么会发生呢？提示：这不是一个攫取或追逐的游戏。

不，这是本体论设计描述，即那种关键性的游戏，参与者编造出他们所继承的身心历史并将其重新转换成构建他们现时身份的肉体动词。他们发明了这个游戏；这个游戏重塑他们自身。又是词形变异。总是回到重要词语的生物色彩上。词语在生物的自然文化(nature cultures)中获得了血肉之躯。

# 赛博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 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当娜·哈拉维

严泽胜 译

## 集成电路中的妇女的共同语言的反讽之梦

本文是一种尝试建立忠实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  
反讽式政治神话的努力。或许亵渎要比尊崇和认同更为忠实。亵渎似乎总是需要非常严肃地对待事物。我不知道从美国政治——包括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的世俗宗教的、福音派新教会的传统中还能采取什么更合适的姿态。亵渎在内部保护某种道德免受大多数道德的压制，同时亦坚持认为共同体是必要的。亵渎不是背叛。反讽关涉不能化解为更大的整体的矛盾，甚至辩证地说，关涉使不相容的事物连在一起而产生的张力，因为两个或所有不相容的事物都是必要和真实的。反讽关涉幽默和严肃的游戏。它也是一种修辞策略和一种政治手段，一种我希望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中看到的更受尊重的政治手段。处于我的反讽式忠实——即我的亵渎行为——中心的是赛博的形象。

赛博(cyborg)是控制论的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既是虚构的生物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社会

现实是实践的社会关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建构,一种改变世界的虚构。国际妇女运动建构了“妇女经验”,也揭示或发现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共同对象。这种经验既是虚构也是事实,有着最为重要的政治的性质。解放依赖于对压迫的意识——想象的理解——的建构,同样也依赖对可能性的意识的建构。赛博既是虚构也是实践经验的问题,这种虚构和实践经验改变了20世纪晚期算作妇女经验的那些东西。这是超越生死的斗争,不过,科幻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界限是一种视觉幻象。

当代科幻小说充满了赛博——这种同时既是动物也是机器的生物,居于模棱两可地既是自然的也是制造的世界中。现代机器也充满赛博,这是生物体与机器——每一个都被想象成编码的装置——的亲密耦合,而且拥有一种不是在性的历史中产生的权力。赛博的“性征”恢复了羊齿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的那种有趣的自我复制的巴洛克式风格(这样一种微妙的预防异性恋的机体特征)。赛博的自我复制与机体复制不相干。现代生产似乎像是一个赛博将工作领域殖民化的梦,一个使泰勒主义<sup>[1]</sup>的梦魇显得像是田园诗的梦。现代战争是一场赛博的狂欢,被编码为C3I,即命令—控制—交流—智能(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这是1984年美国国防预算的一个840亿美元的项目。我在论证的是,赛博是一种测绘我们的社会与身体现实的虚构,也是一种暗示某些非常有成效的耦合的想象的源泉。福柯的生命政治<sup>[2]</sup>是赛博政治这一非常开放的领域的一个微弱预兆。

迄至20世纪后期——这是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吐火女怪(chimera),是理论上虚构的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物;总之,我们是赛博。赛博是我们的本体论<sup>[3]</sup>,它赋予我们政见。赛博是凝缩着想象和物质现实的形象,是两个结合在一起构成所有历史转变之可能性的中心。在“西方的”科学和政治传统——即种族主义、男权资本主义的传统;进步的传统;挪用自然

作为文化生产的资源的传统；从他者的反射来再造自我的传统——中，生物体与机器的关系曾是一场边境战争。在这场边境战中至关重要的是生产、再生产以及想象的领地。本文是对边界混乱的快乐和边界建构的责任的论证。本文也努力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非自然主义的方式、在想象一个无性别的世界——也许是一个没有遗传的世界，但也许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世界——的乌托邦传统中，促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和理论。赛博这种化身是外在于拯救的历史的。

赛博是后性别世界的生物；它与双性恋倾向、前俄狄浦斯期的共生现象<sup>[4]</sup>，非异化劳动<sup>[5]</sup>，或其他通过最终把各部分的全部能量挪用到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去的机体完整性的诱惑毫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赛博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起源故事；这是一个“最后的”讽刺，因为赛博也是“西方”逐渐加强对抽象个性化——一个终于摆脱了所有依赖的终极自我，一个太空中的人——的控制的可怕的天启式的终极目标。“西方式”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起源故事取决于原初的统一性、完满性、赐福与恐怖的神话——每个人必须与之分离的菲勒斯母亲再现了这种神话——取决于个体发展的任务与历史的任务这对孪生的、对我们来说最强烈地铭刻在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有力神话。希拉里·克莱恩曾论证说，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它们的劳动概念和个体化与性别构成的概念方面，都依赖于——出逐渐强化对妇女/自然的控制的戏剧中的原初统一性——差异必然从中产生——的情节。赛博跳过了原初统一性即西方意义上的与自然同化这一步。这就是它的像星球大战计划<sup>[6]</sup>那样可能导致颠覆其目的论的非法允诺。

赛博断然坚持局部性、反讽性、亲密性和反常性。它是对抗性的、乌托邦式的和完全不是无害的。赛博不再由公私两极所结构，它界定了一个部分基于家庭的社会关系变革的技术城邦的范围。自然与文化被重构；其中的一个不再是另一个挪用或合并的资源。

由部分形成整体的那些关系,包括极性与等级制统治的关系,在赛博世界中是有争议的。与法兰肯斯坦的怪物<sup>[7]</sup>的希望不同,赛博并不指望其父亲通过重建乐园来解救它;即通过制造一个异性恋配偶,通过它在一个完成的整体——如一座城市和宇宙——中的实现来解救它。在这个没有俄狄浦斯计划<sup>[8]</sup>的时代,赛博也不梦想基于有机家庭模式的共同体。赛博不会承认伊甸园;它不是由泥土制造的,因而不可能梦想回归尘土。也许这就是我想要看看赛博是否能够颠覆预示在某种被命名为撒旦的狂暴冲动中回归核尘埃的天启的原因。赛博并不虔诚;它们不会回想起宇宙。它们对整体论充满警觉,但渴望联系——它们似乎对统一战线政治有某种天生的感觉,但却没有先锋政党。当然,赛博的主要问题是,它们是军国主义和父权制资本主义——更不要提国家社会主义——的私生子。不过私生子通常极不忠实于自己的起源。毕竟,它们的父亲是无关紧要的。

我将在本文的结尾回到赛博的科幻小说这个问题,但现在我要指出三处至关重要的边界崩溃,这使得以下的政治虚构(政治科幻)分析成为可能。到20世纪后期,在美国的科学文化中,人与动物的界限被彻底打破了。独特性的最后一块沙滩,即使没有变成娱乐公园,也已被污染了——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精神活动,没有什么能真正令人信服地决定人与动物的分离。许多人不再觉得需要这种分离;的确,女性主义文化的许多派别肯定了人与其他活的生物的联系快乐。保护动物权利的运动不是对人的独特性的非理性否定;它们眼光锐利地认识到要跨越自然与文化的不光彩的断裂,建立二者间的联系。最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生物学与进化论既使现代生物体成为知识的对象,同时也使人与动物的联系变成某种一再受到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和专业争论的侵蚀的模糊痕迹。在此框架内,给现代基督徒教授创

世论，应该像某种形式的虐待儿童那样受到反对。

生物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是科学文化中唯一公开论证人的动物性的意义的立场。从事激进政治的人大有余地为破裂的边界的意义争辩。赛博出现在神话中，这恰好是人与动物的界限被逾越的地方。赛博远不是标志着将人与其他活的存在隔开，而是标志着既令人不安又令人愉快的紧密结合。兽性在这种婚姻交换的循环中具有了新的地位。

第二个有漏洞的区分是动物—人(生物体)与机器的区分。前控制论的机器可能有鬼魂出没；机器中总是有鬼魂的幽灵。这种二元论构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话，此对话由某个辩证法的后裔——根据喜好称其为精神或历史都行——所解决。不过从根本上说，机器不是自动的、自我设计的、自治的。它们不可能实现人的梦想，只能使其破灭。它们不是男人，不是自己的创造者，而只是对男权主义复制梦想的滑稽模仿。只有妄想狂才会认为它们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我们并不如此肯定。20世纪后期，机器已使得自然的与人造的、心灵与身体、自我发展的与外部设计的之间的差异，以及许多其他过去常应用于生物体与机器的区分变得彻底模糊了。我们的机器令人不安地生气勃勃，而我们自己则令人恐惧地萎靡迟钝。

技术决定论是把机器和生物体重新构想为编码的文本——通过这些文本我们从事着书写与阅读世界的游戏——所打开的唯一意识形态空间。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将一切都“文本化”，因其对作为任意阅读的“游戏”之基础的统治的现实关系的乌托邦式漠视，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指责。<sup>[9]</sup>当然，后现代主义策略，像我的赛博神话一样，确实颠覆了无数的有机整体(例如，诗、原始文化、生物学有机体)。简言之，被看作是自然——见识的来源和纯真的保证——的东西的确定性遭到破坏，可能是致命的破坏。阐释的先验权威丧失了，作为“西方”认识论

之基础的本体论亦随之丧失。不过,可供选择的既不是玩世不恭也不是背信弃义,即某种抽象的生存形式,就像对通过“机器”摧毁“人”或通过“文本”摧毁“有意义的政治行动”的技术决定论的解释那样。赛博将会是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生存的问题。黑猩猩和人工制品都有政治学,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

第三个区分是第二个区分的子集:对我们来说,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界线是极其模糊的。有关量子理论的后果和测不准原理的物理学科普读物,是作为美国白人异性恋性关系的激烈变革标志的丑角罗曼司的某种科普对等物;尽管它们曲解了它,但是它们涉及的问题是正当的。现代机器的精髓是微电子设备:它们无处不在而又无一可见。现代机器是一个不虔敬的新暴发的神,它嘲笑上帝的无所不在和精神性。硅芯片是用于书写的表面:它铭刻在只被原子噪音扰乱的分子刻度上,这种原子噪音是为保护核子刻度的最终干预。书写、权力以及技术在西方文明的起源史上是老搭档,但是小型化改变了我们对机械装置的经验。小型化结果与权力有关;小与其说美观还不如说极其危险,例如巡航导弹的情况。比较一下 1950 年代的电视机或 1970 年代的新闻摄影机与现在在做广告的腕戴电视或手持摄像机吧。我们最好的机器是由阳光制造的;它们全都明亮、洁净,因为它们只是信号、电磁波,即光谱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机器极其轻便,易于携带——一个在底特律和新加坡的巨大的人类烦恼的问题。人在任何地方都几乎没有如此易变,既是物质性的也是不透明的。赛博是以太,是精萃。

赛博的无所不在与不可见性恰恰是这些阳光带机器如此极端的原因。它们在政治上就像在物质上那样难以看清。它们与意识——或者意识的类像——有关。<sup>[10]</sup>它们是乘轻型货车横跨欧洲的漂浮的能指,受到那些背井离乡因而行为怪异的格林汉姆妇女(Greenham women)<sup>[11]</sup>——她们对赛博权力网络有很好的理

解——的女巫——织物(witch-weavings)的阻碍,她们的阻碍比老式的男权政治——这种政治的自然选民需要防御工作——的武力更为有效。最终,最“艰深”的科学涉及的是界线最模糊的领域,即纯粹数字、纯粹精神、C3I、密码术以及对有效的秘密之保存的领域。新机器因而清洁而明亮。它们的工程师是太阳的崇拜者,居间促成一场与后工业社会的夜梦密切相关的新科技革命。这些清洁机器所引起的弊病只是免疫系统的某种抗原的微小编码的改变,只是对压力的经验。“东方”妇女灵巧的小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少女对小家家的旧式迷恋,妇女对小东西的强迫关注在当今世界呈现出全新的维度。也许有一个赛博艾丽斯(Alice)<sup>[12]</sup>考虑到这些新的维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许是在亚洲制造芯片,并在圣丽塔(Santa Rita)旋转舞蹈的非自然的赛博妇女,它被建构的统一性将引导有效的对抗策略。

因此,我的赛博神话关涉的是被僭越的界线、有效的融合,以及改革派可能将其作为必需的政治工作之一部分来予以探究的危险的可能性。我的前提之一是,大多数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都看到在社会实践、符号表达,以及与“高技术”和科学文化相关的物质制品中被深化的心与身、动物与机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二元论。从《单向度的人》到《自然之死》<sup>[13]</sup>,改革派所发展的分析策略强调技术的必然统治,并使我们恢复为一种想象的有机整体,以整合我们的抵抗。我的另一个前提是,那些抵抗世界范围内技术统治的强化的人们需要团结的程度空前强烈。不过,一种稍稍反常的视角转换可以更好地使我们能在技术介入的社会中为意义以及其他形式的权力和快感而斗争。

从一个视角来看,赛博世界关涉的是最终把控制的格栅强加在地球上,是最终体现在以防御的名义发动的星球大战启示的抽象观念,是女性身体在男权主义的战争狂欢中的最终挪用。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赛博世界可能关涉活的社会和身体的现实,在其中



人们不担心他们与动物和机器的共同的亲缘关系,不担心永远是局部的身份和矛盾的立场。政治斗争是同时从两个视角来看的,因为每一个视角都揭示了从另一个有利位置看是不可思议的统治和可能性。单视觉比复视觉或多头怪兽产生更严重的幻觉。赛博统一体是怪异与不合法的;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我们几乎不可能为抵抗和再结合期望更有力的神话。我愿意把LAG——利弗莫尔行动小组(Livermore Action Group)<sup>[14]</sup>——想象为一种赛博团体,它致力于切实地改变最强烈地体现和涌出技术启示的方法的实验室,致力于建立一种实际上设法把女巫、工程师、老人、性变态者、基督徒、母亲以及列宁主义者长期联合起来以使美国裁军的新的政治形式。不可能的分裂是我所在城镇的亲合团体的名称(亲合:不是通过血缘而是通过选择联系在一起,一个化学核团体吸引另一个,即亲合力)。

## 破碎的身份

已很难用一个单一的形容词来命名某个团体的女性主义——甚或已很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这个名词了。通过命名来进行排斥的意识很严重。身份似乎是矛盾的、局部的和策略性的。由于对它们的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承认是艰难赢得的,因此性别、种族与阶级不可能为对“根本的”统一性的信仰提供基础。成为一个“女性”不存在必然束缚妇女的东西。甚至不存在“成为”女性这样一种状态,女性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范畴,它是在有争议的性科学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建构的。性别、种族或阶级意识是由父权制、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充满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可怕的历史经验强加于我们的结果。在我的修辞中谁算作“我们”?哪种身份可以用来为这样一种称为“我们”的有力的政治神话奠定基础?什么可以激发对这个集体的积极参与?在女性主义者中(更不用说

在妇女中)沿着每一条可能的错误路线发生的痛苦的分裂,已使得妇女(woman)这一概念令人难以捉摸,成为为妇女之间相互支配之矩阵辩解的理由。对于我——以及对于许多具有相似的历史定位,即定位在白种人、从事专门职业的中产阶级、女性、激进分子、北美美人、中年体态的人——来说,政治身份危机的根源是多种多样的。美国左派和美国女性主义的晚近历史,即是通过不断的分裂和寻求新的本质统一性而对这种危机作出的反应。不过,另一种通过联合——亲合,而不是通过身份而作出的反应也逐渐得到承认。

切拉·桑多瓦尔从对称为有色人种妇女的新的政治声音形成的特定历史时刻的考虑的角度,对一种称为“对抗意识”的有希望的政治身份模型予以理论说明,这种政治身份模型来源于那些被拒绝在种族、性别或阶级这些社会范畴中获得稳定的成员资格的人对权力网络的理解能力。“有色人种妇女”——这是一个在其诞生时就遭到它所包含的那些人的反对的名称,以及一种标志着“西方”传统的男性的所有符号的系统损毁的历史意识——用他性和差异构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身份。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是完全政治化的,无论人们会怎样谈论其他可能的后现代主义。

桑多瓦尔强调,识别谁是一个有色人种妇女缺乏基本的标准。她注意到,对一个群体的界定是通过对否定的有意识的挪用进行的。例如,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妇女或一个美国黑人妇女并不能像一个妇女或像一个黑人或像一个名墨西哥裔美国男人那样讲话。因此,她处于否定性身份层级的底端,被置于甚至那些称为“妇女与黑人”——他们主张进行重大的变革——的享有特权的受压迫的身份类型之外。“妇女”这一范畴否定了所有非白人妇女;“黑人”这一范畴否定了所有非黑色人种,以及所有黑人妇女。不过,在已确证她们作为美国有色人种妇女的历史身份的美国妇女中,也并不存在着一个“她”,不存在任何单一性,而是存在着一个差异

的海洋。这一身份划分出一个自觉建构的空间,这个空间不能确证那种基于自然的认同行动的能力,而只能确证那种基于自觉的联合、亲合以及政治上的亲密关系行动的能力。与美国白人妇女运动的某些支流的“妇女”不同,这里并不存在对这一范型的自然化,或至少,这是桑多瓦尔论证通过对抗意识的力量唯一可获得的身份。

必须把桑多瓦尔的论点看作是对女性主义者的有力的系统表述,这种表述源于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话语的发展,反殖民主义话语消解了“西方”及其最高成果——一个不是动物、野蛮人或女人的人,即男人,他是一个称为历史的宇宙的创造者。随着东方主义在政治和符号方面被解构,西方身份包括女性主义者的身份都不稳定了。桑多瓦尔论证,“有色人种妇女”有机会建立一种有效的统一体,此统一体并不是复制先前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那种帝国主义化的、总体化的革命主体,这种主体没有正视由解殖民化而引起的那种无序的多音状态。

凯蒂·金强调认同的限度以及认同的政治/诗学机制,这种机制被纳入对“诗歌”这种文化女性主义的生成内核的阅读之中。金批评当代女性主义者中的那种持续倾向,即从女性主义实践的不同“契机”或“对话”转到对妇女运动加以分类,以使自己的政治倾向显得像是全体的终极目的。这些分类往往重新使得女性主义历史像是在时间中持存的种种相关类型的女性主义——尤其是那些被称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的以及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典型团体——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夸张地说,通过建立一种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所有其他的女性主义通常不是被合并就是被边缘化。女性主义分类学产生了对偏离官方妇女运动经验进行控制的认识论。当然,“妇女文化”,就像有色人种妇女,是由促使亲合的机制有意创造出来的。诗、音乐以及某些形式的学术实践的仪式是出色的。美国妇女运动的种族和文化政治是密切地相互交织

的。金和桑多瓦尔的共同成果是学会在不依赖挪用、合并以及分类认同的逻辑的情况下打造一个诗学/政治的统一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通过支配形成的联合或通过合并形成的联合的斗争，不仅削弱了为父权制、殖民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其他种种无人惋惜的主义辩护的理由，而且也削弱了所有声称采取某种有机或自然的立场的主张。我认为，激进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削弱了她们/我们的认识论策略，而这是构想可能的统一体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西方政治人所了解的所有“认识论”是否会让我们在建立有效的密切关系上失败，这还要看一看。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努力将革命的立场、认识论建构为那些致力于改变世界的人们的成就，这已成为那种显示认同的局限的过程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尖刻方法与有关革命主体的本体论话语的建构性方法，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在为了生存下去而消解西方自我的行动中结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同盟。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拥有一个历史性建构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不过，尽管我们丧失了原初的纯真，但我们并没有被逐出乐园。我们的政治活动也丧失了具有无罪之天真的罪之放纵。不过，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另一种政治神话看起来会像什么呢？什么样的政治会进行局部的、矛盾的、永远开放的对个体和集体自我的建构，并且仍然是可靠的、有效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地——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我不知道历史上还有哪些时候更需要进行政治联合以有效地对抗“种族”、“性别”、“性征”以及“阶级”的支配。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些时候我们能够帮助建立的那种联合会是可能的。“我们”中没有人再具有为“他们”中的任何人规定现实状态的象征或物质的能力。或至少，“我们”不能声称没有实施这种支配。白人妇女，包括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发现（即在尖声抗议中被迫注意到）妇女这一范畴的非清白。这种意识改变了所有先前范畴的地貌；它就像

热量改变脆弱的蛋白质的性质那样改变了这些范畴的性质。赛博女性主义者必须表明，“我们”不再需要自然的统一范型，任何结构都是不完整的。清白，以及必然对作为洞见之唯一基础的受害身份的强调，已造成了足够的损害。不过，被建构的革命主体也必然使 20 世纪后期的人们踌躇不前。在对同一性的扰乱和在建构它们的自反策略中，打开了为在预言式地终结了救赎历史的重大事件之后的时代编织非尸布的东西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都同时使“妇女”这一范畴和对“妇女”的社会生活的意识自然化和非自然化。也许，一种系统的漫画式描述可以突出这两种运动的性质。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根源于一种对揭示了阶级结构的工资劳动的分析。工资关系的后果是系统的异化，因为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分离。抽象和幻想在知识中居主导地位，支配则在实践中居主导地位。劳动是使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克服幻想并且发现那个对于改变世界必不可少的观点的享有特权的范畴。劳动是创造人的教化活动；劳动是使有关主体的知识，因而也是使有关屈从和异化的知识成为可能的范畴。

按照忠实的来源关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策略联合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成就是将劳动范畴扩展到能容纳(某些)妇女所做的事情，即使当工资关系服从于一种更全面的对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劳动的看法。特别是妇女的家务劳动以及妇女作为母亲的一般活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再生产——根据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类似而进入理论之中。在此，妇女的联合依赖于以“劳动”的自体结构为基础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使联合“自然化”；它是以某种植根于社会关系中的可能的立场为基础的可能的成就。本质化的运动是处于劳动或其相似物——妇女的活动——的自体结构之中的。继承马克思主义

的人道主义,及其突显的西方自我,对于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这些系统表述的贡献是强调现实生活中的妇女的日常责任,是建立联合而不是使这些联合自然化。

凯瑟琳·麦金诺对激进女性主义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对作为行动之基础的西方身份理论的挪用性的、合并性的、总体化的趋势的漫画式描述<sup>[15]</sup>。根据麦金诺的看法,将晚近称为激进女性主义的妇女政治活动中所有不同的“契机”或“对话”予以同化,这在实践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不过,她的理论的目的论逻辑却显示某种认识论和本体论——包括对它们的否定——如何消除或控制这差异。麦金诺理论的作用之一是重写了激进女性主义这个杂多领域的历史。主要的作用是创制了一种经验理论,即有关妇女身份的理论,这种理论对于所有的革命立场来说是一种启示。即是说,被纳入这种有关激进女性主义的叙述的总体化,通过强化对彻底的非存在的经验和证明而达到了其目的——妇女的联合。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来说,意识是一种成果,而非自然的事实。麦金诺的理论消除了人道主义革命主体所固有的某些困难,但却是以彻底的还原论为代价的。

麦金诺认为,激进女性主义必须采取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分析策略,不是先看阶级结构,而是先看性/性别结构及其生成关系,以及男人在性方面对女人的建构和占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金诺的“本体论”建构了一个非主体、非存在。“女人”不是起源于自己的劳动,而是起源于另一个人的欲望。因此,她发展了一种意识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可看作“女人”经验的东西,即为性侵犯命名的一切,而且就“女人”可涉及的范围而言,就是为性本身命名的一切。女性主义实践是对这种意识的建构,即对不存在的自我的自我认识。

反常的是,在这种激进女性主义中,性占有仍然具有劳动的认识论地位,也就是说,能有助于改变世界的分析必然由此产生。但

是,性/性别结构的结果是性的对象化而不是异化。在认识领域,性的对象的结果是幻觉和抽象。不过,一个女人不仅与她的产物疏离,而且在某种深层意义上不是作为一个主体,甚或不是作为一个潜在的主体而存在,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全依赖于性占有。通过他人的欲望而被建构,与劳动者被迫和自己的劳动产品分离而被异化,并不是一回事。

麦金诺的彻底的经验论是极端总体化的;它与其说排斥,还不如说取消了所有其他妇女的政治言语和行动的权威性。正是这种总体化产生了西方父权制本身从未成功产生过的东西,即女性主义者对妇女除非作为男人欲望的产物,否则就是某种非存在的意识。我认为,麦金诺正确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观并不能为妇女的联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在为了女性主义的目的而解决所有西方革命主体的矛盾的问题时,她发展了一种甚至更专横的经验学说。如果说我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不满的是他们无意识地取消了在反殖民话语和实践中明显的多种声音的、不可同化的根本差异,那么麦金诺有意识地通过妇女“本质上的”非存在而取消所有的差异也并不令人心安。

根据我的分类法——它就像所有其他的分类法一样是一种对历史的再铭刻——激进女性主义可以容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称之为劳动的妇女的所有活动,只要这些活动可以被性别化。生育对于这两种倾向具有不同的意味,一种倾向植根于劳动,另一种倾向植根于性,二者都把支配和忽视社会和个体现实的后果看作“错误意识”。

超越于任何一位创始人的论证中的困难或贡献,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观点往往都不接受局部解释的地位;二者通常被建构为整体性的。西方的解释也如此要求;“西方的”创始人还能怎样与其他的创始人结合呢?每一种支配都试图吞并其他的支配,其方式是通过类比、简单的列表或补充来扩展其基本范畴。激进

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中对种族问题的难堪的沉默，是一个严重的破坏性的政治后果。历史和多种声音消失在试图建构谱系的政治分类之中。在声称揭示作为一个统一的或可总体化的整体的女人这一范畴和妇女这一社会群体之建构的理论中，没有为种族(或别的许多东西)留有结构空间。我的漫画式描述的结构表面上是这样：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阶级结构/工资劳动/异化  
劳动，类似于生育，扩展到性，加上种族  
激进女性主义——  
性别结构/性占有/对象化  
性，类似于劳动，扩展到生育，加上种族

在另一个语境中，法国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声称，妇女在二战后作为一个历史群体与青年等群体一同出现。她所说的日期是可疑的；但我们现在习惯于想起，作为认识的对象和历史的参与者，“种族”并不始终存在，“阶级”具有历史的起源，而“同性恋”是相当晚近的。并非偶然的是，正是在地球上人们联系的网络空前多样、丰富和复杂的同时，人类家庭这一象征系统——而且也是女人的本质——却崩溃了。“发达资本主义”不足以表达这一历史时刻的结构。在“西方的”意义上，人的终结是至关重要的。在现时代，女人分裂为妇女并不是偶然的。或许，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质上并没有犯下提出压制妇女的特殊性和相互矛盾的利益的本质主义理论的罪过。我认为，我们至少已经通过不加思虑地参与白人人道主义的逻辑、语言与实践，以及通过寻求一个单一的支配基础，以确保我们革命的声音。现在，我们已很少有辩解的理由。但是，由于意识到失败，我们冒着陷入无限的差异和放弃那种建立局



部、真实之联系的令人困惑的任务的危险。某些差异是十分有趣的：某些差异是世界历史支配系统的两极。“认识论”关涉的是对差异的认识。

## 统治的信息学

在这种对某种认识论和政治性的立场的尝试中，我想勾画一幅描绘可能的联合的图画，这幅图画受惠于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计划原则。我勾画的框架是根据世界范围内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社会关系的重组的程度和重要性来设定的。我支持这样一种政治，它根源于如下主张：认为在一个新兴的世界秩序体系——在其新颖性和范围上堪比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秩序——中，必须在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性质上有根本性的变革。我们正经历一个从有组织的工业社会向多形态的信息系统转变的运动过程——从极度工作转向极度游戏，一种致命的游戏。这种二分法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意识形态性的，可以用下列图表来表示，此图表显示了从安逸的旧式等级制统治向我称之为统治的信息学的可怕的新网络的转变：

表征	仿真
资产阶级小说，现实主义	科幻小说，后现代主义
有机体	生物成分
深度，完整性	表面，边界
热烈	喧闹
作为临床实践的生物学	作为铭刻的生物学
生理学	通信工程学
小团体	亚系统
完美	最优化

优生学	人口控制
颓废,《魔山》	退化,《未来冲击》
卫生学	施压管理
微生物学,肺结核	免疫学,艾滋病
有组织的劳动分工	生物工程学/劳动控制论
功能专业化	模数建构
繁殖	复制
器官性功能专门化	最佳遗传策略
生物决定论	进化惯性,强制
共同体生态学	生态系统
种族存在链	新帝国主义,美国人道主义
家庭/工厂的科学管理	全球工厂/电子农舍
家庭/市场/工厂	集成电路中的妇女
家庭工资	可比价值
公共/私人	赛博公民身份
自然/文化	差异领域
合作	增进交流
弗洛伊德	拉康
性	遗传工程
劳动	机器人技术
心智	人工智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星球大战
白人资本主义父权制	统治的信息学

这份列表暗示了许多有趣的东西。首先,右边的那些项目不可能被编码为一种颠覆左边项目的自然主义编码的“自然的”结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或物质上都不可能返回了。不仅是“上帝”死了,“神性”也死了。在考虑生物成分这类项目时,我们不应根据

基本性质,而应根据设计策略、界线限制、流速、系统逻辑、减少限制的代价等来考虑。有性繁殖是多种繁殖策略中的一种,其代价和收益取决于系统环境。有性繁殖的意识形态再也没有理由祈求那些将性与性角色看作像有机体和家庭这类自然物的有机方面的概念了。这种推论将被揭露为非理性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阅读《花花公子》的公司管理人员与反色情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将结成不可思议的盟友以共同揭露这种非理性主义。

同样的,就种族而言,有关人类多样性的意识形态必须根据参数的频率来表述,就像血型或智力评分一样。援引像原始和文明的之类的概念是“非理性的”。对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而言,对完整的社会系统的寻求让位于一种称为“试验人种学”的新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有机物消失在对写作游戏的关注中。在意识形态的水平上,我们看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被翻译为发展和欠发达、现代化的速度和限制之类的语言。所有的物或人可以适当地根据分解和重组来加以考量;没有“自然的”架构来限制系统规划。世界所有城市的金融区,以及出口加工和自由贸易区,表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事实。全宇宙可被科学认识的事物,必须作为通信工程学中的问题(对于管理者而言)或作为文本的理论(对那些会抵制的人而言)来加以系统阐述。二者都是赛博符号学。

我们认为控制策略应集中在边界条件和交界面,而不是集中在跨越边界的流速——也不是集中在自然客体的完整性上。西方自我的“正直”或“真挚”让位于决定程序和专家系统。例如,用于控制妇女生育能力的控制策略将在人口控制和个体决策人的目标成果最大化的语言中得到发展。控制策略将根据效率、限制的代价、自由度来系统阐述。人类,就像所有其他成分或亚系统那样,必须定位在一个系统架构内,此架构的基本运作模式是偶然论的、统计学的。没有任何客体、空间或身体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

何成分都可以与其他任何成分结合,如果可以为处理某种普通语言的信号建构适当的标准、适当的代码的话。当今世界的交换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实现的那种普遍转化,马克思对此作过充分的分析。<sup>[16]</sup>影响当今世界各类成分的特有病状是强制—交流的中断。赛博不属于福柯的生物政治;赛博是在模拟政治,这是一种更有效力的运作领域。

这种对二战之后历史性地出现的科学和文化上的认识对象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看到女性主义分析的某些重大缺陷,好像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组织着“西方”话语的有机的、等级化的二元论仍然支配着女性主义分析的进行。这些二元论已被拆解利用,或如左伊·索菲娅可能指出的,它们已被技术性地消化了。心与身、动物与人、有机体与机器、公与私、自然与文化、男与女、原始与文明的二元划分,在意识形态上都是成问题的。妇女的实际境况是她们被榨取/整合进一个生产/生育和称为统治的信息学的交流构成的世界体系。家庭、工作场所、市场、公共场所、身体本身——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几乎无限多样的方式分散和结合,这对妇女和其他人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本身是因人而异的,并且使得有效的国际对抗性运动对于生存来说既难以想象又至关重要。重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专注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包括决定性地建构我们的想象的神话和意义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来进行的。赛博是一种分散重组的后现代的集体与个人的自我。这是女性主义者必须编码的自我。

通信技术和生物技术是重构我们身体的关键工具。这些工具体现和强化了全世界妇女的新的社会关系。技术与科学话语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形式化,即理解为那些建构它们的流动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固定瞬间,不过,它们也应被看作是强化意义的手段。工具与神话、手段与概念、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系统与对可能的身体——包括知识的对象——的历史性剖析之间的界线是可穿越

的。的确,神话与工具彼此相互建构。

而且,通信科学与现代生物学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步骤建构的——把世界转化为编码问题,这是在寻求一种共同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所有对作为手段的抵抗都消失了,所有异质因素都可以分解、重组、投资和交换。

在通信科学中,把世界转化为编码问题,可以通过考察应用于电话技术、电脑设计、武器部署或数据库的创建和维护的控制论的(反馈控制的)系统理论来加以阐明。在每种情况下,关键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一种语言和控制理论;关键的运作是确定信息量流动的速率、方向和概率。世界被再分为不同的范围,这些范围的信息渗透性是不同的。信息只是那种允许普遍的转化,从而也允许不受阻碍的工具性权力(称为有效交流)的可计量的要素(单位,统一的基础)。对于这种权力的最大威胁是交流的中断。所有的系统崩溃均取决于压力。这种技术的基本原理可以精简为 C3I 隐喻,这是表示其运作理论的军事符号。

在现代生物学中,把世界转化为编码问题,可以通过分子遗传学、生态学、生物社会学的进化理论以及免疫生物学来加以阐明。有机体已被转化为基因编码和解码的问题。生物技术,作为一种书写技术,广泛渗透到研究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有机体不再作为知识的对象存在,而是让位于生物成分,即特种信息处理部件。生态学中的类似步骤可以通过探究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的历史和效用来予以分析。免疫生物学和相关的医学实践是编码和识别系统作为认识对象,作为建构我们身体现实的结构的特权的富有意义的范例。生物学在这里是一种密码系统。研究必然是一种智力活动。这颇有讽刺意味。受到压力的系统会出错;它的交流过程会中断;它无法识别自我和他者的差异。移植了狒狒心脏的人类幼儿引起了全国性的伦理困惑——对于动物权益保护者如此,对于人类纯洁性的护卫者至少也是这样。男同性恋者、海地移民以及

静脉注射药物的使用者,是标志着(铭刻在身体上)界限混乱和道德堕落的可怕的免疫系统疾病的“享有特权的”牺牲品。

不过,这些涉入通信科学与生物学的离题已达到一个极高的层次;有一个寻常的、主要是经济上的现实支撑着我的主张,即这些科学与技术为我们显示了世界结构的根本转变。通信技术依赖于电子技术。现代国家、跨国公司、军事力量、国家福利机构、卫星系统、政治程序、创造我们的想象之物、劳动管理系统、对我们身体的医学建构、色情商业、国际劳动分工以及宗教福音传道,都密切依赖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是类象——没有原作的复制——的技术基础。

电子技术促成了劳动向机器人技术和文字处理、性向遗传工程和生育技术、心智向人工智能和决策程序的转化。新的生物技术不仅仅关注人的生育。生物学作为一种有效地重新规划原料和生产过程的工程科学,对于产业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今天,这种意义也许最明显地表现在发酵、农业与能源领域。通信科学和生物学是对自然—技术知识对象的建构,这种对象彻底模糊了机器与有机体的差异;心、身与工具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日常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性的“跨国”组织,文化和想象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象征性组织,二者似乎也同样密不可分。基础与上层建筑、公与私或物质与观念的维持界限的形象似乎从未更虚弱。

我曾用雷切尔·格罗斯曼描绘的集成电路中的妇女这一形象,来给在一个如此密切地通过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重构的世界中的妇女的境况命名。我用“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这样一个古怪的累赘表述来表明,我们不是在论述一种技术决定论,而是论述一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历史系统。不过,这一表述也应表明,科学与技术提供了新的力量源泉,我们需要新的分析与政治行动的源泉。植根于高技术促成的社会关系中的种族、性与阶级的某些重组,可以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有效的进步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

## 家庭工作经济

“新产业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遍及全球的工人阶级。资本的极端流动性和新兴的国际劳动分工，与新集体的出现以及熟悉的群体分类的弱化，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些发展既不是无关于性别，也不是无关于种族的。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白种男人最近易于遭受永久失业，而妇女则不像男人那样快地从工作名册上消失。这不仅仅是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是那些位于出口加工区，尤其是电子工业区的以科技为基础的跨国公司的优先劳动力。更系统的描绘包括生育、性、文化、消费与生产。在典型的硅谷，许多妇女的生活是围绕从事电子技术方面工作的职业而建构的，她们的个人现实包括连续的异性恋的一夫一妻制、照顾孩子、疏远亲属或大多数其他的传统社团，当她们年老时极有可能孑然落寞和穷困潦倒。在硅谷，不同人种和种族的妇女组成了一个在文化、家庭、宗教、教育、语言方面存在着矛盾差异的微观世界。

理查德·戈登把这种新情况称为家庭工作经济(homework economy)。尽管他把与电子技术集合相关而出现的原本意义上的家庭工作包括在内，但戈登是想用“家庭工作经济”来指称一种工作重建，这种工作完全具有原先归之于女性工作——真正只由妇女从事的工作——的那些特征。工作被重新界定为真正属于女性和女性化的，无论是由男人或女人来从事它。被女性化意味着变得极其脆弱；能够像后备劳动力一样被拆散、重组、利用；与其被看作工人还不如被看作服务器；服从有报酬的工作断断续续的时间安排，这种工作是对有限工作日的嘲笑；导致一种近乎猥亵的、不适当的以及还原为性的生存。消除技术需求是新近用于先前享有特权的工人的老策略。不过，家庭工作经济不仅仅指大规模地消除技术需求，甚至对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技术型职业之外的女人和

男人来说,它也不否认新的高技术的领域正在出现。毋宁说,这个概念表明,工厂、家庭与市场按一种新的规模被整合起来,而妇女的位置是关键性的——需要对之进行分析以说明妇女中的差异,以及男人和女人在不同情境中的关系的意义。

家庭工作经济作为一种世界资本主义组织结构,是通过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不是被其引起)的。攻击相对享有特权的、主要是白人的、男性的联合工作之成功取决于新通信技术整合和控制劳动——尽管劳动已大量分散和非中心化——的能力。妇女在失去家庭(男性的)工资(如果她们从未享有过这种白人特权)和她们自己的工作——正在成为资本密集的办公室工作和护理工作——的特征这两方面感受到新技术的后果。

新的经济与技术的调整也与福利国家的崩溃,随之而来的要求妇女为自己以及为男人、孩子和老人维持日常生活的需要的强化相关联。贫困的女性化——由通过家庭工作经济(在家庭工作经济中,稳定的工作成为了例外)摧毁福利国家引起,而由那种希望在养育孩子方面妇女投入的工资将比男人投入的收入多的期待所维持——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焦点问题。各种妇女做主家庭的起因因种族、阶级或性而异;但它们的日益普遍是妇女在许多问题上联合的基础。某种程度上作为她们被强加的母亲身份的一种职责,妇女通常要维持日常生活这没有什么新鲜的;但与整个资本主义的日益增多的以战争为基础的经济的那种整合却是新的。例如,美国黑人妇女——她们已摆脱(勉强地)薪资家政服务,现在开始大量从事职员及类似的工作——遭受的特殊压力,对于持续强加的就业状态下的黑人贫困具有巨大的暗示意味。第三世界的非工业化地区的少女日益觉得自己是家里现金工资的唯一或主要来源。这些发展必然在性别和种族的精神动力学和政治学方面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阶段(商品/早期工业、垄断、跨国)的



框架内——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跨国主义连在一起,并且与詹姆逊的三个主导性的审美时期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关——我想要论证,特定的家庭形式与资本的形式以及它的政治和文化的伴生物辩证地相关联。尽管实行起来是成问题的和不平衡的,但这些家庭的理想形式可系统化为:(1)父权制核心家庭,由公与私的二分模式所结构,并伴随着白人资产阶级的划分领域的意识形态和19世纪英美资产阶级女性主义;(2)现代家庭,由福利国家和像家庭工资这样的制度所促成(或强加),伴随着非女性主义的异性恋意识形态,包括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格林威治村所呈现的激进形式;(3)家庭工作经济的“家庭”,具有妇女做主家庭的矛盾修辞建构,它否定女性主义并吊诡地强化和削弱性别本身。

在这个语境中,对起因于新技术的全球结构性的未充分就业进行预测,部分地描述了家庭工作经济的图景。由于机器人技术与相关技术在“发达国家”使男人失去了工作,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加剧了为男性创造工作机会的失败,而且还由于办公室自动化甚至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也变得普遍,因此,工作的女性化程度增强了。美国的黑人妇女始终知道面对黑人男性的结构性未充分就业以及她们自己在工资经济中岌岌可危的位置会是怎么一回事。性、生育、家庭与共同体生活,以种种亦使白人和黑人妇女的境况相区别的方式,与这种经济结构交织在一起,这不再是一个秘密。更多的男人和女人将对付这同样的境况,这将使得在基本的生计维持问题(有工作或无工作)上建立跨种族和性别的联合成为必要,而不只是令人愉快。

新技术对全球性的饥饿和维持生存的粮食生产也具有深刻的影响。雷·莱瑟·布鲁姆博格估计,妇女生产了50%的维持世界生存的粮食。妇女一般不能从粮食和能源作物的增强的高技术商品化中获益,她们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她们提供粮食的责任

并没有减少,而且她们的再生产状况变得更加复杂了。绿色革命技术与其他高技术工业生产相互影响,改变了性别劳动分工和不同的性别移民模式。

新技术似乎深深地卷入罗斯·皮切斯基曾分析过的“私人化”形式之中,在这种形式中,军事化、右翼的家庭意识形态和政策以及将共同的财产强行界定为私人财产,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促进。新通信技术对于消除每个人的“公共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这促进了永久的高技术军事设施的迅速增加,而损害了大多数人,而尤其是妇女的文化和经济利益。像电视游戏和小型化电视这类技术对于创造现代的“私人生活”形式似乎是至关重要的。电视游戏文化被缓慢地引向个人竞争和宇宙战争。这里产生了高技术的、性别化的想象,即能想到地球的毁灭和科幻式地逃离其后果的想象。被军事化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想象;而其他的电子与核战争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

新技术影响到性与再生产的社会关系,而且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性与手段的密切关系,即把身体看作一种私人的满足和效用最大化的机器的观点的密切关系,在社会生物学的起源故事中得到很好的描述,这些故事强调遗传微积分,解释男女性别角色的支配的必然辩证法。这些社会生物学故事依赖一种将身体看作生物成分或赛博通信系统的高技术观点。再生产状况的诸多变化之一是医学上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妇女的身体具有可以新的方式“透视”和“干预”的界限。当然,在医学阐释学中,谁控制着对身体界限的解释是一个重要的女性主义问题。窥视镜在1970年代充当妇女要求拥有自己的身体的象征;手工艺工具不适于表达我们在应对赛博再生产实践的现实时所必需的身体政治。自助是不够的。可视性技术恢复了用照相机来搜寻这种重要文化实践,恢复了照相意识的深层的劫掠性。性征、性活动以及再生产是结构我们有关个人和社会之可能性的想象的高技术神话体系中的主要

角色。

新技术的社会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大量的科技劳动力重构期望、文化、工作和再生产。一个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危险是强大的双模态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造成大批各族群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有色人种,局限于家庭工作经济,各种类型的无知,以及普遍的裁员和无能为力,受到高技术的镇压机器的控制,从娱乐到监视并消失。一种适当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应关注从事特殊重要职业的妇女,尤其是从事建构科技话语、程序与对象的科技创造的妇女。

这个问题只是探究女性主义科学之可能性的一个方面,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新的从事科学的群体能在知识、想象和实践的创造中起到什么样的基本作用?这些群体怎样才能与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联合?可以建构什么样的政治责任以跨越分隔我们的科技等级而将妇女联合起来?在与反对科学设备军事化的行动团体的联合中,可能会有发展女性主义的科学/技术政治的途径?硅谷的许多科技工人,包括高技术牛仔,并不想为军事科学工作。这些个人偏向和文化趋向,能否在其中妇女——包括有色人种妇女——的人数已相当多的职业中产阶级当中,结合形成进步的政治呢?

### 集成电路中的妇女

让我概括描述一下妇女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些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重新建构的。如果通过区分公私领域——表现为将工人阶级生活分为工厂和家庭、将资产阶级生活分为市场和家庭以及将性别存在分为个人和政治领域——来说明妇女生活的特征在意识形态上曾是可能的话,那么现在这完全是一种误导性的意识形态,它甚至表明了这些

二分项目在实践和理论上是相互建构的。我喜欢一种网络意识形态形象,它暗示空间和身份的多样性,个人身体和政治团体中的界限的可渗透性。“联网”既是一种女性主义实践也是一种跨国公司策略——联网是针对对抗性的赛博。

描述统治的信息学的特征的唯一方式是把它描述为一种对不安全和文化贫困的大规模强化,造成为最弱势者建立的维持生存网络的普遍失败。既然这种描述大多与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的紧迫性就显而易见了。现在有许多事正在做,而且政治工作的理由是充足的。例如,努力发展为那些上班挣钱的妇女争取权益的集体斗争形式,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这些努力与劳动过程的技术调整,与工人阶级的改造,具有深刻的联系。这些努力也在提供对一种更加全面的劳动组织的理解,这种劳动组织包括共同体、性与家庭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产业工会中从未被优先考虑过。

与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有关的结构调整引发了强烈的矛盾心理。但这最终未必会被 20 世纪后期妇女与工作、文化、知识生产、性与再生产的所有方面的关系的影响所平抑。因为有极充分的理由,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是最有效的,并且难以理解那些看起来只能像错误意识的东西以及在晚期资本主义人们为什么会参与对他们自己的统治。关键是要记住,失去的东西——尤其从妇女的观点来看——常常是暴虐的压迫形式,而这些形式在面对当前的侵害时被以怀旧的方式自然化了。对由于高技术文化的介入而分裂的统一体的矛盾心理,要求的并不是将意识划分为“作为可靠的政治认识论之基础的敏锐批判”与“受操纵的错误意识”这两个对立的范畴,而是对新出现的快感、经验和权力——这些东西具有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潜能——进行敏锐的理解。

希望出现新的基础以建立跨越种族、性别、阶级的新的统一体

是有理由的,因为种族、性别、阶级这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基本单位本身是变化无常的。在全球性的与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的联结中,遭遇到的困难的强度是巨大的。不过,人们经验到的东西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缺少充分巧妙的联系以集体性地建立有效的经验理论。目前种种试图阐明“我们的”经验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的、人类学的——都只是初步的。

我意识到我所处在的历史位置——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女孩,被授予生物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这是因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政策的冲击而成为可能的——提供的视角的奇特性。我的身体和心灵既受到妇女运动也受到二战后的军备竞赛和冷战的建构。为产生忠诚的美国技术专家而设计的政治,也产生了大量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关注政治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效果,而不是关注当下的失败,希望的理由就更充分。

女性主义观点的永久性偏见,影响了我们对政治组织和参与形式的期望。我们不是为了好好工作才需要一个整体观点。女性主义的共同语言之梦,就像所有对一种完全真实的语言,即完全忠实地指称经验的语言的梦想一样,是一种极权化的帝国主义梦想。在这种意义上,辩证法也是一种渴望解决矛盾的语言梦想。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可以从与动物和机器的融合中学会如何不成为一个作为西方逻各斯之体现的大写的人。从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造成的这些有效而忌讳的融合中可以获得快感,从这个观点来看,可能的确存在着一种女性主义科学。

### 赛博:一种政治身份的神话

我想以一个有关身份和界限的神话——这一神话可能激活了20世纪后期的政治想象——来作为结束。在这个故事中,我借鉴

了乔安娜·罗斯、萨缪尔·迪兰妮、约翰·瓦雷、詹姆斯·泰普特里、奥克特维亚·巴特勒、莫尼克·威蒂格以及冯德·麦金太尔等作者的观点。这些人是我们的故事讲述者，探索体现在高技术世界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是赛博理论家。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对身体界限和社会秩序的概念的研究，应该有助于我们意识到基本的身体意象属于世界观，而且也属于政治语言。法国女性主义者如吕西·依利格瑞和莫尼克·威蒂格，尽管有许多差异，但都擅长从对化身的形象描述，而尤其对威蒂格而言，从对身体的破碎和重构的形象描述来书写身体，编织爱欲、宇宙论和政治。

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如苏珊·格里芬、奥德丽·罗德和艾德里安娜·里奇，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政治想象——也许过分限制了我们将承认为友好团体和政治语言的东西。她们坚持有机的东西，以此来反对技术的东西。但她们的象征体系和相关的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异教的立场，充满有机论论调，只能根据桑多瓦尔的观点理解为与20世纪后期相适应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她们只会使任何不关注晚期资本主义的机器和意识的人感到迷惑。在这种意义上，她们是赛博世界的一部分。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还有大量的东西明显包含有机体和机器的明确区分以及类似的结构西方自我的区分的瓦解所固有的可能性。正是同时性的瓦解摧毁了统治的矩阵，打开了几何学的可能性。可以从个人和政治的“技术”污染认识到什么呢？我将简要考察一下两组交叉重叠的文本，看一看它们关于建构一个潜在有用的赛博神话的洞见：建构有色人种妇女和女性科幻小说中的异形自我。

前面我已指出，“有色人种妇女”可以理解为一种赛博身份，一种由融合外人身份综合而成的有效的主体性。图绘这种潜能有物质上和文化上的坐标方格。奥德丽·罗德的《局外人姐妹》的标题抓住了这种基调。在我的政治神话中，局外人姐妹是国外的妇女。美国的女性和女性化的工作者，会把这些妇女看作妨碍她们的团

结、威胁她们的安全的敌人。在国内，即在美国的国界内，局外人姐妹是那些在相同的产业中被操纵以达到区分、竞争、利用之目的种族和族裔身份的妇女中的潜在一员。“有色人种妇女”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的优先劳动力，是全球的性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五花八门的再生产政治因她们而进入日常生活的真正的妇女。受雇于性产业和电子装备车间的年轻的韩国妇女是从中学征招的，学过集成电路。有读写能力，尤其是懂英语，是那些很受跨国公司欢迎的“廉价”女性劳动力的特征。

与东方学关于“口语原始性”的陈词滥调相反，有读写能力是有色人种妇女的特定标志，美国黑人妇女以及黑人男性曾经冒死学习、教授阅读和书写才获得这种能力。书写对于所有被殖民化的族群具有特别的意义。书写对于区分口说文化和书写文化的西方神话是至关重要的。原始的心智和文明的心智，这一区分近来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西方的非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崇拜一神教、非勒斯、权威以及单数词、唯一绝对的名称——的攻击中受到越来越大的侵蚀。为书写的意义争论是当代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解放书写游戏是极其严肃的。美国有色人种妇女的诗歌和故事反复涉及书写、涉及获取意指的权力；但这一次权力必然不是非勒斯的也不是清白的。赛博书写必然不涉及堕落，不涉及对从前在语言、书写、人类之前的整体性的想象。赛博书写涉及的是幸存的能力，幸存的能力不是基于原初的清白，而是基于利用工具去记录把它们作为他者记录的世界。工具常常就是故事，被重述的故事，是颠倒和取代自然化身份的等级二元论的变体。在重述起源故事时，赛博作者颠覆了西方文化起源的中心神话。我们的头脑充斥着那些渴望在天启中实现的起源神话。对女性主义赛博来说最为重要的非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起源故事，被建构为文字技术——书写世界的技术、生物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要素，这些技术最近将我们的身体文本化为关于 C3I 的格栅的编码问题。

女性主义的赛博故事有着将交流和智能重新编码以颠覆命令和控制的任

务。从象征性角度和实际的角度来看,有色人种妇女的斗争充满着语言政治;有关语言的故事在美国有色人种妇女的丰富的当代写作中具有特别的力量。例如,重述土著妇女马林奇的故事——她是新世界的混血“杂种”种族之母、语言大师、科尔特斯的情妇<sup>[18]</sup>——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身份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彻丽·莫拉加在《爱在战争岁月》中,探讨了当人从未拥有原初语言、从未讲述原初故事、从未享有文明世界的合法的异性恋的和谐、因而也不能把身份建立在神话或从天真无邪状态的堕落以及拥有自然之名(即父母之名)的权利的基础之上时的身份主题。莫拉加的写作,其华丽的文辞,在她的诗中呈现为一种与马林奇掌握征服者的语言同样的违反——一种使幸存可能的违反,一种不合法的创造。莫拉加的语言不是“整体”;它被有意识地嵌合,是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两种征服者的语言的嵌合体。然而,正是这种嵌合的怪物,而不是一种违反前的原初语言,造就了有色人种妇女的色情的、适当的、有效的身份。局外人姐妹暗示了世界幸存的可能性,不是因为她的清白无辜,而是因为她能在边缘生存的能力,因为她无须原初整体性的创始神话而书写的的能力,这种创始神话必然启示着向死亡的同性的最终回归,人类曾把这种同性想象为清白和全权的母亲,最终摆脱了她儿子对她的再次利用。书写记录着莫拉加的身体,确证它为有色人种妇女的身体,不可能进入英国父亲的未标记的范畴,或进入有关一个从未存在的“原初文盲”母亲的东方学神话。马林奇在这里是母亲,而不是偷吃禁果前的夏娃。书写确认的是局外人姐妹,不是人类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家庭所需要的堕入书写之前的女人。

书写显然是赛博技术,是 20 世纪后期的被铭刻的表面。赛博政治是语言斗争,是反对纯粹的交流、反对完全用一种代码来翻译



所有意义这一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核心教义的斗争。这就是赛博政治强调杂音、主张污染,为动物和机器的非法耦合而欣喜若狂的原因。有一些使男人和女人很成问题的耦合,它们颠覆欲望——一种被想象为创造语言和性别的力量——的结构,从而也颠覆“西方”身份的再生产,即自然和文化、镜像和眼睛、奴隶和主人、身体和心智的再生产的结构与模式。“我们”并不是开始就选择成为赛博,但选择却为一种想象个体的再生产先于“文本”的广泛复制的自由主义政治和认识论创造了基础。

赛博无须使政治基于“我们”整合所有其他统治形式的享有特权的压迫位置,基于纯粹被侵害者的清白无辜,基于那些接近自然的理由,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可能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据西方认识论的律令运转的,试图从压迫的等级制和/或潜在的道德优越性、清白以及更接近自然的立场的角度来建构一种革命的主体。不可获得的原初的共同语言之梦或有望防御敌对的“男性化的”分离的原初共生关系,却被写进了一种文本的游戏,这种文本游戏最终没有赋予阅读或救赎的历史以特权,承认“自己”完全卷入世界之中,使我们无须将政治根植于认同、先锋政党、纯洁性和养育孩子之中。由于被剥夺了身份,混血种族使人懂得边缘的力量和像马林奇这样的母亲的重要性。有色人种妇女已把她从男性化的令人畏惧的邪恶母亲转变为教授如何生存的本来就能读会写的母亲。

这不仅是文学解构,而且也是阈限的转变。每一个以原初的清白开始并赋予向整体性回归以优先性的故事,都想象生命戏剧是个性化、分离的过程,是自我的诞生,自主的悲剧,是堕入书写,是异化,即被他者内心中想象的间歇所缓和的战争。这些情节由一种再生产政治——没有缺陷的复活、尽善尽美、抽象——所支配。在这种情节中,妇女要么被想象得更好,要么被想象得更坏,但所有人都同意,她们缺乏自我,个性化能力薄弱,更多的与口说

者、与母亲结合,与男性化的自主不太相干。但存在着另一条减少与男性化自主的利害关系的途径,这条途径不经过女人、未开化的人、无足轻重的人、镜像阶段及其想象域。它经过妇女和其他现在时的、不是出自女人的非法的赛博,她们否认欺骗的意识形态根源,以便拥有真实的生命。这些赛博是拒绝在此时消失的人,无论一位“西方”评论者多少次谈到由“西方”技术、由书写造成的另一个原始的、另一个有机的群体的可悲的消失。这些有着真实生命的赛博,即爱娃·奥格所描述的在日本和美国的电子公司工作的东南亚乡村女工,实际上重新书写了她们的身体和社会的文本。在这种阅读游戏中,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概括一下,某些二元论在西方传统中源远流长,它们对支配妇女、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总之,支配被建构为他者以反射自我的一切——逻辑和实践具有系统性的影响。这些使人困扰的二元论中主要的是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现实/表象、整体/部分、行动者/资源、制造者/造物、主动/被动、正确/错误、真理/幻觉、总体/局部、上帝/人等。自我是不受支配的一方,他借助于他者认识到这一点;他者是把握未来的一方,他通过经受支配认识到这一点,对支配的体验揭穿了自我自主的假象。成为一(One)就是成为自主的、有权力的,就是成为上帝;但成为一也是成为一种幻觉,从而与他者卷入一种辩证的启示之中。然而成为他者则是成为多重的,没有明确界限,受折磨,非实质的。一太少,但二则太多。

高技术文化以有趣的方式质疑这些二元论。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谁制造和谁被制造是不明确的。在变成编码实践的机器中何为心智与何为身体也是不明确的。就我们在正式的话语(如生物学)和日常实践(如集成电路中的家庭工作经济)中的自我认识而言,我们感觉自己是赛博,混合物、镶嵌物、嵌合体。生物有机体已变成生物系统,通讯设备,等等。我们有关机器和有机体、技术的

东西和有机的东西的正式知识没有根本的、本体论上的分别。

一个结果是我们与我们的工具的联系感增强了。许多电脑使用者体验到的那种出神状态已成为科幻电影和文化笑话的主题。也许,截瘫患者与其他身体严重残疾的人能够(有时确实)最强烈地体验到与其他交通设备混为一体的感觉。安妮·麦克弗雷的《歌唱的船》探讨了一个赛博的意识,这个赛博是女孩的大脑和复杂机器的混合体,是在一位严重残疾的孩子出生后构成的。性别、性活动、具体化、技能:所有这些在这个故事中都被重构。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应以皮肤为界,或至多包含皮肤所囊括的其他存在物?从17世纪直到现在,机器可以被赋予生命——赋予它们幽灵的魂魄而使它们或说话或行动或说明其有序的发展和智能。或者有机体可以被机器化——还原为被作为心智资源来理解的身体。这些机器/有机体关系已废弃了,不必要了。对我们来说,在想象和其他实践中,机器可以是修复设备,本质的成分,友好的自我。我们不需要有机整体论来提供不能渗透的整体性,总体女人及其女性主义变体(突变体?)。让我通过对第二组文本——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赛博怪物逻辑的非常有限的解读来结束这个问题。

生活于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中的赛博使男人或女人、人类、人造物品、种族成员、个体身份或身体的地位变得极成问题。凯蒂·金阐明,阅读这些小说的快感主要不是基于认同。通过学习已敢于解读像詹姆斯·乔伊斯或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学生,在第一次面对乔安娜·罗斯时,却不知道如何理解《埃里克斯或阴性男人历险记》,小说中的人物拒绝读者对单纯的整体性的寻求,同时又认可对英雄冒险、纵欲和严肃政治的渴望。《阴性男人》是关于一种基因型的四种变体的故事,所遇到的这些变体即使结合起来也不能形成一个整体,不能解决违反道德的行为的困境,也不能消除对性别的日益增长的反感。萨缪尔·迪拉尼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尤其是《纳弗文的故事》,通过重新进行过时的革

命,再现了西方文明的创始步骤,以颠覆它们的貌似合理性。詹姆斯·泰普特里的小说被认为特别具有男性气质,直到她的“真实”的性别被暴露;她讲述的是基于非哺乳动物的技术如轮流生育或雄性育仔囊或雄性喂养的生育的故事。约翰·瓦雷在他对盖亚进行的极端女性主义的探讨中,建构了一个超级赛博,盖亚是疯狂女神—行星—魔法师—老女人—技术手段,其表面产生了一种后赛博共生关系的奇特排列。奥克特维亚·巴特勒写了一个非洲女巫,她以其改变事物的能力对抗其对手(野生种子)的遗传控制,她使时间倒流,将一位现代美国黑人妇女带入奴隶制度,在这里,该妇女的行为与她的白人主人—祖先相关,决定了她自己的血统(种族)的可能性,而且也决定了对一位被收养的杂种孩子——他开始认识到敌人就是自己(幸存者)——的身份和共同性的非法洞见的可能性。

因为对越界的描写特别丰富,冯德·麦金太尔的《超光速》可以结束这个关于那些有希望帮助重新界定化身和女性主义书写的快感和政治的怪物的节略目录了。在一部没有一个角色“完全”是人的小说中,人的地位是极成问题的。奥卡,一位遗传基因被改变了的潜水者,能与逆戟鲸说话,能在深海状况下生存,但她渴望像飞行员一样探索太空,这就需要进行危害到她与潜水者和鲸类的亲密关系的仿生移植。通过携带新开发的代码的病毒媒介,通过外科移植手术,通过植入微电子装置,通过模拟复制以及其他手段,实现她所期望的转变。雷妮通过接受使她能够经受超光速的速度变化的心脏移植和许多其他的改变而成为了一名飞行员。拉杜·德拉库在他居住的地外行星上经历了一场病毒性肺炎之后,发现自己具有了一种改变所有物种的空间知觉界限的时间感。所有的人物都探讨了语言的界限、交流经验的梦想,探讨了即使在这个不断变化和连接的世界里,限制、偏向以及亲密的必要性。

怪物总是界定着西方想象之共同性的界限。古希腊的人首马

身怪物和亚马孙族女战士,通过对婚姻的破坏和具有动物性的女战士的界线污染,确立了希腊男人的中心城邦的界限。

在现代早期的法国,未分离的双胞胎和两性人是混乱的人形材料,它们为关于自然和超自然、医学和法律、异常和疾病——所有这些对建立现代身份至关重要——的话语奠定了基础。研究猴子和猿的进化和行为的科学,划分出20世纪后期产业工人身份的多重界线。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中的赛博界定了与那些关于男人女人的世俗小说提出的十分不同的政治可能性和界限。

严肃地对待赛博而不是把它视为我们的敌人,会产生几个后果。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是力量和身份的地图。赛博的身体也不例外。赛博的身体不是清白的;它不是诞生于花园;它不寻求单一的身份,也不产生没有终结(或直到世界终结)的对立的二元性;它认为反讽是理所当然的。一太少,而二只是一种可能性。从技能——机器技能——中获得强烈的快感不再是罪过,而是具体化的一方面。机器不是一个需要驱动、崇拜和支配的它。机器就是我们,我们的程序,我们的化身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对机器负责;它们并不支配或威胁我们。我们对界线负责;我们就是它们。一直到现在(从前),女性化身似乎是给定的、有机的、必然的;而且,女性化身似乎意味着养育技能和它的隐喻扩展。只有通过脱离原来的位置,我们才能从机器获得强烈的快感,然后辩解说这毕竟是适合于女性的有机的活动。赛博有时可以更严肃地考虑性和性的化身的局部的、流动的方面。毕竟,性别不可能是普遍的身份。

什么算作日常活动、算作经验,这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可以利用赛博形象来解决。女性主义者最近声称,妇女倾向于日常性,妇女比男性更多地维持着日常生活,因而潜在地具有一种有利的认识论位置。这一声称有引人信服的一面,使不受重视的女性活动变得令人瞩目,并将其命名为生活的基础。但是,是生活的

唯一基础吗？所有对妇女的无知，所有对知识和技能的排斥以及知识和技能的失败是怎么回事？男人具有日常生活能力，擅长建造事物，将它们拆开，擅长游戏是怎么回事？其他化身又是怎么回事？赛博性别是一种进行全面报复的局部可能性。种族、性别与资本需要一种整体和部分的赛博理论。赛博中不存在创造总体理论的动力，但存在着一种对界线、对它们的建构和解构的内在体验。有一种神话体系等待着成为一种政治语言，为一种考察科学技术和挑战统治的信息学的方式奠定基础。

一个最后的形象：有机体和有机组织的、整体主义政治依赖于重生(rebirth)的隐喻，并总是要求再生产的性资源。我要表明，赛博与再生(regeneration)更有关，并且怀疑生育母体和大多数分娩行为。对蝶螈来说，受伤后——例如失去肢体——的再生，包括器官再生和恢复功能，可能在以前受伤的部位成对重新长出，也可能是其他的单数局部生成的形式。

重新长出的肢体可能是异形的、复制的、有效的。我们都曾深受伤害。我们需要的是再生，而不是重生，我们之被重构的可能性包括希望有一个没有性别的异形世界的乌托邦梦想。

赛博意象可有助于表达本文的两个关键论点：1)创造普遍的、总体化的理论是一个严重错误，它可能永远——但现在肯定——忽略大部分现实；2)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负责，这就意味着拒绝反科学的形而上学，技术的鬼神学，从而也就意味着承担起在与他人的局部联系中、在与我们的每一分子的交流中，熟练地重构日常生活的界线的任务。科学技术不仅是使人类可能得到巨大满足的手段，也是复杂的支配形式的发源地。赛博意象可以提示一条走出二元论——我们以此来向自己解释自己的身体和工具——的迷宫的途径。这是一个关于有力的异端异质语言，而不是关于一种共同语言的梦想。它是以使新右派的超级维护者害怕的方式说话的女性主义者的想象。这意味建构和破坏机器、身份、范畴、关系、

空间、故事。尽管两者被绑在一起旋舞，但我宁愿是赛博而不是女神。

## 注 释

[1] 一种由美国发明家和工程师弗雷德里柯·泰勒(1856—1916)设计的工业管理系统，它试图将工人的效率最大化以优化生产。

[2] 法国哲学家和文化史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在《性史》(1976)中运用这个术语来描述那些调控身体、把权力和知识的方法扩展到生命本身的社会权力机制。

[3] 关注存在之性质的哲学分支。Chimera: 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具有狮头、羊身、蛇尾的女性怪物；更一般地指所有由不协调的部分组成的怪物。

[4] 根据精神分析学理论，在婴儿期的最初阶段，先于与父亲和社会秩序发生冲突的俄狄浦斯阶段，出现了一个依赖母亲、自恋认同以及多形性欲冲动的时期。这一强烈依恋母亲的时期引起了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家(例如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与海伦·西苏)的极大兴趣。

[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非异化劳动指不是在奴隶社会、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中进行的劳动。

[6] 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3年提出的主动防御战略，以建立一个防御来袭导弹的屏障。

[7] 这是 Mary Shelley 的小说《弗兰肯斯坦》(1818)中虚构的生物，他请求他的创造者为他创造一个配偶。

[8] 精神分析学将童年早期的任务——形成一个明确的自我或身份——为与母亲分离，这是通过父亲的形象介入母—子二元关系的俄狄浦斯阶段完成的。

[9]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July/August 1984, pp. 53—94.

[10]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 trans. P. Foss, P. Patton, P. Beitchman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11] 从1982年开始，近20年来抗议在格林汉姆公地的美国空军基地部署核巡航导弹的英国人团体。

[12] 刘易斯·卡罗尔提到的《艾丽斯仙境奇遇记》的女主人公，她变得既非常小又非常大。

[1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1964); Carolyn Merchant, *Death of Natur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0).

[14] 一个组织起来在加利福尼亚利弗莫尔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抗议核武技术发展的团体。

[15] Catharine Mackinnon,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Signs*, Vol. 7, no. 3 (1982). pp. 515—544.

[16] 即把个体劳动力转化为商品。

[17] 即把生活划分为工作的公共领域和家庭的私人领域,男人和女人分别掌握着这两个领域的权威。

[18] 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 1485—1547),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探险家。马林奇(Malinche):一位阿兹台克酋长的女儿,她是科尔特斯的翻译及情妇。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 抗战时期重庆“才子集团”的 “生活态度论”

黄晓武

“生活态度论”这一说法是由当时中共南方局的一些年轻人，如乔冠华、胡绳、陈家康等，在《中原》、《群众》等杂志上发表《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文章而引起的，他们在文章中探讨感性、感情、生活态度等问题，以之反对左翼阵营中的教条主义，被认为是党内知识分子为了响应延安整风号召而在国统区开展的思想运动，因为错误理解了延安的意图而受到批评和警告，被要求立即整改。<sup>[1]</sup>

现有的对“生活态度论”的探讨基本上是在中共党内批评的框架下进行的，讨论的文本一般也仅限于中宣部电文和董必武的回电中的几篇文章，但是，稍稍换一个考察角度，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很多异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与误认的框架之外，“生活态度论”本身也可以揭示出国统区思想界更广泛的问题，它是针对国统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教条主义问题而提出的。也就是说，它虽然从延安整风运动中获得了理论和实践的资源，但它针对的是国统区思想界本身的问题，离开了这个语境，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其观点主张。

## “生活三度”说

1944年福建永安出版的关于这次讨论的文集名为《方生未死之间》，收录的文章依次为：《方生未死之间》（于潮）、《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项黎）、《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于潮）、《生活的三度》（嘉梨）、《论所谓“生活的三度”》（茅盾）、《论艺术态度和生活态度》（项黎）。<sup>[2]</sup>史任远在写于1945年的序言中说：“这里的六篇文章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上最佳的收获。从其中，我们可以获知自‘五四’以后的二十六年来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不能深入的原因和今后新文化运动应循的途径；可以获知主客观的关系和生活究竟的意义之所在；可以获知新文化运动至此推进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sup>[3]</sup>他是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来评价“生活态度论”的基本观点的，认为这些文章在主客观问题上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那么“生活态度论”在主客观问题上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呢？

《方生未死之间》收录的这次讨论的相关文章的范围和中宣部所批判的文章的范围稍稍有些不同，它没有选择《群众》上的陈家康的《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文章，却选入了嘉梨和茅盾关于“生活三度说”的文章。其实，在受到党内批判之前，所谓的“生活态度论”比较清晰的理论上的阐述就是“生活三度”说。“生活三度”说最早是由嘉梨在《人民不是一本书》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他认为，在处理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上，要注意生活的三个方面：要扩大生活的范围，加深生活的经验，加强生活的密度。“这是生活的三阶段，同时也是生活这一范畴的三方面：扩大生活范围指的是生活的广度，加深生活经验指的是生活的深度，而用全副心肠去关切人民的命运指的是生活的密度——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距离。”<sup>[4]</sup>

嘉梨认为,我们提出生活的概念是为了克服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这一问题,但实际上生活概念的提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生活这一概念下,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仍然停留在旁观的层面上,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知识分子用全副心肠去贴近民众。“由于不满意于我们对这一世界的关系仅仅乎停滞在理论上的‘想想’,我们提出了生活;但是直至现在我们所了解的生活大部分是‘看看’世界的表面,和‘过过’现实生活而已。现在是我们前进一步,用全副心肠去‘贴近’我们人民的时候了。人民不是一本书,生活不是为了搜集材料,生活本身就是目的,生活永没有疲倦的时候。”<sup>[5]</sup>

在写于稍后的《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一文中,乔冠华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发挥:“我们不但要扩大我们的生活广度,加深我们生活的深度,而且要加紧我们生活的密度,我们不但要精通世故,而且要切近人情,我们不但要和我们的人民生活在一起,而且要爬到他们的心里用心去‘疼’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道出人们的衷曲;他们的喜、他们的怒、他们的哀、他们的乐、他们的爱、他们的恶、他们的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创造出真正的新文化。”<sup>[6]</sup>在这篇文章里,乔冠华把“生活三度说”提炼成了一种关于生活态度的理论,认为我们要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我们今天不但要科学和民主,而且要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发自内心的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sup>[7]</sup>

茅盾认为关于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密度的“生活三度”说对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有很大的益处,它有三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把那些格言式的关于生活的指示组织成为了体系”,“把一向成为口头禅的‘充实生活’、‘向人民大众的生活学习’等等口号都组织起来,给以具体的内容”;“第二个优点是从‘密’字的强调上把理论往前更发展了一步;第三个优点是因为它成为一个整然的体系给人

们以研究讨论的便利。”<sup>[8]</sup>在这个“生活三度”说中,茅盾认为,密度的提出,最为扼要,但他也对密度说进行了补充,认为密度除了贴近人民的一面,也有对自己的一面,那就是事事认真:“‘密度’是说‘贴近人民’”,“但是除了这‘人和人民’的关系,密度还应该有‘对自己’的一面。今有千百人于此,同样的‘看看’,然而所得多寡不尽同,所得广狭亦不尽同。同样的‘过过’,然而阅历的深浅不尽同,体味到的甘苦不尽同,为什么不尽同呢?恐怕最主要的,还在各人处世的态度不尽同。凡是能够事事认真,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兴味盎然,抱有最大而无穷尽的热忱的人,他在‘看看,过过’以后,所得必然最多最深,这一种事事认真,对一切都兴味盎然的态度,其始属于‘个人修养’的范围,即‘对自己’,但其后扩大了,便是对于人民的体贴和关心。”<sup>[9]</sup>因此,茅盾对“生活三度说”作出了新的总结:“密度是广度和深度的基础;而密度也者,在己就是事事认真,对一切兴趣浓厚,对人则是体贴,全心灵和人民拥抱。私生活的事事认真,对一切兴趣盎然,就是他能够爱人民,全心灵和人民合抱的起点。”<sup>[10]</sup>

但是,茅盾也对“生活三度说”和思想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所谓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其实只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光有生活的态度还不够,作家必须有清醒的思想觉悟,如果思想上没有基础,即使刻意追求生活的广、深、密,也不会达到真正深入民众的效果。“所谓事事认真,所谓对生活一切都兴趣盎然,还不过是一种生活态度;光有了这一种生活态度也还不够,必须思想不糊涂。归根一句话,撇开了思想觉悟问题而谈生活的广深密,也就不会有是处。”<sup>[11]</sup>

“生活态度论”有没有脱离思想基础呢?其实,在明确提出“生活态度论”的《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一文中,乔冠华对生活态度的强调正是从思想问题的缺陷出发的。他对当时重庆左翼文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进步知识分子“思想得太多,而感觉得

太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乔冠华认为，原因是进步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它现在还是一种教条和理论，“直至现在它还没有能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血肉”，因为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教条，因此导致了思想和生活的脱离和矛盾：“最初是思想和生活的矛盾，其次是思想和生活在外表上一致了，又是工作（公生活）和生活（私生活）的矛盾。最后工作和生活事实上一致了，又是理智和感情的矛盾——不是行不由衷心为行役，便是思想得太多感觉得太少（甚至至于思想上积极感觉上消沉）”。<sup>[12]</sup>

乔冠华认为这种思想和生活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通病。五四以来介绍进来的各种西方的文化和思潮只能以思想始，以思想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二十五年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只是二十五年的新思想运动的历史；因为每一种新思想运动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存在，它自然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变成比思想更多的东西”。<sup>[13]</sup>乔冠华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生活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并且，新文化运动的担当者本身也不能脱离这种现实生活环境的制约，因此，“新文化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漂浮在脑里，而旧社会的幽灵，却深深地盘踞在我们心中”，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新文化的抽象理论的领域里，我们始终难以完全免掉教条主义的毛病；在我们的感性艺术的领域里，我们始终难以完全免掉公式主义的毛病”。<sup>[14]</sup>

乔冠华认为当前知识界存在的精神危机部分地也是由中国的传统造成的，是“死的拉住了活的”。乔冠华认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三教并列的：儒家、释家和道家，但实际上，它们三者在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他认为，佛教在中国过去的国民生活中始终没有发生过独立而又深刻的影响，

和儒家、道家一起构成中国士大夫文化传统的另一大要素是“土匪”主义,也就是一种“利用一切、渗透一切、败坏一切、不顾一切”的“极端的个人主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由儒家、道家和“土匪”三大要素构成,五四运动并没有完全清除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五四运动开始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解除了旧礼教的枷锁,忽视了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态度的重要;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仅是要解除他们的旧礼教的枷锁,而且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我们要改造中国知识分子,我们要改造人。”<sup>[15]</sup> 乔冠华提出,解决当前知识界精神危机的出路就是要解决理论和实践不能统一的问题,关键在于要提倡生活态度,也就是说,要“建立起一种符合于那新思想的生活态度”。<sup>[16]</sup>

五四以来,关于大众化问题和“深入民间”、“手触生活”、“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等讨论都试图解决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隔膜的问题,那么乔冠华在这个时候提倡生活态度论的意义在哪里呢?乔冠华认为:“这一个主观任务的提出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指示着新文化的建立不但有待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且要主观当事者的改变,新文化的建立者本身还是需要建立的。”<sup>[17]</sup> 问题的重心不单是要改变生活态度从而更好地去了解民众,而是要改变自己。“我们不仅要了解旁人,而且要改造我们自己。”<sup>[18]</sup> 这里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提法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的观点极其相似。马克思认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sup>[19]</sup> 乔冠华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提倡知识分子要改变生活态度,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革命的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20]</sup>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正像乔冠华所说的,革命理论

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大革命时期就明确提出了,在那个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转变”,“在 1925—1927 年前后,我们在新文化的论坛上时常看到一个名词,即所谓‘转变’”。<sup>[21]</sup> 乔冠华认为那时的所谓转变实际上只是指思想的转变,而现在所要求的转变是生活态度的转变。为什么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在这里具体地被看成是生活态度的问题呢?因为乔冠华要解决的是国统区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问题,正像他自己在回忆《方生未死之间》这篇文章时所说的:“这篇文章里涉及的问题很广,系统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sup>[22]</sup> 乔冠华认为,首先,在国统区这个特殊的条件下,知识分子是无法用直接的革命实践来解决环境的改变和自身的改造问题的。如果脱离直接的革命实践,那么知识分子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呢?乔冠华提出了他的“到处都有生活”说:“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或后方,而是在生活态度。”<sup>[23]</sup> 其次,乔冠华对革命实践一词进行了重新的解释。他认为,在大革命中提出理论和实践的统统一时,人们对实践的理解是非常单纯的,所谓实践就是直接行动,没有直接行动,就没有实践。“他们心目中的实践是只有愤怒,没有感伤的;只有叫喊,没有呻吟的;只有流血,没有流泪的;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其实,不管是一个怎样新的人,他愤怒,他也感伤;他叫喊,他也呻吟;他流血,他也流泪;他前进,他也后退;除掉直接行动而外,他还有并非直接行动的生活。”<sup>[24]</sup> 因此,生活的范围比实践大,“实践的意思是实行一个理论上的条文,其最初所指大部分亦不外直接的行动和制定工作,而生活的范围却固然包含有行动和工作,同时也还包含了不是行动的休息,不是工作的自自在在地与人往来、待人接物的生活,行动主义固然不能包含生活,工作主义同样不能包括生活”。<sup>[25]</sup> 在乔冠华看来,如果说革命的实践能够改造知识分子,那么对于无法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的大后方知识分子来说,革命的生活更能够改

造自己,反对进步知识分子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方法就是改造他们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通过对实践一词的重新解释,乔冠华认为,改变生活态度就是一种具体的革命实践方式。

## 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

胡绳在“生活态度论”中引起争议的文章是《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和《论艺术态度与生活态度》,他提出了“感性生活”这一概念,要求知识分子重视和理性生活相对的感性生活。由于受到批判,胡绳自己后来编的关于抗战时期的论文集,从1946年的《理性与自由》到1990年的《胡绳文集(1935—1948)》中都没有收这两篇署名为项黎的文章。<sup>[26]</sup>胡绳在回忆写于这一时期的论文时说,贯穿着的主题就是通过反对反理性主义思想和复古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和自由”。<sup>[27]</sup>和这些捍卫理性的文章写作于同一时期的提倡“感性生活”的两篇文章和前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呢?胡绳所谓的反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指当时的战国策派的学者们,复古倾向的代表主要是指贺麟和钱穆,虽然他对冯友兰的“贞元三册”也写了好几篇书评文章进行批评,但他认为冯友兰的思想存在的问题和前面两者是不同性质的,他认为反理性主义和复古倾向在事实上是相互关联的,“反理性主义在中国所找到的最好掩护就是复古,而向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倒退的倾向自然是和开明的理性对立的”。<sup>[28]</sup>

捍卫理性需要提倡感性生活吗?在我们的印象里,感性似乎是和理性相对的。正如胡绳在《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一文中所阐述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的理智高度发展的时代,“由于人类理智的发展,感性的生活在全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在某些方面已经渐渐地降低。在原始人和古代人的生活中的有些情感,到了今天,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非常可笑的,完全无益的了。像宗教的感



情,对神的敬仰,这是曾被认为最崇高的情感,而且是人生的中心的,但到了现在,对于这种感情,我们已经由理智的帮助而加以唾弃了”。<sup>[29]</sup>抗战时期胡绳写作了《反理性主义的逆流》、《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等文章,贯穿着这些文章的一根红线就是捍卫理性。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胡绳同一时期既捍卫理性又提倡感性生活呢?

我们最好从胡绳对冯友兰的“贞元三册”的评论开始。冯友兰提倡“新理学”,认为自己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而讲的,“尊理性”是他的一个主要主张。胡绳并没有把冯友兰简单地和当时其他的儒学复兴的学者归于一类,而是认为应该有所区别。胡绳在评论冯友兰的《新世训》一书时,对书中表现的“尊理性”的精神表示了赞同,认为“在《新世训》中所提出的生活方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尊理性’。这的确是一个庄严的发端,在我们今日所处的时代中,正是理性和反理性的斗争的时期。有人鼓励着反理性的热情,来造成迷信式的信仰,有人诱发着兽性的物欲,来造成盲目的追随。在这时候,我们更应该给予理性以高度的尊重。我们也以为,生活决不能受非理性主义的支配,在健全的生活中必须放逐反理性的成分”。<sup>[30]</sup>但是,在“情与理”的关系问题上,他反对冯友兰的“以理化情”,而是提倡情感、意志、信仰、道德等人的主体性因素。他认为尊理性与提倡感情、意志、信仰、道德观念等并不矛盾:“我们是主张在生活中重客观而尊理智的。但是重客观并不包含着绝灭主观的意思,尊理智也不包含着以理智来取消感情、意志、信仰与道德观念的意思。我们以为,在健全而完善的生活中,人是以重客观为前提的,而在理智的光下使感情、意志、信仰、道德观念这一切都互相和融而像春雨下的百草一样一致地欣欣向荣。”<sup>[31]</sup>

胡绳认为,冯友兰的“以理化情”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的延续。“中国宋明两代的道学家曾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正是说,用理性的生活来绝对排斥感性的生活。道学家从

道德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以为‘人欲’——感性的东西是不道德的,所以应该排斥。”<sup>[32]</sup>他认为,“新儒学”在科学和理智的外衣下复活了传统理性生活对感性生活的排斥。“(新儒家)他们也继承了‘灭人欲’的主张,但他们不说‘灭人欲’,而说‘消灭感情’,不说‘存天理’,而说‘了解事物’。这就是从道德的观点转移到理智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说法,一个人能够对于外界的人与事物都能有充分的了解,则就可以不起什么感情。他们认为这种无情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sup>[33]</sup>

新儒学的“以理化情”是说了解了事物的道理,就不会对事物产生感情,胡绳认为这种说法对于自然现象是用得通的,对于社会现象却行不通。“社会现象因为有自觉的人参加在其中,所以我们对于任何社会现象,都可以有是非的判断。”<sup>[34]</sup>是非的判断是和爱憎之情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既然可以有是非的判断,自然就会有爱憎的情感。对于社会现象,我们的理解越深,越是了解其真相、其来踪去迹之后,则我们的是非观念也越是分明,而爱憎也越是深刻了。”<sup>[35]</sup>在理智与情感的问题上,胡绳认为我们要除去的只是琐碎、狭隘、无意义和虚伪的感情,而发展博大、深厚、真实的感情,这种感情和理智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情不但不会妨碍理智,而且会使理智格外充实;不但不会妨碍做事,而且使做事格外有力;不但不是人生的累,而且使人生的内容丰富而光辉。”<sup>[36]</sup>

但是,和法西斯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和对情感、意志的盲目崇拜相比,胡绳认为“以理化情”说对于盲目的意志与信仰的鼓吹似乎仍然是一服清凉剂,有它的一定作用,但过分强调却走向了反面。从当时的世界局势来看,法西斯主义是诉诸人的情感的,它动员和利用了民众的非理智的情绪,为自己的目标服务。“法西斯主义者是强调感性生活的,他们把感性生活看作生活的全部。法西斯主义者是反理性主义者,他之所以能鼓励本国的青年和人民来从事侵略战争,不是因为他使人民懂得了他的主张是对的,而是因为他

从人的精神上复活了那种原始的单纯的感性的直觉与激动。他提倡力的哲学,超人的哲学,使人对于有力量的超人发生神秘的感情,而无条件地崇拜,正如古代人之崇拜神一样。他努力使人把战争看作是感觉的享受,把弱小者在自己面前辗转而死亡看作最大的快感。他鼓动人们对胜利的喜悦,杀戮的愉快,鼓动人们对对自己的国家无条件地热爱,鼓动人们对侵略与征服的最狂热的冲动。”<sup>[37]</sup>而进步阵营呢,由于法西斯主义高扬了野兽式的感性主义,宣传单纯感性的生活,于是更加有意识地反对感性生活,降低感性生活在全部生活中的作用。胡绳认为,我们因此而走入了另一个偏向:“把理性生活看作生活的全部,根本否定了感性生活在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sup>[38]</sup>

胡绳对冯友兰的“以理化情”说的批评还在于,冯友兰把自己这种尊理性、否定感性生活的理论立足于唯物史观之上。他认为,照“真正了解物质史观或经济史观的人”的看法,“人的行为,是为他的经济的环境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人的行为好坏不必有爱憎的感情,因为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甚至对于敌人我们也应该“虽抵抗之而不恨之”,“如修路工人之对付大石,虽必打碎之,但不必恨之”。胡绳认为,这是从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推导出来的结论,而不是历史的唯物论的观念。因为经济环境的影响表现到人的行为上,其间仍是通过了人的主观意识的。“我们深刻地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侵略中国,那正帮助我们判断这种侵略行为是错误的,是非正义的,于是我们就更憎恶它。”<sup>[39]</sup>

在1942年的《评冯友兰〈新世训〉》一文中,胡绳似乎还不能够从理论上来说明唯物史观在人的主体性方面的具体主张,经济环境的决定性影响是必须通过人的主观作用的,但主观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什么还是很模糊的。在写于一年之后的《这就算是批评么?》一文中,由于很多人批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本否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的精神力量——人的主观力量,胡绳从马克思的《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即他所谓的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出发，对唯物史观在人的主体性方面的主张作出了详细的说明。

胡绳认为，固然唯物论也有低级的，完全忽视人对客观的作用，但这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胡绳引用了马克思对这种唯物论的批评：“以前的一切的唯物论——包括费尔巴赫（哈）的唯物论在内——之重大缺点，就在这种唯物论只在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之下，去把握对象，却不是看作人的感觉行为，不看作实践，不是主观地去把握。”并且，这种唯物论“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此人的改变是环境和教育的改变之结果，却忘记了正是人来改变环境，而教育者自己也要受教育”。<sup>[40]</sup>胡绳认为，马克思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正是要克服这种旧的唯物论的倾向，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给人的精神生活作出恰当的说明。“史的唯物论不是取消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给人的精神活动作了恰当的说明，并且因为史的唯物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露出来了，便更加强了人对社会的主观作用和控制能力，正如同自然科学把自然现象的发展法则揭露出来，便更加强了人对自然的主观作用与控制能力一样。”<sup>[41]</sup>

胡绳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区别并不是在于一个承认主观作用，一个不承认主观作用，唯物论也离不开主观作用。他引用了恩格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一观点。“人的行为，必须经过人的头脑——这是事实上所必然的。外界对于人的作用先及于头脑中，在其中反映成感情、思想、行动、意志，总而言之即‘心潮’，在这个形式之下便成为‘心力’。如果一个人追随‘心潮’的发展并承认‘心力’的影响，就算是一个唯心论者，那么无论哪一个人，都算生下来就是唯心论者，如此何以世界上又有唯物论者呢？”<sup>[42]</sup>唯物与唯心的区别在于对精神与物质的先后和依存关系的看法的根本

不同。因此,胡绳认为:“一个唯物论者承认了物质是先于精神而存在,并且精神是物质的反映,而人的主观行为只有在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发展趋势时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那么他丝毫不必取消人对环境的能动力量。”<sup>[43]</sup>在胡绳看来,只有机械的唯物论才努力证明人只是整个物质世界中的一个从属分子,只能受客观现实的支配,不能有任何主动的作用;辩证唯物论丝毫不忽视人的主动作用,并且能够认真地指出这种主动作用如何发生,又怎样才能充分加以发挥。<sup>[44]</sup>

那么,辩证唯物论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呢?胡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生活态度论”所特有的,不是诉诸革命实践,而是诉诸人的主体性因素,诉诸感性生活和人的感情,“实际生活是什么呢?那总是感性的生活,越是日常平凡的生活就越是感性的生活”。<sup>[45]</sup>也就是说,在正确指出辩证唯物论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教条主义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胡绳又把主观作用的发扬诉诸知识分子的感觉和感性生活,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这当然跟大后方知识分子无法直接和群众结合的环境有关,因此,与其说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如说使那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显露了出来,感觉和感性生活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后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问题。胡绳认为,感性的要素对于人生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感觉到的道理比理解了的道理更为切近人生。“一个道理,假如能够和日常平凡的感性的生活打成一片,那么人们就自然彻底按照这个道理而生活,而工作。因这时,他们就不仅从思想上接受了这个道理,而且感觉到了这个道理;不仅承认了这个道理,而且对于这个道理发生了割不断的感情的系带。人们进攻一个敌人,不仅因为知道了自己的敌人,而且因为从心底里憎恨这敌人,每一次看到听到敌人暴行就更加深了这憎恨;人们服从一个真理,不仅因为明白了这个真理,而且因为从心底里爱这真理,这真理在实际生活中更多发出一度的光辉就更加深了

这种爱。强烈的爱与憎正是人生活动的最崇高的动力。”<sup>[46]</sup>

胡绳认为，他们所提倡的感性生活跟法西斯主义强调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法西斯主义利用的是人们身上的那种原始的情绪，是盲目的和具有侵略性的；而他们要提倡的感性生活是和是非善恶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说的爱憎之情，是和是非观念联结着的。人生的活动正是以是非观念为标准而以爱憎之情为动力的。没有爱憎之情，人们不可能鼓舞奋发地为辨别是非观念而斗争；而也只有那样能唤起人们的热烈的爱憎之情的，才能算是明确的是非观念。”<sup>[47]</sup>胡绳认为，用理性的生活来抹杀感性的生活，用思想来抹杀感觉，用理智来抹杀感情，这种理论是一种苍白的生活态度的反映，是某些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身上的缺陷，但他认为这也是那些具有“思想的武装”的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

胡绳认为，具有思想的武装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思想和生活的脱离，“一种思想，假如不是从自己的生活中发展出来，而纯粹是靠脑子的活动所获得，并且始终停留在脑子里，那么所谓思想的武装常常不过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思想成了围墙，把自己和其余的人隔绝了开来，因而也就把自己和真正的生活隔绝了开来”。<sup>[48]</sup>于是，他不是生活在生活中，而是生活在思想中间。胡绳这样来解释当时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他已经从理论上给一切不幸的人找到了圆满的出路了，他就可以不必理会任何个别的不幸的人了；他已经在理论上了解了苏联必胜的道理了，他对于斯大林格勒的解围也就无所用其兴奋了。因为他已经拿如此丰富的思想给了旁人，他还要给旁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有了这样伟大的思想，可以完备地解释一切已有和将有的问题，那么他何必再去关心任何问题。”<sup>[49]</sup>对于进步知识分子中由于教条主义而形成的思想的围墙，胡绳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来解释的：“难道理论也能成为这种精神的墙的建筑材料么？能的。当理论被僵化成为教条的时候，它就成为建筑这种封

闭自己的感觉与心灵的最坚固的墙了。很多人把一层又一层的教条堆积起来,上面一个空隙也没有,于是安心地躲在里面;满足于抽象的思想法则,却再也看不到丰富活泼的实际;满足于正确和错误的呆板标准,却再也感觉不到一点真诚的喜爱和憎恨;满足于空洞的理想和愿望,却再也不关心真实的人民的命运。”<sup>[50]</sup>

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中也指出了抗战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性,他称之为革命的宿命论,认为高尔基就指出过苏联革命中存在的这种问题。在冯雪峰看来,这种革命宿命论的态度认为社会的进步和革命的胜利都是必然的,我们只要相信这个必然,宣传这个必然就行了,却忘了社会的进步和革命的胜利的道路是曲折的,是需要人们去为之战斗的。“这态度所以有害,就在于忘记了革命的必然胜利是靠革命阶级的团结和用尽所有力量的至死不屈的斗争,忘记了这必然是系之于人的战斗。”“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如果是根据历史发展的科学的铁则,则它的实现就非人认识了这铁则而用力去争取来不可。”<sup>[51]</sup>

胡绳对感性生活和生活态度的强调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和反对复古主义的“以理化情”两个方面中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的阐发。他强调唯物主义在重视“物质”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因素,因此反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教条主义错误,但他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诉诸感觉与感性生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左翼阵营中的教条主义问题。

**唯“唯物的思想”论**

陈家康用唯“唯物的思想”论来解释当时进步知识分子阵营中存在的精神上的危机,认为“自从新哲学开始运动以来,的确有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抗战时期重庆“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

部分知识分子,走错了道路。他们口头上讲唯物论,实际上所讲的不是唯物论,而是唯‘唯物的思想’论”,它的实质仍然是“唯心论”或“唯思想论”,“不过他们所唯的不是叫做唯心的思想,而是叫做唯物的思想。花样虽然翻新,唯思想的本质,并无改变”。<sup>[52]</sup>这种唯思想论过度地强调思想,导致了思想与生活的脱离,是造成知识分子消沉与沮丧的主观方面的原因。陈家康把这种唯“唯物的思想”论看作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哲学上的根源。

唯“唯物的思想”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陈家康认为,唯“唯物的思想”论的基础是没有把思想看作是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作为一种物质的存在的人的一种运动。“近几年来,许多知识分子把思想强调得太厉害了,以致忘记了强调思想不过是物质的一种运动而已,思想不过是叫做人的这一类物质的一种运动而已。”<sup>[53]</sup>陈家康是从一种本体论的意义来谈人的存在问题的。他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物质的自在,这种自在既是一种自然的自在,也是一种社会的自在。“人类是一种物质的存在,人类是一种物质的自在。人类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人类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人类是一种自然的自在,人类也是一种社会的自在。”<sup>[54]</sup>作为一种自然的自在,就要涉及生命和生命力问题,“如果搁下社会的范畴不提,专就自然的范畴立论,那么,生命就是物质运动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命本来就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的形态。生命力就是以生命形态表现出来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我们对于生命和生命力的基本解释”。<sup>[55]</sup>

陈家康认为,唯“唯物的思想”论的问题在于强调人的社会存在的属性,却忽视了人的自然存在的属性,因此忽视了生命与生命力问题,这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最使我们感觉奇怪的是,就是有许多以辩证唯物论自居的人,对于生命和生命力问题的冷淡。有些人绝口不谈这个问题,有的人虽然谈谈,也认为是不足轻重。这许多人从来没有想到生命和生命力问题是辩证唯物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而且由于唯心论者时常谈到生命问题,谈到生命



力问题,于是我们更不敢谈。好像谈到生命与生命力问题,就怕犯了唯心论的嫌疑。这种不谈的动机,多少是由于自怯。我们认为,没有彻底地弄清楚生命力和生命问题,也是造成唯‘唯物的思想’论的原因之一。”<sup>[56]</sup>

陈家康从分析的角度出发,在自然范畴的领域,把人的物质运动分为两大部门,第一是生理部门,第二是心理部门。生理部门又分为两个小部门,第一是饮食,第二是男女。心理部门也分为两个小部门,第一是思想,第二是感情。陈家康认为,这四个小部门的物质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整体,任何单独地庸俗地强调某一小部门的作用,来解释人类的物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会产生错误的思想,唯“唯物的思想”论就是过分强调了思想部门的作用。因此,反对唯“唯物的思想”论,我们首先要“把人当物质,不要把人当思维”。<sup>[57]</sup>

在处理人作为自然的自在与作为社会的自在的关系时,唯“唯物的思想”论切断了人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之间的联系,把自然与社会对立了起来。陈家康认为,唯“唯物的思想”论者的最大的毛病,就是剑走偏锋,“偏到强调人类是社会的自在,而忘记了人类依然是自然的存在;偏到只强调人类是社会的自在,而忘记了人类依然是自然的自在。偏到只强调人类之社会的自在遭受到生产关系之矛盾的束缚,而想不到人类之自然的自在同样遭受到生产关系之矛盾的束缚”。<sup>[58]</sup>因为人的自然的自在同样遭受到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束缚,因此,需要发扬人的自然生命和自然生命力参加社会斗争。

人的自然生命和自然生命力与社会斗争的关系是什么呢?陈家康认为,社会并不要求取消人类的生命和生命力,自然的生命和自然的生命力在社会中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自然生命和自然生命力的发扬能促进社会斗争的发展。“假使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没有燃烧,假使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没有爆发,他所

作的社会斗争,也不会强烈。”<sup>[59]</sup> 陈家康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哲学上理解为什么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喜欢在伟大的社会斗争中歌颂伟大的生命力。那么,歌颂人类的生命和生命力,就是唯心论吗? 陈家康认为,唯心论者不能在社会中发展人类之自然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力,这是唯心论与唯物论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辩证唯物论强调自然生命和自然生命力,是要“提高主观的物质运动,把生命燃烧起来,把生命力昂扬起来,认识自然的自在,以便加强社会的自在的斗争,这决不是企图把自然因素强调到超过社会因素”,否定“社会发展形态之决定因素乃是生产工具与生产力”,而仅仅是为了纠正唯“唯物的思想”论者“不把人类当作生产的主人,而把人类当作生产工具的奴隶”这样的偏向。<sup>[60]</sup> 为了纠正唯“唯物的思想”论的错误,陈家康提出了一个口号:“自在的自觉”。他认为人的自然的自在和社会的自在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绝大多数的人民,由于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他们根据自身的自然需要,以及建筑在自然需要基础上的社会需要,产生了革命的需要和革命的思想,这就是自在的自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民以革命的需要为出发点而要求革命。由于有了革命的需要而生产革命思想。”<sup>[61]</sup> 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根据自在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以及人民的需要来形成革命的思想,“没有自在,便没有自觉。自觉再丰富,仍然不会比自在更丰富。思想再丰富,仍然不会比物质更丰富”。<sup>[62]</sup> 唯“唯物的思想”论的知识分子把问题颠倒了过来,他们以为有了革命的思想,然后才产生革命的需要。

陈家康指出,假使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之自在自觉这一内在的依据,谁也无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搬到中国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他认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根据中国无产阶级之自在的自觉。唯“唯物的思想”论者对人民的需要漠不关心,他们对于只有自在的需要,还没有高度的自觉的人民采取一种悲

天悯人的态度，他们从思想出发创造思想，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根据中国人民的自在的自觉探索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教条主义者的唯‘唯物思想’论者，口头上与我们一样，主张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骨子里却把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基础的阶级的自在与自觉，完全挖掉。”<sup>[63]</sup>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陈家康的观点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整风文件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上，他更多地强调了思想和物质（也就是他所说的人的自然的自在和社会的自在）之间的联系，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剖析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探索补救的方法。在他看来：“我们今天强调人是物质，并非轻视思想，强调自在并非轻视自觉，而是为了使我们有更活泼的思想，有更活泼的自觉。”<sup>[64]</sup>在这一问题上，胡绳走得更远。在《论中国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一文中，胡绳认为，建立新的文化、继承中外文化传统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并不是马列主义思想本身。“假如我们在评价中外文化遗产时，总是看它们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思想而决定取舍，那么我们就不过是最愚蠢的教条主义者。”<sup>[65]</sup>胡绳认为，既然当时所可能建立的文化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马列主义者只能以自己的思想武器来服务于现实所需要和可能的民族文化的建立（在这里就有马列主义中国化），却不能以自己的思想来做全部民族生活的根本”。<sup>[66]</sup>胡绳的这篇文章当时也受到了点名批评。<sup>[67]</sup>

陈家康认为，唯“唯物的思想”论在认识论上的失误是“看轻了感觉”，唯物论的认识论是以感觉为基础的，由于轻视了感觉，“结果就把思想的源泉堵塞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sup>[68]</sup>陈家康认为，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感觉，这与工作中强调调查研究是互相配合的。“如果你能够对于宇

宙和自然的实际,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实际,随时随地都使用切实周密的感觉(这是最敏锐的感觉),我们可以保证这种感觉,根据唯物论来加以思考和整理就会上升而成为唯物的思想。”<sup>[69]</sup>在感觉与生活的问题上,陈家康认为,人类的实际生活、一切具体生活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生活,因此他赞同胡绳的提法,认为完美的生活是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的结合,而且“真切而丰富的感情,只有在感性生活中,才能产生,只有在理性生活中,才能提高,离开了感觉与思想,离开了感性与理性,也决不会有感情”<sup>[70]</sup>。认识论上轻视感觉的错误,在陈家康看来,就转变成了生活态度上的错误,知识分子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却丝毫感觉不到生活和实际。唯“唯物的思想”论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对实际生活没有感觉。和乔冠华一样,在“到处都有生活”这一问题上,陈家康认为:“其实并非没有生活,没有实际,不过是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不正确,以致感觉不到生活,感觉不到实际罢了。”<sup>[71]</sup>但是,在解决错误的生活态度问题时,陈家康和乔冠华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陈家康认为,感觉的麻木跟思想的僵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和感觉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既不是思想决定感情,也不是感情决定思想”,思想与感情都是由人的存在决定的,因此生活态度的问题就要归结到人的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他所说的“自在的自觉”,而不是诉诸生活态度本身的改变。万同林认为,陈家康对教条主义批判所生发出来的“自在论”,和胡风对用“抽象的一般”代替“具体的个性”的批判一起,在当时汇聚成了一股独具魅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sup>[72]</sup>

## 批评与反思

“生活态度”论受到了来自党内的批评,很快就被制止了。在接到延安的中宣部的批评电文前,重庆党内就已经对乔冠华、胡

绳、陈家康发表在《新华日报》、《群众》、《中原》上的这些关于“感情”、“感性生活”的文章进行了批评,也就是董必武所说的“进行了理论斗争”,认为“三位同志之相同点是偏重感情,提倡感性生活,注重感觉,强调心的作用”。<sup>[73]</sup>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对于乔冠华、胡绳、陈家康等这些党内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后方思想斗争的任务是响应延安整风的号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造成的思想上的僵化。但是这种响应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展开的,它不能离开特定的现实,不能完全被放进延安整风的框架内进行分析。1943年,由于中国与英美新约的签订以及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些国际国内的形势的变化,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正像冯雪峰在总结国统区文艺运动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中所说的:“关于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正有些新的问题在提出来。”<sup>[74]</sup>在国统区,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理论探讨虽然也受到来自延安的影响,但它本身也具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胡绳所说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sup>[75]</sup>

延安的中宣部在致董必武的电报中说:“在大后方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不是党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在思想上应当宣传唯物论、唯物史观(不是其名词,而是其精神)与为群众服务的人生观。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改造学习、整顿三风、文艺座谈会讲话等文件精神,联系世界、中国的现实与青年立身处世问题,写成有系统的亲切通俗通得过审查的文章和小册子,来战胜蒋介石、陈立夫、冯友兰、朱光潜、加内基、马尔腾辈的乌烟瘴气。”<sup>[76]</sup>一些学者由此出发,仅仅从重庆中共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误解了延安整风的意图而来谈“生活态度”论,或者从“才子集团”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的差别来谈“生活态度论”<sup>[77]</sup>,这就

简单化了“生活态度论”兴起的复杂的语境，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态度论”提出的时候，茅盾、邵荃麟这些后来反对“主观论”和“生活态度论”的人当时也是在热烈地探讨主观和生活态度的问题，并且是对之持比较肯定的态度的。<sup>[78]</sup>为什么进步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对主观、感性、生活态度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热烈的讨论呢？这一被忽视的问题其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董必武在《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函件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中认为，人与人性、生活态度及生命、生命力等问题，是“观念论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问题，乔冠华、胡绳、陈家康等人在这系列问题上，“观点都相同或相近，已成系统，很危险”。<sup>[79]</sup>如果除掉“观念论”、“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这些结论，从他们的具体的理论分析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国统区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三人实际上提出的是知识分子中的无力状态问题，针对的是国统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危机，也就是热情消退之后的麻痹和疲倦。正像乔冠华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喉舌，中国人民的灾难深重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的血和泪快要流成江河了；然而，遍地是无声的死亡，听不到一点声响。”<sup>[80]</sup>他们认为，这种精神危机主要是由进步知识分子中的教条主义造成的。他们的解决方法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探索人的主体能动性，但是这种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并没有脱离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正像陈家康所说的：“今天我们知识分子的衰颓，当然不仅仅由于自然的生命之不能燃烧，自然的生命力之不能昂扬，毫无疑问的还有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sup>[81]</sup>这个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客观方面的条件，但是他们是要在客观方面的条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强调发扬主观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乔冠华诉诸“生活态度”，胡绳诉诸“感性生活”，陈家康诉诸“主观的物质性”。

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认为，感性生活如果当作实践生活来解释的话，那么在反对教条主义时，特别地提倡感性

生活自然是对的,但不能把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对立起来。同时,认为教条主义者或机械唯物论者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缺少感性生活,只在理性中思考,这种观点也过于简单化,不能揭示教条主义的社会的、阶级的、思想的根源。“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我们的历史事实所昭示,就正在实践中产生而有着深刻的社会和阶级的根源,以及思想上的来源;倘若将这种错误单看作了太着重书本子的结果,那就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将教条主义的错误之社会的、阶级的、思想的严重性放过了。”<sup>[82]</sup>

把感性生活理解为生活实践,从这种实践的观点出发,冯雪峰把感性生活看成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看成是思想产生的根源。“这样,理性生活就不能脱离感性生活,它被统一(对立地统一)于感性生活中,即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理性生活时也主要地被感性生活所决定,于是思想的错误不错误也主要地由感性生活所决定。”<sup>[83]</sup>因此,存在决定意识,感性生活决定人的意识和思想。“如果感性生活(当作实践生活解释)是人的意识的主要决定者,那么错误与否也主要地由人的感性生活所决定,就是说,感性生活才是人具体地体验着社会矛盾斗争的生活,而且主要地决定他如何感受和认识那矛盾。”<sup>[84]</sup>不健康的理性生活总是与不健康的感性生活联系在一起,教条主义者以教条和机械论的思想方法为依靠,但更以不健康的感性生活为基础。同时,冯雪峰认为,思想和思想方法跟感性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健康的感性生活能纠正错误的思想和思想方法,而正确的思想和思想方法也能纠正感性生活中的不健康的部分,领导正确的革命行动。

冯雪峰把感性生活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生活实践,从而部分地肯定了“生活态度论”的观点。通过强调感性生活中的矛盾,冯雪峰强调了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说的,这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得出的中国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重视感性生活,扩大生活范围是正确的,但不可忘记感性生活

中的矛盾,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是实践斗争中不可缺少的斗争形式。冯雪峰认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的实际上的收效在于“在展开思想方法上的斗争的同时,更着重于研究社会的、阶级的、历史的根源,尤其在工作方式、领导制度及实际生活态度上展开彻底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sup>[85]</sup>革命思想运动总是和政治斗争相关联,因此政治方面的反教条主义等的斗争,有着高度的思想斗争和思想提高上的历史意义,直接影响着广泛的思想运动。冯雪峰最后指出,“生活态度论”的错误在于对感性生活的解释过多地掺杂着旧哲学的感觉论的观点,把教条主义的错误更多地归结于生物学的理解,甚至还滑到了自然生命和自然人的观点上去。“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他们简直将教条主义者犯错误的原因归结到生理学上的感觉的麻木上去了。这不仅不能驳倒教条主义,并且自己就的确脱离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观点太远了,也就是离开问题的实际太远了。”<sup>[86]</sup>

感性世界、人的感性存在、感性活动、文艺的感性作用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中从区别于唯心主义和旧的唯物论的立场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阐述,而他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也成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各家征引和发挥的基础。胡绳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出发,在“感性生活”这一问题上更多地强调的是环境的决定性影响是必须通过人的主观作用的,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胡绳强调的是“史的唯物论要给人的精神活动作恰当的说明”,他的“感性生活”这一概念貌似取自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他也用取自这篇文章的引文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支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感性生活”和马克思“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sup>[87]</sup>——《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人的感性存在”的提法其实是不一样



的,胡绳最终诉诸的是“强烈的爱与憎”,这其实跟费尔巴哈诉诸人与人之间的抽象的“爱”有些相似,还处于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感性存在时,是反对这种抽象的提法的,马克思总是把感性世界和人的感性存在理解为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形式比较简略,对很多问题的阐述都是只言片语,在写作于同一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可以找到更详细的论述。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时说:“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sup>[88]</sup>这一批评似乎也同样适合于“感性生活”论。

那么“生活态度论”中这种“强烈的爱与憎”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显然不是来源于费尔巴哈的传统,而是来自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传统,尤其是鲁迅所代表的那个左翼文艺传统。胡绳在《爱与憎》一文中,讲到“没有对于吃血者的憎,哪里会有对于被吃血者的爱”时<sup>[89]</sup>,引用鲁迅的话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sup>[90]</sup>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的文章《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一文中,胡绳认为,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突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生活态度,突破了对生活的麻木和消极躲避的态度,“鲁迅永不放弃对现实的认真探索,永远不停止从现实中辨明是非,从现实中燃烧爱憎。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sup>[91]</sup>这些文章都是在提倡“感性生活”论的同一时期写作的。胡绳的“感性生活”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提倡感性,提倡感性生活和人的主体能动性,但在这些概念之下包裹的却是中国左翼运动特有的内涵,主要依托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的传统。

鲁迅在谈论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文人相轻”时,认为:“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佬。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sup>[92]</sup>他的这段话是提倡“热烈的爱与憎”的“生活态度论”者的理论资源,也是胡风等“主观论”者的理论资源。这些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框架内提出自己的主张的,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被赋予了特定的内容,这特定的内容是与中国左翼文艺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在新的问题和形势下不断地修正和重新作出阐释。

1948年,在“香港批判”中,乔冠华对“生活态度论”中的部分观点进行了检讨,在讲到作家的“爱与憎”的能力时,他开始诉诸“长期的无条件的全身心地和人民结合的实际生活”,认为这才是作家的“爱与憎”的能力的源泉。“作家同时要有正确地而又是由衷地爱或者恨他所企图表现地各式各样具体对象的能力。这种主观能力从哪里来的?主要的是从作家长期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得来的。在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只能一般地教育我们爱和恨的主要方向,但它却不能代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爱这个应该爱的具体人物,或者恨那个应该恨的具体人物的真爱和真恨的实际生活。而这种正确的爱和恨的能力,却是从那‘长期的无条件的全身心地’和人民结合的实际生活中教育(感情也是要受教育的)和锻炼出来的。”<sup>[93]</sup>

1943年“生活态度论”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毛泽东1938年以来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不完全一致,这也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走向“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是有很多的支流的。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探索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如果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走向毛泽东思想,没有看到这一发展过程本身的复杂性,这种简单化的思路

就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贬低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 注 释

[1] 参见《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37—140页。

[2] 茅盾、于潮等著:《方生未死之间》,东南出版社,1944版。嘉梨:《生活的三度》,文章原名为《人民不是一本书》,发表于《新华日报》副刊1943年3月17日。其他文章都发表于《中原》杂志,依次为创刊号:《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第1卷第2期:《论所谓“生活的三度”》;第1卷第3期:《方生未死之间》、《论艺术态度与生活态度》。

[3] 史任远:《方生未死之间·序》,《方生未死之间》,小雅出版社,1947年,第3页。

[4] 嘉梨:《人民不是一本书》,《新华日报》副刊,1943年3月17日。

[5] 嘉梨:《人民不是一本书》。

[6] 于潮:《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中原》,1943年创刊号,原文注明写作时间为1943年3月4日。

[7] 于潮:《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中原》,1943年创刊号。

[8] 茅盾:《论所谓生活的三度》,《中原》,1943年第1卷第2期。

[9] 茅盾:《论所谓生活的三度》。

[10] 茅盾:《论所谓生活的三度》。

[11] 茅盾:《论所谓生活的三度》。

[12] 于潮:《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中原》,1943年创刊号。

[13]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中原》,1944年第1卷第3期。

[14]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15]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16]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17]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18]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19]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 [20]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55页。
- [21]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 [22] 乔冠华:《口述自传》,《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乔冠华、张含之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 [23]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 [24]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 [25]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 [26] 不过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给年轻人讲过关于1943年他写这两篇文章和受到内部批判的事,见《程门立雪忆胡绳》,郑惠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也参见龚育之:《送别归来琐忆》,《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郑惠、姚鸿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2—274页;也参见舒芜的回忆《舒芜口述自传》,许福芦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27] 胡绳:《自序》,《胡绳文集(1935—1948)》,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页。
- [28] 胡绳:《序言》,《理性与自由:文化思想批评论文集》,华夏书店,1946年,第1页。
- [29]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中原》,1943年创刊号。
- [30] 胡绳:《评冯友兰〈新世训〉》,《文化杂志》,1942年第2卷第6号。
- [31] 胡绳:《评冯友兰〈新世训〉》。
- [32]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
- [33]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
- [34] 胡绳:《评冯友兰〈新世训〉》。
- [35] 胡绳:《评冯友兰〈新世训〉》。
- [36] 胡绳:《评冯友兰〈新世训〉》。
- [37]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
- [38]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
- [39] 胡绳:《评冯友兰〈新世训〉》。
- [40] 沈友谷(胡绳):《这就算是批评么?》,《群众》,1943年第8卷第17期。
- [41] 沈友谷(胡绳):《这就算是批评么?》。
- [42] 沈友谷(胡绳):《这就算是批评么?》。
- [43] 沈友谷(胡绳):《这就算是批评么?》。
- [44] 参见沈友谷(胡绳):《是圣人还是骗子》,《群众》,1944年第9卷第12期。

- [45]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新中华》,1943年4月10日。
- [46]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新中华》,1943年4月10日。
- [47]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新中华》,1943年4月10日。
- [48]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
- [49] 项黎(胡绳):《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新中华》,1943年4月10日。
- [50] 李勃(胡绳):《墙》,《新华日报》,1943年4月10日。
- [51]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第1卷第2期。
- [52]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群众》,1943年第8卷第16期。
- [53]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54]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55]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56]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57]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58]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59]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60]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61]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62]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63]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64]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65] 沈友谷(胡绳):《论中国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群众》,1943年第8卷第12期。
- [66] 沈友谷(胡绳):《论中国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
- [67] 见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40页。
- [68]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
- [69]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70]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抗战时期重庆“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

- [71]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72] 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 [73] 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第139页。
- [74]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第1卷第2期。
- [75] 胡绳:《胡绳全书·第一卷引言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 [76]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37—138页。
- [77] 舒芜:《回归五四·后序》,《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2—603页;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139页。
- [78] 见茅盾:《论所谓生活的三度》,《中原》,1943年第1卷第2期;邵荃麟:《伸向黑土深处》,《文艺杂志》,1945年新1卷第1期;邵荃麟:《我们需要“深”与“广”》,《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8页。
- [79] 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第139页。
- [80] 于潮:《方生未死之间》。
- [81]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 [82]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第1卷第2期。
- [83]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
- [84]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
- [85]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
- [86]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
- [87] 恩格斯语,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 [8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8页。
- [89] 洪索:《爱与憎》,《新华日报》,1943年3月3日。
- [90]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

[91] 洪索:《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新华日报》,1943年10月19日。

[92]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第348页。

[93] 乔木:《文艺创作与主观》,《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2辑。

对作家小谈:人育量猪里突既芬册楚

曹湜 王凡译

艺术

## 我们在现实里都是盲人：刘小东访谈

刘小东 孙善春

孙善春(以下简称孙):像你刚开始考美院的那个时候是非常难考的,我们都知道。

刘小东(以下简称刘):嗯,对。

孙:全国只招20个人左右吧那个时候,油画专业的。

刘:不是,我考附中的时候,1980年,收23个,到大学的时候,一个工作室我们是5个。

孙:对。

刘:另一个工作室是7个。

孙:用现在的话来讲,那个时候是非常精英的教育。你认为当时的制度是精英的教育制度吗,从美术教育来讲?

刘:当时我没感觉。

孙:从现在来看呢?

刘:从现在的国家制度来看当时是非常奢侈的设施。非常奢侈,那个时候老师比学生还多。

孙:对。现在你在母校任教授?

刘:对。

孙:现在也作为一个教育者。

刘:对。

孙:现在回头来看,你现在当老师比当初做学生时这个教育制



度真的有很大变化吗？在教学中间，或者这个过程中间？

刘：有很大变化。

孙：主要是哪几个方面的变化？

刘：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有好有坏。那个时候好就是老师多学生少，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每个学生的心情可以说是很骄傲的。就从事艺术的角度来讲，心情骄傲是非常重要的。

孙：这话说得是。

刘：另外一个方面，由于老师多，教学认真，可能会束缚你个人的自由的发展，这都是辩证的。那么今天来讲，学生多老师管不过来，也许促成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大了些。

孙：对。

刘：我也不知道哪一个会更好。

孙：你也不会像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思想家那样，追究现在的教育是不是倒退了堕落了；因为艺术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精英的，是非常高端的，在教育方面是高端产品。是不是这样？

刘：因为我遇到问题永远是两方面看。

孙：因为你作为艺术家可能不会去追究堕落了多少。

刘：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说现在学生的质量不如以前。

孙：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刘：经常会这么说，我老不这么看。我觉得从画画本身来看没差多少，还是有个别画得好的。

孙：对，我明白。其实我主要还是想请你谈谈对艺术和你自己的艺术的看法。比如说，一个艺术家在选择创作的时候，他面对那么复杂的现实世界，他肯定是要有所选择的。同样，不同的画家处理同样的一个题材，他的态度，他的立场、出发点可能会决定他的创作的某些方面或者某些走向。如果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有一个非常精英的作派，一个立场，我是一个非常精英的艺术

家,我接受过中国非常奢侈的艺术教育,在老先生的呵护之下成长,在那个时代。现在没有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今不如昔。如果用这种态度来俯视日常生活的话,俯视现实的话,可能现实世界的面貌就和另外一种观点的人所看到的就不一样。我不知道,你是否觉精英态度会影响一个艺术家对题材的选择以及处理的方向?

刘:应该会影响,我觉得会影响。其实精英不精英是别人看,自己可千万别把自己当精英,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当精英你可能就离很多生活远了。

孙:那对艺术呢?

刘:对艺术也一样,包括做人。你如果觉得自己是精英了,其实你就会隔绝很多的友谊,你也隔绝了很多生活的源泉。深入日常生活啊,别的普通的兄弟姐妹的灵感和情谊,都会减少很多。

孙: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在生活中是韬光养晦的,是很懂中国文化和做人之道的,那我在艺术中间非常高档,非常像奥林匹亚众神一样俯视众生,我的艺术中间就蕴藏着世界和真理,等等。也就是说,我是两方面的。我在生活中是很随和的,非常的平易近人;但是我在我的艺术上面,我个人认为我的艺术蕴藏着极大的真理,甚至说是唯一的真理,这个东西的价值呈现出来被人认可的时候,它会光芒万丈,气壮山河,会不会呢?

刘:会有这种欲望。而且这是你的支撑点吧。

孙: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时候,支持他走下去严肃创作的有一个支撑点,你是这样吗,可以这么说吗?

刘:可以这么说。因为一个艺术家从事的劳动是非常无现实意义,或者是无实用意义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在支撑你,也许就是你的欲望,或者就是某种荣誉在支撑着你。这种荣誉可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自己加上去的,也许有时候不喜

欢自己这种日常生活，你的日常生活跟你所传达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你作品里还是很喜欢传达很多日常琐碎的细节。这种东西确实是能够让很多人引起共鸣，这个使你绘画的时候感受到一种冲突性。

孙：我明白了。我听你讲过，一年多以来媒体对你轮番轰炸，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在上海待过，我有很多朋友是做媒体的，记得高端媒体比如《外滩画报》也采访过你，你是成功人士嘛。我看过很多你的采访，但说实话，我非常不满意。我总觉得以后跟艺术家谈话要谈出一些有用的东西，而很多采访不好玩，也没什么好看。更别说好想了。你的作品和你的资料显示，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你反复讲日常的生活，一种细节，所以我从你的教育开始谈，再谈一下所谓日常生活中间的庸俗。我想知道你更细一点的看法，对庸俗生活的关注，我们和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到底艺术家的生活距离它有多远，我们的艺术到底距离它有多远。我很喜欢一个作家，是捷克的一个作家，博胡米·赫拉巴尔，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作家，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很委屈的人，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的昆德拉，这个人很有意思，赫拉巴尔在得了法学博士之后就在城市里面过最普通的生活，比如说他做钢铁工人，做垃圾站的工人，等等。他过了很多年这种生活。他认为他的文学创作就是要过最庸常的生活，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间，他才能够进行他所谓的创作，才能够把握住他所要写的东西。当然我说这个不是想用你跟赫拉巴尔对比，你是画家，他是文学家，或者说是小说家。我想知道作为一个画家，一个比较传统的艺术家，因为画家嘛，还是相对比较传统的，你是怎么看待普通的生活？因为我们不能说你过的是普通的生活，不过你怎么想？你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被庸俗和细节包围的人，因为你要跳出来创作，我想知道你对这种日常生活的，小的，细节的庸俗的看法。或者说你有没有真正想过这个东西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

关系吗？

刘：想过。一个人的创作离不开他童年、少年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咱们成长的年代都是日常生活非常混乱的，现在讲来都是很单纯的，因为人想过去就只能想起纯洁的一面。

孙：对，美好的旧时光。

刘：当你长大以后很多麻烦就来了，我不喜欢日常生活的具体的麻烦，比如我个人生活，我特别讨厌跟人打交道，比如说你在哪租一个房子，盖一个房子，买一个房子，起码的吃住行要跟很多人很多人打交道。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头疼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又特别喜欢和这些人住在一起。现在还好一点，前几年我非常恐怖，住在——

孙：非常好的高档住宅区。

刘：对。我喜欢住在破楼房里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离开他们我就好像没有了灵感。这种临时的东西，就像他们买菜呀，打架呀，挤电梯呀，踹墙啊，破坏公物啊，这些令人非常讨厌的每日的行为，非常非常丰富。我不参与其中，我就像个游客，我住在这里，但是我要和他们有一些距离。我真的掺杂进去以后这些事情我处理不了，我非常非常怕和京郊的农民打交道。那都是非常利益的关系，很多事情把你拴上套以后他就在那不停地、不停地在盘剥你。他总觉得阶级之间是一种仇恨，人和人之间总是很难达到一种默契的友爱，因为你明知这是不同阶层的人的活法。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又离不开他们，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过年过节，热热闹闹，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父母，爷爷姥爷在一家里头，看上去非常美。

孙：你是不是说你看到他就非常纳闷儿，噢！他们这些人哪来的这么一股劲儿，活得非常带劲儿。

刘：因为我是搞形象的一个艺术家，我只是从视觉上和心理上感觉非常非常动人。可是你要真是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之

间是非常钩心斗角的。即使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难办的，日常生活是非常难处理的。就像出家一样。有的人出家是为了修神仙，再有的人出家是为了修世俗。

孙：对对。

刘：修世俗是最难的。我也是两方面比较犹豫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是不是出家？我老念叨他妈出家得了。真出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舍不得这些世俗的一种乐趣，那么你就索性修世俗吧。你修世俗你又参与太深了，你又应付不了这里的麻烦。所以我从生活上来讲，我不喜欢这种日常庸庸碌碌的这种钩心斗角的生活，我希望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只跟几个人打交道，生活变得非常平坦，然后一生当中都可以绞尽脑汁地去想各种问题。有很多很多这种矛盾的人。

孙：你刚才讨论一个乐趣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在回答那个外国人提的问题的时候谈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情趣，我觉得用词都很好，你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刚才的话就非常精彩。另外我现在有个问题，我不大懂佛学，但我刚才听你讲这个出家，我也想讲两句肤浅的看法。就是佛经里面有一段，它是最简单的一段佛经，我看过一点，就是《百喻经》。你可能看过。

刘：不不不，我没看过这个佛经。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全是感性的。

孙：这个佛经简直不是佛经，就是都是故事，最简单的。但是也成了经。它特别好玩的就是它的第一段，困扰了我很多年。就是说佛带领很多的弟子讲法，来很多人听，除了他的忠诚的弟子之外，还有很多的异教。他们就有人站起来问佛祖：天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等等，无穷追问。他们问佛祖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佛祖给他们的答案他们都会来辩驳，认为你给我的答案是不完备的，不能够解答我心中的疑问。到后来释迦突然一转，他开始反问说，你觉得你人生在世，你是苦还是不苦。他就用这一句话

一下把他打回来了。他们这些心里怀着怀疑而来，他们心里都不能否认人生之苦。然后佛祖就说你觉得人生是苦的，你就要想怎么样来解决它。因为你要是这样活下去你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永远追问是不可能有的答案的。这段话对我震动非常之大。我刚才听你讲后，可不可以这样作一个总结，刘先生，成功的艺术家，是不是可以说他是一个信仰日常生活的艺术家呢？如果说我们一般中国人都没有信仰，没有宗教，那是不是艺术家可以说他除了他的创作之外，他可以在日常庸俗的生活环境中锤炼出来或者说萃取出来很多的意义呢？

刘：这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日常生活上你感到你对生命有直接的体验，这种直接体验能告诉你是真的活着。如果没有日常生活的话，比如说你把自己关到一个屋子里，你好长时间不跟这些日常生活打交道，你真不知道你是不是活着。而且别人也会觉得你活着和死了没什么区别。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几十年前见到一个朋友，突然见到他了，又见到他了，那么他还活着，但是你有你一辈子见不到的朋友，但是他可能在另一个轨迹里也一直活着，对你来讲其实已经没有了。而你对他也不存在了。所以日常生活证明人真的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有痛有乐，真的是这样的。到这里也能够升华出你艺术上想说的话，比如说其实从事艺术创作有一种想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的愿望。特想自己当自己的上帝的心情。他对一切制度都怀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不太信任这个现存的东西。任何制度，任何东西吧。

孙：是不是说像马克思的人生格言一样，怀疑一切？能不能这么说？你是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期的，可能会记着马克思这句话，怀疑一切。

刘：起码从我目前的四十多岁的体验来讲，我还没有体会到哪个社会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没有一种人生是一个完美的人生。

孙：迄今为止？

刘：嗯。

孙：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个艺术家的怀疑和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的怀疑有什么不一样吗？是不是你在这个怀疑之外，你创作的冲动更大更强，或者说做自己上帝的愿望更强烈？或者说你更善于处理，有更多的技巧来处理你的怀疑和你的生活？

刘：也许是。我觉得怀疑是一种力量，不满也是一种力量。艺术不仅仅是描绘你满意的一方面，有的时候它其实更深层的动力是你对它不满，你不喜欢这东西你才去描绘它，并不是你喜欢的景象你才去描绘它。我喜欢描绘非常矛盾的东西。比如说我正常的日常生活喜欢，我也喜欢大自然，空气清新，小河流水，漂亮。可是我从来不会画，因为它太寻常了，没有必要我再去画它。它已经非常完美了。我所关注的东西都是不完美的东西，都是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发展与被发展的矛盾。

孙：我想多问一句。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对进步过快发展过快的这种无意识的恐怖。艺术家是否没有必要了解？因为他也不知道人类要去往何方，这也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但是他可能会有一种本能的直觉，或者说感受到一种不满意、担心，或者像你所说的，一种恐惧。我知道像有的艺术家，比如陈丹青老师如今就经常谈退步问题。我想冒昧地问你，以一个艺术家的观点，不是说作为一个批判者，你认为我们人类有进步吗？我们在进步，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过快。是否它有可能会回复，有一天会逆过来。像水一样，它开始逆流，人类的欲望向前走回到当年，人和自然相对和谐的时代。像席勒说的一样，素朴的诗的时代，人类比较天真的那个时代，你觉得有可能吗？从信仰角度来讲，从直觉来讲，你觉得有可能吗？

刘：不可能。说实话，完全不可能。

孙：我觉得这一点在现代是可以说是不考虑吧，可以说是检测一个艺术家的历史感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尺。我也觉得从资本主义

兴盛以来，人类历史已经不可挽回了。

从我们刚开始讲的说。我们从这个进步开始讲。多少人谈艺术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崇敬，我到现在还是崇拜艺术。我问你一个比较极端的问题，你是画油画的，你对国画怎么看的呢？国画这个东西，在中国的这个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谢赫六法那个时代就相当成熟，一直这样发展下来，有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和画法传统。我觉得在国画这个形式上可能承载着更多的就是刚才我们谈论的那个问题，就是艺术家用传统，用这种感觉、感触、笔触、用光、构图、上色等等这些东西来进行创作，但是艺术家是处在一个巨变时代，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可能画家更能体现出一些问题。如果说有什么难题的话，他们可能经历得更多。你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你可以随便回答，可能我说得远了一点。

刘：我觉得国画不适合在今天这个社会生存。

孙：这是你的看法？

刘：它适合在，如果在中国来讲，我的判断来讲，它适合 50 年以后。就是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个人完全不顾左邻右舍或者社会舆论的干预，个人完善个人的欲望更强的时候。

孙：就是说它可以作为一个个人满足欲望的方式，一种排遣生命，或者在优越的社会里面作为自我消遣的一种方式存在，成为自我追求的一种方式。

刘：不是。我觉得那个时代会更宽容。真正到文明的社会的时候，社会可能会更宽容。

孙：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度过生命的方式。

刘：历史非常残忍。现在的中国社会我认为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时代。

孙：就是说在艺术中间还有一个相对霸权的東西来干涉它？

刘：非常的霸道，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这样。



孙：我觉得你说的很直白，也非常的精彩。我们再接着谈艺术的另一个问题。像法国一个哲学家瓦雷里，他在谈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时说，他在谈到区别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很好玩的一些话，他说，以前人做东西呢，他的时间感流逝是很慢的，他在做东西的时候，他是用时间慢慢的一点点堆积，一点点的积累，充满耐心，或者说等到最后，完成，等到一个奇迹的发生。他的手，他的全身和他的身心的灵魂都沉浸其中，都赋予这个东西，通过他的手担任他的身体的运作，让这个艺术作品呈现。艺术作品因为在时间中间的这个洗涤，慢慢地一点点地成熟，到最后变得充满魅力。你曾经说过，你在创作的时候是瞬间判断形象，然后再慢慢地选择形象，让形象跟着作品，慢才有意味。我想听你谈谈你怎么理解慢这个问题。因为你刚才讲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的洪流没人阻挡？

刘：怎么说呢，我觉得古代的艺术，全身心地付出传达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美。那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从事的本分的工作。那么发展到现在的当代艺术家，其实更像一个政治家。他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可以从事很多种艺术。他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发言权，他必须是一个政治家。他仅仅作为一个手工艺的艺术师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没有发言权你的人生就白活了。就这么简单。

孙：没有被别人感受到就等于没有存在过？

刘：等于没有存在过。非常残忍。我是一个很有古典情怀的人，如果我有钱收藏的话，我一定收藏古典艺术，不轻易收藏当代艺术。但是我要从事的话，我一定从事当代艺术，不从事古典艺术。因为我也是现实生活中活着的一个人，我希望这个历史有我的发言权。

孙：不被埋没，需要有声音。声音是只有发出来的声音才有意义。

刘：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无耻。所以呢，一旦你有很好的情怀，

如果有一些发言权的话也许就会变得好一点。也许你就是希望自我完善型的人。自我安慰的还是好一点的。

孙：我在这里觉得，画家的创作往往被人认为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里面。画家运筹帷幄，神态英发，然后豁然落笔，惊天动地。有人描述你画画非常有气度，这个气度和这个气魄记来会很有意思，有声音也有图像，呵呵。你有人跟着录像嘛。让我想起来当年非常著名的法国的大导演克鲁曹给毕加索拍的纪录片。你刚才讲到这个古典的情怀，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情怀的这个情和怀到底是什么？

刘：情怀对我来讲，就是能给别人营养的东西。能够滋养别人，而自己就退在后面。它像个谦逊的老者，它老是给别人营养。奉献自己，而不出现在镜头前边。

孙：奉献，不去伤害，给自己一个后退的空间。

刘：自己也不需要后退，它很从容的。

孙：从容周旋，皆合法度……

刘：反正它古典艺术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孙：哦，我明白了。

刘：你可以从古典艺术上吸收很多的营养。但是当代艺术里你就只能吸收一些点子。你的点子更坏一点，你的点子更绝一点，但是互相都是嫉妒和仇视的心理。当代艺术缺少古代艺术这种宽宏的情怀，因为它给社会所带来的个人自由的欲望，个人发展的欲望。古代艺术其实是为别人服务的。

孙：奉献，给出。

刘：对，给予。大概讲就是这样。

孙：比方说我看你画三峡这一组非常大的画，那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观众来看？我记得你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看艺术展览，比方说影像作品，你大概看几分钟就会走开，对这个话我觉得我很敏感。为什么呢，因为影像代表现代，相对于绘画比较现代的

一种艺术门类,那么你希望别人看你的作品的时候,不希望像他看待影像作品这样,比方说只给他一分钟的时间。那你觉得一个理想的现代观众,看你的这个三峡的时候,这样的一幅巨作,你希望他付出多少的时间?或者说需要怎么样一个慢,和你创作中的慢相比?

刘:因为我几乎不指望人在我作品里多待一分钟,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今天的人不可能在一个没有情节的事物面前多待一分钟。大家可以在一部电影,或者说一出电视剧里头待上两个小时,但是很少人会在一张照片,一幅绘画面前坐两个小时。非常少。

孙:是,非常少。

刘:那么在当代艺术展里的影像作品经常也是没有情节的,所以我还是普通观众,我也待不了那么长时间。我看一眼明白它大概意思,就走了。好,它会慢慢地影响我,我觉得这个慢不是说我在他面能待多长时间,而是说沉淀到他的心里,影响到他的价值观,一个艺术最根本的是价值观。就是这个人的道德,他的价值观,能不能影响另一个人。这是非常难的。

孙:影响一个人,包括对他价值观上的影响?

刘:对。所谓做人。其实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人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影响了我的做人,他并没有教导过我,只是他细微的生活的常态或者说他的点点滴滴影响了我。

孙:有没有艺术作品?

刘:有的人什么都没有。

孙:什么都没有?不言之教?他可以通过他生活的点滴,来不知不觉地影响你。

刘:对。

孙:让你知道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生活中有了这个人,生活会怎么不同。

刘:起码你应该知道一个生活的标准,不能太放低,就是说,有

很多东西你不能做，

孙：要有底线不能被突破。

刘：对。我觉得是这样，必须有一些东西。就像你一辈子会有很多的标杆，在大海里航行其实要靠很多的路标。

孙：如果我爬不上去，但是也不会往下走。

刘：有很多路标你不至于变得太坏。

孙：太坏，太猥琐，太下作。

刘：对。这些路标都是你生活中碰见的点点滴滴，有的是事儿，有的是人，有的是艺术品，有的是一部书，有的是这么几句。

孙：我也很想知道，在价值观的影响上面，艺术的作用，相对其他的東西来说，是相对重要呢还是相对不重要呢？还是一样重要呢？

刘：对于我来讲，艺术作品对于我的价值观的影响？

孙：对，我是说艺术作品。就是相对狭隘的艺术的意义。不是说人生的艺术，不是一种哲学的艺术，不是一种生命的艺术，而是比较狭隘上的一个作品，它是创作的一种具体的东西。

刘：艺术对我的影响在方法上。就是说，你用什么方式传达想说的话。如果没有一个艺术历史的话，没有一个艺术家会传达他想传达的东西。一个人都在一个历史的锁链里头有所发展，艺术历史那么长，它有多种方法、方式传达艺术家想说的话，那你不懂这个历史，或者对这个历史一点都不知道的话，你传达的东西几乎都在儿童状态。儿童的东西都非常好，像壁画，都非常好。但它再往深里，无路可走。如何再往深里走就是历史告诉你，我们在现实里都是盲人。

孙：这是历史的意义。

刘：对，我觉得是这样。

孙：在历史的大碾盘中间，一个艺术家只有明白有这样一个锁链的链条，一个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他的创作才有历

史的意义。

刘：是，我确实是这样。

孙：它的确是不能抛开的。说得好。我记得刚才你讲了一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影像作品，它没有情节，或者说一个作品这没有情节，所以大家很难坐在它面前，坐在一幅画前面看上两个小时，无论它多么伟大。那是不是说，莱奥纳多的《蒙娜丽莎》再怎么好，它也意义不大，是不是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有所关联呢？

刘：怎么说呢，刚才我讲的意思是，坐在你作品前，待两个小时的人，或者说一个莫名其妙的影像作品，他能待两个小时的人，在我印象中，大概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想学习一种方法。

孙：对，比方说学画油画的学生。

刘：对，另一种，就是几乎没事干的人。

孙：有闲。

刘：有闲。哎！我觉得有趣我就坐着待着，我想别的事儿去了。

孙：对。

刘：我在一个展览会上看一个高科技的影像或者电脑艺术，因为我不想从中学习方法，我不是搞这个的，我看一眼我想看的价值观，我想看他对这个社会对人生如何看的，其实看几秒我就知道了，知道了我就走开。我就看他的看法，可以一眼看穿，我根本不想看它的全部。那么同样，人家看我画儿也这样。他如果只想看一个价值观的话，几眼就看到了。人家可以走开了。

孙：那么可不可以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悲观的艺术家。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把他放在这个历史的链的意义上？

刘：要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就不会从事艺术。

孙：那你为什么认为从事艺术者都必须是悲观主义者呢？它也有很积极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悲观主义都肯定是喜欢思考的人。

刘：思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悲观主义者有一个最好的东西，他有悲悯之心，这个要传达。我不知道乐观主义者有什么更大的东西。

孙：悲观主义者不会退居到他个人的小社会中什么也不干吗？

刘：那是消极的悲观主义者，我希望做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我知道这个悲观，所以我就爱惜每一秒钟。我珍惜每一个人，我珍惜每一个场景，能不能传达出来。因为我悲观，所以我才这么爱惜它。

孙：恐怕这个悲观来之不易就消失掉了。

刘：怕它消失，其实我怕它消失。

孙：创作需要它，要留一点痕迹在里边。

刘：不然的话我就天天花天酒地，高兴，来，吃！喝！金钱美女！

孙：快活。

刘：快活不就完了！但是那样的生活我可以在完成一两件作品庆祝一下的时候偶尔为之。一般的时候我不会。

孙：快活这个词很有意思，快乐的时间过得快，叫快活，所以古典的时间过得慢叫慢活。时间过得非常慢，有日无聊。没有办法来消磨时日，找些朋友在一起，三两知己，在大树底下喝喝酒，说说闲话，这可能是现实社会中一个人对古典社会的假想吧。不过刚才讲的可能太多了。

刘：没什么，该说就说。

孙：我还是问你几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吧。你对摄影、电影还是感兴趣的，我看到过你的照片，拍得蛮古典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什么电影或导演？

刘：不知道。

孙：都没有详究过。

刘：没有详究过。

孙：只是喜欢看就看了。

刘：对。

孙：能不能告诉我们最喜欢的几个？

刘：电影？

孙：对。影响最大的。马上就能想起来的，经常愿意重看。

刘：喜欢的我也不会重看，很少重看一个电影。

孙：因为没有时间还是什么？

刘：重看的电影是儿童时代看过的电影。比如说样板戏、地道战，这跟你的童年有关，在看的时候你是在回想你的童年。一个真正的艺术品我不会看那么多遍。不会重看一个电影。我不是一个学者，我也不是个电影工作者。大概它对我的价值观会有影响，不过再拿出来的机会就几乎没有了。

孙：那我可不可以这样问你，你反复强调这个艺术的价值观的问题，那是不是因为太看重价值观了，而放弃了一些娱乐和美感呢？比如说我，班门弄斧啊，我非常喜欢看尼古拉斯·雷的一个电影，一个美国的老导演，他的一个老片叫做《孤独地方》，就是写一个坏脾气的作家的孤独。我特别喜欢看，经常半夜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把它拿来看。为什么喜欢这个电影，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怜，这个人是搞文字工作的；另外一个美感，电影拍得非常的美。

刘：可能你有你的心理。因为你是一个学者，你要研究。而且你从研究当中要体会美感。

孙：对。我知道这一点。

刘：我跟你不同，我应该把我更多的美感用在我的创作上，不是用在欣赏里头。几乎没有时间欣赏。

孙：没有这个欣赏，慢慢地欣赏，生活岂不是很痛苦？

刘：不会，创作比欣赏还要享受。

孙：这个我能理解。那么创作享受真的大到你可以不去欣赏？

刘：我可以用少量的时间去欣赏。

孙：但是这个娱乐相比你再看别的作品的时候，价值判断要多得多。是吧？

刘：经常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个电影，我脑子里总浮现那么一个电影，就是塔尔科夫斯基的那个讲圣像画家的，叫安德烈——

孙：就是安德烈·鲁伯格廖夫。

刘：这个电影我只看过一遍。

孙：是不是因为他是讲画家的？

刘：跟画家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有那个气势。开场特别漂亮，我都忘了，我就记得那个浓烟，一匹马，然后好多人在烧东西，炼钢似的。

孙：这个生活场面可以说是又辽阔又优美，可以这么说。我也很喜欢这个电影。

刘：它有一种非常壮观的东西。

孙：一种很魔幻的，都把生活打破了。

刘：我几乎记不住了。很多场景它所谓的价值观影响我了。我觉得无论这个世界多么低俗，或者多么什么什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爱说的词还是伟大、宏伟、悲壮、壮丽，现在一切我们都在抛弃的词，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孙：或者说只是我们不敢用了。

刘：对，我不敢用。但是那个电影还是传达了一些我们不敢用的词，它传达得好，而且可信。不是假大空，不是费了多大的阵势。我几乎忘了是说画家的，我老以为它是个战争电影。

孙：这个画家身处异族入侵时期，那些人要毁灭他们的文化。这个鲁伯格廖夫大受煎熬。他想得到自己能够维系生命和信仰的东西，所以他经过很多的艰难，最后终于成为一位伟大的圣像画家。它是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是不是你因为一个画家的直觉，一种本能，让你对这个有亲近感。



刘：一定是，我几乎是忘了。就是记得那个恢宏让我印象很深。

孙：很有意思。确实是这样，他把我们原来不大敢说的东西，觉得这个东西毕竟还存在过，你看这个例子，不就是吗？所以说，好的艺术作品，它可以不论历史怎么样波澜壮阔，或者说多么惨绝人寰的浩劫发生，艺术品终究可以凝聚一些信息，来记录一个历史时段，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刘：应该是这个。我不知道这样说话会不会被人家嘲笑啊，但是我觉得艺术是凝结一个时代的产品。别的东西都起不到这个作用。这个社会的能量全记录在一个简单的画面上。要过几百年以后，可能几百年以后的社会学家，各种学者都会从这些作品里头提炼出当时那个社会的可读信息。

孙：他们会通过各种方法来作各种破解，各种阐释。

刘：我觉得好艺术应该能达到这个效果。

孙：那你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名字叫做“消失的现场”，是不是和你的这个观点有关系呢？

刘：有关系，和整个的价值观有关系。

孙：要做见证现场毕竟是要消失的，它是注定要消失的，所以我现在要来拯救它？让人知道？

刘：要记录它。为什么我要费这么大劲儿去写生，起码让我自己相信或者是，怎么说呢，我付出了同样的汗水，写生的也是存在的。其实你也可以参阅很多照片啊，历史啊，你重新营造一个画面，但是我不愿意那样。那样是一个智力工作者的状态，我希望我回到一个体力工作者的状态。就是这么大大一个工程，人家有死亡，有汗水，我希望能作出一点点点点滴滴，这样跟他们共度一点点时间。

孙：共度一个历史时光？

刘：对。共度一点点，起码这个时候我在，而且不是说拍照，一

瞬间。因为我在，而且一个月都在，我全身整个人都是在的。烟云的变化，风景的变化，这一个月我能感受到，花草的凋零，通通可以体会到。而且你面对它画画的时候，你今天画这朵花，它是这样的，明天画的时候，它就已经不一样了，或是下一分钟就不一样了，每一分钟的变化都会体会到。那我起码能够安慰我自己，这个事我起码是做得实实在在的。

孙：实实在在的？

刘：实实在在的。

孙：你一开始就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体力活的艺术劳动者。

刘：艺术太虚了。他们甚至讨厌艺术，因为它发展到今天太过于智力劳动了。

孙：很多人特爱以艺术之名做一些非艺术的事。

刘：这不是艺术家的问题，这是整个艺术体制的问题。

孙：也就是这个艺术体制可以允许，可以纵容，它可以催生很多条件，让人可以以艺术之名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事情和我们所谓的艺术是不是有关系？

刘：总的来讲艺术体制是为媒体工作的。我觉得今天的艺术非常可怜，就可怜在它为媒体工作。

孙：我觉得你这话倒很尖锐。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听听你谈谈这个媒体问题。

刘：今天的人如果没有媒体就无法了解这个社会。

孙：那你觉得艺术家从社会角度来讲，是不是一个媒介呢？

刘：当然是了。

孙：那他是怎么一个媒介呢？

刘：一个艺术家的欲望太强，他想在社会得到发言权，他如何得到发言权？他必须通过媒体。

孙：他要和媒体合作，把自己推出去。

刘：不仅是一个艺术家，整个艺术体制都要这么做。一个美术

馆，国家的文化宣传都要通过媒体。

孙：从前期艺术的准备，生产，推广，接受全都要套着这个流程。

刘：没有办法。

孙：都要通过中国媒体这样的运作。

刘：你说运作有点小瞧人家了啊。事实确实是这样，媒体本身它是门艺术，它本身涵盖的面已经太广了。

孙：大媒体嘛。

刘：它本身已经太进步了。就是按古典情怀来讲，是瞧不上的东西，今天他已经把你陈列了。

孙：也就是说在大媒体中，古典情怀已经没有生存的地方了。

刘：我也不敢这么说。

孙：还是给个人留一点空间吧。

刘：对。个人，有非常伟大的个人。

孙：非常伟大的心怀，在自己的信念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长出一些果子？

刘：他的果子可能不需要你们看。

孙：他已经没有社会的意义。他个人还是可以成功成名。

刘：那就是个伟大的人了。

孙：你是否愿意做这样的人？

刘：我往这种人去努力努力。但是现实做不到。

孙：还没做到？

刘：我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一个隐士。做一个隐士就像做一个慈善家一样，要有巨大的实力才能够维持你这个生活。

孙：一个伟大的画家在陋室中间默默耕作，留下了很多看不见的珍藏，留待后人来发现，来阐释。

刘：但是有这种欲望本身就是无耻的，他做作品为什么非得留后世人去？

孙：我也是这样认为。

刘：所以说中国人就是很麻烦。

孙：对，就像中国人写一本很伟大的书一样，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一定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刘：我觉得这就非常无耻。这其实占有了我们非常有限的地球资源。

孙：耽误了我们的想象力和精神空间。

刘：对，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其实坦白来讲，无愧于这个时代吧，无愧于这点脑力体力，然后转弯了。

孙：在你看来这就是一个本分的艺术家的命运，是不是？

刘：如果未来的社会很矫情，它愿意保留这些东西，你感谢它，你可能会珍惜。没有保留，你完了，它完了，就完了。

孙：像尼采说的，不能有懊悔的心态。不能因为这个时代而后悔。就像波德莱尔诗所说的，我现在截断了我的手臂我很后悔，是因为当年我想拥抱白云。大致是这么说的。波德莱尔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家所处的处境他是逃不掉的，不自由，他的依附，他的妓女般的地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看透一切之后，他又拼命地创作。所以他隐含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画家的命运，可以说就是死在调色板前。我刚才听到你的话，你对自己的这个作为一个当代画家的定论，是不是在这一点精神之上和波德莱尔在19世纪的这种看法如出一辙？

刘：他的书我也没读过，但是我听你讲，我明白一点儿了。真的，我基本上属于读书读不懂的人。我都是通过读书的朋友转述，然后找一点精髓。我觉得这些思想家有的时候在安慰艺术家，他的理论有的时候在安慰艺术家，因为他知道艺术家本身是有伤害的。

孙：让他不孤独。

刘：你之前说的那句诗，那句诗能安慰多少人，是吧。一个艺术家要想获得成功，但是他没成功的时候，或者哪天他郁闷的时

候,他想起这句诗的时候,他可能感觉他与上帝同在,他就能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其实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创造了很多名句,其实安慰了很多受伤的心灵。什么人受伤?从事真正创作的人,非常受伤。

孙:一个艺术家容易受伤,当然可以这么说。

刘:当然。思想家本身也是受伤的人,因为他搞这个思想。

孙:我们接着这个往下说吧。有个人可以说是影响了人类。他是60年代出生的人。叫麦克卢汉,他是个艺术爱好者。他在这个技术时代,非常看重艺术家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艺术家是一个高敏感度的探测器,就是世界发生了什么,生活发生了什么,艺术家是最早感受到的,而且看得清楚。所以说我们要是生活的话,我们应该往艺术家那边去学习。不知道你听了我的转述,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刘:巨高明的看法(笑)。

孙:是不是真的是说,我艺术家真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探测器,走在前面呢?因为我可以教人们怎么生活。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很多的现实的层面,现实的岩石我们不能打碎。你觉得作为一个积极的艺术家,自己可不可以在这个时代承担起一个责任,不是说教导,而是引导别人,给别人一个触发,用你的作品,来引导他们怎么面对这一个混乱的、价值观失控的一个时代,多种多样的东西混杂生存在这个时代,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一个脚手架,或者一个标尺、一个路牌这些东西呢?

刘:我根本不敢这么奢望。

孙:不敢这么奢望?

刘:因为这些奢望有时真的太天真了。我知道人是利益的动物。那么在利益面前,人就不可能说没有任何妥协。你只能通过你的艺术,渗透一点点价值观,也就是说在他原有的基础上加一点点的善,积一点点的德,积一点点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那么在他

索取利益的时候,哪怕一闪念,有那么一点点,那么人就会好一点。但是这点奢望我都不敢有。

孙:不敢有大想法了?

刘:我只是说我的艺术希望达到这一点,达到让掌权者、利益最大化的受益者们能够思考一点。但这个非常难,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今天的生活快速发展的生活里,基本上就是螳臂挡车。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意思。

孙:也没有意义了?

刘:我觉得国外的社会,它结构咱也不了解啊,或者它也跟中国的一样,人类的都差不多吧。只是相对来讲,有些社会就目前来讲还算合理一点。也不能说理想。

孙:合理一点?

刘:嗯,稍稍地能照顾一些大众的声音,嗯,就是什么一些街道的管理,个人的安全呀,还能得到一点点的人性化的保证。仅此而已。

孙:艺术家是不是要比现在生活在你身边的普通人,可以有更多的力量,相信自己可以把这个社会变得好一点?

刘:我不敢这么说。

孙:也不敢这么说?

刘:艺术家的优势是只能和有钱人一起去吃饭。

孙:装模作样地吃吗?

刘:也不是说装模作样,这其实也需要艺术家做朋友吧。当然我希望在做朋友的过程中,能够和大家互利,嗯,就是大家都能够好一点,而不仅仅是利益的往来。

孙:好的。如果你不累的话,我想再问你一个小问题。

刘:没有没有。

孙:说这么多话啊。

刘:没事。理论问题都很棒。

孙：我是个艺术圈外的人，每次面对艺术家的时候，我都觉得每一个做不同行当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专业放在一边，大家都来谈一些共同的问题，会是件非常好玩的事情。虽然大家都做着不同的工作。

刘：对，是这样。

孙：大家在一起，都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共同体会。你刚才说过，有的作品，大家都能看很长时间，因为它很有情节，另外许多作品都不能看超过一分钟，因为没有情节。那么你是怎么处理这个情节呢？或者说它就是一个故事？

刘：情节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现实生活里就很缺少情节，缺少连贯的情节。

孙：是啊。

刘：我们渴望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把握住它吧。这就是给我们的梦想。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充满了情节，可是我们很难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情节，是吧？谁会一辈子去看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看到一个缩影，一个情节，这是欲望，是满足一种观赏的欲望。电影能达到这种欲望。

孙：对，像一个梦一样。

刘：电影就能很快地达到这种欲望，但是如果电影不给你这个欲望了，你就不爱看，很简单。但是，有许多的电影就不给你这欲望，因为他已经从事电影这个专业了。

孙：是啊。

刘：所以可怕就可怕在它这个专业。它一到这个专业的时候它有很多反动的声音，比如你们搞哲学的，谁一旦有名，你们就把他抛弃了。比如那个海德格尔是吧。这个思想家大众全接受了，你们可能要去找一个大众还不太知道的思想家，大众会觉得这个很牛。这是人很简单的心理，不然就觉得不牛，觉得很傻。在电影工作中也这样。

孙：这个也不一定。

刘：不一定吗？其实我就是一个人简单的人，不愿意做一个很多人都知道我的一个艺术家。少数人知道的话，就会很牛逼。我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孙：我觉得一个东西意义的产生，它的传达有很多东西。一个人意义上的传达，在五百年后发生作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他发生作用的时候就必须动用两个标准，那你不能动用他五百年后才发生作用的那个标准。如果我们动用他五百年后的作用来做标准，来检验五百年前，那我认为是一个偷懒，或者说是一个讨巧，艺术家是不能这样做的。作为一个好的思想家，他也不会希望他的读者这样做。我是这样看的。当然我为什么会另外谈这个情节呢？因为还有一个理论问题。比如说我们谈这个消失现场的时候，我们想通过实实在在的经验来经历一段时间，然后来记录一段历史，来拯救一段这种消逝的历史。但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像电影有不同的拍法一样，有的古典电影就是一个缩微的人生旅程，当然很多电影史家就认为电影就是做梦。如果我们建构一个历史，拯救一个历史的话，这段历史可能是有情节的，可能本来就没有情节的，或者说这个情节还没有出现过，情节还没有长出来就死掉了，我觉得生活中充满太多未曾发生进入阳光的故事。我想提问这个，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可能从来没想过这样似乎很哲学的话题；但是我觉得你会想，在处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你要把它搬出来放在画布上的时候，这个肯定是非常艰难的吧。

刘：反正我就是说，用我的方法解决的话，为了这个“消失的现场”我们来到青海、青藏高原。来之前我就知道了，我们的祖国在开发大西北，我们的开发方式一定是工业化的方式。需要投资，什么是投资呢？就是建大工厂，建所谓的科技园，或者是叫什么什么开发区。都是要圈地，然后把一个原始的、原生态的平衡打破了，叫大家过上富裕的生活，人人开小汽车。带着这个起码的一个概



念来,那你就为这个概念寻找很多场景,这个场景是自然形成的,不是我人为的。为什么我尊重写生,就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整个青海一下走了两个月,拍了好多照片,然后把它们重新组合成一个概念。而是在这一瞬间的场景里头,它已经存在了。有烟囱,有乌云,有铁路,有戈壁,有马,有人,有被汉化的人,有原住的人。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一个场景里头已经浓缩了你想说的话。那么我们尽量不要去编造,因为现实其实真的发生了。真的正在发生。而发生的结果,有些好有些坏。我们不管这些,但起码这个发生的过程我们要面对它,面对这种发生的现状,去指示它,去怀疑它,都可以。

孙:我明白了。我提的问题是一个做文字的人关心的问题,我觉得你的回答肯定也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非常真诚的自己的考虑。

刘:对,那个社会会更宽容。今天的社会太霸道,不允许这样的艺术方式生存。不是说谁发个行政命令。或者说,这个社会已经来不及顾这一块儿了。而这一块的人本身也太中国了。如果这群人别太把这当回事儿的话,也许会创造一个新的形式。但是大多数的国画家太看重国画本身,这就跟这个时代挺不合拍的。

孙:太看重国画本身,是不是说太看重国画之所以成为国画的那套东西?

刘:不,他老是希望历史能够退步。

孙:噢!

刘:历史不会退步。

孙:历史不要来把我湮没,时代不要湮没我。

文 献

## 书的缺席

莫里斯·布朗肖

胡继华 译

“书的缺席”——[这个特殊的词组]意味着，书面的东西作为书写的未来而又唤醒了一种绝对不会发生的未来。因此，这个词组本身并不比“外在”、“碎片”、“中性”这么一些词语更能成就一个概念，但是它却有助于将“书”这个词语概念化。不是当代解释者给予黑格尔哲学以系统性，并视其为一本书，从而又把这本书视为绝对知识的终极目标；相反，恰恰就是 19 世纪到末期，马拉美才真正开始了如此作为。然而，为了冒险地命名这部大作(Work)，马拉美以其独有的体验力量穿透了这本书，而这部大作的中心魅力可能就在于书写。但这一中心永远在中心之外。书写行为，疯狂游戏(Insane game)。但书写行为也同这部大作的缺席具有一种关系，一种他者性关系。恰恰是因为他感觉到了，随着大作的缺席，通过书写而发生在书写之上的巨大变化，使马拉美可能去命名这本大书，将这本大书命名为这么一样东西：通过给它指定一个场所和一个时间，从而给生成活动以意义。此乃第一个概念，也是最后一个概念。但是，马拉美尚未给书的缺席命名，而仅仅是认识到了书的缺席是借以思考大作的途径，而大作就是功败垂成，或者说，就是不可能性。

书的缺席不是书的涣散(coming apart)，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涣

散就在书的本源,构成书的对立原则。书乃永恒涣散(即自我迷乱,茫然失序),这个事实仍然只会导致另一本书,或者导致此书之外的一种可能性,而不会导致书的缺席。让我们承认,让书如灵魂附体(或如幽灵出没)的东西恰恰可能构成了它永远缺少和永不在场的书,而仅仅满足于无所包容(没有将它转化成内容)地包容(远距离地拥有)它。让我们同时也承认对立的情形,即这本书包装了这永不在场和被排斥在外的书,但书的缺席却不能仅仅以书为基础被视为对书的否定。让我们再承认,如果圣书(Book)负载了意义,那么缺席之书就如此外在于意义,以至于无意义也不再眷注于它。

令人惊讶的是,在书的某种传统之中(这一传统派生于卡巴拉主义的系统表达,尽管还存在着一个认可纯粹在场的神秘含义问题),所谓“书面的摩西律法”先于“口传的摩西律法”,而后者派生出了编辑而成的律法书,唯有它才构成了圣书。在这里思想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命题:书写之前别无他物。但是,第一块匾额上的文字,直到它们被打碎之后以及因为它们已经被打碎,这就是说,在口传决定被收回之后以及因为口传决定被收回,它才能够被辨认;而这就让我们获得了派生的文字,即我们所熟悉的文字,它具有丰富的意义,能够发号施令,并常常等于它所传达的律法。

让我们把这个令人惊讶的命题与书写实验的可能未来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有两种类型的书写,一种是白色书写,一种是黑色书写;一种书写使不可见的白色火焰变得可见,另一种书写则在黑色火焰力量的作用下以字母、文字和句子的形式得以接近。在这两种书写形式之间,有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独立而永远和第二种书写形式纠葛不清的口传性,因为恰恰就是黑色火焰本身,即这种整齐有韵的黑色性,限定或者说规定了全部光亮,使全部光亮获得了可见形式。因此,我们所谓的“口传”就不仅是一个临时现在和空间在场的名称,而且还是发展或者中介,由一种解释、容纳并且规

定了未区分的原始状态的话语所支撑。因此，“口传律法”也是书面律法，但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口传”，是因为它作为一种话语而单独得以交流，而没有被称为注疏，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既传教又宣誓、既给予权威又赋予正义的言语：为了让书写产生普遍可解性、也许同时创造被看作禁忌又被看作限制的神圣律法，语言（话语）好像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不可见的阴影线中，原始的书写，最初的文字好像必须在言语之外得以思考，并仅仅以这种外在性为指向，以缺席或者断裂为目标，而缺席与断裂是如此原始而又古远，以至于必须被化为碎片来逃避荷尔德林式狂热的野蛮。

书写在圣书之中缺席，作为不缺席的缺席之物而存在。以此为基础，自我缺席于缺席之物，圣书使它自身（在口传和书面、律法及其注疏，在禁忌之物以及对禁忌之物的思考两个层次上）得以解读，并通过封闭历史而自我注疏：书的封闭过程，文的断裂状态，知识的权威力量。我们关于这种书写的可能论说，即对于这种不存在于书籍而存在于他者性关系之中的东西的可能论说，就是它仍然处在可理解性之外。也就是说，要阅读就必须通过我们的注视而进入一种意义（或者无意义）与在场的关系之中。因此，可能存在着一种既外在于阅读所得的知识又外在于律法形式和要求的书写。书写，（纯粹）外在性，在一切在场关系之外，在一切合法性之外。

书写的外在性减弱，即它回应口语力量的呼唤，同意在一种以书即书面话语为归宿的语言之中得以随形赋彩——此时此刻，这种外在性就容易作为神圣律法的外在性出现在最高层次，而作为意义的外在性出现在最低层次。神圣律法就是书写本身，它放弃了对话的外在性而指明了被禁忌者的地位。书写的非法性，作为对神圣律法的永恒反叛，恰好掩盖了与书写相关的神圣律法非对称的非法性。

书写：外在性。也许，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外在性书写，但这

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这个假设已经背叛了书写不偏不倚的性质。在标明我们与圣书结盟的书籍里面，外在性根本就不能独自成功地给自己以权威力量，而当写下其名字之时，它就只能在神圣律法的空间下完成这种书写。书写的外在性散播在书页之间，而变成了作为律法的外在性。神圣之书作为神圣之法而立言。我们读书，从中读到现存的万事万物既没有被禁止也没有被允许。但是，这种既允许又禁止的结构不就是我们阅读水平的结果么？能否还有另一种解读神圣之书的方法，致使书的他者再也不被宣告在清规戒律之中？如果我们真的以这样的方式阅读，我们不就是在读另一本书么？我们不就是准备阅读缺席之书么？

初始的外在性：也许我们应该假设，它的本质就是如此，以至于若不在神圣律法的钦命之下，我们就根本无法忍受它的存在。如果禁忌与限制的系统停止了对它的保护，那又如何呢？或者，它仅仅是为了使界限成为可能而简单地存在于可能性界限上吗？这种外在性无非是一种对于界限的要求吗？只有通过一个定义我们才能思考界限本身吗？在渐渐逼近未被界限之物时，这种定义是必要的；但如果界限被逾越，这种定义又应该消逝。正因为如此，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因其不可逾越而已被永远逾越。

书写将外在性含于其内。向神圣律法生成的外在性本身就落在神圣律法的保护之下——反之，神圣律法被书写出来了，也再次落在书写的保护之下。我们必须假定，这种再度双重化的书写，一旦它直接将书写命名为差异，它就只有通过双重性来肯定外在性本身的性质，而这种外在性却永远外在于自身，发展于一种非连续关系之中。存在着一种“第一”书写，但正因为它是第一书写，它就已经自我区分，因其标志之物而分裂；如果这种标志恰恰在这里形成，它同时又仅仅是作为这个标志而存在并且自我区别，进而支离破碎，被逾越超凌，最后还惨遭废黜，以至于（在这种外在性中，断裂就存在于它被显露的地方）一种新的断裂在所难免。这种断裂

充满暴力色彩却又温柔敦厚(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被规定和被限定的),以至于在成为一种具有爆破力量的文本(一种确定的断裂行为取代了原始的碎片)之时,律法可能在禁忌的面具下拯救一个整体的许诺。

换言之,第一块碑文的破碎并未打破原始的未分化的和谐状态。反之,由此而开启的事件乃是以一种有限的外在性(凭此而让一条界限的可能性得以被宣告)代替一种无限的外在性,以缺乏代替缺席,以破碎代替断裂,以决裂律法代替纯粹一不纯粹地破裂的断简残章,而后者与神圣的区分相去甚远,而拥挤在中子的裂变(中子的裂变也是中子)之中。再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和第一外在性决裂,以至于那种在自我主宰彼此约束之中有规则地被分化又在语法上被重构的语言,让我们直接和间接地参与到第二外在性关系之中。在第二外在性之中,“逻各斯”就是律法,律法就是“逻各斯”。这些关系首先保护了话语,然后保护了辩证法,可是,律法反过来又消解了这些关系。

“第一”书写并不比第二书写更便捷,但它外在于一切逻辑范畴。它不会慷慨大方地通过迷狂的参与而授予礼物;在迷狂的参与之中,捍卫“太一”(the One)的律法不仅与其合一,而且还确保了它们之间水乳交融。第一书写,就是他者性本身,严厉而又冷酷,绝对放弃了权威,如炽热的炭火焚烧,比一切律法都无限严谨。律法,强迫书写通过言语的断裂(即言语的及物性)迂回前行,从而把我们从书写之中拯救出来。拯救,将我们引向知识,并通过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将我们引向神圣之书,然而,知识隐迹无名,延续着我们的渴望。

神圣律法的本质:甚至在它被制订之前就被侵犯了;不惟宁是,自此以后它就以遥远之名被发布在一个崇高的位置,一个遥远的地方,而排除了直接知识与知识的命定主人的一切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当其得以流传,容许流传,并成为流传的

律法，律法就只能靠不去建构的决断才能被建构成律法。如果界限不被逾越，在逾越之中被显示出不可逾越，那么，就根本没有什么界限。

但是，律法先于一切知识（包括律法的知识）而存在吗？唯独律法才敞开了这种知识，通过一个准备性的“必然如此”（it must be）为知识准备了前提条件，尽管这种条件仅仅是来自神圣之书。在神圣之书里，律法通过秩序结构而自我证明，但在建立这一秩序结构之时却又威胁了这一秩序结构。

永远先于律法，既没有被建立在追求知识的必然性之中，也不取决于这种必然性，绝对不可能遭到某些人的误解，而常常在本质上由那种特殊的违法行为所证实；违法行为暗含着对律法的参照，在其审判之中使人感到了服从于律法的权威，而且当它遭受稍许侵越之时却坚如磐石，稳如泰山。这就是（神圣）律法。

律法的“必然如此”并非本源意义上的“汝必”。“必然如此”不可用于任何一个人身上，更慎重言之，只有不用于任何人它才是律法。律法的不可适用性不仅是它的抽象力量及其不可穷尽的权威的符号，而且还是它持久有所保留的符号。律法不能说“汝必”，因此它绝对不针对任何一个特殊的个人：不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而是因为它不仅以整体之名进行区分，而且它本身就是区分，为唯一性而规约的自我区分。这也许正是律法冠冕堂皇的谎言：它自在地给予外在性以合法地位，从而使之成为可能和成为现实，自在地免于一切规定和一切内涵，从而作为纯粹不可适用的形式，即作为任何在场之物都无法与之对应的纯粹危机而自我持存，然而它不仅具体地显示在多种规范之中，而且通过联盟议约而具体显示在礼仪形式之中，以便为一种向自我回归的确切内在性留下空间，最终肯定这个不仅牢不可破而且深不可测的“汝必”。

摩西十戒仅仅是相关于整体的律法。上帝（任何语言都无法涵盖因此无法徒劳称道的名字），只有上帝，才能携带这个整体以

及指称这个整体的最高目的性。无人奋力去冲击这个太一。因此,大写他者见证,仅仅为这个唯一者作见证。唯一者是一个参照,如海纳百川将一切思想统一到尚未思考的领域,使思想不断地转向太一,正如转向思想不能侵犯的东西。因此,重要的是指出,不是唯一的上帝,而是大写的整体才必然是上帝,而上帝本身就是超越。

在对太一的伟大责任感之中,律法的外在性找到了自己的尺度;正是太一与众多的联盟,才将原始的差异当作对神灵的亵渎加以拒绝。然后,在律法本身却仍然有一项条款维持着外在书写的记忆,此时此刻它发号施令说:汝毋造偶像,汝毋再现,汝必拒绝以类似、符号和标志之名的在场。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不言而喻,禁止以符号作为在场的方式。如果书写行为本身就与形象相关,并且命名了偶像,那么,书写行为也使作为标记的墨迹外在于它本身固有的外在性;因此,书写奋力克服这种外在性,力求以空洞的语言和符号的纯粹指称来拒绝这种外在性。以律法的形式出现,“汝毋造偶像”就不是对律法的陈述,而是对先于一切律法的书写危机的陈述。

让我们承认:律法为外在性所迷恋;这种迷恋像幽灵一般纠缠着它;当它将作为一种形式而确立起来,当这种迷恋将它表达为律法,它就以分离之名和在表达过程之中从迷恋之中分离出来。再让我们承认:我们不妨将作为书写的外在性,即一种永远没有关系的关系,称之为松懈成为律法的外在性,而与此同时它也成为更紧张的关系,而具有一种集合形式的张力。我们必须周知,只要律法存在(律法找到它的地位),一切都会面目全非;恰恰是这种所谓“原始的”外在性,以从今往后就无法诉之言表的律法的名义,被呈现为一种松弛状态,一种随遇而安的中立性;与此同时,律法之外,书本之外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就无非是朝着无规矩自发性的回归,无非就是自动的蒙昧,一种不负责任的姿态,一种非道德的游



戏。换言之，从律法外在性到书写外在性之间，前程渺茫无限，归途遥遥无期；在这个语境之中，向上回归之路就是堕落之路。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接受一种堕落（尽管我们无法默认这样的堕落），除非我们接受一种以非本质之偶然为取向的本质上不确定的堕落（律法轻蔑地称之为一种游戏——一种每每将一切推向风险，导致全面失落的游戏：律法的必然，书写的偶然），否则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向上回归”。律法就是皇极（summit），除此别无他物。书写，默默延续在天堂与深渊（high and low）的仲裁之外。<sup>[1]</sup>

## 注 释

[1] 我之所以写这几页不确定的文字，是为了礼赞（和否定）那些书籍，而那缺席之书通过许诺而已经被创造在这些书籍之中；这些书出自哪些人的手笔，已没有名字可考，但因友爱之故命名如题。